



基洛夫被暗杀以后

● [苏]阿·雷巴科夫著
● 王志棣 范 彬 聂刚正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基洛夫被暗杀以后

◎【苏】阿·雷巴科夫著

（ JILUOFUBEIANSHAYIHOU

江苏文艺出版社

基洛夫被暗杀以后

著 者：〔苏〕阿·雷巴科夫

译 者：聂刚正 等

责任编辑：许金林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江苏新华印刷厂

850×1168mm 1/32 15.5印张 2插页

335,000字 199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155—1/I·147

定 价：6.5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苏联当代著名作家雷巴科夫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对“斯大林时代”作了编年史式的描绘。《基洛夫被暗杀以后》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他用写实的艺术手法揭示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我们翻译出版这部作品，并不意味着对作者的历史观和具体判断的完全赞同。他国的历史可作借镜。描写他国历史的文学作品则需要读者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细心鉴赏的。相信读者能够明辨是非，舍伪存真。

1

邮件未按期到达。甚至过了一个星期，仍然未到。但从克日马来的爬犁给售货员费季卡运来了一些货物。

萨沙到小铺子里去打听，费佳未开正门，让他从后门经过小贮藏室进屋。

“给你运货来了吧？”

“运来了点货。”

“为什么邮件没到，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谁知道！也许你要赊点什么？”

“什么也不用，谢谢。”

萨沙又顺道到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那里去。他躺在床上，用房东的打着皱褶的长皮袄把自己盖得严严实实。

“您生病啦？”

“没病。”

“那干吗躺着？”

“有什么事可做啊？”

“为什么邮件不来？”

“邮件？你还想等信件啊？现在可要给您送来另一种信件了。”

“我不懂。”

“您不懂……我们国家出了什么事儿，你知道吗？工人阶级的敌人暗杀了基洛夫同志，可您还指望能按时按点地给这些敌人送信。萨沙？！当局必须要做好准备，您懂吗，要准备好反击，使整个俄罗斯大地震动的反击。要使敌人再也不敢暗杀工人阶级的领袖，再也不敢派人来暗杀。虽然敌人究竟姓甚名谁至今还不清楚，凶手是谁也不清楚。而您呢，在彻底查明凶手及其领导者期间，在准备给敌人以毁灭性的反击期间，您瞧，您还在等信，想看报纸。工人阶级的敌人需要什么样的信件呢？他们要的是能订立攻守同盟以逃脱暗杀活动的罪责的信吧？他们要的又是什么样的报纸呢？要的是能从中了解情况、找出头绪，以便随机应变的报纸吧？不行，亲爱的，您绝对不会有这种机会的。他们没有触动到您，没有强迫您在这天寒地冻的日子里步行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去，您还得说声谢谢呢！”

“得啦，”萨沙笑着说，“别吓唬我，主要的是别吓唬您自己。”

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抬起身来，坐在床上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萨沙。

“我吓唬您？相反，我现在是要您放心。您以前经常看到卡尤罗夫吧？”

“卡尤罗夫？这几天在街上我还遇到过他。”

“您再也见不到他了。”

萨沙带着怀疑的神情看着他。

“是啊，是啊，”他重复说。“他今天夜里被人带走了。”

“夜里？”

“嗯，要看怎么算啰。凌晨的时候，约莫三个小时前，一架带后座的雪橇拉到门前，把他的那些破旧东西乱扔一气之后就把他带走了。”

“没人看到？”萨沙惘然若失地说道。

“当然啰，就连那些狗也没叫，所有的人都睡了，就这么回事。您还记得您的同伴沃洛佳·克瓦恰泽吗？”

“当然记得。”

“他也被押送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去了。从安加拉河和邱纳河来的同伙都被押送走了，所有戈尔佳温斯克的人都被押走了，那些人您是认识的，从前的社会革命党人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从前的无政府主义者阿纳托利·格奥尔吉耶维奇和弗丽达那个美人儿……他们把碰到的人都给带走。很快就要轮到我和您了。”

“难道真把他们送走了吗？”

“萨沙！您认识我不是一天了，头头们把我们这帮人判一年能说成三年，可我不是那种爱说闲话的娘儿们，不是好散布流言蜚语的人，更不是谣言传播者。确确实实知道的事情我才说。刚才我提到的那几个人和其他很多人确实是被送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去了。最近你在克日马没有碰到过那个被流放的老太婆萨姆索诺娃·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吧？”

“是的，没碰到。我认识她。”

萨沙曾替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向她转交过二十五个卢布。

“就连这个老太婆也被赶走了，顺便说一句，她已经七十二岁啦。”

萨沙耸了耸肩。

“沃洛佳、费丽达、我，甚至您，年纪还轻，可能送到集中营去，毕竟是不花钱的劳动力，这我能理解。可七十二岁的老太，即使拖也拖不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她会死在半路上的。”

“那又怎么样呢？这点谁感兴趣？又有谁对此感到不安呢？说实话，萨沙，我觉得很奇怪。命令已经下达了，对凡写有这种性质文章的流放犯都采取行动，限期立即押解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而您还在指望当地执行命令的某一位全权代表会考虑到她年老多病，可怜她……再说，他们会因她不服从命令而枪毙她的。至于她是不是死在路上，那不是他的事，他对此没有责任。倘若拖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她还活着，那就再加刑五年——集中营监禁，然后再送走，把她送到另一个地方，就是说，一直送到从名单上注销为止。报表上完全相符，在花名册上有，活的还是死的无关紧要，只要有这个人就行。死了，就做个记号，从总人数上减去一名。萨沙，一般说来我知道，象您这样的人，是个小角色，还不够格，可我和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按他们的观点，是惯犯，我们这些人就象歌词里所说的是‘大限已到’。”

“那又怎么办呢？”萨沙平静地说，“我们等着瞧呗。”

他们就这样在自己的莫兹戈瓦，在地球的边缘继续活着，他们虽与世隔绝，但却感觉得到世界上正在发生一件可怕的事，这件事大概很快就会牵连到他们。

萨沙和济达几乎没见过面。在克日马有两位女教师被解职了。其中一位女教师的丈夫是流放犯，他被遣送到克拉斯

诺亚尔斯克去了，另一位女教师本人过去是流放犯，是流放期满后留在克日马的。虽然从前这是尽人皆知的事，但是现在，在基洛夫被暗害以后，又开始了新的时期，全国正在清洗“嫌疑分子”，两位女教师被解职后，让济达代替她们。每天上午七点至九点，她在莫兹戈瓦教课，十点钟，一部雪橇拉到学校门口，将她送到克日马，等雪橇把她送回来时，已经很晚了。萨沙每次在街上遇到她的时候，总要停下来向她打招呼，亲切地问她近况如何。她总是将目光移开，说一切都好，只是工作很忙。

“济达，”萨沙说，“那时我错了，不该委屈你，这件事我非常后悔。如果你能够的话，原谅我吧。”

她终于抬起眼来看着他。

“算了，萨绍克，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我明白已经过去了，”萨沙说，“我还明白，坏了的东西是粘不起来的，再不能恢复到过去一样了。可我还希望我们依然是朋友。”

“当然啰，”济达婉然一笑，“当然，怎么不是这样呢。”

谈话到此为止。

以后他们再也没有遇见过，因为济达忽而在莫兹戈瓦，忽而在克日马，而萨沙则找到了工作。

1935年1月，天气酷寒。年老的安加拉人都不记得哪年曾这样冷过。他们坐在小木屋里谈论说：“这个冬天，真是活见鬼了。”

集体农庄主席伊万·帕尔费诺维奇忙得不可开交。当然，

在村里安置好二百头母牛并不难，几年前村里有两千头牛呢，各家的畜舍还保留着，农庄的女劳力也够，她们照料牲口的习惯还没被根除。

但是要看管好分散在几十家农户牲口棚里的公共牲畜可不是件容易事。母牛是从前的十分之一，可印发的养牛须知却比从前多了10倍。牛不能受寒，不能让它们吹穿堂风，可牛棚年久失修，破墙烂壁，没有牲口的时候，谁去管它啊。

集体农庄建造这个乳牛场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确切地说，这不过是一座两排的大牛棚。但是经常停工，不是被这件事干扰，就是受另一件事牵制。木材去年就已经运来，料子倒还不错，是落叶松的，但很潮湿，因此一直在风干。预算已经批准，预算里有“采伐材料”这一项，因此放倒落叶松，砍掉枯枝，从森林里运回来——这一切都是根据预算按章办事的。去年就这么做了，甚至有部分工作前年就已开始……现在到了该建造的时候了。

区里开始打建造乳牛场的报告，以前还没有任何地方建过这样的乳牛场……到处都是私人的畜棚。领导当然惊慌起来了，倘若将这情况报告边区，这就意味着将因破坏畜牧业的发展而受到审判，他们会把死掉的每一头牛的罪名都转嫁到这件事上，还可能将此当作破坏行为枪毙你。以前曾下达过一个命令——在开春之前，母牛产犊之前，乳牛场一定要建成。

伊万·帕尔费诺维奇组织了一个生产队，让萨沙的房东萨瓦·卢基奇任队长。萨瓦·卢基奇过去是个很好的木匠，其实在农村里，人人都是木匠。

“也许你能帮上忙，”萨瓦·卢基奇对萨沙说，“他们把劳动日开给我，我交给你。”

“那伊万·帕尔费诺维奇怎么办？”

“他就是这么吩咐的。”萨瓦·卢基奇直率地回答说。

于是萨沙干起了木匠活。

生产队里有六个人：萨瓦·卢基奇、萨沙和其余四个庄稼汉。他们将圆木斫平，平放在横木上，用扒钉从圆木的两侧固定起来，再用一种在篝火上烧焦的木炭所染黑的细绳穿扎起来，每根木头都留有斧劈斫砍的痕迹。

萨沙砍圆木的两面，使每个棱边宽25公分，招呼庄稼汉将木头翻过身来，固定好，再砍其余两面，这样就砍成四个棱边，接着再砍角，圆木就做成了。

萨瓦·卢基奇从圆木旁走过，看了看。

“行，干吧！”

“年轻小伙子，刚下的鸡蛋。”几个庄稼汉温厚地笑了一会儿说。

萨瓦自己动手把圆木的一端砍成“棒子”。萨沙也做了一个，同样做成功了。圆木两边堆满刨花、木屑，发出阵阵新鲜木头的香味和寒气。

他们运来铺路用的鹅卵石，实际上是一些大石块。这里很冷，一般不挖地基，人们就在石头上放上框架，用厚度为13—25毫米的薄板钉成门窗洞，再用薄板遮上。

萨沙将圆木砍成上、下框架，还和一个庄稼汉一起把一根根圆木锯成两米长短，每根圆木上砍一道槽，以便塞干青苔。

“如果没有木楔和干青苔，这木匠活也就干不成了。”萨瓦·卢基奇常这么说。

在家里他沉默寡言，总是在院子里做些什么，可在这儿，

在上班的时候，说个没完，而且爱说俏皮话。

其余的庄稼汉做薄板、厚板，一个上一个下地拉锯。他们干得很欢，从不发火动怒，即使有谁锯走了样他也总是心平气和地重锯，甚至还开玩笑说：

“别担心一下子敲到你的娜斯佳身上！”

现在萨沙睡得很早，天刚拂晓他和老人就起身，老妈妈已经为他们做好了早饭，他们吃了以后就去上班。

晚上，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偶尔来他这里。

他们似乎已变得无精打采，虽然他自己想振作精神。曾有一个妇女从克日马来找他，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忙了一阵，准备招待她。那个妇女很瘦，显得有些早衰。

有一次，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白天到他们的牛棚里来，老人先发现了他。

“萨尼亚，有人找你。”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挥动起一卷印刷品。

“邮件到了！我拿到了您的报纸和信。”

“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谢谢你，亲爱的！”

萨沙从他手里拿过几封信，脱下了手上那双鹿皮制成的、冬天套在手上干活十分方便的手套，再取下里面贴手戴的毛线织的连指手套，拆开一封信，先看了看写信的日期，随即打开信纸，因为瓦里娅的附笔通常写在最后。可这封信上瓦里娅什么也没写。他又拆开第二封，又没有。

拆开了第三封信，终于有了。

他连看到她写的字迹都兴高采烈。

瓦里娅写得很简短：“一切如常。我活着，我在工作，我

在思念……我们在等着你。”

她还能公开地给他写些什么呢？什么也不能写……就象他写给她信一样。但他看到这两三句话也就够了。主要的是她在等着他，主要的是他待在这倒霉的莫兹戈瓦已经将近两年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以后，不管他们会不会让他住莫斯科，他们终归能见到面的！

他微笑着分别将信塞进自己的两个口袋。右边口袋里装没有瓦里娅附笔的信，左边口袋是有附笔的信。

“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请到我那儿去，您先看会儿报纸，我们马上就来。”

萨瓦·卢基奇心地善良，简直是位不可多得的好老头儿，他卷了一根纸烟。

“瞧你干吗把信收起来，看吧，看吧。”

“待会儿再看。”萨沙回答说。

天开始渐渐发黑，他们收了工，将工具放到工具箱里，藏在圆木中间。

在家里，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递给萨沙一张报纸。

“您看吧！”

“请等一下，先让我把衣服脱了。”

萨沙脱了短皮外衣和帽子，把鹿皮手套和连指手套放在火炉上面，换了双鞋，然后拿过了报纸。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基洛夫被刺后立即颁布的关于审理恐怖活动的一份决定宣布：

“根据对反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的恐怖组织、恐怖活动案件进行侦察和审理的结果，各加盟共和国

将现行刑事诉讼法作如下修改：

1. 对这些案件的侦讯限期不超过10天。
2. 在法庭审理案件前一昼夜，起诉书送达被告。
3. 审讯案件时不准旁听。
4. 对判决不得上诉，不得请求赦免。
5. 对处以极刑的案犯，必须按照判决书立即执行。”

“是啊，”萨沙若有所思地说道，“还不坏。”

“这是战时的法律，”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说道，“不过现在似乎没有打仗。没有任何国家、政权敢于剥夺被告的辩护权，而这个决定却不仅不准被告请律师辩护，而且褫夺了本人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倘若起诉书交给被告仅仅一昼夜，他根本无法准备辩护词。谁也不敢剥夺被告上诉的权利，要知道，法官也是人，他们也可能犯错误，谁也无权剥夺被告期望赦免的权利，没有仁政的国家是无法生存的。这一决定比战时法律更糟，因为它指的不是杀人行为，而是泛指反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的恐怖活动。亲爱的萨沙，这个概念是有伸缩性的——借口恐怖活动，可以想怎么整人就怎么整，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人员的范围怎么理解可以随你的便，上至斯大林，下至庄稼汉威吓要狠狠揍的那个故意替他算错劳动日的农庄记工员。这是一个消灭无辜、消灭无法自卫的人们而不受任何监督的决定。这是一项维护大规模违法行为的法律。”

他摇了摇头说：“您还记得普希金在听了《死魂灵》前几章后对果戈理所说的话吗？‘上帝啊，我们的俄罗斯多悲惨呀！’颁布了这么个决定后又能说些什么呢？也说‘不幸的俄罗斯’

吗？还请您注意，工作效能有多高：12月1日基洛夫被刺——一项新的法律就已经拟好，而且正式颁布了，这点你觉得如何，啊？”

“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我从未对您讲过我的那个侦查员。他姓季亚科夫，戴一副眼镜，是个极其冷酷无情的人，少有的混蛋。我们的案子是他办的。您知道，当时他还因我没有在审讯笔录上签字而生气，噘着嘴说：‘在党面前你还不愿缴械。’臭狗屎！我怎么忘得了他？的确……要是这个决定在半年前出台，他可能控告我搞恐怖活动哩。逻辑很简单：为什么您在墙报的节日专刊上不提斯大林同志的名字？因为您反对斯大林同志。您不愿意他领导国家和党。但您怎么才能撤他的职呢？只能杀了他，杀了我们的父亲和导师，杀了我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嘴，您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那还用说，这种事情一般是不对外讲的。可这个企图您是深思熟虑的，一旦有合适的机会和有利条件您就会实现您的企图的。您是一个潜在的恐怖分子，您的那些朋友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你们所有的人在一起就是恐怖组织。对你们这些人，审讯时就是不准辩护，判决后就是无权上诉，审判后一个小时就得枪毙。”

“对，”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表示同意，“就这点来说您还是走运的。”

萨沙冷冷一笑。

“这么说来，我简直是个幸运儿了。我们是不是要为此干一杯呢？”

“我不反对。顺便还要向您解释一下，为什么您确实是个幸运儿……”

萨沙还有少许用酒精做的饮料，女房东切了一些熏鲑鱼，在炉子旁忙碌起来。

萨沙反复读了这些来信，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在浏览报纸。

“萨沙，发生了什么事啊，到处都在审判，枪毙了一大批人，列宁格勒成千上万的贵族、过去的有产者和他们的子女都被流放了，可他们犯了什么罪？人民呢？！人民默不作声？您说什么啦？！人民不会沉默的，不会不讲话的，决不会！您瞧，您读读，人民要求镇压。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敖德萨，全国各地都在开群众大会，到处都在揭发、在消灭、在枪毙！党也没有按兵不动！在大大小小的党的各种会议上搜出了大批隐藏的敌人，不少共产党员悔悟了，他们捶胸顿足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说自己注意不够，没有做好工作。可是不行，这无济于事。这种悔过被认为是不够，不是发自内心的。”

女房东从炉子里拿出装有土豆的小铁罐。

萨沙喊萨瓦·卢基奇到桌边来吃饭。他们一起坐下，每人干了一杯，就着酒吃了点东西，又斟上第二杯。

“我究竟为什么是个幸运儿呢？”萨沙问道。

“因为您现在在莫兹戈瓦，”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一边撕掉鱼皮，一边回答说，“您现在生活在消过毒的环境里。倘若您现在是自由的话，那么您也得参加这种群众大会，也得揭发、枪毙、消灭。”

“我可以不参加嘛。”

“不行。您要是在企业里工作，群众大会您是怎么也溜不掉的，这种缺席审判您再也逃避不了。我不是仅仅说您一定得

发言，非得用手指点着什么人，称他为敌人、敌人的帮凶或者怙恶不悛的、暗藏的等诸如此类的人。这还不够！您还得和大家一起表决，赞成枪毙他们，您必须举手，因为如果您不伸出手来，如果您投反对票，这就意味着您是敌人，立刻就会把您带到该去的地方。”

“就算这样吧，要是您，会怎么办呢？”

“我？嘿，这吓唬不了我。只要苏维埃政权还存在，我就没有其他路可走：除了流放、蹲集中营、坐牢以外，还是蹲集中营、还是坐牢。我倒是希望能在集中营或者牢房里开这种群众大会，不过他们没考虑到，在牢房或集中营里谁也不会举手赞成的。”

“但是我们从理论上假设，如果您已刑满释放，现在住在某个小城市里，已经有了工作，上班时开群众大会，声讨敌人，要求枪毙他们，大家都表示同意，自然最后要付诸表决，那您怎么投票呢？”

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默不吭声，不住手地剥熏茴鱼的皮。

“喂，这样的话，您怎么办呢？”萨沙问道。

“我不知道，萨沙，说真话，我不知道怎么办。在这些群众大会上有很多人，他们都由衷地相信报纸上所说的，都相信由于反复宣传使他们印入脑海的那些事情。也许还有很多人，他们并不相信，但想到他们的孩子还未成年。”

“您没有孩子。”

“没有。坦白地告诉您，大概我也会举手的。因为胳膊拧不过大腿，因为如果我一个人去上断头台，最终仍然什么也不会改变，他们还是要被枪毙，我和他们一起同归于尽。而

他们往往招认了一些什么，他们悔过了，我干吗要为这些软弱的人去牺牲呢？要知道，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知道，过去他们自己就把很多人置于死地，现在别人又把他们送到死路上去，我干吗要保护他们呢？”

“可是您刚才说，现在他们流放的是过去的贵族、过去的有产者和他们的子女。孩子们呢，过去他们可从没有置任何人于死地。应当受到保护。”

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终于剥净了茴鱼上的皮，咬了一口。

“多好的鱼啊，味道好极了。您提的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萨沙，一个十分严肃而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但是，萨沙，这个问题对你有现实意义，而不是对我。因为我再不会有二者必择其一的情况出现，我走的是另一条道。而您呢，萨沙，您正走在这个国家正常运行的轨道上，您不会从这条道上脱轨的，您所面临的将是这个问题。”

“得啦，怎么啦，”萨沙说道，“等出现这个问题的時候，我再来解决吧。但您的答案对我不合适。”

“我也常常否认我的答案，认为这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答案。”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说，“刚才我只不过是说任何一个明智的人如果处在我的地位将会怎么办；他将会举起手来，他将会象大家所做的那样去做。俄罗斯的悲剧就在这里。我不是在谴责任何人，人民总是人民，人总是人。”

“可‘人民的特殊任务’究竟是什么，而人民的‘特殊使命’又是什么呢？人民信仰‘基督教、东正教的起因’到底是什么呢？”

“萨沙，您用这样一些肤浅的问题，就想驳倒我们的……

或者这么比方说，我的哲学？”

“我虽不是哲学家，”萨沙表示异议地说，“但我坚定地认为，任何民族都没有一个当救世主的角色，都没有特殊的救世任务。不存在超民族、超人民，有的只是人们，好人和坏人。需要建立一个这样的社会，在那个社会里，任何势力也不能强迫人们成为坏人。”

“一切有关完美社会的设想，萨沙，都是幻想。”

“是的，完美的社会是没有的，大概也未必会有。但努力使其成为完美社会的那种社会，就已经是非常好的社会了。”萨沙说道。

“不知为什么，看不出我们的社会过去曾向这个方向努力过。社会——就是很多人，而我们现在却正在把他们变为非人，”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站起身来说，“我要走啦，明天我即使睡一整天也不要紧，可您还得上班呢。您要明白，他们连木工活都委托给您干了，可我就不能干这个活儿。”

萨沙笑了。

“我有靠山。”

他指指房东。

“萨瓦·卢基奇帮了忙。”

“为什么不帮忙？”萨瓦·卢基奇说。“要完工。领导命令！”

“要是我，您也会收留的。”

“您是一个聪明人，学者，”萨瓦·卢基奇说，“您会觉得干我们这种活不体面的。”

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走了。

萨沙将母亲的几封来信看了又看，又仔细看了一眼瓦里

娅的附笔——虽然她写得又简短又克制，但他还是在这几句话里找到某种隐藏的含意。“我活着，我在工作，我在思念……我们在等着你。”

他写给她信也是这么简短，每一句话都是经过反复斟酌的：“亲爱的瓦莲卡，每当我收到邮件，我都要马上看看，你是不是寄来了点什么。”兴许，她也会发现他写的这几句话里的含意的。

这就是他能让自己做的一切。在莫斯科时他从未表露过对她的特别关心，现今他所表现出的这种关心只能解释为是出于对自由的渴望，对熟人的怀念，只不过是因女人而产生的烦恼。萨沙不愿意成为被人误解的人。

也许她写上：“我多么想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呀？”这句话，说明她的态度表现得更勇敢、更坚决一些了，可也许这是他的臆想，她只不过是鼓励鼓励他，因为她是个好心的姑娘，有一颗善良的心。

“我活着，我在工作，我在思念……我们在等着你。”当然，这几句话里面还是有点……即使话里没有什么含意，她的这些有节制的附言，他已怀着激动不安地心情等了很久。瓦里娅对未来的坚定信念一直使他相信能如愿以偿的。

妈妈的来信语气虽然很平静，但在她的信中有某种事情使人有所警觉。妈妈在一封信上谈到薇拉婶婶的情况时说：“薇拉从别墅里搬走了。虽然在那里冬天完全可以住，但她不愿为木材和炉子花许多时间和精力。”在告诉他的这句话里没有任何特别的意思，可在第二封信里妈妈又写道：“薇拉把别墅关了整整一个冬天。”为什么接连在两封信里提起她？是由于疏忽吗？也许是薇拉婶婶或者她的丈夫出了什么事？或

者是她的孩子们，他的堂弟或堂妹发生了什么事？他写信给母亲问：“薇拉婶婶、沃洛佳叔叔（这是她的丈夫）、斯韦特兰娜、瓦列拉（这是他们的孩子）的身体好吗？他们现在在哪里，情况如何？”

必须让母亲放心。在信里他请母亲在书桌抽屉里找一下他的大学学业记分册和驾驶执照（搜查时这两样东西未被拿走）。如果找到的话，他让母亲保存到他回来，这两个证明他以后都用得着。他写信给母亲的唯一目的是安慰她，要她相信他很快就会回来，以此坚定母亲心中期望儿子释放的信心。虽然他本人对释放并不抱奢望。他还请妈妈把自己的那几本描写法国大革命的书寄来。在中学时他看了很多法国大革命史的书，中学毕业后仍有兴趣，曾搜集过不少书，现在很想再读一遍。他信上还写了他现在在乳牛场工作的情况，工作很愉快，报酬也不少，够他吃饭和付房租的，因此不需要寄钱给他。

他写了很久，坐在火炕上的房东老太太对他说：

“干吗要把眼睛熬疼？铺好被子睡吧。”

“明天返程的邮班要走，”萨沙回答说，“得在邮班走前写好。”

他睡得很晚，醒来时萨瓦·卢基奇已经吃了早饭。

“我一会儿就来，卢基奇。”

萨沙迅速穿好衣服，洗了脸就开始吃蛋——一个蛋已经放在桌上。

房东老头儿已经出屋走到院子里了。

“你走吧，”萨沙在他身后说，“我一定跑步赶上你。”

萨瓦·卢基奇这时转过身来说：

“来了一架雪橇，上面有警察……”

“到我们这儿来的？”

“谁知道？”

什么也没有收拾，事先一点没有准备。萨沙慌乱地去拿信，他不愿意别人碰这些信，可是他什么也来不及收拾了，算了，让他们来吧，等他们来吧，没地方可藏了。

在安加拉的生活要结束了。将去哪个集中营继续这种生活呢？大概他再也见不到妈妈、见不到父亲，再也见不到瓦里娅了。

他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抽起来，看了看窗外，窗上蒙上了一层霜，什么也看不见。他留心谛听，听不到雪橇吱吱嘎嘎的响声。

只听围墙的篱笆门砰地一声，接着屋门被打开——原来是萨瓦·卢基奇回到了屋里。

“危险过去了，萨尼亚，”他画了个十字，“谢天谢地。”

“他们去哪儿啦？”

“拐到那边去了。”

拐到“那边”意思是第二个拐弯的地方，第一个拐弯叫“这边”。

究竟冲着谁来的？大概是冲着马斯洛夫来的。

“卢基奇，我到那儿去看看，等会儿去上班。”

“去，去吧！”老人说，“别着急，活儿我们能应付得了。”

雪橇停在马斯洛夫住的屋旁等着。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和彼得·库兹米奇也站在那里。

萨沙刚走近屋子，马斯洛夫手上拎着箱子，肩上扛着背囊从门里走了出来。他是什么时候收拾好这一切的？难道他

平常就把箱子整理得很好、时刻作好准备的？

马斯洛夫前面有一个带枪的民警，身后跟着另一个高个儿持枪民警，挺直了身子，鄙夷地撇着嘴唇。

马斯洛夫将提箱放到雪橇上，然后取下肩上的背囊，也放上了雪橇。

放好以后，他向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转过身来。他们互相拥抱，互相吻了一下。又和彼得·库兹米奇拥抱，热烈地吻了一阵。接着向萨沙伸出了一只手，萨沙握了握他的手，看了看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眼睛。

然后问道：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您什么话也不想向奥莉加·斯捷潘诺夫娜转达吗？”

“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那儿有地址，他会写信的。”

他想了一下，补充说一句：

“谢谢你们还记得她……”

2

萨沙到工地去了。庄稼汉们将一根根方木按两米间距放在框架上，隔成一个个单牛栏，装上榫头，使其没有伸缩余地。

活计干得漂亮又精细。萨沙十分惊讶，用这样简单的工具：斧头、大小锯弓、各种凿刀、各种粗细刨子，竟能做出这样的活儿，仅借助铅垂和水平尺，居然能使活儿做得这么精确。

他本来也可能干这种活儿的，但他今天来晚了些，仍把他派去砍圆木上面的框架。

“去送那位同志了吗？”萨瓦·卢基奇问道。

“去送了。”

“他们把他赶到哪儿去了？”一个皮肤黝黑、长着鹰钩鼻子，身子干瘦的叫斯捷潘·季莫费耶维奇的农夫关心地询问。

“谁知道。”萨沙回答说。

“也许刑期满了，”萨瓦·卢基奇说。

“您是说，让他自由了？”斯捷潘·季莫费耶维奇冷冷一笑。“让他自由不会由民警送他的。”

“克日马农民议论纷纷地说，有一个领导人被杀害了，是报纸上登的，”一个农民说，这个农民也叫斯捷潘，但父名不是季莫费耶维奇，而是卢基扬诺维奇，“凶手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他反对搞集体农庄，就是说，他想解散这些集体农庄。”

“现在解散集体农庄还有什么用，”斯捷潘·季莫费耶维奇又冷笑了一下，“有什么东西好分？什么东西都被破坏了。……”

“哎，算了吧，”萨瓦·卢基奇提心吊胆地看了看四周，“可见，你又忘了疼啦。”

“怎么忘了疼？！”

“要不，你就听天由命吧，”萨瓦·卢基奇说，“就是说，上帝怎么安排就怎么样。”

“上帝，上帝，您什么都推到上帝身上。”斯捷潘·季莫费耶维奇恼火地回答说，“您的教堂在哪儿？上帝什么事也没为您做，这个牛棚上帝会替你盖起来吗？把牛搞死的是我们，现在建造牛棚的也是我们。”

“那你就别造牛棚嘛，”另一个农民说。他叫叶夫谢伊，他的父称是什么，萨沙不知道，人们都干脆叫他叶夫谢伊，有时还给他加上个很不好听的韵脚。

“离开这个牛棚你到哪里去？”斯捷潘·季莫费耶维奇愤恨地答道。他指了指萨沙说：“瞧，这些人，刑期一满，他们就走了，愿到哪儿就到哪儿。可我们呢，我们农民无处可去。我们是没有身份证的人，只能呆在一个地方——坐在这儿，不准动！这就是给你的自由！”

“什么样的毒蛇让你受不了啦？！”萨瓦·卢基奇说，“你知

道，要是有人听到你的这些话，他再到处乱说，会造成什么后果呀？”

“我知道，”斯捷潘·季莫费耶维奇阴沉地回答，“我们会因为这完蛋的，可如果我们不开口呢，也是倒霉。”

“我们的任务是干活，刚才我们已经谈了好一阵子了。”

果真，已经快到中午了。于是他们又干起活来。

农民们想聊聊，可又为什么不谈，看得出，萨沙在这里妨碍他们，他是外人，他们早就懂得，有外人在场，最好是三缄其口……多么可悲的情景啊……

又过了一星期，彼得·库兹米奇被叫到克里马去了……这次没有来民警，只不过通过村苏维埃下了道命令：某日报到。

“兴许是释放吧，伙计们，啊？”他注视着萨沙和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的眼睛，寻求他们的同情和支持。“我的刑期早在11月份就满了。”

“如果刑期已满，您干吗还呆在这里呢？”萨沙问道，“要是他们想起来就好了。”

彼得·库兹米奇摇了摇头。

“这样想起来是危险的，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你得注意，说不定他们会硬给你加刑……要知道，他们没把我们象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那样带走，因为我的那篇文章不是政治性的。”

“不是政治性的！”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冷笑一下说，“经济反革命，一篇蛮不错的文章。”……

“算了吧，”萨沙打断了他的话，“您到克日马去就知道了，以后再告诉我们吧。”

彼得·库兹米奇去克日马以后，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对萨沙说：

“瞧吧，也许会把他的放掉，——这是一部官僚主义机器……有这么一张卡片，刑期也满了，就是没有释放令。当然，现在是在基洛夫事件以后……不过，鬼才知道呢，我们等着瞧吧！”

傍晚时，彼得·库兹米奇回来了，他兴高采烈，激动不已。他自由了！他拿出一张纸来给大家看：“服刑期已满……按人民委员会关于公民证制度决定的第二条执行。”就是说，有一个缺陷——不能住在大城市。

“为什么我要住大城市，”彼得·库兹米奇激动地说道，“我不需要住在大城市。我是在旧奥斯科尔出生和长大的，那儿有我的妻子、女儿和亲戚，我就在那里过日子。”

“您有钱乘火车吗？”萨沙问。

“我到得了的……去克日马前我已经和邮递员商量好了，行李费——10个卢布。到旧奥斯科尔的车票，我想，大概要25到30卢布。总起来说，在50卢布之内。50卢布我能想办法弄到。”

“那喝的，吃的……”

彼得·库兹米奇挥了挥手。

“饿不死的。房东要替我烤很多面包干，送我干鱼，还有鸡蛋，车站上喝开水都是免费的……请你们放心，我一定到得了那儿。”

第二天，彼得·库兹米奇搭农庄的便车去克日马了。在

和萨沙、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告别时，哽咽了一下，似乎他因自己的运气好而感到难为情。

“会有机会的，你们的一切也一定会顺利解决的。”

“会有机会的，会有机会的，”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用亲切而又自嘲的口吻重复说，“您就安安稳稳地在那儿过日子吧，别开小铺子！”

“看您说到哪儿去了，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老人吓得跳到一旁说，“眼下这个时代，开什么铺子哟！能当个售货员就谢天谢地啦！”

“最好去当个看门的。”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说。

“这是为什么？”

“安稳些。在商店要对物资负责，容易被人乘机吹毛求疵。而当个看门的——您可以裹件皮袄坐在那儿，烤火取暖……”

“不，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这怎么能行呢？我的那个行当从小就会干了，我还能做些有益的事呢。”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爬上雪橇……驾雪橇的人猛然一拉缰绳，马拉着雪橇跑动了。

“再见吧，愿上帝保佑你们，”彼得·库兹米奇大声喊道。

“这个人什么也不能明白，”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忧郁地说。

彼得·库兹米奇的被释使人们的情绪稍有振作。况且很快又传来了另一个消息：扎伊姆卡村里瓦西里神父刑满释放

了。就是说，不是统一行动，而是部分的，不是全盘解决，而是分别处理。

但是，又一个星期后，一个小姑娘跑到牛棚，对萨沙说：

“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叫你。”

这个小姑娘是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房东的女儿。萨沙立刻明白，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要被遣送走了。

萨沙见到他时，他显得那么朝气蓬勃、精神抖擞，正在收拾东西。从前由于前途未卜，终日处于等待状态，反而感到如坐针毡，现在一切都定了——又走上另一条路；现在他已确实地知道等待着他的的是什么了；为了忍受等待他的一切，需要毅力，需要对一切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有命令要您报到？”萨沙问。

“有什么区别啊？！克日马要来人带我了。克日马地方很小，可看得出，最后一站是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您不会到那里去的，这使人感到有点希望。不过，以后还有不少站呢。萨沙，所以您得对一切有思想准备……您要明白，利季娅·格里戈里耶夫娜·兹维亚古罗还没有被押解上路，而根据现在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的性质看，她也一定会被押走的。您瞧，现在还没有触动她呢。这就是说，以后的事多着呢。这是给您的，”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指了指一叠书补充说。“我知道，您不太喜欢读哲学书，可这里有几本书，虽旧了，但挺有意思，我是一直带在身边的……再说反正要被他们没收掉的……倘若您要被遣送走，那就随便留给谁，万一不行，就扔了吧。”

“谢谢，”萨沙说，“您路上还缺什么东西吗？”

“好象都有了。”

“您现在什么也没有，”萨沙说，“保暖的内衣没有吧？”

“我已经不习惯穿保暖的衣服了，就穿随身衣服走。再说冬天快完了。”

“猎装我没有，可绒布的衣服我有两套呢。还有一双羊毛袜子。”

“我这就够了。”

“我还有一件不穿的高领绒线衫，您带走吧。”

“萨沙，什么也不需要……他们会把犯人的东西全部给没收的。”

“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之前不会被没收的……我见过您常戴的那副还是涅夫斯基时代的老古董手套。”

“不，我的那副手套还好好的呢……”

“我送您一副很好的驼鹿皮制的无指手套，戴在手上可暖和呢。鞋子有吗？”

“我的鞋子好得很，您瞧，是毡靴底的。够了，萨沙……一应俱全，就是没有钱。但现在国家养我。”

“您到底是从哪儿知道他们是冲着您来的？”

“我知道，”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简短地回答。他不忌讳萨沙，信任他，但以前他从未请任何人到他这儿来，因为这里的生活就是这样，什么人都不该找。

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的东西似乎不多，塞满一只背袋就够了。

“瞧我已拾掇好了。”

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坐到长凳上。

“萨沙，我想对您说几句临别赠言。和您分别我感到心里

很难过，说真话，我很喜欢您。虽然现在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我和您是属于不同营垒里的人，但我喜爱并尊敬您。我尊敬您并不是因为您能坚持自己的信念，象您这样的人还多着呢。但您的信念不同于其他人的信念，在您的信念里有一种人性的成份，没有受阶级的、党的观念的局限。也许您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点，您的信念是从人类的真正理解中得出的结论。就这点说，我很敬重您。不过，我比您年岁大，经历的事比您多。请您不要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要接近一些生活。否则生活将会置您于死地的，或者，更可怕，会把您毁了的，那时……恕我直言，理想主义者有时会成为崇高、神圣的人，但更多的是变成暴君和残暴专横统治的卫护士……大地上有多少邪恶行为被崇高的理想所掩盖，有多少卑鄙行为被崇高的理想证明是正确的啊。我说的话您不会见怪吧？”

萨沙微微一笑。

“您说哪儿话，难道能对一个人的看法见怪吗？对您的理论我不准备辩论，对我的前途我自己也不能担保。我要讲的只有一点：我生活在地球上，我是地球上一个普通的人。正因为这一点，我不是您所理解的那种理想主义者，我是我自己所理解的理想主义者；我认为一个人应当信奉某种思想，但这种思想应当是富有人性的、人道的、正义的思想。在这一年的监狱、羁押和流放生活中我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人的生命和人的尊严更为珍贵和神圣。谁企图谋害人的生命，谁就是罪犯，损害人心中的人也是罪犯。”

“但是这些罪犯必须受到审判。”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指出。

“对，必须受到审判。”

“瞧，您的论点中已经出现漏洞了。谁是法官？”

“我们不要把问题搞得那么深奥。我现在重复一遍：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是人的生命和人的尊严。如果这个原则被主要的、基本的理想所承认，那末人们将对各种个别的、局部的问题作出回答。”

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仔细倾听他的议论。这时门口响起了雪橇发出的吱吱声。

“是这样吧，找我来了。”

“您跟他们磨蹭一些时间，我马上就回来。”萨沙说。

他奔出屋子，门口停着一架雪橇，雪橇上坐着一个驾橇人和一个民警。

萨沙奔到家里，急忙拿了两件绒布内衣、一件绒线衣、一双驼鹿皮手套，又添了两件衬衫，回到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那里。

“喂，您把这些拿来干吗？”他皱起眉头说道，“您瞧，我这背包装得满满的了。”

“不要紧，塞得进去，您把包打开！”

他们将萨沙拿来的东西都塞进了背袋。

“对了，这是奥莉加·斯捷潘诺夫娜的地址，加里宁市。我已写好了一封信，现在只有指望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寄出了。不过到那里也许我直接被送进监狱。所以还是您写封信给她吧——两封信里总有一封信会寄到的。”

萨沙将写有地址的小纸片放进了口袋。

民警和驾橇人喝完了茶，走了出来。

他穿好了衣服，拿起背袋，放到地上。“喂，怎么样，让

我们告别吧，萨沙。”

他们互相拥抱、热烈地亲吻。

“我和您还没争论完呢，”他微笑着说。

“也许以后什么时候我们会争论完的。”萨沙说。

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到厨房里去向房东夫妇告别，走出屋来，将背袋放上雪橇。

门口站着一个小姑娘，肩上披着一件短皮袄，她是房东的女儿。

“喂，再来一次！”

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和萨沙又一次热烈地相互亲吻。

他坐上雪橇，用车毯盖好了双脚，快活地说了一句：“走吧，怎么样！”

雪橇吱吱轧轧地响了起来……

萨沙站在那儿，凝视着他们的背影，一直目送他们到转弯的地方看不见为止。

小姑娘也一直站在门口望着。

莫兹戈瓦的流放犯只剩下两人了：萨沙和莉季娅·格里戈里耶夫娜·兹维亚古罗。

3

可是在阿尔巴特街却一切如常。

日子仍然那样一天接一天地过着，似乎没有人被流放、没有人坐牢，没有人被关进劳改营，没有被监禁的人。

那些被监禁的人的熟人、这些熟人的熟人还象过去那样生活着。他们的情况，一般普通劳动者的情况，他们的光荣事迹，在报纸上刊载、广播里报道，在各种会议上的谈论。

象萨沙·潘克拉托夫这样的人，也同样在报纸上、广播里报道，在各种会议上被谈论着，但对他们，是象对待必须消灭的敌人那样来报道和谈论的。那些支持他们、同情他们的人，也必须消灭。

因为谁也不愿意被消灭，因此对那些必须被消灭的人的情况就没有任何人表示怀疑，这些被消灭的人没有经过审判，他们的罪过也只是从报纸的简讯上有所了解。

比较保险的是根本不去谈论他们的事。最好是谈论别的。譬如，谈谈那些在极地作考察的勇敢的飞行员，去年他们从北冰洋的冰原上救出了遇难的“切柳斯金号”轮船的全体船员。如果说有谁头脑里产生这样的想法，认为从监狱里救出无辜者和救出“切柳斯金号”的船员一样重要，他们也不会

公开地说出自己的想法的。

尤里·杰尼索维奇·沙罗克现在戴上了有横杠的军衔，他是一个民警机关和刑事部门的老侦缉人员，直接听命于第一处处长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武特科夫斯基及其副手施泰因。他也受季亚科夫的指挥，充其量只不过是处长的助手。

武特科夫斯基和施泰因都很器重沙罗克，因为他办事认真、勤勤恳恳、任务完成得很好，而且也是个有发展前途的人。在这里，谁要是不仅能“突破”受侦讯的人，不仅能逼使其认罪，而且主要的还能使受侦讯的人供出关系网，造成不是单个人作案，而是有组织的案件，这种人就被认为是有发展前途的人。而被招供出的那些组织的成员，照样也要牵出新的关系网。这样一来，就能造成一种业已开了头需要继续追下去的形势，以此保证惩罚机构能连续不断地发挥作用。

沙罗克对此心领神会，很快就掌握了这个窍门。他还领会了很多其他道理，其中包括这样一条道理：不要抓住任何人的辫子不放，虽然别列津很赏识他，沙罗克却和他保持一定距离。他做对了，别列津名扬远东了，的确，他被调去当大官儿了，官衔还保留着。可毕竟把他从莫斯科调走了，他手下的人也分别塞到不同的地方去了。

沙罗克在这里透彻了解到的道理中还有一条：不要过于挑剔，时刻不能忘记，你是在刀尖上走路。在这里只能奉命唯谨，要极其谨小慎微。让那个季亚科夫傻瓜蛋沉醉于自己的地位和自由放任、不受管束的生活吧，让他以为在最具有

现实意义的地区工作而昏昏然吧，一切还没到时间呢！

当然，现在他们这个处最忙。二处是管孟什维克、崩得分子、无政府主义者的；三处负责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运动——木沙瓦特分子、达什纳克党人及诸如此类的人；四处分管社会革命党人；五处负责宣传宗教和教会思想的人。现在分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部门工作十分清闲。

沙罗克要能调到那些处去工作一定很乐意。他仿佛觉得有可能调到管宗教、教会的五处去，但犹豫了一些时候，他又不想调走了。他不愿意和上帝打交道。

沙罗克不信上帝。但他对母亲虔诚的信仰采取宽容的态度——那是她的事。而且，鬼才知道他！有些知识渊博的人也信上帝，例如科学院院士巴甫洛夫就信上帝。他是一位纯粹的唯物主义者，世界著名学者，可他在科尔图希办教堂，敬奉上帝。政府当时很爱护他，斯大林同志本人对他也很尊敬。

不是上帝不上帝，而是有一种无法解释的东西存在着。是命运，还是什么呢……1934年10月的时候，他还在感到惋惜呢，由于患了该死的阑尾炎，列宁格勒扎波罗热茨那儿他没有去成。要是去了的话——现在他就得在劳改营里听粗嗓门训话了。

尤拉当时象往常一样，是在凌晨下班回家的，到7时左右，他折腾得难受，痛得再也受不住了，身子似乎折成了两段，既不能吸气，也不能呼气，一会儿向右躺，一会儿向左躺，辗转反侧，有时将两条腿弯到胸口，怎么也不管用，再

也忍不住，他呻吟了起来。

母亲在房间里急得团团转，说：“也许用热水袋要好些？”谢天谢地，父亲还没去上班，他已猜到是怎么回事，他不同意用热水袋，说道：“我们去叫应急用车吧。”

尤拉不肯，因为应急用车一定会把他送到医院去的，而晚上他得乘“红箭”去列宁格勒到扎波罗热茨那里去，到医院后可能不放他出院，这样就走不成了，要是去列宁格勒的事吹了，他又要在季亚科夫手下干活了。

“打个电话吧，”父亲坚持自己的意见。

“不要打电话，过会儿就好了。”

“不叫单位的应急用车，那就去叫市内的救护车吧。”

尤拉试图从床上坐起来，痛得直哼哼，又倒在枕头上了，不行，现在痛得无法忍受，要是救护车来，注射一针，马上就会不痛了。他指指放笔记本的地方。

父亲找到了电话号码，挂了个电话，半小时后来了一辆汽车，人们用担架将尤拉抬了出来，整幢房子里的人都看着他，门口的人都十分惊慌，汽车将他送到瓦尔索诺菲耶夫斯基大街，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医院，立即抬到手术台上，作了手术。手术后说，伤口10天后拆线。完了！列宁格勒去不成了。当时他有多懊恼、多么难过啊！结果倒是阑尾炎救了他。事后都叫人不相信这就是命！

“这就是您的运气，及时送到了这里，倘若再过两三个小时就要成腹膜炎了。”替他动手术的齐特龙布拉特教授说。他是一位最出色的外科医生，很有意思的是他的双腿是假肢。

但是，原来尤拉幸运的还不仅是他没有得腹膜炎，更主要的是他没有到列宁格勒去。

手术大约两天以后，有人给他送来了一袋水果——橙子、桔子和苹果，还有一张便条：“尤罗奇卡，你感觉怎样？你需要什么，写信给我。列娜”。

尤拉将便条放进了口袋。列娜来了！她还是来了！他已经疲惫无力，被疼痛折磨得苦不堪言，看到便条后更是百感交集，甚至喉咙里都感到痒痒起来。就是说，她还爱他，她已经原谅了过去的一切，不再吃醋了。

说真的，一个不愉快的念头一闪而过：或许这是他们知识分子玩的鬼把戏？……不论过去怎么样，在困难的时刻应当前来相助，应当表示关心、同情。体而人都喜欢这样做，要知道，他们都是些有礼貌的体面人……谁也没到他这儿来，她却来了。

只有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武特科夫斯基来过电话，询问他的健康状况；但他是首长，他理应对下级表示关怀。至于母亲，她常常来，当然，这不在其列。母亲常给他送来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给他烤了好多馅儿饼，这位糊涂妈妈，哪怕问问医生，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也好呀。他在这里什么也不需要，伙食很好，他们知道病人该吃什么，毕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中心医院啊……而列娜呢，她按知识分子的习惯：送的是柑子、橙子，这不是填饱肚子的食物，不是大馅饼搭荞麦粥，而是表示关心的意思。

其实不是这样，她到这里来并不是出于礼貌！她不可能忘记他。象她这样的一些人没有忘记他。象他这样的一些人也没忘记他。他不是没有骨气的可怜虫。他是个堂堂的男子汉！

但是，去年夏天在谢列布良针叶林里他们第一次和解以

后沙罗克所体验过的那种自豪、兴奋、得意洋洋的心情，现在他感觉不到了。高兴吗？是的！是高兴。毕竟是愉快的。

“请您回信，”护士说道。

“写字很困难……让她到这儿来一下吧。”

“到病房里来是不行的。医生先要使你站起来，等您自己能开始走路，自己走到走廊上去，我们这儿有一间专供探视病人的小会客室。请您忍耐一下，过两天医生一定能使您站起来的。”

尤拉在列娜的便条背面写道：

“列诺奇卡，谢谢你带来的东西。我什么也不需要，这里应有尽有，请放心，很想见到你。大约两天后他们就准许我下地走路了，我一定出来看你，你来吧……”

他想了一想后，又写上：“吻你”。

两天以后，医生同意尤拉起床了，就在那一天列娜来了。

他们坐在尤拉病房前面的一间小会客室里。列娜肩上披着一件医院的白大褂，罩衫上的带子来回晃动着，白大褂里面穿的是蓝色西服，白衬衣，一双高靱套靴紧紧裹着她那两条丰满有力的腿。他看到她的腿心里就不能平静，她身上的香水味撩得他心慌意乱……她美丽、健康、容光焕发，而他身上穿的却是难看的绒布大褂，大褂里面就是内衣，两只光脚套着一双拖鞋，连脸也未刮。

“你认出了我吗？”沙罗克微哂道：“我大概象个死人了
吧？”

“你别夸张，”列娜微笑说，“你脸色稍微有点苍白，在医院里这是很自然的。你要在这里待多少时间？”

“两三个星期。”

“别难过，我会常来看你的。”

毕竟是个好婆娘！虽然性情、志趣等方面与自己不一样，但是个好姑娘，挺合适！她心地善良、亲切温柔，爱他，这点他看得出，现在她又准备为他做一切事情，然而观点上还是有些不一样，这是不是所谓的按科学的方法看问题呢？

她的善良、温柔、正派、和顺，她身上令人愉快的一切品质恰恰是他所禁忌的——他不能对她坦诚相见、直言不讳，他不能露出他的庐山真面目。

对维卡——那个女情报员——当然啰，倘若她不是告密者，而只不过，比如说是他的妻子，他就能百无禁忌了。对她说话可以毫不隐瞒，可以竹筒倒豆子，无需拐弯抹角、闪烁其辞，她也能理解，说不定还能帮他出谋划策。

可对列娜却不能这样。需要虚与委蛇地去适应她对道德和道义方面的见解，但是在他的事业中，在他的生活里又能有什么样的道德和道义可言呢？再说，道德和道义是否存在呢？

她父亲的道德和道义是什么样的呢？他在当省肃反委员会主席时枪毙了多少人？他将那么多人送到阴间里去是遵循的什么道德标准？是遵照无产阶级的利益吗？是谁确定这些利益的？是党？是列宁？

好极了！他沙罗克遵循的同样也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所不同的只是确定这些利益的是党的现在的领袖——斯大林同志。可是要将所有这一切去向列娜解释是毫无意义的。他得象她那样充满敬意地去谈论人们，也象她那样，满怀同情地谈论那些被追缉和被控告的人。有一次他说了一些与此相反

的话，她虽未反驳，但露出惊恐的神色看了他一眼，把他的心绪都搞坏了。

床第间，娘儿们总是那么炽烈、温顺，使人眷恋，令人离不开她。……但要知道，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去同什么人谈谈才好……她每天到医院去看他有什么用呢？

假如他把使自己焦急不安的一切向她和盘托出，他们俩将会一起因没去成列宁格勒的事感到惋惜的，他们就会琢磨琢磨，伙伴里谁可能顶他的位置到扎波罗热茨一帮人那儿去，当然，他出了医院就可以知道了。但是，也可能季亚科夫耍滑头，不肯说出名字……可如果案子不急，扎波罗热茨也可能等他，他会在莫斯科说：“我除了沙罗克以外，什么人也不要。”

可是他和列娜谈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其实他对这些小事并不感兴趣，他言不由衷，心口不一，处处虚与委蛇地应付她，时时刻刻提心吊胆，但愿别说出不该说的话，但愿不再看见她那惶恐不安的眼神，这不仅使沙罗克感到贬低了自己，而且苦恼不堪。但他又不愿中断与她的往来……

沙罗克病愈出院了，他们的会面又从一种情况恢复到另一种情况了。

尤拉总是夜间工作，列娜是白天上班。所以没有地方见面；季亚科夫·列韦卡的住宅不能再去了，那次同维卡垮了以后，他已经够呛了。他们到谢列布良针叶林列娜家的别墅去过几次。冬天，别墅里的暖气通常都烧得很暖和，但是每逢休息日总有什么人来，弗拉德连常在那里度假、滑雪。

有一次，尤拉晚上上班的时候给她挂了个电话。她十分

高兴，问他近况如何。

“累坏了，象一条狗一样，每天在这里和一个狗崽子打交道。”

她当然马上不吭声了。她是个洁身自好的姑娘，是位公主。您得明白，他说出了她们的神经承受不了的话。他象一个擦洗用的纤维团子一样，已经精疲力竭，简直不能斟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了。

“好吧，你别烦我们的事儿啦。还是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吧。”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一切如常。”

“我只不过是给你打个电话，”沙罗克说，“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五一节我们怎么过啊？”

“你有几天假？”

“两天。”

“我也是两天，我们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吧。”

“去哪儿呢？”

“我们会想出个好地方的……还有三个星期时间哩。”

“好，我们想想吧，”沙罗克说。

这是令人陶醉的两天。专车将他们送到莫斯科近郊的一所科技工作者内部的疗养院。

“你是怎么弄到疗养证的？”尤拉问道。

列娜含糊其辞地回答说：

“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当她向管理人员出示证件时，尤拉看见证件上写着

布佳金的姓。显然是她爸爸为女儿设法弄到的。

疗养大楼富丽堂皇，但周围一个熟人也没有，列娜和很多人频频招呼。她向尤拉说了几个人的姓——都是学者，其中有些是科学院院士，他们带了妻子儿女一起来度五一节两天假日。

疗养院给了他们一个房间，窗户朝着小桦树林。桦树树枝还没长叶子，但已经仿佛包着一层隐约可见的嫩绿色的云状物了，就是说，树叶眼看就要破蕾而出了。

“只有春天桦树树干才是这样的白色，”列娜看了尤拉一眼，“你以前没有发现吧？”

不，他从未注意过。

“我已经忘记我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出城的了。”

刚发芽的小草从去年的枯叶下探出嫩绿的叶子，天气十分美好，风和日丽，春光融融，但树林里尚未全干，水在脚下发出扑哧扑哧的响声，小路还是潮湿的。所有的人都不穿大衣了，而是穿西服，妇女们卷起连衣裙的袖子，都是些漂亮的、保养得很好的、身强力壮的娘儿们。

他们打排球、打槌球，沙罗克还是第一次见到槌球，这种现在已经不时兴的游戏，看起来很可笑，那些仪表堂堂的院士和他们养得肥肥胖胖的太太们愤怒地争论，为一些尤拉不懂的槌球规则争吵不休。

尤拉观看列娜玩球，当他俩的目光相遇时，就对她报之以微笑。表面看来她很不擅长体育运动，已经成年，动作慢条斯理，可尤拉在谢列布良针叶林就确信，她游泳好极了。在这里，她玩槌球和打排球也很出色。真是好样的，是位善于运动的女子。她既生性活泼、无忧无虑，又举止文静。一双眼睛闪烁

发亮，对尤拉体贴入微。

他们是在第二天傍晚时分手的。吃了中饭以后，他们半躺半卧地依偎着休息……到该起来的时候，她躺在他的胳膊上问道：

“在这儿多好啊，是吗？”

“是的，挺不错的，”他半睡半醒地回答。

“可你要知道，我要和你分手了，尤拉，”她平静地说。尤拉觉得她甚至微微笑了一下。

她说话的意思他没能立即弄懂。

“我不明白。”

“我说，我要和你分手了，尤拉，这一次是永远分手了。”

“为什么这样突然？”

“这并不突然。这件事我不是今天才决定的。但我想和你和和气气地分手，甚至是幸福地分手。”

“就因为这件事你才把我带到这里来的吗？”

“是的。”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做得漂亮，太文雅了，很高级。可以说是女王解除自己宠臣的职务。不过我还是想要知道是什么原因。”

“原因？”她向后一靠，仰面躺下，两手垫在头下。“是不是值得称为原因……我和你已经不是孩子了，不是少年恋人。每次打电话约会已经对我们不适合了……你别认为我想和你结婚。”

“为什么？……也许我想和你结婚呢？”

她笑了起来。

“这还不够，尤罗奇卡……你也许想，可我也许不想。”

确实他也没有打算和她结婚。讲这件事是可笑的。但这触犯了她的自尊心，他感到受到了侮辱。

“我什么地方不配你？真有意思！”

“你配得上我，我似乎也配得上你。可这是在这里，在这张或另外哪一张床上。但是，在一张床上睡觉——这还不是过一辈子。”

“你怎么啦，又吃维卡的醋了？”

“你打哪儿知道我是在吃维卡的醋？在这方面我从来没有向你说过什么。”

“你虽没说过，可我知道，我什么都应当知道，”沙罗克常常喜爱讲这句话，有时用得恰当，有时用得不恰当。

“哦，这么说，我也知道。我知道维卡是为什么和以什么身份常常到那所住房里去的。”

现在他用胳膊稍撑起身子。这里既有某种含糊不清的问题，也有某种令人不愉快的味道。他原以为，她只不过是流露一些醋意罢了。原来她知道维卡是个告密者。她从哪儿知道的？是不是维卡自己承认的？那他可就被戳穿了。

“她到底是以什么身份到我那儿去的呢？”

“我不希望讨论这个题目。”

他突然在她的话音里听到了铿锵的布佳金式的坚定调子。

“我对这个题目不感兴趣。维卡是个什么样的人，很多人知道。但她自己的很多事都与你有关，这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而且再不会从我这儿传出去。所以你别担心；无论何时、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决不会使你难堪。这点你是非常清楚的。不错，当我在你那儿看见维卡的时候，我愤怒极了我

们的关系也因此而破裂了。但后来当我得知她是怎样的人以后，我明白了，是我不对。因此，那件事现在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我们要分手呢？我本来不想说，但倘若你坚持要问，那我就告诉你：我怀孕了。尤拉，我要把孩子生下来。而作为你，大概也会料到，再不会有任何雨后送伞的事了，我不会去打胎的。我将生一个儿子或女儿。我不会强迫你干任何事，连抚养费也不向你要，也不登记你是孩子的父亲，我知道，你不愿意。”

这消息倒还不错！

但是这情况本身并不使他吃惊，甚至还不如她那从未听过的、心平气和而又庄严的声音。

“为什么？说实在的……”沙罗克刚开口说话。

但她打断了他的话，说：

“你别反对啦！我所说的一切不是空话，说了是算数的。”

她没有提高嗓门，但在她的话音里又一次听到了布佳金式的那种斩钉截铁、不容反驳的语气。

“我们俩都不需要这个婚姻，首先是你不需要，何必装假呢？”

沙罗克站了起来，走近窗口，拉开窗帘，久久地站在那里。

一切都是对的。她不需要他，他也不需要她。到家里就象到了别人的家，内心永远处于紧张状态，在一起生活，还得察颜观色地相互应付，说话要词斟句酌，这简直是不可能的。

但当列娜几乎是一字不差地重复说出他站在窗口所想的话时，他惊讶万分。看来，他还是对她估计过低了。

“我们是彼此不同的人，尤拉，我们的观点不一样、价值观念不一样，我们相互之间很难理解对方。我看到你在虚情假意地应付我，口是心非，说的不是实话。这是困难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累赘。”

“你指的是什么？”

“我指的是你所说的关于萨沙的事，仿佛多亏你的努力，才判他三年流放，而不是去劳改营，似乎他的被捕对你有什么威胁。胡说八道！不过我总是把你往好处想，我常常说服自己，所有这一切本来就是这样的。”

沙罗克沉默不语。

“还有和维卡的事。我知道，你在机关工作，可是你的这种工作的事实本身就使我厌恶，给我留下了不愉快的、沉重的感觉。你们把什么事都极其卑鄙龌龊、不择手段地混为一谈了。”

他坐到床上，坐在列娜的旁边，拉着她的手，微微笑道：

“那究竟为什么那时候你到医院去看我呢？我们的关系可是你自己恢复的啊！”

“我怎么能不来呢？！……我那时心慌意乱。”列娜说：“他们把你用担架抬出来，用应急用车送走。后来我就可怜你了，假如谁也不去探望你，一个人躺在医院里太孤单了。”

“明白了……就是说，你只不过是可怜我。可我当时却指望你爱我呢。”

“我？”她陷入了沉思。“我不知道。未必……可现在我希望我们能友好地分手，我恰恰希望能在这阳光明媚的五月节日里和你分手，这正是为了让这个日子能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不应当提起医院的事，这样他就给她提供了一个不必要的贬低自己、表现自己知识分子优越感的借口。虽然那时她即将死去，而她濒临死亡是由于他的罪过，他也没有到医院去看她；而他只不过动了一次不值一提的小手术，她就去探望他，她的表现胜于他、高于他。

现在，她怀孕了，又一次将重负让自己一个人承担，毋需他操一点心，负一点责任，不要他出抚养费。恐怕那里所有的人都在骂他了。在家里嘛，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本人想必会说：“没有你那个卑鄙的家伙我们也能行，你生吧！”又一次表明他们是显贵，而他是贱民、微不足道的小人。

然而，他对她无言以对。但他应该作个答复，必须体面地摆脱这种处境。

“这几天我们过得很好，”尤拉说，“我们不要以澄清我们之间的关系来使我们度过的这几天美好的日子蒙上阴影。我明白，你已经准备好了这次谈话，又少许喝了点酒，我们不要再谈下去了，你现在很难摆脱这种心情。我们乘车走吧，等你稍平静些后，我们再重新开始谈这个问题吧。”

她摇了摇头。

“我们再也不要谈这个问题了。我再也不和你见面了，尤拉，一切都结束了。”

她伸手从小桌上拿起手表，站起来，开始穿衣服。若无其事地说道：

“今天有两班公共汽车：7点一班，8点一班。我订的7点的票，我想早一点回家。为了让乘7点钟车走的人准时上车，晚饭将提前半小时开。所以，尤拉，你快一点吧！”

4

瓦里娅进了建筑学院。她没有象尼娜所建议的那样入白天上课的系科，而是上的夜大学：她说助学金少，而她又不愿意成为尼娜的累赘。

这一理由不能使尼娜信服，几百万大学生都能靠助学金凑合着过。当然，生活不得不俭朴些，但现在大家生活都不宽裕。现在就是这样的时代。国家正在鼓足干劲，正在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为了达到这一伟大的目标，人民把剩下的最后的一点自己所必需的东西都让给别人，忍受着难以置信的贫困，瓦里娅的无数同龄人现在还在土窑和草棚子里挨冻，建设着各种工厂、电站。大学生们也都挤在六人一间的集体宿舍里，吃的是学生食堂的粗茶淡饭。而瓦里娅却在阿尔巴特街上有一个房间，她过去的那个可爱的丈夫虽然是个骗子，可终究还可以供她穿鞋、穿衣五年，所以她完全可能在白天的系科里舒舒服服地学习。

尼娜原则上不反对她上夜大学。但何必说谎呢？何必混淆视听呢？她怎么啦，难道还不了解自己的妹妹？……她了解！其实事情简单得很：在夜大学学习可以使瓦里娅摆脱一些最起码的社会工作，而白天工作又能免除她在学院里的社

会工作。要知道她本人也承认说：“谢天谢地，我现在再不去开会了。让别人去举手给他们的‘天才的和英明的’唱赞歌吧，让那些绵羊去狂热地吼叫吧！”

她也曾经向她，向尼娜这个党员说过这一点！但跟瓦里娅争论，证实某些事实毫无益处，她在这个年龄就如此容易动肝火、这样不可调和，真令人惊讶！

她的床头上挂了一张萨沙·潘克拉托夫的照片，在尼娜的照相册里也有一张这样的照片，不过那是普通的尺寸，而她床头上挂的这张是放大的，放在镶玻璃的镜框里，挂在最显眼的地方。尼娜的小桌子上方挂一幅斯大林同志的肖像，而瓦里娅挂的却是萨沙·潘克拉托夫的肖像。后者因为写了一篇按第58条第10款被认为是“反革命宣传鼓动”的文章而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如果有人到尼娜家里来，一定会认出这是萨沙的照片，顺路到这里来的邻居也会认出是他的。如果那个女邻居薇拉·斯坦尼斯拉沃夫娜看见，她一定会阴险地笑笑，一定会去告密的。现在怎么办，不准别人进房间吗？

“你干嘛挂萨沙的照片？”尼娜问道。

“你干嘛操这份心呢？”

“毕竟我们住在一个房间里，应当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尊重嘛！”

“可你挂我们这位最优秀的司机的像的时候，问过我吗？”

她指了指斯大林的肖像。

“为什么说是司机？”尼娜没有立刻听明白。

“那还用说？铁路职工就是这么写的：我们最优秀的司机斯大林。”

“不许这样说！懂吗？决不许！我挂斯大林像时你不在这

里，当时你和你的那位可爱的玩弹子球的丈夫住在一起。我尊敬斯大林同志。”

“可我，”瓦里娅冷静地回答，“我尊敬潘克拉托夫同志。”

“你尊敬，那就请吧，只是请你放在心里……没有什么可以大肆宣扬的！他是你的什么人？丈夫吗？好象你曾经有过一个丈夫，那不是他！未婚夫吗？你怎么等不及了，你已匆忙地嫁给了骗子手。是中学同学吗？你在上学时还不认识他。他和你非亲非故，什么人也不是！你为什么要把挂他的照片呢？为了向谁示威？这样做能有什么后果，你不考虑吗？因此，我预先警告你：如果你不把照片拿下来，我自己拿。”

“噢，是这样……”瓦里娅一时呐呐地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她平静而坚定地宣布：“请你注意，你只要动一下萨沙的照片，我就把你的那个有小胡子的像扯下来，拿到走廊里去当着众人的面撕成碎片。你毋需怀疑，我说到做到。”

尼娜气得火冒三丈：真是精神变态者，放荡的女人！她将萨沙奉为自己崇拜的偶像，新出世的玛格达林娜，新出世的耶稣·基督。简直是个盲目迷信的人！只凭她胡说八道的话的百分之一，他们就可以判她五年。而且尼娜必须对她负责。她说什么呢？难道以前不了解自己的妹妹的思想情绪？她和她不是住在一个房间里吗？

“我不允许你和我这样讲话！”她断然地说，“不允许！”

“也许我死活不开口，这总行了吧？”

“对，如果你没有别的题目好谈，那就免开尊口。我是共产党员，我不愿意听反苏宣传！”

“反苏宣传？难道我现在说的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什么话吗？我拥护苏维埃政权，只是你那位‘父亲和导师’我受不

了！”

“不准你这么称呼斯大林同志，决不允许！斯大林同志和苏维埃政权——是一回事。”

“对你说来是一回事。”

“不仅是对我，而且对党、对全国人民。”

“别替全国人民说话了，你们把全国人民愚弄得够了。在一份报纸上登：‘解除叶努基泽的职务以便选他为全高加索的第一把手。’而在其他报纸上登的却是：‘因政治堕落和生活腐化开除出党。’你们到处说谎！”

走廊上传来了脚步声，在门口停了下来。瞧，这可等到了，薇拉·斯坦尼斯拉沃夫娜这个坏蛋现在为萨沙的照片要窃听他们谈话的内容了。

“我再重复一遍，”尼娜转用悄悄的声音说，“我禁止你同我谈这样的话，明白吗？”她的脸涨得通红，手臂一挥，在空中做了砍的姿势。“我禁止你跟我谈这样的话，而且无论和任何人都_不准谈。”

“和你不说我能做到，”瓦里娅也压低了声音，“至于跟别人——你就别管我了。你的两只手别这么挥来挥去的！”

“你明白你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吗？”

“什么后果也不会有。我只跟一些正派的人谈。”

“这是你自己的事。可如果你再次当我的面用这种情绪和我说话，那么我们之中就必须有一个人永远离开这屋子。”

“我不阻拦你，”瓦里娅稍微眯缝上眼睛说，“不过……你可以把我打发到布蒂尔卡监狱去。”

“如果你不回心转意，也许不得不这么做。”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瓦里娅镇静地回答，“对你来

说这是非常自然和合乎逻辑的。不过你得常带些东西转交给犯人了。”

瓦里娅唱了起来：

别在冰上行走，
冰层就要破裂；
别去爱那小偷，
偷儿定会露出行迹。
一旦露出行迹，
人人深恶痛绝；
给犯人送点儿东西，
还得烦恼叫屈。

“别装疯卖傻！”尼娜呵斥了一声。

“其实，你不会送东西去的，可不是吗？送给那儿的一个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女人！别人会送来的。好吧，”她站起来说，“你放心，我和你再不会谈这个问题了。”

以后她们不仅这个问题不再谈了，而且一般的问题也不谈了。有什么问题可谈呢？各人有各人的生活。

但这并不能使尼娜满意。现在正处于严峻的、极其重要的年代，国家不仅受到国外敌人的包围，而且正在与国内暗藏的敌人进行斗争。对斯大林即使产生丝毫怀疑就意味着怀疑党、不相信社会主义事业。只有无限地、毫无保留地信任，才能团结千百万人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只有无限地、毫无保留地信任，才能保证取得胜利。在战斗中毋需争辩，在战斗中只要行动，执行首长的命令，而不是讨论这些命令。她的妹妹不仅怀疑，而且不相信和否定对于尼娜及千百万苏联人民

说来是珍贵和神圣的一切。从前她关心的是男孩子、各种小型舞会、餐厅饭店，后来嫁了个丈夫是个弹子球迷、小偷、骗子手，现在又在搞反苏宣传了。这一切将导致什么后果？什么在等待着瓦里娅？等待她尼娜的又是什么？问题还不在于恐惧，问题还在于她作为党员的诚实。倘若她掩护瓦里娅，就是怂恿她散布反苏言论，也就意味着她在鼓励她进行反苏宣传。她这行为就是对党犯罪，她就成为同谋。

但是怎么办呢？去找瓦里娅的领导人谈谈？向党组织汇报？告发自己的妹妹？！这太可怕了！要知道，如果瓦里娅被关进监狱，所有的人都会知道把她送进牢房的是她的亲姐姐。可是对这件事她又不能保持沉默。

去和阿列夫京娜·费奥多罗夫娜商量商量呢？她总是象母亲般地待她。尼娜是她特别宠爱的人，共青团员、积极分子——这都是阿列夫京娜·费奥多罗夫娜所喜爱的。尼娜从师范学院毕业以后，她就接受她到学校里去教历史，没把尼娜赶到外地去。有一次，尼娜想征求别人在有关萨沙·潘克拉托夫被捕事件的声明上签字，阿列夫京娜·费奥多罗夫娜看了声明以后，把声明撕了，并且说：

“根本就不存在这份声明。”

以后也再未提过这件事。过了一个月她又推荐尼娜入党。

尼娜对她无条件地信任。这位妇女体态丰盈，个子不高，头发又直又稀，圆圆的莫尔多瓦人的脸型，戴一副夹鼻眼镜。她曾参加过国内战争，1919年入党，在尼娜心目中她就是党的良心的化身，是她学习的楷模。

可是将瓦里娅的情况讲给她听，毕竟意味着将责任推到她肩上。她就算了解她们姊妹俩的事了，而了解在我们这个

时代——这就意味着已经承担责任了。尼娜可以保持沉默，为了以防万一，她毕竟还有个托辞——虽然这个托辞并没有说服力。也可以设想，她从来不知道瓦里娅的真实思想，瓦里娅从前在她面前从未暴露过自己的观点；或者是另一种情况：她自己觉察到妹妹心里有某些想法，曾经试图引她坦白地说出来，但谈话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一言以蔽之，到时候怎么才能推卸责任。当然，推卸责任并不体面。

但是，对阿列夫京娜·费奥多罗夫娜来说就不可能有任何可以辩解的理由了。因为尼娜已经把一切都讲给她听了。她了解情况，她知道她学校过去的一个女生说这种性质的话，就是说，她应当及时对此作出反应，但当时她却未加可否。

尼娜犹豫不决，怎么也决定不了她该怎么办。正好有一个机会帮了忙。阿列夫京娜·费奥多罗夫娜主动叫她去作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她是教育人民委员部派来加强这所学校的，因为当时这所学校以其社会成分复杂、教师思想反动、充满一种无法遏止的旧学校的气息而闻名。

她杜绝了这种气息。从外面调来了一批年轻的教师，其中就有尼娜，学校里建立了少先队和共青团组织，过去经常起哄的家长委员会也被新成立的奉公守法的委员会所代替了。

学校再也不是革命前后的那种奉行帮会式的关门主义的学校了。当时这所学校被认为是改善学者生活中央委员会——它使阿尔巴特街的知识分子有可能依旧使自己的子女离群索居、与世隔绝。现在学校接受所有的儿童入学，连“实验示范”学校的名称也取消了，这个称号就是那个改善学者生活中央委员会为提高那些老年教师、反动分子和顽固落后分子

的工资而千方百计授予这所学校的。现在学校是区里的一所按序数排列的劳动人民的中学。

这样一来，阿列夫京娜·费奥多罗夫娜就变成了普通劳动中学的校长了。而她原先在人民教育委员部和在委员部之前都担任重要工作。她派到学校来工作本来是暂时的，后来领导上把这件事给忘了。她等待新的任命已经不少年，但一直没有调令来。其结果在职务上反而比以前低了。

她到学校里来享有的那种崇高威望的光环暗淡了。她过去的那种威武好斗的做法现在不合时宜，被认为是不明智乃至可笑的表现。严格要求变成了吹毛求疵，严厉被看作是缺乏修养、容易动怒。由于她从前受的是正统的师范教育，所以渐渐和老年教师靠拢，也就是和那些严格要求学生掌握知识、不愿过分给积极分子提高分数的老教师紧紧团结在一起了，这些老教师反对作儿童学试验和类似的试验。她发现八年级学生能知道哈姆雷特的社会根源，文化知识却贫乏得令人触目惊心，连句子中什么地方该打逗号都不会，为此，她赶走了佩列伟尔泽夫〔(1882—1968)—苏联文艺学家，20年代末30年代初其庸俗社会学观点曾受到批评〕的追随者——一个年轻的语文教师，让一位过去教过孩子们句法、正字法和标点符号的老年教师重新任教。

阿列夫京娜·费奥多罗夫娜对人民教育委员部领导、对人民委员布勃诺夫及其副手爱泼斯坦的看法也同时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对人民教育委员部和这两个人的仇恨与日俱增，认为他们是使自己降职的罪魁祸首。

但并非所有人都忘记了她，还有一些过去和她并肩革命的人尊敬她。

她从这些朋友那里及时得悉了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作出了一个决议的消息。决议里说，目前历史教学太抽象，只向学生提供一些空泛的抽象概念，必需使学生牢牢记住历史上的活动家和大事年表。

现在这项决议已经公布，决议令人感到意外。教师们已经习惯这样的公式：人类的历史——这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历史上的活动家只不过是阶级利益的表达者。怎么现在必须回到把历史看作为一些伟大人物的业绩的观点上来呢？

阿列夫京娜·费奥多罗夫娜对这项新的决议却处之泰然。对她，对这位曾是最上层党的政策的代表人物来说，这项政策无论有什么变化也不能使她感到惊讶。她从来没有对上级怀有崇敬的感情，过去她常常从很近的距离看到国家领导人，对他们就象对平常人一样，她本人也可能处于他们的地位。她一直认为托洛茨基是异己分子，认为托洛茨基分子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的、好大吵大嚷的人，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则是危言惑众的人物。她和李科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及其他一些地道的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代表人物比较接近。但是他们要承担领导责任还显得软弱无力。现在她拥护斯大林，这倒并不是因为钦佩他的品质，知道他的价值，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他是唯一有能力执牛耳的人，而且领导权掌握得很牢。他了解党内的情况、掌握党员的心理，是个实干家，而不是夸夸其谈的人。

阿列夫京娜·费奥多罗夫娜本人就是讲究实际的人，她从是否带来利益的观点来评价人。有一次她在历史课上甚至说：“十二月党人又怎样呢？他们有什么成就呢？”

从朋友们那里得悉的消息是：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

的这项决议是在布勃诺夫和爱泼斯坦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由此可见，这是在故意向他们发难。

这立刻使她成为决议的拥护者，虽然她明白，肯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般说来即意味着特别夸大斯大林的作用。但是，难道个人的作用小吗？倘若没有列宁，十月革命能够实现吗？斯大林在世时得到的报偿比列宁在世时多，但这是两位不能相比的人物。列宁当时不需要别人确认他的威望，就因为他是列宁；而斯大林需要，因为他只不过是斯大林。但是斯大林的权威——这就是党的权威、党的干部的权威，斯大林的一切应归功于这些干部。

新的历史教科书尚未编成，而旧教科书又不能用。因此她就请尼娜来，因为举办了一个全国历史教师暑期讲习班，要派一些回去后自己能够办市、区教师讲习班的优秀教师去学习。阿列夫京娜·费奥多罗夫娜推荐尼娜去，又一次证明了她对她的关心。

“谢谢您，阿列夫京娜·费奥多罗夫娜，我一定努力完成这个任务。”

“你一定能胜任的，”她鼓励她说，“不然我们派谁去呢？派若霍夫去吗？”

她们过去在中学学习时就是读若霍夫编的著名教科书，尼娜在师范学院读书时就当过他的学生。他曾授过课，若霍夫是历史学家索洛维约夫理论的拥护者，被扣上了唯心主义的罪名。她提到若霍夫的名字，是向尼娜表明，她把她抬到多高的地位。

“明天将颁布决议，”她接着说，“后天你到区国民教育处来拿介绍信。”

她毫不怀疑，决议定会象她所需要的那样，尼娜也一定会被确定为派遣对象的。

“讲习班未必备有资料和提纲，一切都得记录，你要多准备一些练习本。”

“我一定准备好。”

阿列夫京娜·费奥多罗夫娜冷冷地一笑。

“很想知道，我们的那几位怎么才能摆脱这处境。爱泼斯坦免不了要发表意见的，他又要兜圈子了。”

她还不能这样议论布勃诺夫——他是人民委员、中央委员。但是，她说爱泼斯坦，实际上是在影射布勃诺夫。

她又转用公事公办的口吻说道：

“你要把讲习班的内容全记住，记录下来，以后你自己还要指导别人哩。”

尼娜明白，使她感兴趣的只是布勃诺夫和爱泼斯坦。

“我一定全记住。”

由于阿列夫京娜·费奥多罗夫娜的缘故（这样的干部还不被器重！）她自己常常也感到对人民教育委员部某些领导人的不满了。

但她一直在考虑着一件事：关于瓦里娅的情况，告诉阿列夫京娜·费奥多罗夫娜呢，还是不说？

阿列夫京娜凝视了她一会儿。

“你还担心什么？”

尼娜犹豫不决地说：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

“你说，你有什么事！”她命令说。

“瓦里娅，我的妹妹，您还记得她吗？”

“记得，当然。挺美的小姑娘。她怎么啦？”

“她匆匆忙忙地嫁给了一个玩弹子球的人，迷恋上了美好的生活，可后来又和他离婚了，自然很失望，情绪和其他的一些事情都不好。”

她用寻根问底的眼神瞧着尼娜。她明白，问题不在于嫁了个玩弹子球的和在饭店的事。

尼娜不作声了，她没有勇气说出“反苏言论”这几个字。尼娜突然清楚地意识到这件事不应该说。对这种话她的态度一定很严肃，决不会心慈手软，可能造成最令人难以预料的、最严峻的后果。

“哎，怎么啦？”阿列夫京娜·费奥多罗夫娜严厉而冷漠地问。

“没什么。您问我担心什么，我已对您说了。”

她笑了一下，仿佛为刚才一刹那间的软弱感到内疚似地说。

“讲习班预计在列宁格勒举办，但也可能在莫斯科，在红色教授学院。”

尼娜思忖了一下：如果在列宁格勒举办就更好，她就可以离开莫斯科，两个月不再见到瓦里娅，和她在一起很尴尬。

5

瓦里娅对自己进了夜大学感到十分满意。现在可再没有人能够拖她去参加任何会议了，万一有人要她开会，她脸上就可以装出惊讶的神情说：“那上学怎么办呢？”除此之外，她还能指望多几天空闲时间，譬如温课迎考，况且，夜大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学科，无论哪一门政治经济学和其他课程都几乎没有，她可以借口工作而不去听那些她不感兴趣的课程。工作上她从不马虎，她不愿哄骗自己的集体。

而最主要的是她学习很轻松。同年级同学都是些普通参加实际工作的建筑工人、施工员、工作队长，在这些人中她是唯一从正规中学里精心培养出来的学生，懂得数学、物理。她虽然从不在家里做作业，仍是班上的尖子、骄傲；再说，家庭作业布置得很少，几乎从不布置。晚上九点钟不到，她就没事了，所以能经常去探望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或者赶去看场电影。她常避开卓娅，一个人去看电影，不和她一起去。

有一次，突然卓娅蓬着头，肿胀的眼睛上挂着泪水来找她，原来她的一盒制图仪被人偷了。全套绘图仪器，还是崭新的呢。

“拉尔卡偷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卓娅说道，“昨天晚上她到我这里来要喝茶，我到厨房里去，她就是这个时候拿的。起初我什么也没发觉，她就是这种人。”

“她就是这种人，一般体面人的屋子是不让这种人进的，”瓦里娅说道，“我曾事先警告过你。”

“是啊，”卓娅同意地说，“你是曾经对我说过，你有这种鉴别力。”

“请别奉承我。”

“我们在一幢楼里长大，在一个班上学习，我怎么赶她走呢？”

“当然啰。难道我们能容许自己做这样无礼的事吗？”

卓娅苦起脸又要哭出来了。

“如果我们现在不从她那里把制图仪拿回来，她一定会将它转手给她的维奇卡，那就一切都完了。”

“你说这‘我们’是指谁？我可不打算卷进这件肮脏事。”

“瓦留莎，我求求你，和我一起去吧。你什么话也不要说。你只要站在旁边，拉拉一定怕你。”

“不，”瓦里娅斩钉截铁地宣布，“我该到图书馆去了，我得准备好资料呢！”

她们走到街上。

“祝你一切都好，”瓦里娅说，“望你成功。”

当她要转弯进普洛特尼科夫巷时，回头瞧了一眼，只见卓娅站在大门口，哭着，不住地用手帕擦眼睛。

瓦里娅又走了回去。

“我们走吧，不过无论如何这是最后一次了。”

国家银行在斯摩棱斯克大街和普留齐希大街拐角处一座大厦的底层。银行大厅里摆满了接待储户用的桌子，厅内熙来攘往、喧哗嘈杂。出纳柜前的人排成一条长龙。银行职员们也密密麻麻地挤坐在柜台的栅栏后面。

拉拉正在栅栏后翻查着储蓄卡，她立即觉察到有人来找她了。她一直预料会有人来找她，便埋头搞卡片。她在一排长长的储蓄卡箱里翻弄着，将卡片插来插去，认乎其真地查找，以便让人马上明白：她丢不下手上的工作。

“你喊她一声。”瓦里娅命令。

“拉拉。”卓娅喊了一声。

拉拉向大厅看了一眼，佯装没听到。拿了一张储蓄卡，送到一个胖呼呼的女会计那里，那个女会计戴着一副男用的角质眼镜，胸口别着数不清的小蝴蝶结，是位典型的女会计，不象细腿的拉拉。

“她怕我们走近她。”卓娅说。

“大声点喊。”瓦里娅建议。

“拉拉，”卓娅大喊一声，使整个大厅都听到了。

排队的人都回过头来看。瓦里娅非常难为情，柜台后的银行职员也抬起了头。那位胸口有蝴蝶结的胖会计用低沉的声音说：

“瞧这些人！”

拉拉回头瞧了瞧，在她眼睛里似乎闪出一丝慌乱的神情，瓦里娅觉得，她现在恨不能立刻躲到桌子底下去。她自己也禁不住想跑开了。但拉拉迟延了片刻，终于走出柜台。

她身材瘦削、尖鼻子、微微弯曲的头发。她阴沉着脸站在她们面前，挑衅地瞧着卓娅。

“干嘛这样大喊大叫？！我不是聋子！你要干什么？”

“请你把制图仪还给我！”

“还你什么制图仪？”拉拉激怒地问。

“哎——，拉拉”，卓娅带有责备意味地拉长声音说，她怎么也下不了决心当面指责拉拉偷东西。

“什么‘哎’？！”拉拉目光里露出凶恶的神色。“我从未见过什么制图仪，而且到现在也不知道。”

“我工作上需要用它，”卓娅央求地说道，“拉罗奇卡，你要明白，也许你不过是开个玩笑吧？”

“请你别哄吓诈骗！”拉拉答道，“我可不是好欺的。我不是小偷，我比你诚实。”

“我不知道现在我该怎么办了。”卓娅苦苦哀求道。

拉拉卑夷地耸了耸肩。

“我也不知道你该怎么办。你塞到哪儿就到哪儿去找。或者去买套新的，这不就完啦！再见！我可没空！”

卓娅慌乱地看着瓦里娅，她又眼泪汪汪的了。

“你仔细听我说，拉拉，”瓦里娅低声说，“现在我们去找你的行长，”她向行长办公室的门那边点了点头，“我们去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来找他。然后我们从这儿到第八民警分局，你知道民警局就在莫吉利采夫斯基巷。倘若你不知道，你的维佳会告诉你的。民警局一定会派人到你那儿搜查的。如果你在那里搜不到，就会到维坚卡那里去搜。我的意思你明白吗？你都明白了吗？”

拉拉站在那里，垂下眼睛，过一会儿说：

“我不知道，我没有拿制图仪。当然我不想在单位里丢丑……我马上去试试弄点钱。去向同事借。”

“别说了！”瓦里娅答道，“谁会借给你钱？”

拉拉不吭声了。

“快决定吧，”瓦里娅说，“我也没空。”

“好吧，”拉拉终于抬起目光说，“我回一趟家，向妈妈要。”

“走吧！”

“我只能午饭休息的时候去。”

“你们什么时候休息？”

“一点。”

墙上的圆形壁钟已经十二点半了。还要在这里惹人讨厌地逗留半个小时。

“我们等你一会儿。”瓦里娅说。

这是十分滑稽可笑的场面，瘦小的拉拉站在中间，身材高大的瓦里娅和卓娅象两个民警站在两边。

拉拉不住地环视四周——也许是害怕，也许是盼望遇见维坚卡。

走到大门口时，她说：

“请你们在这里等一等，我马上就出来。”

瓦里娅冷冷地笑了笑。

“别装糊涂！妈妈不会在家，她也没钱。而这时候你想把制图仪藏起来。卓娅和你一起去。卓娅，去！”

拉拉象困兽似地看了她后，和卓娅走进了大门。瓦里娅一个人留在外面。

拉拉的父母过去很富有，是贵族，是贵族的姓氏。现在拉拉的妈妈干透花刺绣活，而拉拉则结识了小偷维坚卡·洛

马舍夫，自己也成了小偷。

瓦里娅在门口溜达时想到了卓娅。卓娅笨头笨脑，容易激动，常常卷入一些荒谬的事情里，这使她十分恼火。今天这件事一般地说也是令人讨厌的。但无论怎么说，卓伊卡对她还是忠心耿耿的。除了她之外，还有谁对她忠心呢？再也没有了。

卓娅跑出大门，得意洋洋地挥舞着手里的制图仪盒。

“你看没看盒子里面？”瓦里娅问道。

卓娅脸上顿时露出惊惶的神色。

“我多高兴，刚才急急忙忙就跑出来了。”

她小心翼翼地打开盒盖，仪器原封不动地在里面呢。卓娅关上盒子，放进手提包里。

“好了，没事啦，我得赶去上班了。谢谢你。”

她亲了亲瓦里娅的脸颊。

瓦里娅从图书馆回来的路上遇见了维卡。

维卡站住，微笑起来，拥抱并亲了瓦里娅。接着立刻从小提包里掏出一块小手帕，手帕发出一股“科济”牌香水的香味，擦去了留在瓦里娅脸颊上的口红。她还是象从前那样的漂亮，服饰华丽，身穿一件薄薄的驼色大衣，戴一顶同样颜色的圆形软帽，连说带笑，十分引人注目，惹得来往行人都转过脸来看她。

“瓦里娅，亲爱的，看见你我多么高兴。”

瓦里娅遇见她是否高兴呢？这就很难说了。一般地说，她是一个与自己不相同的人。但在萨沙那里过新年晚会的情景，霎时浮上了心头，瓦里娅第一次去并在那里结识了列沃金那

一伙人的饭店也重现在她的脑海里。于是她也向维卡微微一笑。

“你到哪里去？”维卡问道。

“回家。”

“或许到我家去，好吗？”维卡提出。

“不，家里人等着我呢。”

“好吧，那我就送送你……”

维卡和瓦里娅并排走着，不时地看看她，快活地微笑着，似乎她真的为她们这次相遇而高兴。由于她的谈话，瓦里娅心中就象过去她们相识时那样，又浮现起另一种生活，那种无所顾忌、现在那些无所不为和无所不能一帆风顺的幸运儿所过的那种我行我素的生活。可她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什么都能做、什么都允许做的人是不存在的。但是，过去曾有过一层迷雾，有过假象。这种生活，虽然不象从前一样吸引人，但令人想起，从前有一度时期曾经使人迷恋和向往过。

“听说你和科斯佳分手了？”维卡问。

“是的，”瓦里娅不乐意地回答，她不愿谈这个话题。

“瓦里娅，请原谅我干涉你的事情，但我从一开始就弄不懂也不赞成你和他结婚。当时我就知道会是什么结局。可惜的是那时你没有向我问起关于他的情况，你一点也未和我谈起。你要知道，瓦莲卡，我一直希望你幸福，现在还是这样，一直对你很好，可是你似乎突然无缘无故中断了我们的友谊。我什么地方得罪你啦？”

“结果是这样。”瓦里娅冷淡地回答。

“我明白，”维卡抱有同感地点了点头说：“我们都是爱情的奴隶。你大概听说过我嫁给谁了吧？”

“听说了。”

“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最最正派的人了，别的我暂且不说，他简直是个天才。他很爱我。可是你知道，我几乎见不到他，每天清早就走了，很晚才回家，有时就在办公室里过夜。可有什么办法？他象所有天才一样，全神贯注……我应当耐着性子，应当挑起我该挑的担子。不过有些无聊。”

“你可以去工作嘛。”瓦里娅说。

“早上六点钟就起床？……去挤电车跑遍全城……你知道，我肩上有有个家呢，家务啊、服侍丈夫、父亲、瓦季姆啊——这一切全都是我的事……我丈夫是怎么工作的，刚才已经告诉你了。父亲也好不到哪儿：他不是研究所就是在门诊所，有时还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常常夜里有人来叫他，那就得让他吃饱，伴送他去。实际上我是一个家庭妇女。瓦季姆成了著名的批评家，有影响的报纸记者。在新闻界工作过的是疯子一样的生活，他们往往在编辑部通宵达旦地被拖住不放。这三个人要人照料，我就服侍他们嘛。”

她睨视了瓦里娅一眼，又补充说：

“我的那三位男士就不愿听到我去工作这件事。”

瓦里娅暗自冷笑，心想：她什么都说到了，就是忘了提家里的那个小保姆费尼娅，费尼娅每天把咖啡端到床上给维卡喝。

“难道费尼娅不在你家干啦？”她佯装天真地问她。

“还在干呢。可费尼娅究竟是费尼娅。家里经常有客人，正如你所知，他们不是普通的客人。要接待他们，能干这事的只有我。总之，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可不是诉苦，只不过是说说我的生活情况。我哪儿也未去过，什么地方也未待过。也

没有人到我家里来。瓦里娅，你哪怕什么时候来看我一下也好啊。”

“什么时候？白天我要工作，晚上在学院学习。”

“是吗？真是好样的！什么学院？”

“建筑学院。”

“好极了！这方面我有好多熟人，建筑学家、建筑工程师，或许你需要他们帮忙？”

“不，什么忙也不要帮。”瓦里娅说。

“瞧你说的，要的话，就说一声。我说的不仅是我的丈夫，而且还有我的那些熟人……他们在全世界都有声望……只要他们一句话，你的一切事情就全部解决啦。”

“什么也不需要。”瓦里娅露出阴郁的神情。

“不需要，那就不需要吧。”

维卡站住了。

“我的电话号码丢了吗？”

“没丢。”

“那就好极了。打电话给我，到我家来，我们坐一会儿，聊聊天……”

6

从二月中旬起，邮件又开始按时送到了。萨沙收到了十二月、一月的报纸，三月里收到了二月份的报纸。

自基洛夫被尼古拉耶夫刺杀后，报纸上几乎天天刊登长长的一串恐怖分子的名单，他们都是从国外派来的。有的在莫斯科，有的在列宁格勒、有的在基辅或明斯克被枪毙了。

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暗杀基洛夫的就是他们。

然而，1934年12月底，报纸纷纷报道，杀害基洛夫是前列宁格勒共青团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分子们为复仇而组织的，他们还想杀害斯大林以及党和政府的其他领导人。

所有被指控的人，包括前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两名委员：科托雷诺夫和鲁缅采夫，当时就被枪决了。

而在1935年，被告席上又突然出现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及党的过去的其他著名活动家，共十九人。他们是否直接参与杀害基洛夫，在法庭上尚未得到证实，可季诺维也夫还是被判了十年徒刑，而其余的人，有的八年，有的六年或五年不等。

诉讼程序是闪电式的，没有辩护人出庭，然而，关于季

诺维也夫分子参与暗杀事件的说法却是一清二楚、令人信服的。还有谁能做这件事呢？因为各家报纸都这样报道，尼古拉耶夫过去是季诺维也夫分子，而且他的伙伴也全是季诺维也夫分子，所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自然要为他们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令人怀疑的是他们是否应该受到这样严厉的惩罚，可是，不管你怎么说，基洛夫毕竟是被暗杀了！肯定被害了！虽不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本人，可是他们志同道合者干的……肯定被害了！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早在1917年就将起义的决定泄露给了临时政府。1926年他们又和托洛茨基结成了联盟，而后者在这之前一年就被宣布为党的凶恶的敌人。现在面临着法西斯的威胁，希特勒已经集结了五十万陆军，组成了强大的空军，明目张胆地以战争相威吓，在这种情势下能够心慈手软吗？党正在以牙还牙，虽然这样做，很可惜，同时也错杀了一些无辜。

因此，萨沙在仔细阅读这些报纸的同时，一直试图透过这种歇斯底里的仇恨和痛骂，捕捉他过去所珍惜的东西，他的国家赖以生存和他记事以来全副精神所寄托的东西——国家的丰功伟绩，人民的革命热情和信念。

有时萨沙顺道去看看利季娅·格里戈里耶夫娜·兹维亚古罗。

和从前一样，她仍住在拉里斯卡家里，用缝纫机或手工做裁缝活，她干很多活，特别是从克日马拿来的活计。拉里斯卡过去对她很尊敬，十分殷勤，现在有些妇女常到她屋里来，到这有名的离了婚的女人这里……来讨论怎么做和做什么针线活，她也参加讨论，她在农村娘儿们的生活中起很重

要的作用；她不仅了解这里发生的许多事件，而且了解克日马发生的事件。也许拉里斯卡只不过有些害怕利季娅·格里戈里耶夫娜，因为她是个挺有魄力的女人，善于赢得别人对自己的尊敬。

她的塔拉西克是个不声不响的孩子，通常都坐在长凳上，间或用两只手将一块小木头转来转去，他就这样玩。利季娅·格里戈里耶夫娜也不爱说话，她的样子已经衰老，长得又不漂亮，牙齿歪斜地突出来。

萨沙常把报纸带来给她看，过几天她就还给他，很少评论，既不象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那样高谈阔论，也不推理、争辩，仅仅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案件提了一句：

“一出戏正在开场。”

“可是要知道，基洛夫被害了，”萨沙表示异议地说。

“报纸上可以要怎么写就怎么写，”兹维亚古罗动肝火地打断他的话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任何时候也不会做这种事，而且他们也毋需这样做。杀死基洛夫只对一个人有利。”

萨沙明白她说的是什么人。

“可是党，人民……”

“我们没有党，”兹维亚古罗粗暴地打断他的话头，“有的是一些唯命是从执行他的政策的干部。他憎恨党，毁灭党，人民也憎恨他，也要消灭他。”

萨沙扫了报纸一眼。

“你瞧斯大林关于人民说些什么：应当体贴和关怀人，就象园丁培育被选中的果树那样。”

“‘园丁’啊、‘果树’啊，”利季娅·格里戈里耶夫娜又打

断了他的话，“全是高加索人的花言巧语。他在农村里砍了几百万棵这样的‘果树’！有几百万人死于饥荒！”

“那就谈农村吧，”萨沙坚持地说，“顺便说一句，他是这么说的：‘每个农庄庄员家里都应有自己的家业，虽不大，但是属个人所有……有家庭、孩子、个人的需求和个人的爱好’，这些问题不能不加以考虑。”

“‘个人的爱好’，”利季娅·格里戈里耶夫娜讥讽地重复了一遍，“‘不能不加以考虑’。这些胡言乱语您全都相信？当然他明白，庄稼人是必须吃点什么才能活下来的，否则全得一个接一个地死掉——到那时能有谁来受他支配呢？您不了解他，可我知道，很多年来，我就象现在看到您一样常看到他。人啊，生命啊——对他来说，全微不足道，他比刑事犯还坏，倘若需要，他想杀谁就杀谁。他是个演员，能扮演任何角色。现在他正在讲人，在阿谀人民呢，所有的暴君都这样做。聪明的暴君是阿谀人民的，当然，是在口头上，实际上他在消灭人民。难道您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吗？”

的确，萨沙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也不可能没有这些想法，但他仍一次又一次潜心阅读斯大林的历次讲话，力求按自己的想法去理解这个人，而不是象对这个人充满仇恨的利季娅·格里戈里耶夫娜所想象的那样去理解他。

“您怎么不讲话啦？”

她嘲讽地打量着萨沙，目光在他的翻过来的裤脚上停住了。

“您怎么穿这样破烂的裤子？”

萨沙脸红了。这是他唯一的一条裤子，就是过去在莫斯科也没有多余的裤子，只有一套衣服，还是马克送他的。

“裤脚破了我就用剪刀把破的剪掉。”

“真聪明……您到幔子后面去坐一会儿，我把你的裤子缝缝好。”

她和平时一样，用令人不能违抗的口吻说。

萨沙走到帷幔后面，带了一张报纸，在那儿继续看报。

“我们在很多事情上确实存在着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对工作人员的态度简直岂有此理……视人为草芥的情况屡见不鲜……我们必须首先学会珍惜人，珍惜干部，珍惜每一个能给我们事业带来益处的工作人员。总之，应当明白，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中最珍贵和最有决定意义的财富是人，是干部。”

要知道，所有这一切讲的正是他，是萨沙和象萨沙这样的人。这正是利季娅·格里戈里耶夫娜应当读读的东西。

但此刻他没穿裤子，坐在幔子后面和她交谈太不象话了。

过了一会儿，利季娅·格里戈里耶夫娜将缝好的裤子递给他。

“穿起来吧！”

他穿好裤子，从帷幔里走出来。

塔拉西克仍坐在原地玩他的小木头。

“塔拉西克，”萨沙说，“我们去玩玩吧。”

塔拉西克带有疑问地看了看利季娅·格里戈里耶夫娜。

“去吧，”利季娅·格里戈里耶夫娜说，“你整天整天地坐在家里，去吧！”

她替塔拉西克穿好衣服，虽然天已不怎么冷了，她仍用一块头巾将他严严实实地裹了几道，穿好之后，他就和萨沙一起出去，向安加拉河走去。

小男孩神态拘谨、闷声不响，被头巾左一道右一道裹着，显得又小、又笨拙，他在萨沙身旁走着。

“你几岁啦？”萨沙问。

“不知道……七岁，不过……”

“就是说，你知道。你会念书吗？”

“不会。”

“字母认识吗？”

“认识。”

“诗呢？”

“不会。”

“妈妈常念诗给你听吗？”

“常念。”

“念些什么诗？”

“记不住了。”

“你想我给你念念吗？”

“想。”

他们站在安加拉河河岸上，太阳晒得暖和了。塔拉西克的头不住地摇来晃去，显然，他感到热了。

萨沙替他松开头巾。

“好点了吧？”

“嗯。”

塔拉西克将两只手从手套里拿出来，手套吊在一根细带子上。

萨沙握住他的一只手。

“不觉得冷吗？”

孩子瘦弱的小手上的一股暖流透过了他的手掌。他蹲下

身来，将塔拉西克的两只小手握在自己的掌心里。

“暖和吗？”

“暖和。”

小男孩严肃认真地看着他。萨沙心想，塔拉西克大概从来没有出声笑过。

“那么你还想我给你念首诗吗？”

“想。”

“把手套戴好。”

塔拉西克使劲地戴上手套。

萨沙站起身来……

周围是一片布满了雪的白茫茫的荒漠，只有对岸呈现出一片黑压压的树林，树林的一边被日光照得雪亮。

后来天变暗了。太阳被云挡住了。

“那些云彩使你想起什么？”

塔拉西克耸了耸肩膀。

“没有。”

“那象条船，看见吗？你瞧，那是桅杆，那一根根船桅上仿佛都结了冰。还有船帆。看见吗？”

“看见了。”塔拉西克迟疑地答道。

萨沙突然想起了莱蒙托夫的《幻船》，他给塔拉西克朗诵起来：

在那大海的蓝色波涛上，
星星刚在天空闪烁发光，
一艘孤船满帆急驰，
飞速前进，长风破浪……

海中有座小小的孤岛——
阴森的花岗岩，一片荒凉；
在那小岛上有一座坟墓，
有一位皇帝在里面埋葬。……

在一年终了的时刻，黄昏时分，
他悲哀地走向死亡，
船儿静静地停泊下来，
靠在小岛高高的岸旁。

这时皇帝渐渐苏醒过来，
突然站在坟墓中央；
他头戴一顶三角尖帽，
身着一套灰色军装。

向胸前垂下高傲的头颅，
交叉起他那有力的臂膀，
迈步向前坐在船舵前面，
迅速朝着自己心目中的方向起航。

船向可爱的法兰西驶去，
那是他抛下光荣、皇位的地方，
他丢下了他自己的王储，
还有那些旧日精锐的兵将。……

他勇敢地迈开大步下船，

径直走到祖国的岸上，
高声呼唤自己的战友，
威严地叫喊昔日的宿将。……

元帅们早已听不见他的召唤：
有的已在战斗中阵亡，
有的已经背叛了他，
卖掉了他们征战的刀枪。……

他只得挥了挥手，
重又垂下了自己的头颅，
登上他那艘神奇的幻船，
驾船驶回原来的地方。

塔拉西克聚精会神地听着。

“喂，怎么样，喜欢吗？”萨沙问道。

“喜欢，”塔拉西克答道，“我想回家。”

他们回到家里。萨沙本想立刻就走，但利季娅·格里戈里耶夫娜拦住他说：

“您忘了报纸。”

而且她挖苦地加了一句：

“报纸上有您的那位斯大林各种姿态的照片。原来他还率领无产阶级团队打过冬宫。”

确实，每天报纸上都有一幅斯大林同志的肖像。不然就是两幅，甚至三幅：斯大林单人肖像、斯大林和列宁合影、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合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合影，斯大林和

卡冈诺维奇合影，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合影、斯大林和农庄庄员们、斯大林和军人们、斯大林和工人们以及斯大林和其他人的合影，还有斯大林的一些素描肖像、斯大林的雕塑像。

报纸上大量刊登有关国内战争获得胜利的材料。有察里津保卫战、攻克罗斯托夫、彼尔姆，东方战线，消灭邓尼金、红军周年纪念日第一骑兵军建立十五周年、波兰战线——所有这些全都是斯大林的功劳。

按历史学家伊·伊·明茨的说法，1917年10月，“斯大林为了实现列宁的意志，率领无产阶级团队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啊哈，利季娅·格里戈里耶夫娜冷嘲热讽是针对这个。这可实在是胡言乱语！一切功劳都归斯大林，到处都是斯大林的胜利。从工厂、农庄，从厄尔布鲁士和卡兹别克山峰纷纷发来对斯大林的致敬电。每一个演说，每一篇文章的开头和结尾都用到他的名字。

萨沙早在大学学习的时候就厌恶吹捧斯大林，讨厌对他的著作、文章、讲话和作品过分颂扬，萨沙觉得这些赞美诗和阿谀奉承之辞皆是极其粗俗和蒙昧无知的。这些永无止境的重复，这种“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嚼烂了的陈词滥调，这犹如镣铐般的模式，对他的任何思想，任何一句话都不准有丝毫怀疑的做法——所有这一切都令人抑郁万分。

但是对其他一些人来说，这种做法并不使他们难受。相反，却使他们欣喜若狂。难道大家都不对，而他和象他的这些人都对？……

大概当时他不理解，斯大林是在和人民对话，他理应说得使人民理解他、相信他、跟他走。这个国家的人民几百年

来过的是奴隶般的愚昧落后的生活，必须善于和他们谈话。诚然，人民的水平必须不断提高，可是现在又不得不考虑到这种水平。而他，萨沙，也是人民。他的生活离不开他成长起来的社会环境，不能不信任国家、不信任党。他应当和党和国家共存亡。不论他个人对斯大林是什么态度，斯大林现在仍然是他们的化身。应当站得高一点，摆脱个人想法。

因此，萨沙愈来愈多地产生要写信给斯大林的想法。他知道，现在大家都在写信给斯大林，他不可能一一读完成千上万封信，也不可能读完他的信。而且他的信也到不了斯大林的手中。

不过，他仍然要向斯大林提出自己的想法，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他虽不能在实质上实现他的责任，但无论他遭遇到什么，无论他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他都可以扪心自问地说：“我曾经向斯大林提过。”没有用吗？是没有用。不过我毕竟向他提过了，因为我是向以他为代表的党提出的。

两年前，当他在大学里开始他一生中这件重大事件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无权给斯大林写信，浪费他的时间，那时他一心寄希望于自己为自己辩护。此刻他已不能自己为自己辩护了，只有斯大林能帮助他。否则他又将加刑，也许他将一辈子待在劳改营里，这样一生就完了。他写信给斯大林是因为，他萨沙是斯大林所说的那个最小的“小人物”，他以后将诚实地劳动，勤勤恳恳地干工作，尽自己的职责。

在这孤独的、令人感到压抑的日子里，在这些漫长的、愁闷的晚上，在这些长时间失眠的黑夜里，他在这西伯利亚、在这地球的尽头，每当萦绕在心头的千思万绪使他精疲力竭以后，他便开始了幻想，想象着阿尔费罗夫派一辆大车来接他，

他怎样到克日马去，阿尔费罗夫向他宣布，斯大林同志的秘书处发来了电报：“火速将潘克拉托夫送至莫斯科。”于是他便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挂了个电话回家给妈妈，请她去接某某次列车。妈妈和瓦里娅在月台上等着他。他们一起走向电车站。乘四路电车回家了。

必须写封信，即使回信无望也得写。马斯洛夫、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他们与苏维埃政权格格不入，他们与党不同心同德，所以他们道义上无权写信给斯大林。他们只能向法院上诉、向检察机关写信——是的，这是公事公办，至于写信给斯大林——不行，他们不能。而他萨沙可以，因为对他来说写信给斯大林——这是意味着写信给党。

萨沙对自己要写的信经过很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斟酌每一个字……“敬爱的斯大林同志！”萨沙写道：“请您原谅我大胆写信给您。根据1934年5月20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特别会议的决定，按第58条第10款，我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3年，连同判决前的在押时间计算在内，现在我服刑已过去一半以上，但至今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被判罪。我没有任何过错。我上过苏维埃中学，后又在苏维埃大学学习，曾经是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在工厂里工作，我愿做有益于国家的人，无所事事是注定没有前途的。不能够这样生活。我请求您重新审查我的案件。致以最深的敬意。亚·潘克拉托夫。”

他写好了信，但犹豫不决，信一直没有寄出。

这样做是否诚实？有没有弄虚作假？无论他怎样考虑，无论他援引什么样的理由，内心对斯大林的态度并未改变。相反，在他看到和亲身体验到这一切以后，他对斯大林的怀疑只

有更加强了。可现在他写信给斯大林，他一直在使自己相信，他是想工作，愿意为国家为党服务，可他是不是仅仅在努力使自己得到解脱、拯救自己的生命、改变自己的命运呢？

写这样的信是否太天真了？信会不会寄到斯大林的手里？他是不是会读这封信？他的案子是否会重新审查？当然，不会寄到，斯大林不会读这封信，案子也决不会重新审查。究竟为什么着手写信，为什么又把这封信交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去让他们读呢？要知道，信恰恰就是要送到那儿的。

可到底，还是……

7

1935年，斯大林乘车来到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参加莫斯科地下铁道通车庆祝大会。

他一面看着坐在礼堂里的年轻的地铁建设者，看着他们一张张只朝他看、只期待着听他的讲话的兴高采烈的脸，一面思忖：青年是拥护他的，在他的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是他的青年；他们，这些来自人民的孩子们，是他让他们接受了教育，是他使他们有可能建立劳动功勋，参加国家的伟大变革。这个年龄是最富于幻想的年龄，将永远和他们对他的记忆联系在一起，他的名字将使他们的青春生辉，他们将对他忠诚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应当为他们开辟掌权的途径，他们的地位提高将要归功于他，感激他，也只能感激他。

他的思路被布尔加宁打断了。

“现在请斯大林同志讲话。”

斯大林走近讲台。

全礼堂的人都起立了……

鼓掌欢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斯大林举起一只手，要大家安静，但礼堂的人还是激动得平息不下来，大家都有节奏地拍起巴掌，这就象有节奏地

播一口巨大的鼓一样，而每播一次鼓都伴随着一字一顿、震耳欲聋的喊声：“斯大林！”、“斯大林！”

斯大林已经习惯这种鼓掌欢呼声了。可是今天的欢呼声与往日不同，今天向他欢呼的不是那些当官的，不是共青团的官僚们，而是普通工人——混凝土工、掘进工、焊接工、钳工——他们是国内第一条地铁的建设者。他们是人民中最优秀的部分，是人民的未来。

鼓掌声震撼了大礼堂，小伙子 and 姑娘们纷纷跳到椅子上，不住地高喊：“斯大林万岁！”、“伟大的领袖斯大林同志——共青团员们向您欢呼，乌拉！”

斯大林掏出怀表，举在手中，给全礼堂的人看，意思是说该安静下来了。可大家对他的回答是发出更响更热烈的欢呼。

斯大林将怀表给主席团的人看。主席台上的人露出笑容，他们为能够参加领袖与人民的这种令人感动的朴实的交往而感到荣幸。主席团成员们仿佛对斯大林所表现出的这种民主作风作了让步，开始各自就座。

礼堂里的人也纷纷坐下，但鼓掌声仍在继续。

“同志们！”斯大林微微一笑，“请你们等一会儿，不要先鼓掌，你们还不知道我要讲些什么。”

全场报之以快活的笑声，又一次欢呼起来。

“我有两点纠正，”斯大林接着说，“党和政府为莫斯科地下铁道顺利建成奖励一部分人以列宁勋章，另一部分人——红星勋章，第三部分人——劳动红旗勋章，第四部分人——中央执行委员会奖状。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其余的人怎么办？那些付出了自己的劳动、自己的智慧、付出了与他们相

同力量的同志们怎么办？你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似乎很高兴，而另一部分人却想不通。究竟该怎么办？这是一个问题。”

他停顿了一下，礼堂里呈现出一片极其虔敬的肃穆。

“于是，”斯大林继续说道，“我们现在想当着所有诚实的人们的面改正党和政府的这一个错误。”

会场上又爆发出了笑声和掌声。

斯大林举起一只手示意大家安静并接着说：

“我是个不爱多说话的人，因此请允许我宣读这两点纠正。”

他从弗伦奇式军上衣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成四折的纸，摊开。

“第一点纠正：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名义，为莫斯科地下铁道顺利建成，向地下铁道建设工程局的男女突击手们，向全体工程技术人员、男女工人们表示感谢。”

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全体起立，主席团的人也都站了起来。爆发出“乌拉”的欢呼声。斯大林面带微笑，站在讲台上，这时他已不再试图要礼堂的人安静下来了——因为这欢呼声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而且是对宣布感谢地铁工程的建设者们的政府发出的，也是对应当受到崇高谢意的地铁建设者们本人发出的。

当会场上终于平静下来后，斯大林接着说道：

“今天立刻应当纠正的一点是：我们向地铁建设工程局全体同志表示感谢，”他又用手势阻止发出的鼓掌声说，“你们不要向我一个人鼓掌，这是全体同志的决定。”

“要纠正的第二点，”斯大林看了一下摊在他面前的那张

纸，“我现在直截了当地谈一谈：为在动员光荣的共青团员们投入顺利进行莫斯科地下铁道建设的事业中所建立的功勋，奖给莫斯科共青团组织以列宁勋章。”

又重新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这一次斯大林本人也鼓起掌来，这给予莫斯科共青团组织以极大的光荣。

当他停止鼓掌时，全场立刻静了下来。

“这一点也应该今天纠正，明天公布……同志们，也许这还不够，但我们再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倘若还有什么可以办到的，请你们提示一下。”

斯大林用手势向大会表示致敬，然后向主席团走去。

欢呼声比前面任何一次都热烈。“敬爱的斯大林乌拉！”“乌拉！”“乌拉！”响彻整个礼堂，发出一阵阵的轰鸣声。有一个姑娘蓦地跳到椅子上，高呼：“斯大林同志——共青团员们向您欢呼，乌拉！”随后又爆发了一阵阵欢呼声：“乌拉！”、“乌拉！”、“乌拉！”

鼓掌、欢呼声持续了十分钟左右，礼堂的人一直站在那里鼓掌、呼喊“乌拉！”、“斯大林同志——乌拉！”

斯大林不作声地站在主席团席位上看着礼堂里欢呼的人群。不，他们不是一年半之前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向他鼓掌的那些人，那些人鼓掌不是发自内心的，而这些人完全是另一种人，这些是他的人。

毫无疑问，青年的天性是变幻不定的。青年人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得因循守旧，变得停滞不前，新一代正在成长，也应当给他们让路——这是一种连续不断的、病态的过程。

但是干部更新——是不可避免的过程，不过必须使那些走上领导岗位的干部，都是他的干部。新干部不考虑他们的

前辈被消灭的事实，当他们掌权的时候，确信权力是牢固的。而当他们势必要离开领导岗位的时候，他们也不责难斯大林同志，而是怪罪于自己的对手。对他们来说，斯大林同志永远是把他们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的人。

斯大林一面瞧着礼堂里激动的、兴高采烈的、乐得发狂的人，一面这样思忖着。

的确，他们对他忠心耿耿，无限忠诚，真可谓披肝沥胆。他还应当说些话，说些普通的、有人情味的话，要说到每一个人的心坎上，不仅以他的伟大来使他们服从自己，而且要用自己的平易近人来征服大家。

于是当掌声终于平息下来后，他使用不高但大家都能听到的声音问道：

“你们是怎么想的，这两点纠正够不够？”

又一次更热烈的势如暴风骤雨般的鼓掌。

全体起立。

全体主席团成员站着鼓掌。鼓掌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诺夫、奥尔忠尼启则、丘巴尔、米高扬、叶若夫、梅日劳克。这种状态无限制地持续了很久很久。人们不能移动一下位置，不能离开，不能和斯大林分别，须知，这是他们的日子，也许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见到斯大林的日子，他们希望延长这个节日，希望一次又一次地听到斯大林的教导。

但是，斯大林已经讲过话了，不再讲话了，这时有一个人喊一句：“请卡冈诺维奇讲话！”

于是整个礼堂的人随声附和地喊：“卡冈诺维奇讲话！”、“卡冈诺维奇讲话！”

卡冈诺维奇惊慌失措地瞟了斯大林一眼。在他讲话以后能讲吗？

但斯大林说道：

“怎么了，拉扎尔，人民等着你讲话呢，去和人民说几句吧。”

卡冈诺维奇立起身来向讲台走去。

8

斯大林在参加圆柱大厅举行的庆祝大会之后，没有去克里姆林宫，而是直接乘车去昆采沃的新别墅。新别墅是去年梅尔扎诺夫建造的——这是座玲珑精巧的平房，四周是花园和树林。整个屋顶是一个日光浴场。他过去没晒过日光浴，但有一个日光浴场也好，如果以后不喜欢，再盖第二层。别墅由一道有顶的走廊和服务人员的房屋相连。

斯大林第一次来到这所已经建造好、等待着他的房子。

祖巴洛沃那个令人厌恶的地方的生活终于结束了。过去一家所谓亲戚——阿利卢耶夫老夫妻俩住在那里，他们对子娜佳的死一直不原谅他，他们有一个小儿子帕维尔，娜佳用来自杀的那支手枪就是他送的，娜佳的妹妹——安尼娅，是个长得胖乎乎，身上邋里邋遢的傻丫头，她对自己的丈夫列坚斯爱得入了迷，可他丈夫却是个花花公子，行为粗鲁的波兰人，碰见什么女人就和什么女人睡觉。

他对斯瓦尼泽那一家也受不了，他们是他第一个妻子叶卡捷琳娜的亲戚。况且从前他并不爱她，因为她虽然从不多话，而且温顺驯服，但是个见识短浅、虔诚信教的女人，在一切方面都与他格格不入。她一直希望他不要革命而成为一

个神父，她什么也不懂。她的妹妹把他的儿子——雅沙就培养成这种人：雅沙也成了个寡言少语，与他判然不同的少年。一般地说，他对自己的儿子从未仔细地看过，也不了解，现在他的内兄阿辽沙·斯瓦尼泽将他送到莫斯科来了。

为什么要送来?!上学!梯弗里斯没有高等学校吗?不，他不是为了这件事将他送来的。他是想给人看，他斯大林对自己儿子的前途漠不关心，不管儿子的教育。因此这件事他的舅舅阿辽沙·斯瓦尼泽不得不关心了。

要知道他现在有了新家。为什么要将前妻的儿子，要将这个与自己性格不同的、不喜爱的、连俄语也说不利落的儿子引进这个家庭呢?这不是想竭力使他的家庭不和，拆散他的家庭，在他的家里安插自己的亲信吗?他想得可一点不错。须知，娜佳对人是很温和的，倘若雅沙被打发回来，那么人们就会想，这是她不接受雅沙，对她来说主要的是：人们将会有什么议论!

亲爱的内兄阿辽沙·斯瓦尼泽给他来了个出其不意。这样的出其不意已经不止一次了。他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约翰里德。啊?!他想出了什么样的名字!在1929年!是格鲁吉亚的名字?还是俄罗斯的名字?不，既不是俄罗斯名字，也不是格鲁吉亚名字。约翰——这很明白。有这样的英文名字。里德呢?或许也有这样的名字。但约翰里德——这是名字和姓搅在一起。就是那个叫约翰·里德的人曾经写了一本歪曲十月起义历史的满篇谎言的坏书，在这本书里托洛茨基被捧上了天，而他斯大林却只字未提。这本书从所有的图书馆里被查收了，很多人因收藏这本书被判处关五年集中营。而他的内兄阿辽沙·斯瓦尼泽却替自己的儿子取了这个名字。他不

知道约翰·里德是何许人吗？他知道得很清楚。他是个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他从前读书不是在梯弗里斯学校，而是在德国，在耶拿。他通晓几国欧洲语言，还懂得一些东方国家的语言，就象明仁斯基那样是个通晓多种语言的人，所以他一切都明白，给自己儿子取这个名字只不过故意刺激他。

他娶了一个歌剧演员玛丽娅·阿尼西莫夫娜做妻子，显然，她不是主要演员，所以能够离开歌剧团随丈夫一起住在驻柏林商务代表处。她从国外带来各种各样东西送给娜佳，使他的妻子逐渐养成穿国外妇女穿的各种衣服的兴趣，从精神和政治上逐渐使她瓦解。这些凶恶的、怀妒忌心的人故意这么作，但是他们十分害怕。在玩桌球时，阿辽沙总是输给他。不过事后他常对朋友们解释说：“如果我赢的话，他会为这把别人的脑袋给砍掉的。”

这位亲爱的阿辽沙·斯瓦尼泽在他背后就是这么说的，他就是这样挖苦他的！

可为什么在阿利卢耶夫一家和斯瓦尼泽一家之间的友谊又是这样的和睦呢？似乎他们应该互相仇恨才对，因为他们分别是他第一个妻子和第二个妻子的亲属。难道阿利卢耶夫一家人能爱雅沙？或者斯瓦尼泽一家能爱瓦夏和斯韦特兰娜？对他的共同的仇恨使他们联合起来了。这就是他们联合起来的原因。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他的双脚再也不踏进祖巴洛沃那个地方了。让他们生活里没有他这个人吧，让他们之间去狗咬狗吧。他们需要咬个什么人，就让他们互相咬去吧。

在春天五月温暖的阳光下，斯大林在花园里踱来踱去，欣赏着花儿。有些花刚刚含苞待放，有的已经争芳吐艳了。大地

不仅应该能结果实，不仅使人能享受到它的累累成果而且应当饱人眼福。斯大林很喜欢这照料得很好的花园，小路扫得干干净净，凉亭收拾得整整齐齐，有露天的平台，平台上放着小桌、躺椅。

四周一片寂静，悄然无声。这里再没有住在祖巴洛沃时那种终日忙忙碌碌、应接不暇的景象，也再没有人拨弄是非、拌嘴吵架了。尤其那位岳母——奥莉加·叶夫根耶夫娜，她是个爱吵嘴的老太婆，成年累月地和服务人员、和那些她称之为“公家的人”争吵不休，责备他们不会当家，浪费国家财富，差点没指责他们偷窃。她喋喋不休地骂房屋管理员厨师、食堂女服务员，而且往往是有他在场，当着他的面骂。人们可能以为，是他在怂恿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服务人员的呢。

服务人员不喜欢她，背地里管她叫“任性的老太婆”，她确实是个任性的老太，一会儿大喊大叫，一会儿大发议论；一会儿突然感情激动起来，有时痛苦地流出了眼泪，有时高兴得热泪盈眶；忽而又象教训孩子似地把人批评一通；而最主要的是她成天地吵吵嚷嚷，令人受不了。

她的父亲一半是乌克兰人，一半是格鲁吉亚人，而母亲是德国人，叫玛格达林娜·艾赫戈利茨，是德国移民。岳母说话带格鲁吉亚口音，还常掺杂一些格鲁吉亚词儿：“瓦伊梅、什维洛、格纳茨维里、奇里梅；”与此同时还夹杂一个德语词：“迈恩霍特！”而且不住地高举双手呼唤上帝说：“迈恩霍特”，这“迈恩霍特”特别使他恼火，特别刺激他的神经。

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阿利卢耶夫老头是个老糊涂虫！他居然在祖巴洛沃备置了一张工作台，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各式各样的刨刀，成天地磨啊、刨啊、焊啊，不仅在自己家里

修锁，而且帮助附近一些别墅的人修锁。他就是这么个地地道道的无产者，是一个“劳力”、“巧手”。

每当他来到别墅，偏偏就在这时候会有个小丫头来请谢尔盖·雅可夫列维奇修锁。

啊?! 怎样?!

他坐在外廊上，隔壁的小丫头问他：“谢尔盖，雅可夫列维奇在哪儿？”“你找谢尔盖·雅可夫列维奇有什么事？”“修锁。”他的别墅居然被他们变成钳工修配作坊了！你怎么也说服不了他。您得明白，体力劳动能使人变得高尚起来。他是一个理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常与他们一起开会，象他们一样高谈阔论，他正在写回忆录，半天为别人修锁，半天写回忆录。

老布尔什维克协会是什么呢？“养老院”！在一月份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审判案开庭期间，他们义愤填膺，甚至企图通过什么决议。万尼亚·布佳金尤为热心。对老布尔什维克们不能乱加指摘。为什么不能指摘？当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当伊万·尼基季奇·斯米尔诺夫、斯米尔加、拉科夫斯基以及其他托洛茨基分子被投入监狱时，亲爱的万尼亚为什么不激愤？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流放的时候，为什么不激愤？现在对基洛夫事件却提出了抗议。为什么偏偏就基洛夫事件提出抗议呢？要知道，他与基洛夫有私交，本来应当相反，他该毫不留情的，可他却反对对那些凶手和他们的策动者进行审判。他了解什么情况吗？有什么被他猜想到了吗？他在唆使别人提出抗议、写信、通过决议。他们有点胆怯了。

简直是个黑窝！他们做了什么有益的事？他们为什么要

和党分开？他们想为所谓的老布尔什维克制造特殊地位，想把他们标榜为布尔什维克传统的唯一的代表，扮演成列宁遗训的维护者，想当党的最高法官、党的“良心”，成为党的统一的卫士。他们在维护谁呢？他们不是维护党，他们在维护自己，因为他们之中有四分之三的人是过去的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有各种倾向的分子和形形色色的反对派。

所谓的老布尔什维克们深信他们的力量在于团结一致，深信他们的攻守同盟坚如磐石。他们错了，在这方面恰恰是他们的弱点。他们称为公务上的、工作上的、党务上的、友谊的种种联系结果成为构成犯罪的串联，只要有一个人的人口供，就足以对很多人产生怀疑，只要有很多人有了供词，所有的人就都将成为罪犯。

现在他们还保持沉默。

沉默——也是抗议的一种形式。

他们在出版什么呢？《老布尔什维克文集》和各种简报。他们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些什么文章呢？在编造自己的历史。他们写的不是党所需要的历史，而是他们自己需要的历史，在他们写的历史里，首要问题就是没有斯大林的位置。您得明白，这只是一些个人的回忆录。

党不需要这样的回忆录。任何回忆录都是歪曲史实的：因为写回忆录的人只知道他自己参加的那件事，也就是他只知道事情的局部而不是整体。由于缺乏对全局的了解，回忆录作者往往不得不杜撰，从而歪曲了史实。对阐明党史来说，回忆录的这些缺陷使回忆录成为有害的作品。

这些所谓的老布尔什维克还在于些什么呢？

争吵、相互评功摆好、互相指控与沙皇暗探局勾结的罪责以及做那些只能损害老布尔什维克称号的事。因此不得不去搞清楚他们的纠纷和吵架，中央监察委员就干这件事。难道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除了处理他们勾心斗角的纠纷以外就没有别的工作可干了吗？

顺便说说，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是这个协会的主席。当然，当这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的主席是十分受人尊敬的，可是，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本该想一想，谁需要这个协会。这个协会应当为谁和为什么服务？

附带地说，亲爱的叶梅利扬同志还是十月革命前俄国服苦役的政治犯和流刑移民协会的头头。当然，这也是光荣的，更何况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出生于赤塔的一个流刑移民的家庭。但是，叶梅利扬还应考虑考虑，究竟谁还要这个协会。这个协会也是个养老院，只不过它是个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过去的一些冒充革命志士的刑事犯的养老院罢了。他们出版了一份《苦役和流放》杂志。他们发表什么人的文章呢？他们经常提到什么人的名字呢？他们在全苏联几乎有五十个分会——分会里究竟是些什么人呢？这个组织宗旨是什么？尽是一些异己分子，苏维埃政权潜在的敌人。

让叶梅里扬·雅罗斯拉夫斯基本人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让他自己向中央提出一个建议：不仅要取消老布尔什维克协会，过去的政治苦役犯和流刑移民协会也必须清理。日后谁能说斯大林要摆脱老布尔什维克的？谁也不能这么说……

雅罗斯拉夫斯基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这一切应该怎么做。

他和他几乎同岁，两人都是1898年入党，1905年两人在国外，在芬兰塔墨尔福斯一起参加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1906和1907年一起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第五次代表大会。在那里雅罗斯拉夫斯基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举止安详，是位革命实干家。革命胜利后，他们不止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相遇。他感觉到雅罗斯拉夫斯基对他有好感，憎恨托洛茨基，一生都痛恨那个人。于是他在1923年便提议雅罗斯拉夫斯基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纪事件处理小组书记。现在他在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得很出色，对所有的反对派和各种倾向的分子心狠手辣、毫不留情。与奥尔忠尼启则不同，他拒绝让那些投降了的反动派恢复党籍。奥尔忠尼启则那时一直装作朴实忠厚的人。可是他很清楚地知道在这背后是什么，雅罗斯拉夫斯基也明白。真是好样的！1928年7月，他在中央全会上有效地制止了克鲁普斯卡娅，他说：“她居然发展到敢于到生着病的列宁那里去告状，说斯大林欺侮她。可耻！在这样一些大问题上不能将私人关系上的好恶牵连到政治上去。”

他讲得很好，不仅制止了克鲁普斯卡娅，而且使那惹起麻烦的全部情节得以澄清了，这样的澄清是十分需要的。他指出了真正犯有过错的是克鲁普斯卡娅，突出了他斯大林同志的光明正大，为了安慰病中的列宁，斯大林不仅自己道歉，而且自己承担了一切责任。真是好样儿的！

雅罗斯拉夫斯基在党内很有威信，他从不覬覦重要的职位，从未侨居国外，是个地道的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实干家。某些这样的名人应当保留在党内。他虽没有读完任何中学和大学，但象所有自学成才的革命家一样，学问渊博，偶尔写一些党史札记，懂得应该怎样阐述历史上真正领导者的作用。

但他也不彻底地懂得，所以1931年不得不稍稍指出他的错误。那是十分客气婉转地指出的：“很可惜，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这里也不例外，他写的那几本联共（布）党史方面的小册子，尽管有不少优点，但具有一系列原则性的历史性的错误。”他没有感到抱屈，明白了一切。对这些养老院他也全会明白的。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将被取缔，正因为如此，老布尔什维克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才要留下来。

天开始凉起来了，于是斯大林走进了屋子。

他吩咐在后面的大房间里布置些家具，以便又当办公室，又作卧室，家里没有客人时还可作餐室用。只有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才喜欢从这个房间串到那个房间，而成天忙的人一切都应该在他的手边。

在他睡觉的沙发旁边有一张放电话的小桌子，对面墙边是一个餐具柜，餐具柜的一个抽屉里放着他常用的药品。斯大林不让人在他房间里放写字台——那就太象机关的样子了，而这里不办公，这里是住房。再说他可以用一张大桌子工作，桌上放公文、报纸杂志，当送来午饭、早饭或晚饭时，就在桌上铺上桌布。

现在就是这样，当他走进屋时，那个年轻快活招人喜爱的女人祖巴洛沃的女管家瓦列奇卡正在铺台布。

“您好，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给您送晚饭来了。”

她象往常一样，带着崇拜和忠诚的神情看着他。

“谢谢，”斯大林答道。

瞧，他不是已命令弗拉西克不要把祖巴洛沃的任何服务人员带到昆采沃来的吗？

瓦列奇卡用餐巾把桌上的食物都盖上。

“您半个小时后来收去。”

“是，遵照您的吩咐。”

瓦列奇卡走了出去。

斯大林用了晚餐。他吃得很少：掰下一块面包，稍涂上点黄油，喝了杯纯葡萄酒，半碗淡茶。浏览了几张报纸。

准半个小时后，瓦列奇卡来了。

“您吃了吗，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她象以前一样，快乐而忠诚地看着他，这位手脚麻利、朴实单纯的妇女以能为他服务而感到幸福。

“是的，谢谢。”

瓦列奇卡收拾了桌上的东西，都放在托盘上，向斯大林微微一笑，一只手拿着托盘向门口走去。

“让弗拉西克到我这里来一下！”斯大林命令说。

“是，遵照您的吩咐！”

斯大林看完一张报纸，立起身来，在房间里踱了一圈。

地板上铺着一块地毯，另一块挂在沙发上面。这两块毯子加上壁炉——这就是他允许自己享受的全部奢侈品了。

门被打开了，弗拉西克站在门口，他按照立正姿势站着，象士兵那样瞪大眼睛看着斯大林。

斯大林瞧了他一眼，就只有他一个人会这样看他。

弗拉西克吓呆了。

斯大林又在房间里踱了一圈，回过身来，站在弗拉西克

面前。

“我曾命令您不要把祖巴洛沃的服务人员中任何人带到这里来的。”

“是的，斯大林同志，您曾这样命令过。”

“为什么违反命令？”

“我们没有带任何人来，斯大林同志，除伊斯托明娜·瓦连京娜·华西里耶夫娜以外。”

“为什么未经我同意？”

“当时您正好不在家，斯大林同志。就是说我们开了个会，讨论决定只带她一人来，因为她知道怎样端茶送水。是个经过考验信得过的人。”

“你们和谁开会讨论决定的？”

“和保克尔同志。”

斯大林转过身去，走近通凉台的玻璃门边看了一会儿花园。

“挺大的会……你们讨论了很久吗？”

“是的，”弗拉西克刚说了两个字就不作声了。

斯大林离开玻璃门，把桌上的墨水瓶挪了个地方。

“我是在问，你们讨论了多长时间？一小时、两小时，还是三小时？”

“一小时，”弗拉西克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道，甚至都忘了加上“斯大林同志”。

此刻，斯大林同志逼视着弗拉西克。

“就是说，您是好心，把伊斯托明娜带到这里来，而我呢，就是说，心狠，我得把她从这里撵走啰？！”

弗拉西克不敢吭声。

“我得把她撵走吗？”斯大林又追问了一句。

“您说哪儿话，”弗拉西克开始喃喃地说，“斯大林同志，这个我们刹那间……”

“刹那间？！”斯大林终于发作了：“蠢货！因为你这蠢货我得把一个人撵走？！我比你这个笨蛋好些，我一定要撵她走……你们还开会、讨论、决定……这帮白痴！”

斯大林又离开桌子走到凉台的玻璃门旁，没有转过身来，说道：

“去吧！”

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弗拉西克这个粗笨的大兵平生第一次彻夜地在心里诉苦。而那个对什么也不怀疑的瓦列奇卡却在昆采沃一直工作到斯大林逝世。

通房间的西凉台有一扇可以到花园里去的门。夕阳常常透过丁香花丛照进来。斯大林披上件军大衣，又走上凉台，坐在圈椅上。

早就应该离开祖巴洛沃了。

娜佳死了以后他调换了克里姆林宫的住房，耽搁了搬到别墅的时间，在建造“近郊别墅”时，白白浪费了时间，其实可以搬到“远的”任何一座别墅去。只要不去祖巴洛沃就行。

从前娜佳在世的时候，这门亲戚他还能忍受，但娜佳去世以后，那里的一切都使人想起她，而且他们常常提起娜佳。在两位老人的目光里一直流露出责备的神情。

她究竟为什么这么做呢？

有人说，他的性格令人很难相处。可伟大的人物中有谁的性格随和？性格随和容易相处的伟大人物从来没有。真正的伟人性格——常常是桀骜不驯的。

她不是常常亲眼看见他领导宏伟的斗争，还亲眼看见别人怎么攻击他、诽谤他、搞阴谋吗？！还是她不明白他继承了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他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她不想明白！她过去是彼得堡的一个中学生，后来一直仍然是个出身于市民家庭的中学生。

真正的贵族小姐是决不允许自己这样的。国王只娶有皇族血统的女子不是偶然的，那些女子从吃娘奶起时就教育她们懂得王朝的利益高于一切。

连破落了的德国男爵的女儿们也懂得这一点。她们对自己皇族的丈夫无论是背叛行为还是残酷态度都能谅解，她们懂得统治执政、称帝为王是怎么回事。叶卡捷琳娜一世曾经是一个普通的女侍——她这个女皇怎么样呢？缅希科夫想怎么摆布就怎么摆布她。而叶卡捷琳娜二世虽然出身于不显赫的公爵家族，但她自己能驾驭所有的人。

自杀！哪一个沙皇的妻子敢于做这样的事？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没有过。她们理解什么叫在位执政！她们不敢肆无忌惮地往自己在位丈夫身上投下阴影，甚至坐在监牢里、在修道院里也不自戕。

嗨，偏偏在她心里没有这个概念，她不明白他的意义，只认为他是领导人之一，她在克里姆林宫里看见这种“领导人”已习以为常，她不明白他是什么角色，也不明白她自己是什么角色。况且，她在她的学院里听的各式各样乱七八糟

的话太多了，她就要进这个学院——人造纤维系！啊！她非常需要人造纤维！是阿韦利那个卑鄙的家伙唆使她去的。她在那里听了很多反对派的话。她怎么胆敢听他们说的话？！她无权听他们说这些话！她应当制止各种各样的议论！应当表现得使别人甚至不敢和她谈论他，可恰恰相反，她的表现使得别人敢于和她谈论他。

因此，她常听大家议论。

她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好发号施令的女人，想驾驭一切，可结果不能驾驭他，他自己应当操纵一切。他看得很清楚，她经常违抗他，她一言不发，可对他说的每句话都持反对态度。这个女人啊！你不会当妻子，那么当个母亲也好啊，你把自己的孩子抛给谁？瓦西里，好吧，是男孩子，他会长大成人的，可斯韦特兰娜才是六岁的小女孩，六岁，你把她抛给谁啊？！不是把负担转嫁到他的双肩上了吗？

学校的老师们常来说瓦西里的坏话，他学习成绩差，表现也很糟糕。他亲自到学校去说明情况，他本人去——让人民知道他象普通的苏联老百姓一样，在尽自己作父亲的责任。不过要知道，这些责任本来应当由母亲负的。她逃避责任，开了小差，她向他报复——为了什么呢？是因为他没和她在一起去看过戏吗？那是因为忙才没去的。

他本来是爱她的。他清楚地记得看到她的那一天，那时她还完全是个小女孩，才三岁。他从乌法逃出来以后，来到阿利卢耶夫家，当时根本没注意到她，现在记得的是在梯弗里斯的那一天……他虽没注意到，可不会忘记。

他注意她时已经是1912年了，他和西拉·托德里亚来到彼得堡桑普索尼耶夫斯基大街阿利卢耶夫家里。他看到一个长

得很美的十一岁的少女，外表上象十三岁。按格鲁吉亚的风俗——这是未婚少女。她严肃、矜持、不爱说话，和她的姐姐阿尼娅的性格迥然相异。

从此，他常来阿利卢耶夫家，有时还在厨房后面的那间小屋里过宿，睡在那张狭窄的小铁床上。

二月里，在谢肉节那一天，他们一起乘雪橇，乘那种低矮的椅子式的芬兰雪橇，当时人们管这种雪橇叫“扁橇”，雪橇上装饰着五颜六色的彩带，套上几匹又矮又壮的马，马鬃都编成辫子，在雪上滑行时发出一阵阵丁铃铃的小铃铛声和铃鼓声。阿尼娅已经是个健美的姑娘了，当雪橇滑到雪堆上猛然向上跳起来时，她便装腔作势尖着嗓子喊叫起来，而娜佳却镇静地坐在雪橇上，不声不响，头上戴一顶毛皮的小圆帽，身上穿一件短而轻的皮大衣，一双高靱皮靴紧紧裹在两只匀称而健美的小腿上。

终于到了1917年3月，春天……他一到彼得格勒就到维堡大街，但结果阿利卢耶夫家搬走了，他们住到托尔恩托诺夫工厂附近去了，所以不得不乘市内小火车到那里。他只找到了阿尼娅。娜佳去上音乐课了。

那时他等谁呢？他是到阿利卢耶夫两位老人这里来的，当然是等他们的。可实际上是等这位姑娘回来。阿利卢耶夫本人回来了，他陪他坐在厨房茶坎子旁，突然娜佳在厨房门口出现了。虽然还是那身穿戴，但已是个亭亭玉立、身材苗条的十六岁的美丽的姑娘了，长得挺象他的父亲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他的祖母是个茨冈女人，所以娜佳的那双眼睛又大又黑，淡褐色的皮肤，一口雪白的牙齿特别醒目。

她脱下大衣，仅穿一身中学生的制服，帮着铺台布，有

时皱起眉头瞧瞧他。当大家围着桌子吃饭时，她仍然一声不响，认真、凝神地听他们谈话，听他说些什么。因此他不与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作政治上的闲聊，而是讲流放、西伯利亚、钓鱼以及和斯维尔德洛夫生活在一起的情况，他说他常尽力设法额外地多跑几次邮局，以便不做家务。他说得挺逗人笑的。

那时他们把他安置在餐室的沙发床上睡觉，阿利卢耶夫睡在另一张沙发床上。在薄薄的一层隔板那边是奥莉加·叶夫根耶夫娜、阿尼娅和娜佳。他时常听见她们的笑声、压低了的说话声。然后阿利卢耶夫就会用拳头敲墙说：

“安静点……该睡觉了！”

仿佛记得那时他大声地说：

“别管她们，谢尔盖，青年人嘛，让她们笑吧。”

他故意说“青年人”。他保持这样的态度，表现得自己年长，是她们父亲的朋友，但他比阿利卢耶夫小十三岁，当时他才三十八岁，而阿利卢耶夫已经五十开外了。他想让娜佳自己发现这个差别，让她自己发现他象同龄人那样对待她们的父亲是不合适的，他想使她想到：“您是什么老人啊！您也是年轻人！”不是要她说出来，而是要她想到这一点。

倘若她说出来那就不妙了，那就令人感到是奉承、是安慰人的话了，阿尼娅那个傻丫头可能会这么说，而她不会，她不可能，也不会说出来。他当时对这一点的评价是——她是个聪明的姑娘。他发现她对他感兴趣。这不只是对一个搞地下工作的革命者的兴趣，不只是对坐过牢、被流放过的人感兴趣，那是所有青年人所表现出来的共有的兴趣。她对他的兴趣有点特别。

早晨，大家又一起在餐室里喝茶了。娜佳做家务已经完全熟练了，她从外面回来，带回了报纸，放在桌上，表面看起来是给大家看的，可他感觉到，这是对他关心的证明。

后来，还仿佛记得，星期日他们一起乘车，坐在双层车厢的顶上，有他、娜佳、费佳、阿尼娅。阿利卢耶夫一家打算从涅夫斯基关卡搬走，想离市中心近些，便派儿子和两个女儿去找房子。而且决定在新房子里将有一间给他住。好象当时他还笑着提醒他们说：

“请你们别把我忘了……也替我租一间……请别忘了，”他下车时还伸出指头威吓地重复了一遍。

当他伸出一个指头威吓时，娜佳第一次微微笑了。这件事他记忆犹新：当时并不是针对他开的玩笑，而恰恰是冲着他微笑的。

他们在第十罗日杰斯特文卡街10幢17号之一租了一套住房，是六楼的一套很好的住房，宽敞的前厅，一个大房间作餐室也用作阿利卢耶夫和费佳的卧室，还有一间作奥莉加·叶夫根耶夫娜、阿尼娅和娜佳的卧室，在走廊顶头还有一个专门给他住的房间。

实际上他已成为他们家庭的成员之一了。几乎每天都见到娜佳——这个美丽、缄默、令人难以捉摸的姑娘深深吸引了他。她也倾慕他——他发现了这点，心里明白……可是他忙于革命工作，初次公开、合法地为革命工作奔忙——完成这些工作一般都要他到场，他亲自参加；他在《真理报》工作，常常在编辑部过宿，夜以继日，马不停蹄。

斗争在进行，他的命运、他们整个运动的命运——一切前途未卜。他现在能否将这个小姑娘的一生和自己动荡的、变

幻莫测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呢？

是什么想法支配着这个姑娘呢？他比她大二十二岁。在高加索这倒不是障碍，还有年岁更大的人娶年轻姑娘的。而且在她这个年龄爱上成年男子的姑娘也屡见不鲜。

然而，她象她的父亲一样，是个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是否她透过浪漫色彩的眼镜在看他呢？须知，家庭可不是浪漫主义作品，与浪漫主义作品相距甚远。这他已经尝试过一次了。结果如何呢？儿子目前还在第弗里斯，他不认识自己的儿子，几乎从未见过。曾经有过一个妻子，也和他视若路人。家庭对革命者来说，是个累赘……何况此刻革命正在进行，更是包袱。再说，革命——也不是结婚的时候。他的那些同志都是结过婚的。他们的妻子都是党内的同志，不是一般的妇女……不行！

娜佳当然与她们不能相比。这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且时候也不同了……必须确立自己在党内的地位。3月12日，他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的第一天（他们三人同时回来：他、加米涅夫和穆拉诺夫），就在那一天，党中央俄国局作出决议：穆拉诺夫为俄国局成员，斯大林“鉴于其个人性格上的某些特点”在俄国局内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吸收加米涅夫为《真理报》撰稿人，他的文章可以刊登，但不署名，其原因是1914年他在法庭上行为不体面。

愚蠢的决定！那个白痴什利亚普尼科夫居然把自己想象成中央俄国局的领导者！须知，他和加米涅夫可是中央委员，比什利亚普尼科夫的党龄长多了。他们作出这样的决定有什么根据？

次日，他硬性要修正这个决定。终于他作为有表决权的

成员进入了俄国局，并与奥里明斯基、叶列梅耶夫、加里宁、玛丽亚·伊里伊尼奇娜·乌里扬诺娃一起为《真理报》编辑部成员。他在《真理报》这些人组成的编辑部里很快显露出是个有支配能力的人。三天以后，即3月15日，他宣布新组成的编辑部的成员是：斯大林、加米涅夫、穆拉诺夫……

当然，奥里明斯基这个不幸的人表示反对。但反对有什么成效？他3月12日来到彼得格勒，3月15日就已经向他们表现出谁这里是真正的领导人了。

当时，《真理报》以及以后由他领导的《工人之路报》的观点、立场正确还是不正确，当时在对待其他的一些社会主义政党、对待列宁的“四月提纲”以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背叛行为”等方面，他的观点、立场正确还是不正确——所有这一切，就现在而言并没有什么意义，但在当时却举足轻重。他在为争取在党内的领导权的斗争中巧妙应付，这在当时那些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产生了效果——在十月革命时他成了党的领导者之一，中央政治局成员和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政府委员。

但是，当时搞斗争、办报纸，随机应变，他从不象其他人那样在群众集会上奔忙，从不高谈阔论，他只专心工作。当一切都确定了的时候，他始终跟着列宁，现在无论谁在任何问题上都不能非难他。

在那些日子里他顾不上个人的私事。

他很难得看到娜佳，每当他到罗日杰斯特文卡时，这个姑娘都使他激动，但暂时还顾不上那个。他甚至没有时间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她可想到了。

六月里，有一天使他难忘。他坐在编辑部的一个小房间里写什么东西。人们进进出出，他从不注意谁进来，谁出去，只是房门碰得砰砰响，使他很恼火，他对这种声音很讨厌，但在这里不得不忍耐，他也一直耐着性子。

只是有一次门打开时他回过头来看了。为什么他回头看呢？

娜佳站在门口。他看见了她。接着他又看见了阿尼娅。

他们扯了一些闲话。为什么这么久没去啦，他的房间空着等他回来啦……说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最主要的是——她到他这里来就是说，她想看见他。

阿尼娅说道：

“您好久没来了。我们不放心您。”

为什么不放心？没有理由不放心。他们在家每天早晨都收到报纸，读他写的文章，知道他平安无事。

娜佳来看望他……想念他。这才是重要的，这才是主要的。

他看到站在门口的她，高高的个子，身材苗条，美丽姣好，这时他决定了，这个姑娘将作他的妻子。

自这一天起，他经常回家，去罗日杰斯特文卡。

阿利卢耶夫一家对他十分关心，做好东西给他吃，甚至为他买了一套西服。阿尼娅张罗得最起劲，但家里真正的女主人却是最小的女儿娜佳。

奥莉加·叶夫根耶夫娜和阿尼娅说话的嗓门很响，成天吵吵嚷嚷叫得全家都听见，她们的喊叫声常常扰得他不能安宁。而娜佳围着围裙，用刷子仔细地打扫屋子，把所有的东西放在该放的地方。她喜爱整齐、清洁，而且整天不声不响。

既不忙乱，也不叫喊。是个真正的家庭主妇！

晚上她常常弹钢琴，自弹自乐，他一回家，她就住手不弹了。

“为什么不弹了，为什么停下？”他问道。

“您休息吧，”她答道，“我不想打扰您。”

她还在中学里读书，在学校里她被公认为女布尔什维克，她在教室常常嘲笑“美男子克伦斯基”，拒绝捐款救济那些倒霉的沙皇官员。但所有这些都不是从她口中听到的，而是从奥莉加·叶夫根耶夫娜那里知道的。

有时晚上全家围坐在桌旁。

他请娜佳弹一支曲子，她不肯，于是他就请她朗诵契河夫的著作，他喜爱契河夫的作品，喜爱娜佳朗诵他的作品。她朗诵得很生动。

阿尼娅也朗诵，但读得不好，她往往忍不住要笑，笑得前仰后合读不下去——结果什么也听不清……娜佳朗诵时，自己从来不笑，要是听的人笑了，她就停顿一下，然后接着读下去。她朗诵过《变色龙》、《普里希别叶夫中士》，也朗诵过《宝贝儿》，但他觉得她读这篇作品时，并不特别乐意。

有时有些女友来找她。他常常注意听她们年轻少女的交谈……后来她们往往转讲法语……这使他很恼火，似乎她们讲法语有什么事情想避开他，所以就阴沉地走了出去。但是，娜佳懂法语、会弹钢琴，她那认真的态度和善于自持的性格一直吸引着他。

有一次他躺在床上被人喊醒了：

“约瑟夫！”

他睁开眼睛。

门口站着娜佳……他立刻感到有一股焦味，被子快燃着了，原来他手里拿着烟斗睡着了……

娜佳立刻打开窗户。他跳起身来，卷起被子。接着奥莉加·叶夫根耶夫娜和阿尼娅奔进房间，立刻乱成一团，叽里哇啦地抱怨起来。而娜佳却向他微微一笑，挥了几下手，从房间里走了出去。

仿佛还记得，他把卡莫带回家，将他留在家里，自己走了。卡莫讲了很多故事，整个晚上使大家很开心。他知道，卡莫讲的故事很多地方都谈到他。

过了一年，已经是1918年了，他和她结了婚。婚后就将她带到察里津去了。但以后又把她带回莫斯科，从此再没带她去别的地方。

从什么时候起他们之间开始发生矛盾的？他也说不准确。

大约是斯韦特兰娜一生下以后……当时她突然带着瓦夏和吃奶的斯韦特兰娜到列宁格勒父母那儿去，而且宣布说：再也不回来了。她说他是个粗暴无礼的人，还说他是卑鄙的人。这样的事，如果换了别人他是无论谁也不会饶过的，可对她却原谅了。因为她是个刚分娩的女人，据说女人在分娩以后容易冲动，每个女人身上都存在着歇斯底里的因素，而这种因素在刚分娩的女人身上表现得特别强烈。

他原谅了她，挂了个电话去列宁格勒请她回来，甚至愿意自己去接她。她嘲讽地回答：“你来一趟国家得付过于昂贵的代价。”于是她自己回来了。

“你来一趟国家得付过于昂贵的代价。”她这句话里蕴蓄了什么含意呢？当时他想了一下，这是她常说的一句讥讽的话，一般女人挖苦人的话。现在他从另一方面来理解，明白

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那是在召开了十四次代表大会、粉碎了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撤换了列宁格勒的领导班子之后，又过了几个月，这时他到列宁格勒谁也不需要，而且可能会被误解。

是基洛夫劝说她回来的，这表明基洛夫不想他去列宁格勒，还在那时候就不希望他去了。他们在那里曾结下了温存的友情。

她在临死之前曾向他声明，她一毕业就到哈尔科夫上列坚斯家去，将在那里工作。

他听到她和保姆的谈话。“一切都令人腻烦，一切都令人厌恶。没有一件事叫人高兴。”她曾这样对保姆说。“没有一件事”是什么意思？！孩子呢？

她处处都故意和他作对。

她知道他最恨香水，认为女人身上只应当发出清新的、纯正的气息。可她却常常洒香水，故意地洒香水，而且洒外国香水，香水是她的兄弟帕维尔从国外带回来的，她还有意和他为难似地穿外国的连衣裙，连衣裙也是那个帕维尔和其他几位可爱的斯瓦尼泽家的人带回来的，她在学院置身于那些普通苏联老百姓之中，身上却发出外国香水气味。这可是他的妻子……啊？！

帕维尔为什么要送她手枪？一个女人为什么要手枪？是谁想起送女人手枪的？那个人是否准备让她一步步地暗杀他？出事以后，他下令收回他进克里姆林宫的通行证。太不够了，太不够了！他一想到帕维尔就恨之入骨。必须严厉地惩罚他。让他晓得厉害！

现在他已不再结婚了。

人民会理解他的。他失去了心爱的妻子，不想再娶——人民将会理解这件事。他是个好父亲，不愿自己的孩子有继母——人民将会这样理解这件事。他也确实不愿孩子有继母——那将增加许多新的麻烦、新的纠纷，又会多一门新的亲戚，而这门亲戚又将会是怎样的呢？他单身将会极大地为他增添朴素的成分，这种朴素又将给予人民以深刻的印象，使人民敬仰他、爱戴他。人民会想：连关心他的人都没有。

关于他的流言蜚语也没有了，在这点上那些机关没有骗他，在这问题上他追究得很厉害，问得极其详细。他决不让人有任何播弄是非的根据。

他很少当众发表演说，从不到工厂里去，从不参加群众大会，只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讲话：例如在代表大会上、在全会上，在报刊上登简短的祝词。他的每一次发言应当是一次重要的事件，他的话应当一字值千金。普希金说得对：

你沉默寡言吧！沙皇的声音
不应在空气中消泯散尽，
这神圣的音响只能宣告
巨大灾难或伟大节日的来临。

说得多好啊！

应当注意，检查一下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纪念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如何。当然啰，在普希金身上有很多不能允许的思想言行，但应当将不能允许的东西引向反对那个时代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及其左右的人。应当突出需要的、对我们有利的东西。须知，普希金吹捧彼得一世，他著有《青铜骑士》、《波

尔塔瓦》、《彼得大帝的黑奴》……是啊，当时必须这样，于是普希金颂扬现存的政权，为其对外政策辩护……

遗憾的是在他的时代里没有象普希金这样名扬遐迩的诗人。

不过，又何必遗憾？相反，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与历史上一些伟大的统治者同时，往往不会有伟大的诗人。在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仑、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在位时有过哪些伟大的诗人？恰恰相反，荷马、歌德、莎士比亚、普希金、托尔斯泰——他们是生活在哪些皇帝当政的时代呢？谁还记得这些皇帝？伟大的诗人往往以人民的精神领袖自居。而伟大的统治者本人就是人民的精神领袖，与他同时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精神领袖存在。

但所有这一切都这样，再说……他思潮起伏，浮想联翩。这不好。必须善于集中思想……对，现在他已经不再结婚了。

斯大林的前妻叶卡捷琳·谢苗诺夫娜·斯瓦尼泽的兄弟——老布尔什维克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阿辽沙)·斯瓦尼泽于1937年被捕，五年后，即1942年被枪决。

在临刑之前，有人对他说，假如他请求斯大林的宽恕，斯大林将赦免他。

“我该请求什么？我可没犯什么罪，”斯瓦尼泽回答。

于有他被枪决了。

当把这情况报告斯大林同志时，他说：

“瞧，多自高自大，死不求饶。”

也就在1942年，他的妻子玛丽娅·阿尼西莫夫娜在哈萨克集中营里牺牲了。

他们的儿子焦尼克(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监禁在牢内,与刑事犯关在一路,直到1956年才被释放。

斯大林第一个妻子的亲妹妹叶卡捷琳娜·玛丽科于1937年被捕,很快就死在狱中。

斯大林的第二个妻子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的妹妹安娜·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于1948年被捕,判处十年监禁。她被关押在符拉基米尔监狱里,在斯大林死后才被释放。她的丈夫斯坦尼斯拉夫·弗兰采维奇·列坚斯于1938年被枪决。

帕维尔·阿利卢耶夫,斯大林妻子娜杰日达的哥哥,原在装甲坦克管理局工作,曾试图为几个无辜被镇压的同事辩护,在这以后斯大林不再接见他。1938年帕维尔出人意外地死了,年仅四十四岁。

他的妻子叶夫根尼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利卢耶娃于1947年12月10日被捕,判处十年监禁。当1954年4月2日叶夫根尼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被释放时,她已在莫斯科,回家后对儿子说:“我们的亲戚终于释放了我们。”她不知道,斯大林一年前已经死了。

帕维尔和叶夫根尼娅的女儿基拉·帕夫洛夫娜于1948年被捕,斯大林死后被释放。

斯大林第一个妻子的儿子雅科夫1941年夏被德国法西斯所俘,表现很英勇,1943年牺牲,具体情况不明。

他的妻子尤利娅1941年秋在莫斯科被捕,在雅科夫牺牲后不久被释放。

9

阿什亨·斯捷潘诺夫娜在家里第一个发现列娜怀孕了。晚饭后，当大家都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以后，她把列娜留在餐室里。

“你留一下，我想和你谈谈……”

她们面对面地坐在桌旁。

“列诺奇卡，告诉我，我不会弄错的，你怀孕啦？”

“是的。”

“就是说，你有丈夫了？”

“没有。”

“得了吧……就算这样，孩子的父亲是谁？”

“我不想说他的名字。”

阿什亨·斯捷潘诺夫娜耸了耸肩。

列娜补充说：

“我还要求你，请你转告爸爸，让他别问我谁是孩子的父亲。”

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不吭声地听完了妻子的话，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大概仍然是那个狗崽子。”

“可那时她就已经和他断绝往来了。”

“打那以后他们还常常会面。告诉她，让她到我这里来一下。”

“她怕和你谈话，伊万，她求我要你什么也别问她。”

“我什么也不问她，你让她到我这里来一下。”

“你对她温和些，答应吧？”

“我答应你。”

阿什亨·斯捷潘诺夫娜走进列娜的房间。

“列诺奇卡，父亲喊你。”

“干什么？”

“想和你谈谈。”

“我已经全告诉你了，再也不说什么了。”

“他什么也不会问你的，他答应过。你到他那里去一下。”

列娜把书放在一旁，站起来，毅然地向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的工作室走去。

父亲坐在沙发上，用手势示意身边的坐位。

列娜坐下了。

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久久地看着她，然后微笑了一下。

“哎，怎么啦，你想要我当外公啦？”

“倘若能生下的话。”

“应当生下孩子。不应该再重复去年的那种情况了。我不责备你，只不过担心，但愿这别影响分娩。所以我请你去给医生看看，让医生检查一下。去告诉妈妈，你要我去对她说吗？”

“我自己去说，”列娜答道，“我马上就去一趟医生那儿。”

“现在这问题里有微妙的部分。无疑我很想知道这孩子的父亲是谁。你自己明白这一点，倒不是为了要逼他和你结婚，也不是为了得到抚养费。没有他，我们也会培养教育孩子的。他究竟是谁？这个人是你的同班同学……好象是尤拉？”

列娜迟迟不作答。

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期待地看着她。

“是的。”列娜终于回答。

“他知道这事吗？”

“知道。”

“你们想结婚吗？”

“决不。”

“他以后将提出要这个孩子吗？”

“永远不会提出。”

“还有什么人知道？”

“没有任何人知道。”

“那就一切都妥当了。”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说，“孩子还是孩子，会生活下去的。只是你既下了决心，就要坚定些：从此和这个人一刀两断。”

“我已这么做了。”

她在父亲面前没有说假话。可过了五月份的节日以后尤拉又出现了。这使她十分惊讶，因为她坚信那次谈话似乎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了，他走以后将再也不露面，他答应只打电话说说俏皮话。

8月份，当他们从疗养院回莫斯科时，沙罗克仿佛顺便重新回过来谈关于维卡的事：

“究竟谁对你说了这么多的话？”

关于维卡是情报员的事，尼娜从瓦里娅的话里知道并讲给列娜听的。瓦里娅嫁的是一个玩弹子球的人，和他一起在旅馆里的时候常遇见维卡，她曾不止一次地断言，维卡是个告密者。

“别人说的，”列娜简短地回答。

几天以后，尤拉打电话到她上班的地方，问她是否改变主意，她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是流产呢，还是他们绝交……可她也不把事情挑明，回答说：

“不；我没改变主意，以后也决不改变。”

“那就再见吧。”

“再见，尤拉，”列娜说完话后挂上听筒。

现在她的情况就是如此。

“真话，爸爸，”她重复说一句，“我已这么做了。”

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想问，她是否坚信自己不改变主意，但没有问出口，只看了看她的眼睛，列娜没有回避他的目光，这使他十分欣慰。别人说她幼稚，消极……不！不愧是他的女儿，他的亲骨肉，和他的性格一模一样！

他抱住她的双肩，将她拉到自己胸前，她紧紧靠着父亲，象小时候那样把头搁在他的肩上。

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的办公室，由于被突出的墙角挡住，常常是半明不暗的，现在已完全黑了。父女俩——父亲和成年的女儿仍然默然地坐在沙发上，紧紧靠在一起。他们的生活中象这样的时刻很少。

这几分钟补偿了他们这几年不得不度过的困难的、折磨人的一切，使他们不断增添力量，从而能更平静地正视那渺茫的令人不安的明天。

走廊里传来了铃声。

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亲了亲女儿的头，爱抚地拍拍她的脸颊。

“就这样吧，亲爱的女儿，我们在一起坐了会儿，这是有人来找我了。”

他站起来，开了灯，走出了办公室。

马克·亚历山德罗维奇·梁赞诺夫站在前厅里。

他是来莫斯科参加中央六月全会的。6月7日全会闭幕。8日在奥尔忠尼启则那里待了很久。但没到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这里来，而是从那儿挂了个电话，请求允许晚上到他家里来看看他，虽然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协调：表面上是由于梁赞诺夫不为自己的侄儿去向斯大林求情，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在这一点上大为诧异，实际上是由于他们对斯大林的态度迥然不同。

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布佳金知道，梁赞诺夫的处境很复杂，似乎他从工厂里被撤下来并调到克麦诺沃联合企业建设工地了。这项任命很怪：马克·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个冶金学家，不是矿业工程师，也不是化学家，不但如此，而且不是个搞建筑工程的，虽然奥尔忠尼启则向他宣布了新的任命，但调动的真正原因并没说。当然，他到这里来是想向布佳金了解事情的原委。但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对他爱莫能助，因为他自己也是一无所知。

他们走进办公室。马克·亚历山德罗维奇请他允许脱下上衣。他是个小矮胖子，秃顶，那种易患中风的短颈子，他气喘吁吁，露出惴惴不安和诚惶诚恐的眼神。

“喂，马克，怎么样，听说你调到克麦诺沃了，”布佳金问

道。他只称梁赞诺夫的名字，是想强调对他友好的态度。他明白，此刻梁赞诺夫需要他。

“这就去。我很想知道调动的原因。可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没有告诉我。据他说是党的意志，库兹涅茨克煤田需要整顿，已授予你勋章，就是说我们器重你。”

三月份，《真理报》上刊登了一大批荣获列宁勋章的重工业领导人的名单。名单里就有梁赞诺夫。名单上为首的就是奥尔忠尼启则本人，没有布佳金。

“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有洛米纳泽？洛米纳泽一月份自杀了。我和他的关系既不很亲近，但也没和他吵过架。他自杀的原因不怪我，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这点你知道得很清楚。是州委书记伦金传他的，他讲话很粗暴。”

“你从哪儿知道的？”

“工厂里谁都知道这件事，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洛米纳泽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本人，可人家都这么说，似乎他们向他出示了什么人的供词，供他曾在共产国际带头搞阴谋。有一次传他到伦金那儿去，他就在汽车里开枪自杀了，司机停车——他还以为汽车外胎爆了呢。他看到洛米纳泽侧身躺在那儿说：“娘儿们打的枪。”司机说，在这之前，他们不止一次停车，喝酒、吃点东西，很明显，车上的隔板摇上去了。虽然洛米纳泽射击得很准，在乳头下两指的地方，可子弹没有打中心脏。维萨里昂·维萨里奥诺维奇被送进医院，给他做了手术，但他在麻醉时死了。”

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虽然对梁赞诺夫说的这一切全知道，甚至知道得更详细一些，还是注意地听他讲：因为奇尔和其他卑鄙的家伙杜撰出的供词是按斯大林亲自命令拿去要

洛米纳泽本人证实的。

“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很爱洛米纳泽，我明白他为他的死很难过。但我在这件事上，正象人们所说的，毫无瓜葛……我和他很难工作得很协调，因为他是政治上的大人物，我只不过是个工程师，然而领导建设工程的仍然是我。不过，尽管如此，我再说一遍，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冲突，我知道斯大林同志对洛米纳泽的态度，但我从不受命于人。还不仅如此！当时我深信，维萨里昂·维萨里奥诺维奇一定会葬在家乡的，格鲁吉亚人通常都是这样做的，但上级命令将他葬在市公墓，也就这样做了。一些格鲁吉亚人替他立了个纪念碑，凑了些钱刻了题词，还有一个什么纪念像，不怎么好，纪念碑还体面，我能禁止他们这样做吗？也许斯大林同志对这不满意？”

“这个名单，那张签名的纸在哪儿？”布佳金问道。

“在会计处。一切手续都办好了。经费由大家自费出，厂方为此负担了一些材料和少量的东西，但一切都合乎手续。”

布佳金沉默不语。梁赞诺夫使他很不愉快：他怕担风险，在明哲保身……他怕了。签名的纸放在会计处。难道他不明白，凡是在这张签名纸上出现的人，所有这些不幸的格鲁吉亚人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搞死。斯大林对这种善行是不会饶恕的。

“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梁赞诺夫迟疑地开口说，“我想和您商量商量……当然，我明白，我的调动不是偶然的。但调动的原因我不清楚。不是生产上的原因，因为我们的工程提前完成了，生产出了高质量的金属，城市公用设备愈来愈完善，一月份电车通车，消灭了文盲，去年在各高等学校、中

等技术学校和普通扫盲学校里有三万二千人学习，其中一万人不脱产。城市变成了文化中心，索比诺夫、奥布霍娃、卡塔耶夫、革拉特科夫，甚至路易·阿拉贡都曾先后来过这里，要知道，这一切都是我们从零开始亲自动手完成的。究竟为什么突然撤了我？”

“不过你并没有被撤掉，”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表示异议，“他们将你调到另一个相当负责的工作岗位上，你好样儿的，在此地经受住了考验，现在你在别的地方也经受得住。我们就是这样的制度。”

“当然是，”马克·亚历山德罗维奇表示同意，“我一直准备党将我派到哪儿就在哪儿工作。不过你还记得去年皮达可夫的委员会的情况吗？”

“你去逮捕的那个委员会的情况？”布佳金笑着说。

“不过我没有逮捕过那个委员会，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梁赞诺夫不同意地说，“我只不过不想在和奥尔忠尼启则谈话之前放他们到工厂里去，他们生气走了……的确，我们造了一座电影院、一所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的俱乐部、一个少先队营、一所幼儿园和在硫化泉旁边造了一幢医疗大楼。没有花国家一分钱，人们晚上和休息日干的，干得热火朝天，他们是为自己、为自己的孩子们干的。不建设生活区，工厂不可能发展。这些事情在斯大林同志那儿就弄得一清二楚了，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还有谁，好象是叶若夫都在场，斯大林同志承认我们作得对，还称赞了建设工程，他完全赞成，承认皮达可夫派委员会去是个错误，是个大错误。可是一星期前我被喊到州委会政治局去，要我就这一事件写一份书面的情况说明。要求承认这个工程是计划以

外的，因此是不合法的，承认我事实上逮捕了从中心派来的委员会。我向他们解释在斯大林同志那里开的一个会，说斯大林赞成我们的行动。他们回答说：我们不是问你关于斯大林的行动，问的是你的行动，不要假斯大林的名字来掩盖自己，您自己要有勇气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我说：工人们自愿在规定以外的时间工作，有一个人竟阴沉着脸说：‘您强迫他们，他们当然工作。’况且我开始解释说，这些工程对工厂、对工人都是必不可少的，州委书记伦金打断了我的话，说道：‘不是工人们需要，而是您自己为自己沽名钓誉’。”

“那他们决定了什么呢？”

“责成一个党的委员会处理。总之，我就要带着个人的问题离开了——这就是对我的工作的全部奖赏。”

“你为什么不和斯大林谈谈？”

梁赞诺夫垂下了头。

“他不接见我。”

“可要知道，你是中央候补委员，你曾参加过中央全会。”

“在全会期间我都不能走近他。全会开得令人难以忍受。叶努基泽的脸色可怕极了。您想必知道决议的情况吧？”

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用目光指指那张载有斯大林主持的联共(布)中央全会所作决议的6月18日的《真理报》。

斯大林清算了他最要好的朋友他已故妻子的教父、他孩子——斯韦特兰娜和瓦夏称之为“阿维尔”大叔的他们最喜爱的人，这是个在他们家庭里唯一能在某种程度上即使是表面上来维持和谐和一致的人……

因为什么呢？

因为叶努基泽写了一篇关于巴库“尼娜”印刷厂的真实情

况，没有杜撰，没有在小册子里提及斯大林的名字，斯大林甚至都不知道有那家印刷厂。

账算清了！

而且是怎样的清算啊！

两周内制造了一起“克里姆林宫阴谋”，逮捕了78人，一个人接一个人地被抓：有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博利希赫·伊连娜·华西里耶夫娜、叶利恰尼诺娃·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政府图书馆工作人员——涅利多娃·安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佩雷尔施泰因·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西马克·叶连娜·奥西波夫娜；克里姆林宫兵器陈列馆的一些工作人员，尤其是很多政府大厦的清扫女工——茹科娃·娜佳、科尔恰金娜·舒拉、康斯坦丁诺夫娜·娜斯佳、卡滕斯卡娅·布罗尼娅、梅利尼科娃·列娜、梅谢里亚科娃·玛莎、奥尔洛娃·丹娘、斯莫利佐娃·达莎（看门人）、波波夫·伊利亚·马特维耶维奇（木匠）、季亚奇科夫·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大车工人）、涅韦罗夫·伊万·菲利波维奇（守卫）。把这些清洁女工、守卫、图书馆工作人员、管院子的人的熟人，那些熟人的熟人都抓起来。大部分“阴谋家”甚至互不相识，从他们口中逼出口供，供出基洛夫和阿利卢耶夫死因的谈话，认定他们对斯大林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进行反革命诽谤，破坏斯大林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威信，制造“克里姆林宫阴谋”。

他们为这件事在全会上压制阿维利·叶努基泽。似乎他对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的职能机关中成分极其不纯放任自流，让我们那些该诅咒的阶级敌人钻进来，对那些阶级敌对分子持保护、包庇的态度，这些敌对分子则充分利用

他为其卑鄙的目的服务；他与来自异己世界的人的联系比之他与自己党的联系更宝贵。他暴露出自己是腐化堕落的庸俗小人，是个不自量力胆大妄为的人，脑满肠肥、失去共产党员本来面貌的人，是个采取孟什维克立场的达官贵人。

布佳金凝视着梁赞诺夫。

这一切都是在会上说的，都是他亲耳听到的，但是没有讲给布佳金听。

为什么他如此小心谨慎？他为参加镇压老党员阿维利·叶努基泽，为参加摧残那些普通的、没有自卫能力的、识字不多的人，为参加迫害那些清扫女工和守卫而感到羞耻吗？

不，不是，他不感到羞耻。他习惯了。他不愿讲那些细节，因为要讲就得对这一切表态，而他就怕表态——对所有这些肮脏的伪造的事能表示什么样的态度呢？他现在很怕，就象一年前怕替自己的外甥萨沙打抱不平那样。他的外甥是个好小伙子，什么罪也没有，就象78人一样。为了对付一个阿维利·叶努基泽，斯大林又要了78个人的性命。如果只给一个阿维利定罪，就明显地意味着他在清算那本小册子的账了。而将其纳入一大堆人里面——这就是阿维利在搞阴谋，同巴库的事无关。叶努基泽负责克里姆林宫，克里姆林宫里有敌人，叶努基泽就得承担责任。与此同时，还有78名无辜的人丧命——你想想，是怎么一回事啊！……而且还会有很多人要遭灭顶之灾，圈子还将扩大，要让所有企图触犯他的历史的人都知道：可以消灭的不是78人，而是七万八千人。历史比人珍贵，历史比人重要——这就是斯大林的哲学。

但是梁赞诺夫此刻考虑的不是全会上发生了什么事，他忧虑的不是这些事，而是在为自己的命运担忧，感到自己的

命运正在关键时刻，本来一帆风顺，正在青云直上、步步高升，可突然来了个急刹车！

调到库兹巴斯去——这倒是正常的，但不说明原因，带着个人的问题，斯大林又不愿同他谈话……梁赞诺夫虽还未预感到自己会彻底垮台，但已成惊弓之鸟。况且这种惊惶失措之感不是没有根据的。

对付奥尔忠尼启则，斯大林不会象对付基洛夫那样寻找一个尼古拉耶夫，或是象对付古比雪夫那样，寻找一些令人生疑的医生，他将根除谢尔戈引为骄傲的那些人——那些谢尔戈亲自发现、亲手提拔和培养的经济干部，斯大林将会象对待敌人一样对待那些干部，象对待破坏分子那样，将他们一一消灭干净，并且迫使谢尔戈或是参与对他们的屠杀，或是同他们分担破坏活动的责任。

当然，奥尔忠尼启则的威信很高，但是难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当时的威信低吗？因此，梁赞诺夫的事大概就是这个计划中的一个环节——斯大林早就开始周密地考虑自己的计划了，而且早就开始动手了。对付梁赞诺夫，显然是斯大林走的一着妙棋——因为他对他象上帝般地信任，所以瞬间他就可能彻底被摧毁。

因此，布佳金没有对梁赞诺夫谈任何想法，没有交换任何情况，仅仅问道：

“那你想要我干什么呢？”

梁赞诺夫耸耸肩膀。

“我和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的谈话一无所获。我去对他说：州委常委会叫我去，又谈到我个人的事了，可他笑

着说：“你看，计划外的建设成了什么样子？”从前在斯大林那儿时，他也是不支持我的。我请求您，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请您打听一下并告诉我：我调动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好吧，”布佳金说，“我试试同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谈谈。”

他站起来了。梁赞诺夫也站了起来。

“我不能相信他对我会比对你说得多。不过倘若有可能，我一定和他谈一下，”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又补充说。

然后想了一下，问道：

“你外甥的情况如何？”

马克·亚历山德罗维奇叹了口气。

“在流放。”

“在哪儿？”

“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很大。”

“在安加拉河沿岸的什么地方。”

“在安加拉河沿岸的什么地方，”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重复了一遍，不知是沉思呢，还是嘲讽，“好吧！如果我打听到什么，就通知你，如果打听不到，请勿见怪……”

“好的，谢谢，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

他同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和阿什亨·斯捷潘诺夫娜告别后就走了。

10

维卡没有把全部真情告诉瓦里娅。阿尔希捷克托尔确实工作很多，她也确实很少见到他。可她容忍这种情况，因为当丈夫整天忙于工作，你整天自由自在时，便可以毋需考虑他而自己高兴怎样就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了。但为了每天过象节日般的生活就得花钱，需要花很多很多的钱，而阿尔希捷克托尔每月要将自己的一半工资交给他的前妻和儿女们。顺便说，儿女们都够大的了，已成年了，可以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了。而以前曾经同维卡谈起过她该做点事，您明白吗，去上班或者去学习也许还不迟，可那次谈话真愚蠢极了。岂有此理！因为她有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她是妻子，按照他们自己规定的不成文的条条——她是家庭主妇，有权不工作……只是他并不可怜她，也不爱惜她。他的一切注意力和兴趣全都放在工作上，放在他过去的家庭里……他不仅给他们钱，而且没有同他们断绝关系，经常去探望前妻和孩子，回去一起度过家庭节日。他居然能在十二点之前和维卡一起迎接新年，十二点之后和他们一起迎新年，说：“我去看看孩子们，我答应过他们的。”您瞧，那儿是家，这儿是什么呢？

他甚至连自己的东西都不搬过来，只带来一只小手提箱，

手提箱里放两件衬衣、两条衬裤和背带。这就是所谓的天才！他不仅不和妻子分享“共同积聚的财产”，反而将一切都留在那儿，而且连藏书也没带来，要知道藏书是他工作上要用的。他真正的家是在那儿，他肯定还是要回到那个家去的，维卡对这点毫不怀疑，而且并不因此十分惋惜，因为这种生活对她不合适，她过的不是快快乐乐节日般的生活，而是枯燥无味的灰溜溜的生活。

维卡没有同他发生争执，她明白：现在一切都勉强维持着，倘若发生冲突，那么这一丝联系也就断了。可这种联系她不能断，也就是说当她还是阿尔希捷克托尔的妻子的时候，必须安排好新的生活，重新安排自己的命运。不应是另一个人来挑选上她，相反，而是她为了另一个人将既牺牲自己崇高的地位，又牺牲自己幸福的家庭生活。为了爱情有什么不能做到！……那时，她的再嫁将成为一件大事，首先对她的新的意中人来说是件大事。

脑海里又出现了想找个飞行员的想法。可飞行员们在哪里？到哪儿去寻找他们？这只是幻想。况且维卡几乎哪儿也没去过，她一直呆在家里。

马拉谢维奇的家中仍象从前那样挤满了人，热热闹闹，慷慨待客，仍象从前那样，莫斯科知名人士常来拜访。找音乐家吗？艺术家吗？不行，这种人的地位太不稳定了。

她那位哥哥接二连三猛烈地抨击了所有的人，他评论过音乐、戏剧、绘画、文学。作家潘菲奥罗夫在《真理报》上把高尔基咬了一口。瓦季姆说，他咬得对，因为高尔基批评了一些党员作家。然而就在那一版上刊登了从未发表过的高尔基给契诃夫的信，正如瓦季姆阴险地指出的，“在苦药丸上加一点

糖。”现在瓦季姆结交的大多是作家、诗人，著名作家、著名诗人，很多人在马拉谢维奇家作过客。

维卡常常接待客人，同这些人交谈对她来说很困难，因为老实说，她什么也没读过，枯燥无味：所出版的尽是一些突击手、积极分子、工厂和钢铁的书。但她很善于使自己的无知转为对自己有利，她特别仔细倾听对方的谈话，热烈赞扬对方的叙述，让对方明白，她对他的聪明才智和博学十分敬重，这种做法往往使那些人心里极为满意。

有一个三十岁好奔忙的年轻人，长得很瘦弱，他刚刚发表了一部小说，大家都读过，异口同声的赞誉不绝，甚至维卡也看完了这部小说。谢天谢地，那本不是描写突击手的、而是描写富农、描写富农骚动的作品，可以阅读。说实话，作家本人文化修养不高，不知是乡村神甫的儿子、还是教堂执事的儿子。处女作的辉煌成就使他昏昏然不知所措了，除他自己以外，无论谁的话和什么事物，他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连维卡仔细听他的话这一点都淡然处之，甚至避开她、莫名其妙地看了她一眼：因为他根本不希望对方默不作声，相反，他想别人谈论他，评论他的小说，要是对方不吭声，他就自己叙述在别人家里别人是怎么夸奖他的小说的。

或许维卡也能够唤起他的激情、使他迷恋，不过他很快就不知去向了，按瓦季姆所说，他离群索居，以便去写一部托洛茨基搞地下活动的小说，说是必须使他的成绩发扬光大。

又出现了另一个作家，年岁稍大些，大概快到四十了，这是位在彼得堡出生的知识分子，戴一副角质边框眼镜。从前他常住国外，写过某些异国情调的东西，描写亚洲地区的作

品，仿佛是关于巴斯马奇分子^①的情况。但不久他也不知去向了，虽然维卡觉得她在那件事儿上进展得挺顺利：她对他总是随声附和、百般顺从，而且连声赞叹，她的全部表情神态使他明白，她还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人。可也没有结果：这个人也悄悄地不知溜到哪儿去了，似乎跑到东方国家去写新小说了。所有到他们家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落空了，就这样，维卡一个人也没能缠上。

同那些旧相识的约会也停止了，从前他们都是在餐馆里见面，而维卡再也没去过餐馆，阿尔希捷克托尔忙得分不开身，而她不偕同丈夫一起去则意味着破坏了她自己塑造起来的上流社会贵夫人的形象。

她便频繁地轮流和诺埃米、尼娜·舍列梅捷娃（这些姑娘不象她，生活得都很愉快）打电话，可常常在外作客的，仅仅是在涅尔莉·弗拉基米罗夫娜家里，后者已经嫁给了一个富有的法国商人乔治。

维卡很不喜欢这个年轻的法国人，他个子矮小，厚嘴唇，一双淫荡的眼睛尽在女人身上打转，几乎不会讲俄语，或者装模作样，不是说话，有时只是出其不意地唱了起来：“玛丽娅·西多列夫娜，玛丽娅——西，玛丽娅——多，玛丽娅——列”，重音放在“西”、“多”、“列”上，接着傻里傻气地笑上一阵。

不过他家的住房倒十分富丽堂皇，地毯、古色古香的家具、瓷器、自备小轿车、各式各样国外妇女穿的衣服，很多

^① 巴斯马奇分子——1917年十月革命后，封建拜依（地主）和伊斯兰宗教界在“伊斯兰协会”领导下发动的反革命武装叛乱。——译者

衣服，看得出，乔治实际上是富有的，虽然谁也不知道他做什么买卖，即使涅尔莉在这方面也说得含糊不清。

总之，涅尔卡是走运的。可她身上有什么吸引人呢？是一匹母马！健壮、骨骼粗大，男子们常向她扑去。于是乔治被她弄到了手。他还比她矮半个头。“夜里你睡觉时不会不小心把他憋死、不会把他压伤吧？”维卡笑着问道。“你放心，”涅尔莉回答：“他可是个机灵鬼，我们会找到需要的姿势的。”

她将住宅按欧式布置，已经两次去巴黎，仔细地了解清楚：什么开胃酒呀、各式各样的夹肉面包片呀，自己开汽车呀，总之，她甚至不是欧化的，而是美国化了的麻利、泼辣的少妇，既善于适应环境并利用环境，观察和领会能力又强，而且是个有点爱唧唧喳喳说话的女人。但她很勤快，能抽时间看书绘画，屋角里放了一副画架……还有些小嗜好：赛马、赛马赌博，而且经常赢。她很善于钻营——她的那些各式各样的衣服常常脱手得十分灵活利落，不是作投机倒把买卖，而是作为多余的衣服卖给女友，说这一件她不合身，那件颜色不合适。她开始有了自己的“一伙人”——有了已成为惯例的朋友们在她家聚会的日子。

但主要的是涅尔莉家里经常有客人，很多客人，基本上是个些外国人。这就给维卡提供了某种机会。涅尔莉几乎将每一个人的情况都讲给她听——多大年龄、有什么爱好、有哪些可能性，有时还加上几句引人入胜的细节，“议论议论是非”，总之……。

很多人都注目于维卡，但暂时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都是些小人物。几乎所有人都是结过婚的。维卡一直保持着一般的、持重的举止，带着对任何事物都无所求的和蔼可亲的

神态，就象她这种水平的太太所应有的态度那样。有人试图向她献殷勤时，她有分寸地避开，但在尚未弄清“个人身份”之前，并不完全制止他们这么做。当弄清了对方的“身份”不是她所需的人时，她就巧妙地使对方失去第一天晚上她所给予的那一点微小的希望。

维卡在涅尔莉家里终于遇见了夏尔。

高高的个子，淡黄色的头发，他手里端着高脚酒杯站在乔治的身旁同他讲些什么。他那仪容高贵的面孔、凸起的鹰钩鼻子立刻投入了维卡的眼帘，她注意到了他那身端庄而雅致的西服。这种人物还从未飞进过涅尔莉的家。是贵族吗？由于他凝视了她几次，维卡立起身来——终于闪现了一丝希望的火花。她能准确无误地识别男子的目光：哪种是有真正发展希望的目光，而不是恬不知耻地到处搜寻目标的目光。

第二天，当她和涅尔莉“议论别人是非”的时候，维卡谈到夏尔时说：

“淡黄色头发的法国男子你不常遇到吧？”

“所有的法国贵族男子，照例都是淡黄色头发。而且一般地说所有北方出身的法国人，尤其是东北部的法国人，是淡黄色头发——他们身体内流的是日耳曼族人的血，”涅尔莉解释说。

她嫁给法国人后自认为是法国专家。

“他是贵族吗？”

“那还用说。他是子爵，写他的姓时要带上一个前缀‘德’。”

“真有意思，”维卡笑了，“那么，子爵在莫斯科干什么事？”

“夏尔是记者，”涅尔莉说出了一家有名的法国报社，“掌握这家报社的是他的家，他家是法国最富的家庭之一。夏尔的未婚妻是某位金融家的女儿，不是洛希尔^①，在某种程度上有些象洛希尔，我忘了他的姓。”

夏尔既漂亮又富有，而且是单身。这是很重要的情况，因为天主教徒是不准离婚的。

维卡在家中仔细琢磨、思之再三，觉得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她已经丢掉了埃里克——那是季亚科夫和沙罗克阻挠的。现在无论什么都阻止不了她。她在这个国家里无事可做。愚昧无知、嫉妒、莫名其妙地恐吓、口号、进行曲、没完没了的担惊受怕，这一切都使她厌烦。她今天能自由自在地漫步莫斯科，明天就可能来个电话，就象那一次那样，说：“马拉谢维奇女公民，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人找你谈话……”他们将她放了，这也不怎么样，可能又被喊去，又要强迫她干。她对他们承担了某种义务。

必须溜到巴黎去！不朽的、伟大的巴黎。在中学里曾经有过法语课，说真话，她已经有点记不清了，但只要一复习，就会记起来的……这首小诗是怎么读来着？……“您好，桑-苏西太太，这热的小灌肠什么价？”主要是语法，可她会很快回忆起来的，这些“现在时”、“复杂过去时”、“简单过去时”、“简单将来时”、“过去时形动词”她死啃硬背了十年。维卡逐一回想时甚至动了感情，这些语法概念使她想起了童年。

一定得离开这里。阿尔希捷克托尔不久就要不知不觉地溜掉，爸爸迟早也会死的，宁早勿晚，到那时候她到哪儿去呀！

^① 洛希尔——十八世纪西欧财团的创立者。——译者

即使现在她也不能与瓦季姆同桌吃饭，她不能听见他吃东西时嘴吧嗒吧嗒的响声，他那嘴馋贪食的毛病使她厌恶极了，加上他还夸夸其谈，信口雌黄。

嫁了个什么倒霉的工程师，用他那几个可怜的工资庸庸碌碌地混日子。不，伟大的国家没有她也行。连涅尔莉这匹母马他们都带到巴黎去，那么她维卡更不用说在那儿该有自己的位置的。

也许某种重要的事儿就发生在这一次。她想起了夏尔那专注的目光、他那沉默的神情，要知道他们这些法国人都是爱饶舌的人，而夏尔在她面前却沉默不语，这种沉默是意味深长的。恰恰是这点使维卡产生了希望。

她比别人走得早些，聪明的女性从来不一直坐到家庭晚会结束，她就象人们所说的那样，英国式的，不和任何人告别，神秘莫测地消逝了。

她快乐地、满脸通红地回到了家。阿尔希捷克托夫穿着睡衣趿拉着拖鞋啦嗒啦嗒地走过走廊，给她开了门。他脸色发灰，下眼泡肿起来了。

“回来啦，我已准备睡觉了。”

维卡将短毛皮大衣扔到他手上，吻了一下他的脸颊。

“是的，我亲爱的，你的样子很累了……我要到浴盆里去稍稍躺一下。”

要不要把涅尔莉拉进这件事里来？她现在考虑的是这问题。

不，看来暂时不要。一个不该做的动作，一个赞扬的词，一个串通一气的笑容，都会把一切事儿给搞糟的。倘若夏尔再不到涅尔莉家里来，那就是另一回事儿了。不过，等到星期

三再说吧。

如果夏尔来，就是说真有点希望了。那时就毋需涅尔莉了。

下星期三，夏尔又来到了涅尔莉的家。

当然，维卡也来了，而且象往常那样，稍比别人来得迟些……

11

1935年7月8日，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主持制宪委员会。

制宪委员会共有三十位委员，他斯大林是第三十一人。

除被开除出党并撤消一切职务的阿维利·叶努基泽以外，全体出席了会议，因为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此阿维利·叶努基泽形式上仍然是制宪委员会委员。

主要报告人是布哈林和拉狄克。他们两人是新宪法草案主要部分的起草人。不过其他人当然也将发言。那还用说！现在他们要作为“宪法的奠基人”载入史册了。

第一位报告人是布哈林。

三月份，布哈林在第二次全苏集体农庄突击手代表大会的发言中说：“全国人民聚集在列宁的党的周围，现在这个党由劳动人民的出色的领袖、千百万人的统帅——斯大林强有力地领导着，他的名字是历次五年计划、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胜利和宏伟斗争的象征。”

正好一星期之后，《真理报》发表了拉狄克的文章——《无产阶级的统帅》，文章中拉狄克吹嘘的部分甚至超过了布

哈林。人们称他为克拉狄克^①——小偷和猴脸獠腮的骗子手——不是没有原因的。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事件正在重演吗？他们也给他唱过赞歌，可结局是什么呢？

他们自作聪明。布哈林报告了“草案的基本原则”。宪法应当保证人民有各种充分的自由、有世界上最伟大的权利，保证公民完全平等、拥有世界上最民主的选举和最公平的司法制度……

他们——布哈林和拉狄克——就是这样耍把戏的。

连他也没有料到他们的动作如此麻利，报告表明，这部宪法胜过了世界上一些最民主的宪法。天真的人！他们期望以这样的宪法来保障自身的安全，保证自己能先安全地活下来，然后再“根据宪法”更迭政权。简直是糊涂蛋！

这部宪法是他所需要的，而且首先是他。宪法将用来强有力地、从政治上掩护行将到来的干部队伍的革命。当政权掌握在一部分人手中的时候，当这个政权尚未被摧毁的时候，当人民还支持这个政权的时候，任何宪法都是适合的。

而人民是和他站在一起的。尽管饥饿、贫困，尽管牺牲了几百万人，人民仍然拥护他，惧怕他，也爱他。一人大权独揽的条件已经具备。人民受苦受难历来可以归罪于任何人，就是不怪罪上帝。上帝从不受惩罚，只能感谢上帝。

斯大林一边反复思考，一边注意听布哈林的报告。其实所有的人都在听，特别是各民族共和国的人。大家都高兴和

① 克拉狄克——俄语是偷窃的意思，与拉狄克的发音相近。

感动得发呆了——在他们面前作报告的是“党内最优秀的理论家”、“党的宠儿”布哈林本人，大家都十分欣赏他那严谨的逻辑、那美妙的表达方式。从土库曼来的代表艾塔科夫甚至高兴和感动得张大了嘴巴，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州的代表叶尔巴诺夫象只喂饱了的公猫，眯缝着眼睛。要知道，他们是民族主义者。就是穆萨别科夫——外高加索人民委员会主席和来自塔吉克的拉希姆巴耶夫也是民族主义者，乌兹别克人伊克拉莫夫和法伊祖拉·霍贾耶夫，也都是民族主义者。当布哈林长篇阔论在谈关于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时，他们的眼睛简直激动得发红了。对他们来说，布哈林仍象从前那样是“领袖”。因为委派布哈林制定新宪法，大概他们期望他恢复他的领导职务，他们非常想这样。他们深信自己的独立自主，深信非他们莫属，这些封邑的公爵啊！

坐在这里的来自白俄罗斯的戈洛杰德和切尔维亚科夫、柳布琴科、乌克兰的彼得罗夫斯基和丘巴尔……都是这样的人，都是些面貌不清、不可靠的人。

他用丘巴尔和米高扬代替了被暗杀的基洛夫和一月份死去的古比雪夫，让他们进了政治局。

米高扬是一个滑头、骗子，但此人是他的滑头、他的骗子和得心应手的工作人员。1918年他在巴库得救的情况不明。所有巴库的政治委员都被枪杀了，唯独米高扬同志活下来了。蹊跷！情况是否真实呢？这个人将会忠实地服务。

丘巴尔有点令人莫解。但不得不从他同彼得罗夫斯基二人中挑选出一人——因为他们两人都是从1926年起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话，丘巴尔就比彼得罗夫斯基好些了。丘巴尔令人不解，而彼得罗夫斯基很清楚——不是自己人，他

是一个为马克思主义理想而献身的人，就象他本人的亲爱的岳父阿利卢耶夫一样。

而且此地座落的俄罗斯人的面貌也并非全都是清楚的。

譬如阿库洛夫，秃顶，象个蒙古人。曾任检察长，过去虽妨碍维辛斯基，但不得不将他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以代替叶努基泽；而维辛斯基则任命为检察长，使其不受约束。维辛斯基是个大坏蛋，但是个用得着的坏蛋，瞧他现在阴沉着脸坐在那里，佯装出一副对布哈林的报告不悦的样子，这是做样子给他看的。他对一切都明白，这个畜生，梳得整整齐齐的发式，小胡子经过仔细修剪，他身上那套西服显然很贵，衬衫领子浆得挺硬，还打着领结——把自己装扮成欧洲的知识分子，而灵魂深处则是个刑事犯。

他间或向克雷连科殷勤地微笑一下，实际上非常恨他，恨不能将他生吞活剥。

克雷连科毫无疑问是个敌人。他在对儿童的刑事责任问题方面的态度怎样呢？象敌人一样。

尽管8月7日已经颁布了法律，侵占国家财产的事仍在继续，尤其是交通运输部门。主要盗窃者是些孩子。这件事亚戈达在最近的一个专题报告中特别强调。从2月起负责领导铁路运输部门的卡冈诺维奇也证实了这个情况。

但是，儿童们是不受法律制裁的。

说实在的，为什么儿童可以不受法律制裁呢？

十二岁的男孩子十分清楚偷窃是不允许的，他清楚地知道，偷窃行为是犯罪。但是这个男孩同样明白，不能审判他。那么，现在就让他知道，可以而且应当审判他。

还要让那些打发自己的孩子去偷窃的父母也知道这一

点。需要修改刑法：凡年满十二岁以上的所有触犯刑律者都必须追究，直到处以最严厉的惩罚。这样一来，他们就再不会偷了，再不会拿走人民的财产了，再不会抢劫和杀人了。对父母来说，这也将是一个很好的防止他们犯罪的警告。对所有的、各种各样的父母的警告。他们将会知道，是什么在威胁着他们的子女。

然而，司法人民委员克雷连科同志反对颁布这样的命令。甚至请求他接见。当然，他没有接见他。他得到确切的情报：克雷连科断言这种法律是史无前例的，在世界司法界实践上没有任何与此类似的法律，似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十二岁的儿童处以死刑的，儿童们可能成为诬告的牺牲品，简直不可理解，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第十八个年头上通过这样的法律，这将在国外产生可怕的印象，有损苏维埃国家的威望。

克雷连科是由于什么原因突然变得如此人道的？根据什么突然尊重起资产阶级社会的意见来了？……从前他在工业党^①审判案、孟什维克审判案和其他审判案中出庭当起诉人的时候，这一点他倒从来没有考虑过。

就在不久之前克雷连科还肯定地说：“要求法院绝对客观是纯粹的空想。”他曾坚持缩小辩护的权利，因为他当时正确地说过苏维埃的法院本身就在为被告人辩护，好象甚至还建议过废除诉讼法典，称诉讼法典为“资产阶级法律的翻版”。

现在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并且公开摒弃了自

^① 工业党——1926年至1930年间苏联工程师组织联盟。1930年底其领导人被判处不同刑期的徒刑。——译者。

己的观点，去年出了一本小册子：《列宁论司法制度和刑法政策》，为革命的法制、为绝对客观证据、为严格遵循所有的诉讼规范而斗争。……所有这些观点旨在反对十分懂得现阶段法院和检察机关的任务的维辛斯基，旨在反对党的对敌斗争。

孟什维克案件以后，克雷连科立即请求去司法人民委员部工作。很清楚，克雷连科再不想出庭了，他看出事情向什么方向发展。过去他一直跟党外的敌人进行斗争，但现在同党内的敌人进行斗争他不愿意。他企图败坏维辛斯基的名声。

可维辛斯基这个人是用得着的。维辛斯基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没有任何联系，因此在向党内的敌人的斗争方面他是比较合适的。他现在知道自己的地位，迄今他还心有余悸，时刻愿意完成任何一项任务。

而克雷连科却认为自己是一个大官儿，他1904年入党，我们的第一任最高统帅，最高法庭的第一任主席，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要明白，他是位坚持思想原则的革命者。况且，他还是个运动员，登山运动员。是个老布尔什维克，在帕米尔高原某处攀登过高山峻岭。他又是个棋手。他以列宁为榜样，而列宁在这方面的消遣也浪费了大量的时间。

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克雷连科既未被选进中央委员会，也未被选进中央监察委员会。这对他来说是个警告。他感到很委屈，可仍未醒悟过来。今天是他五十寿辰，让他去读他的那些登山运动员给他的祝词吧，中央委员会不打算向他致贺词。这对他也是一个警告。以后的情况，让我们看看再说，看他是从中得出结论呢，还是再给维辛斯基捣乱。人

们之间干脆不协调倒也好；那样的话他们会争着向他表示忠诚。在克雷连科和维辛斯基的关系中没有这种情况。维辛斯基忠诚于他，虽是出于害怕而对他忠诚，但是没有侈离之心。克雷连科却不是这样，他心怀异志。他虽与反对派没有内在联系，既不附和托洛茨基主义，也不同意布哈林的观点，但他也不反对他们，是个不可靠的人物，异己分子。这个人在干部队伍的革命烈火中也一定叫他完蛋。

异己的人很多，不可靠的人很多。和他一起在这里就座的有三十人。他们之中他多少可以信赖的又有谁呢？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卡冈诺维奇、梅赫利斯、米高扬、莫洛托夫。这是多少人呢？二十九人中只有六个人。好吧，那个混蛋维辛斯基就算是第七个吧，二十九人中也有七个，连四分之一都没有。

谁在某种程度上持中立立场呢？这是“最宝贵的一部分”，他们都是党龄很长的木乃伊：克拉西科夫、斯塔索夫、加里宁、李特维诺夫、彼得罗夫斯基……不过，彼得罗夫斯基不是，对他预料还会有不少事的。彼得罗夫斯基的儿子彼得是赖提分子，被清除出党，现在正在流放，早就该枪毙他了。他父亲是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为什么纵容他作这样的事？！

这样一来，“中立派”就有四个人了，连同可靠的人一起共十一人了。

可其余的十八人呢？布哈林、拉狄克、克雷连科、温什里希特，他们是敌人。或可称为不可靠的人有：阿库洛夫、布勃诺夫、苏利莫夫、丘巴尔、柳布琴科、切尔维亚科夫、戈洛杰德、伊克拉莫夫、霍贾伊夫、艾塔科夫、穆萨别科夫、叶尔巴诺夫、拉希姆巴耶夫、彼得罗夫斯基。

这个统计数字说明了很多问题。它反映了党内的状况，反映了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情况，甚至政治局的内部情况。即使在政治局内也有不可靠的人存在：奥尔忠尼启则、鲁祖塔克、柯秀尔和丘巴尔，正如现已查明的那样。

他不应该受他在政治局里是拥有多数还是少数来支配。党不是绝对的神，他才是不依赖任何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绝对的神。在他那里无论是公开的还是潜在的对手都不应该存在。一切潜在的危险都必须消除。谁也无权觊觎最高领导权。要使全国每一个居民都明白这一点，每一个人都应当感到自己的存在、自己的自由、自己的安全正在受到威胁，每个人应该看到自己只有绝对服从才能平安无事，恐怖手段应当不断地运用，应成为一种正常的、惯用的管理方法。

为了向农村人表明谁是他们的主宰，三十年代初的饥馑还是需要的。饥荒虽然夺去了千百万人的生命，但它带来了胜利。

他的执政虽然也将付出千百万人的生命作为代价，但他将向全国人民表明，谁是国家的主宰，他将向全世界表明，在这个国家里是谁的一统天下。

第一步已经作了。对基洛夫的被刺，他报之以无数无情的打击，在国内造成一种人人感到恐怖的气氛。最严厉打击的对象在列宁格勒。这个城市再不能作为第二首都兴旺起来了。在全国范围内正在进行一次公开的党证核查和经过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每个党员进行一次秘密的审查。对参加过形形色色的反对派的人、由其他党派转来的党员、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沙皇的文武官员、宗教神职人员、过去的富农和依附富农的人、所有具有反苏情绪的人都要剔出来、孤立起

来，在需要的时候将他们消灭掉。虽然所有这一切以前也进行过的，但范围不大，主要的还在后面。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基洛夫被刺已经承担了道义上的责任。他们狡猾地承担这个责任，他们使自己的承诺具有双重意义的说法：“鉴于客观情势，原来反对派以前的活动可能导致这些犯罪分子的堕落。”

真是些政客！他们想用这种圈套来解救自己……可在这个时刻从他们口中再逼不出什么更重大的东西来了，把案子搁下来也不行。必须立刻利用基洛夫被刺这件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供词提供了可以将他隔离起来的条件。然而隔离——这是治标不治本。托洛茨基分子被隔离已经五年，他们仍在伺机而动。历史证明：从监狱到登上王位——只有一步之差。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该送他们上断头台。

为基洛夫被刺该负的责任不是道义上的，而是刑事上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应当因他们的所作所为受到审判。

资产阶级报纸不承认一月审判案，要知道，一月审判案没有公开进行，人们常引用那个饶舌的米拉波说的一句名言：“随便给我派什么样的法官——即使是偏心的、贪心的，甚至是我的敌人，但让他公开审判我。”

好！好极了！他们会受到公开诉讼的，他们会受到公开审判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将在全世界面前承认他们的罪行。他们将承认他们受命暗杀基洛夫，还准备刺杀党和政府的其他领导人。所以他们不该是被隔离，而该是被消灭的对象。他们会被消灭的。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否会承认呢？倘若向他们许诺，保全他们的生命，他们会承认的。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夺取

政权。他们如果丧失了生命，也就永远失去了希望。如果他们顽固不化，整个庞大的镇压机器、国家这个庞然大物就将猛然压向他们。在这压力面前他们是坚持不了的。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妻子儿女将成为人质，他们在这压力面前也是经受不住的，他们是些亲爱的丈夫，钟爱子女的好爸爸。

现在法伊祖拉·霍贾耶夫正在发言，他是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也是代表乌兹别克的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一。难道这样的人也不想活着？他是个花花公子，清秀的面孔，在古波斯的小型艺术作品上常常画有这种花花公子。

他生活奢侈，家里四面都挂着壁毯，到处都是贵重的小摆饰，贵重的物品，大概是被隐瞒起来的，所有这些东西全都藏在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他们还收藏钻石。

顺便说说，法伊祖拉与乌兹别克中央委员会书记伊克拉莫夫不和，前者是贵族，后者是平民，但是个厚颜无耻的平民。在1929年4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全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上，他居然对他的插话恼怒地回敬了一句：“斯大林同志，归根到底您还让不让我把话说完？！”

伊克拉莫夫是布哈林的朋友，去年布哈林曾在乌兹别克休息，住在伊克拉莫夫家里。因此将来伊克拉莫夫将和布哈林一起工作，而且再将伊祖拉和他们安置到一起去：他们就会和伊克拉莫夫相互践踏、相互诋毁。世上万事万物都是变化多端、反复无常的：怨仇如此，友谊亦如此。

当霍贾耶夫和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们发言的时候，斯大林冥思苦想。他仅仔细听完了布哈林和拉狄克的讲话——他们是起草人，其余人都是说废话的，他们只需要他听到他们的

声音就行了。他们谈到关于地方苏维埃的作用和其他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所有这些他都不感兴趣，因此根本不听他们的发言。

布哈林和拉狄克所拟定的新宪法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

当代人和后代人将要按这份文件的草案评论苏维埃国家的特征，评论苏维埃国家的民主及其公民的巨大自由。在这种宪法背景上，任何关于恐怖活动和违反法纪的现象的说法看起来都将是荒谬的杜撰。

这部宪法将在国际上获得巨大好处。是啊，将要进行一系列的审判，处理一系列案件，但这些审判案都在具有最民主的宪法的背景下进行，因而看起来将是绝对合法和实事求是的。这部宪法在与法西斯德国国内所发生的事相比，尤为有利。希特勒也在进行革命，实行他的民族革命，希特勒善于将德国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虽然还能维持相当长的时间——因为他建立了强有力的权力机构，可他的做法很粗暴，带有一种纯粹德国式的直率的作风和纯粹普鲁士人的傲慢态度。希特勒是一个政治家，但不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犯有很多错误，犯有很多在世界舆论看来是有损于他的错误。

通过这样的宪法有没有危险呢？没有任何危险，因为政权始终掌握在党的手中，也就是在他的手中。这是实实在在的权力。必须用宪法形式使其有法律根据。必须在宪法中直接提出共产党是苏维埃国家的领导的和引导的力量。但是候选人的提出将不仅仅是党，还有工会、共青团和其他社会组织。他们将是由共产党和这些组织组成的联盟的候选人。

不，这不对。共产党和其他组织的联盟不可能存在，不然这就将意味着这些组织与党平起平坐了，在这里任何平等、

任何平权都不行。不能和什么组织结成联盟，只能和人民结成联盟……

“共产党员和非党员的联盟。”——瞧，这将多么正确。

毫无疑问，新宪法将要求我们的惩罚机关具有更高度的工作效能、更高的警惕性，让敌人不敢利用新宪法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种企图刚一萌芽，就一定要镇压下去。

同样，毫无疑问，新的选举制度将要求各级党组也具有更高度的工作效能、更高的警惕性。没有关系，让他们在新的条件下工作工作，让他们动作快点吧。每一次选举都应当变为一次最广泛的政治运动。在西方，选民们往往投这个或那个资产阶级政党的票，而我们的选举运动将是一次拥护共产党、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强有力的政治宣传，将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的表现，将是一个全民的节日。

当然，新宪法可用来为行将到来的干部队伍的革命作巧妙的政治掩护。但这还不够。必须成倍成倍地扩大我们的胜利和成就的影响，表现人民的热情。

毫无疑问，这种热情是十月革命唤起的。任何一种革命都产生一种对美好未来的希望，而对美好未来的种种希望唤起热情。现在的任务是向人民表现出他的热情，而人民的热情则要向全世界表现出来。

为此报章杂志要日复一日地讲成就。不仅是报章杂志，文学、艺术、戏剧也应该这样。所有这一切应当为表现苏联人民的成就服务，应当促进苏联人民的热情进一步发展并坚定其对未来希望的信心。

当然，也应该写些缺点。但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首先是由于敌对分子的反抗，所以敌对分子必须消灭。

斯大林突然哆嗦了一下。

苏利莫夫从瓶子里倒水的时候将玻璃杯摔了，玻璃杯碰到碟子上了。

这个笨手笨脚的蠢货！连茶杯都抓不住。他还是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主席，是位总理呢！这么说……是喝醉酒了，还是怎么的……他也是从那里——从第五集团军来的，是伊万·尼基季奇·斯米尔诺夫和图哈切夫斯基的战友，虽然没有参加反对派。

他把自己装扮成老实人，装扮成这个样儿的民主派。不久前他装作一个普通顾客去中心百货商店，先在商店里兜了一圈，然后去找商店经理，排在队伍里等接见，向经理诉苦抱怨，仍装作一般顾客那样（很少有人认出他的面孔），后来，在谈话结束时才说明自己是什么人，他使整个商店的人惊慌失措。报纸记者们欣喜若狂地详尽描写了这件事。懂吗，他们可发现哈伦·赖世德^①再世了。

苏联人民不需要这样的领导人，不需要这种悄悄地、化名在人民中挤来挤去，仿佛是为了了解他们需要什么……的领导人。真正的苏联领导人毋需排任何队就知道自己的人民需要什么。所有这些再世的哈伦·赖世德都是想标新立异、仿效已故的基洛夫，都是想向人民表现自己独特的、“民主的”领导作风，而那些类似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和佐利奇之流的粗制滥造的多产作家或记者就接着为他们制造廉价的声誉

^① 哈伦·赖世德(Haran ar Rashid, 766—809)——阿拔斯在朝的第五代哈里发(786—806在位)。握有生杀大权，可以随意将人处死，据说夜间常微服巡游总带着刽子手。——译者

了。

斯大林不再听苏利莫夫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的发言，又重新陷入了沉思。

任何革命都伴随着牺牲，没有牺牲就没有革命。整个人类的历史——这就是牺牲的历史：战争造成的牺牲，自然灾害造成的牺牲，流行病、饥荒、贫困造成的牺牲，千百万人正在死亡。人类很快就会忘却自己的损失，因为归根到底一切都以死亡告终，任何生命均以死亡告终，或者是自然死亡，或者是非正常死亡，或早或迟都要死亡，死是不可避免的，人们也容忍了这一不可抗拒的规律。他们只记得那些派他们去死的人，记得那些统帅们、统治者们、伟大的人民的首领们。人类记得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苏沃洛夫、库图佐夫、斯捷潘·拉辛和布加乔夫的名字；谁还记得在他们麾下、因为他们、为了他们而牺牲的那些人的名字？谁也不记得！

只是任何时候也不必去证明自己有理。拿破仑确立了自己的政权之后，用大炮击毙了成百上千人。谁还记得那些人？在拿破仑战争中牺牲了几百万人，同样谁也不知道他们。而他试图在当吉安公爵^①之死的问题上证明自己有理，于是历史唯独对这一次死亡事件迄今都不宽恕他。

真正的统治者应当在自己死后留下一首首壮丽的颂

^① 当吉安公爵(1772—1804)——法国王子，波旁王朝旁系的最后代表。法国大革命开始后流亡国外。拿破仑怀疑他企图篡夺法国王位，于1804年派人将其押回法国处死。——译者

歌、凯旋进行曲，而不是哀悼的哭泣、凄凉的哭诉。人民应该高唱鼓起人们的希望和乐观主义精神的歌曲，而不是哼那些使人陷入忧愁、痛苦和丧失信心的歌曲，应当兴高采烈地引吭高歌——伟大的时代应当象伟大的节日那样刻骨铭心、永志不忘。必须帮助文化工作者、诗人、作曲家、剧作家、影剧工作者弄清这个方向。形形色色的悲观主义、没落情绪、丧失信仰、恶意中伤，无论是明的还是暗的，都应当彻底地、无情地根绝。胜利的呼声应当淹没被推翻的敌人的痛楚的呻吟。

辩论终于结束了，最后一个饶舌的人托辞不谈了。

“嗯，也好，”斯大林说道，“我认为，同志们说出的想法都很通情达理，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建议。我想，应当选出一个编纂委员会，由这个编纂委员会考虑在这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其写进宪法的最后草案，我们将把这个草案提交给全体苏联人民讨论。没有反对的意见吧？”

没有人反对。

斯大林被选为编纂委员会主席。

苏联宪法委员会三十个委员中被枪毙的有：

1937年——戈洛杰德、叶努基泽、苏利莫夫；

1938年——艾塔科夫、布哈林、叶尔巴诺夫、伊克拉莫夫、克雷连科、穆萨别科夫、拉希姆巴耶夫、温施利希特、霍贾耶夫；

1939年——阿库洛夫、拉狄克、丘巴尔；

1940年——布勃诺夫。

切尔维亚科夫和柳布琴科自杀身死。

帕纳斯·柳布琴科在自杀之前，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妻子，以免她受到折磨和拷问。

12

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没有去和奥尔忠尼启则谈梁赞诺夫的事。没有找到正式的借口——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从不管理冶金工业，而非公事上的谈话呢？干吗呢？布佳金对梁赞诺夫的不愉快的事并不很放在心上；梁赞诺夫有能力，是个很内行的工程师和有经验的组织者，但他缺少人情味，他不能使人产生好感，对待萨沙的事情胆小怕事，对斯大林的赏识却欣喜若狂，在他面前俯首贴耳，他不知道斯大林的垂青突然会变成什么，虽然，现在他将了解这点了。

即使布佳会和奥尔忠尼启则能谈这件事，后者用什么话回他呢？组织局将梁赞诺夫调库兹巴斯的事已经决定了，而对计划外建设的调查呢？无能为力。法律总是法律。在梁赞诺夫逮捕了莫斯科委员会之后，尤其是洛米纳泽自杀以后，奥尔忠尼启则对梁赞诺夫的态度变了。毋庸置疑，梁赞诺夫在洛米纳泽之死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什么过错，谁有过错是尽人皆知的，但梁赞诺夫对待失宠的洛米纳泽可以更有分寸些，在洛米纳泽面前可以不以自己的技术知识、自己的优越地位逞能。

再说布佳金和奥尔忠尼启则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可以找他

来进行开诚布公谈话的那种关系。在私交上从前只是因为他与基洛夫的友谊使他们有联系。现在基洛夫已不在人世了。基洛夫之死使他们之间彼此疏远了，因为布佳金向奥尔忠尼启则转达了别列津的警告。假定奥尔忠尼启则当时没有重视这个警告，因为那时布佳金本人也不明白事关基洛夫的生命。可为什么奥尔忠尼启则现在允许杀戮经济干部呢？虽然现在还没有大批屠杀，但事态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忽而在这里，忽而在那里有工程师、厂长们以莫须有的罪名横遭逮捕。据说，谢尔戈在某些场合表示抗议，但是要知道，坚决制止内务人民委员部各级机关干涉经济事务是需要的。

在昨天举行的全会上，奥尔忠尼启则怎么能同意消灭阿维利·叶努基泽？他是他的挚友，从小就认识他，知道他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个肝胆相照、光明磊落的正派人。他非常明白，是斯大林在向他算那本小册子的帐，叶努基泽在那本小册子上写了真实情况。

可谢尔戈没有站出来大声疾呼保护他。他完全可以挺身而出说：“科巴！^①你认为阿维利辜负了你的信任吗？好吧，你停他的职，把他打发到梯弗里斯，让他度过他的余生吧，他为党忠诚地服务了整整三十年了。”你怕为阿维利抱不平，那么你哪怕替那些什么罪也没有的人辩护也好呀，他们都是些普通老百姓，克里姆林宫里不幸的工作人员：有女秘书、清扫女工、看门人、仓库管理员，都是些纯粹无关紧要的人。他们被消灭仅仅是为了给叶努基泽的案件增添搞阴谋活动的假象。你连一句“不好，科巴，做得不漂亮”的话都不讲，既不

① 科巴——斯大林的党内化名。——译者

提出异议，也不为他们辩护。

布佳金在国外当了多年的大使。作为经济工作者，他当然比梅日劳克、曼采夫、鲁希莫维奇、索科利尼科夫、谢列布罗夫斯基、洛莫夫略逊一筹，那就更不用谈整个工业部门的实际上的领导人皮达可夫了。但在国际事务上的经验方面，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还是比较丰富的。

梁赞诺夫想错了，当时他以为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身在国外，和国内脱节了。相反，梁赞诺夫自己所感兴趣和关心的仅限于自己的工厂，每日每时虚与委蛇地应付国内正在形成的那一套制度，确切地说他已不再是个政治家了，他思考问题不是用独立的政治范畴的方法而是人云亦云、唯唯诺诺，不愿注意周围发生了什么情况。

布佳金由于熟练地掌握三门外语，所以消息灵通。按其天赋和教育程度，布佳金熟悉现代科学上提出的各种问题。奥尔忠尼启则很器重布佳金，委任他在人民委员部里管理科学工作，其中包括国防工业。可能这引起斯大林的不满。

这方面最后一个例子是：一个月之前，6月14日，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在试验场检阅新研制的炮的样品。没有叫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去参加，本来是应该叫他去的。但这次甚至都没有通知他。奥尔忠尼启则说的“大家仍然是满意的”那句话没有说明任何问题。

这是一记耳光。这样的示威，这样的屈辱在军人的眼里使他的威望大受影响；这说明党的领导不重视他，他总共只不过是部里的一名官员，他怎能用新武器装备军队、建立新的军事工业？！

他应当做什么？对此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抱怨吗？向

谁？向斯大林？这是突然对他粗暴无礼么？提出辞职？向党提出辞职是不合习惯的。这可能被看作为不同意党的路线的表现，斯大林恰恰就会这样宣布，而斯大林将管他布佳金叫怠工者、有倾向的分子、终于“暴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也许斯大林不邀请他去试验场正是想挑起他走这一步？！

出路是什么呢？

今天早晨9点他应该接见图哈切夫斯基及其工作人员小组——他怎么向他们说明自己不能去武器试验场呢？“他们没叫我去”吗？不，不能这样答复，听起来仿佛在诉苦，不成体统。“不能”，简短而淡漠地说——“不能”。不过，图哈切夫斯基未必会问，因为他是个知识分子，是个有教养的人。

九时正，军人们都来了；有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基辅军区司令亚基尔、白俄罗斯军区司令乌博列维奇。布佳金暗自微微一笑；图哈切夫斯基将亚基尔和乌博列维奇一起请来了，他利用亚基尔和乌博列维奇参加中央全会，想获得他们的支持。他们将一起向人民委员会“施加压力”，当然这里的话题首先将是有关去年设计的新型坦克。

图哈切夫斯基的巧妙手段使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十分开心，他试图撇开自己因未被邀请去试验场所引起的忧郁的思绪。乌博列维奇也好，亚基尔也好，他们象图哈切夫斯基一样未必会牵涉到这一问题，他们是善于掌握自己的。

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满意地瞧着这两个比较年轻的人，他们在国内战争时期就博得了统帅的荣誉，是军队的骄傲和希望。

图哈切夫斯基——体格匀称，中等身材，虎背熊腰，是个美男子，仪容高贵，端正的脸上长着一双蓝色的眼睛，穿

着一身制作得惊人合身的军装，俨然是一位真正的近卫军军人，贵族。

亚基尔——身材高大，宽肩膀，一双炯炯有神的棕色眼睛，翘鼻子，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然而在他那鬃曲的黑发中已经出现了一缕缕白发——这对三十九岁的人来说过早了些。

最后是叶罗尼姆·乌博列维奇——他是位典型的知识分子，戴着夹鼻眼镜，面庞清秀。

思绪仍然未能撇开，仍然想着昨天他们在中央全会上表决时赞成开除叶努基泽出党那件事。他们可能相信了叶若夫所作的虚假的报告，可能不知道在克里姆里宫全体工作人员中大举逮捕的事，可终究还是投票赞成了！他们投票赞成不是因为相信叶若夫的报告，而是因为叶若夫后有斯大林，他们必须相信他，对他不能不信任。可如果发生战争呢？难道他们那时候还将盲目地服从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所下的那些完全无知的命令吗？可要知道，这就意味着要打败仗了。

不！在军事行动中他们是决不会让步的，就象在国内战争时期他们从不让步一样，即使现在他们也不让步，他们现在执行自己的路线，加强军队建设，武装军队，使军队具有战斗力，不断克服领导上无知的阻力。

在国内战争中，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和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接触过，特别是与图哈切夫斯基。1925年图哈切夫斯基在东方战线第一集团军，他没有参与穆拉维约夫的叛乱，被他们逮捕，差点被枪毙。布尔什维克小组（布佳金当时参加了这个小组）冲击了监狱，救出了被监禁在狱内的图哈切夫斯基。

基和费尔德曼。当时小组由瓦列伊斯基指挥，但图哈切夫斯基确实称布佳金为自己的救命恩人。

图哈切夫斯基率领第五集团军时，参加了粉碎高尔察克的战斗，参加了消灭邓尼金的战斗。顺便说，正是那个时候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确信了斯大林对图哈切夫斯基的真实态度。

布琼尼没有执行图哈切夫斯基的命令，由于这个原因，邓尼金得以逃到新罗西斯克，后撤到克里木，并在那里组成了一个新的战场。布琼尼胆敢不服从图哈切夫斯基的命令仅仅因为在他背后有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撑腰。

1920年在华沙近郊又发生同样的情况。斯大林违抗统帅部的直接命令将布琼尼集团军阻留在利沃夫附近，致使毕苏斯基^①有可能对图哈切夫斯基率领的部队进行侧翼突击，这次侧翼的进攻决定了整个战局的成败。在这问题上斯大林是有罪过的，甚至列宁都说：“谁会途经利沃夫去华沙呢？”可在列宁逝世以后，一些专事巴结奉承的历史学家将那次失利归咎于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在他写的一本不象样的书《从利沃夫到华沙》和沙波什尼科夫在他所写的《在维斯瓦河上》一书中对这件事也插了一手。布琼尼也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有理。

对图哈切夫斯基的践踏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1930年在中央伏龙芝红军之家召开的例会上，一个拍斯大林马屁的人

^① 毕苏斯基(1867—1935)——波兰元帅，波兰社会党右翼活动家。1919—1922年为国家“元首”，残酷镇压国内革命运动，1920年领导反对苏联的军事行动。——译者

竟然对图哈切夫斯基大叫：“1920年就该把他绞死。”他们就用这种态度来对待这位战胜高尔察克、邓尼金的人，对待这位平定喀琅施塔得叛乱和安东诺夫叛乱的人。1932年在军事学院关于波兰战役的辩论中又变本加厉地对他加以诋毁。那些败坏图哈切夫斯基名誉和吹捧斯大林的发言都是蓄谋制造、不怀好意的，给人留下了极为沉重的印象。一位参加这次辩论的人就是这样对布佳金叙述的。图哈切夫斯基没有出席那次会议。

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虽然身在国外，但密切注意着国内事态的发展。他认为图哈切夫斯基不仅是未来战争中的一位最伟大的统帅，而且认为图哈切夫斯基这个人不同于斯大林，前者理解将要和德国交战。虽然反对图哈切夫斯基的运动从1932年起就告一段落了，但布佳金忧郁地想到，在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对待图哈切夫斯基的态度中隐藏着一种巨大的危险。

早在国内战争时期，图哈切夫斯基对他讲了自己的家史。父亲出身贵族，乐善好施，爱上了一个农村姑娘。母亲出嫁后才学会认字。

童年时家里就教他拉小提琴。他不仅学会了演奏，而且还自己制作小提琴。当时这使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十分惊讶：“难道你自己真的制造过小提琴吗？”——“制造过”。——图哈切夫斯基微微一笑，用铅笔在一张纸上快速地勾了一个草图，说：先锯那个，然后锯这个。

图哈切夫斯基是不是一个有坚强信念的共产党员呢？他是1918年4月入党的，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前景胜负未卜，但他懂得十月革命对俄国的意义并将自己的一生和革命联系在

一起。这是一位真正的俄罗斯人，而且是位天生的战略家——视增强俄国的威力为毕生的主要事业。一个强盛的国家——这就是强大的军队，而目前军队的战斗力使他担心。部队的轻武器业已陈旧过时，飞机、坦克、通讯联络设备的数量微乎其微。象布佳金一样，图哈切夫斯基也掌握几门外语，他俩都十分清楚地看到，俄国比其他国家落后了多少和究竟在哪些方面落后。

1928年，图哈切夫斯基写了一个重新武装军队的报告，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草率地否定了。于是，他们同图哈切夫斯基的关系便进一步尖锐化了。图哈切夫斯基递了一份申请，离开了司令部的领导岗位，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

1930年1月，他又寄来了一份新的报告，遭遇仍同上次一样。

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根据上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经验只看到过去，而图哈切夫斯基作为一名真正的军事天才，着眼于未来。

不过，一年以后图哈切夫斯基的几份报告从保险柜中被取了出来。人们总算明白过来了，军队是应该进行技术改造。那些嘲笑和拒绝图哈切夫斯基建议的人如今不得不委托图哈切夫斯基去执行此项计划纲要。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负责分管武器装备，便积极地开始工作了。

布佳金竭尽全力帮助他。

他们吸收了一些出色的学者、设计师参加此项工作，名单是他们共同拟定的，有图波列夫、波利卡尔波夫、伊尔申、佩特利亚科夫(空军)；杰格佳廖夫、托卡列夫(步兵武器)；科

京、扎斯拉夫斯基、莫罗佐夫、杜霍夫(坦克);朗格马克、克列伊梅诺夫(火箭弹);科罗廖夫、灿德尔(火箭);奥谢普科夫、斯米尔诺夫(无线电探测);库尔切夫斯基(炮兵)。红军成了空军陆战队的先驱者,在科学院院士约夫的帮助下运用了无线电电子学。他们仔细研究了坦克结构。什么坦克最好呢?高速行驶的、但是带轻型装甲的坦克呢,还是相反,带重型装甲,但速度稍慢、防御极好的坦克呢?图哈切夫斯基坚持创造一种中型坦克,防御性能好,速度快,既机动灵活,又易于突破防御。重新设计的型号就是这种结构。

“这是一种很好的武器,”乌博列维奇仔细看着放在桌上的图纸说,“在投入批量生产以前,可以进行各种试验,教会人们搞好坦克演习。”

他看上去很疲倦,夹鼻眼镜后面的双眼象有病似的。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把他的精力不支的神态同昨天的全会联系起来。显然,乌博列维奇比别人看得更远。

“大量使用预计要到38年,”布佳金说。

“这简直是大错特错!”——亚基尔的坐椅挪动得发出了响声。“我们已经习惯于生产轻型坦克,可是现在重要的是生产防弹中型坦克。”

“请你别把我的家俱搞坏了!”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微笑着说。

“要争论的话,当然可以争好长时间。每种型号都有自己的优点。但是到作出统一的决定的时候了,”图哈切夫斯基说,“这种坦克是最有发展前途的武器,所以我认为,它是可以长期有用的。”

他们既讨论了轻型坦克模型,也讨论了重型坦克模型,意

见不一，有待于试验。但关于中型坦克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就是需要的那种坦克，不得延误生产。

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答应将问题提交即将召开的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上进行讨论。

谁也没有谈起党的领导人视察新型炮兵武器的事，虽然图哈切夫斯基想必是参加了的。也可能连图哈切夫斯基也没被叫去。伏罗希洛夫的解释完全可以让斯大林感到满意。

13

军人们走了，布佳金再次陷入了不愉快的沉思……斯大林再也不会原谅他去年的一次谈话。所以，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深信，斯大林政策的方向不仅对苏维埃政权，而且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将产生最严重的悲剧后果。斯大林对希特勒执政作出了错误的结论，这和他过去所推行的极端错误的政策一样，估计完全错误，既没有战略远见，战术也很糟糕。

二十年代时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攻势就已要求坚决转变整个政策，从而形成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与社会民主党靠拢。在面临法西斯的威胁时他们就可以采取坚定的反法西斯立场。

但是，没有作这种政策上的转变。

相反，自1929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以后，同社会民主党人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更加剧了。

1929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宣布，革命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是社会民主党，“社会法西斯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特殊形式。”因此，共产主义政党面临的任务是“坚决加强与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特别要反对其‘左’翼，那是最危

险的敌人”。要中断同社会民主党的任何联系，揭露其“社会法西斯”的实质。

这一狂妄的极端主义使希特勒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政权。

1928年德国有八十一万选民投票赞成纳粹分子，到1930年9月14日，德国共产党人向社会民主党人开火以后，赞成纳粹的选票增至六百四十万，即增加了七倍。

希特勒的惊人的得逞理应迫使斯大林重新审查共产国际的政策。但是，斯大林却认为，纳粹主义势力的扩大只能证实劳动群众失去了他们对国会的幻想，他们将不可避免地转向革命阵营。因此，主要任务仍然是粉碎社会民主党。

共产国际的分裂政策破坏了德国工人运动，破坏了它的团结，反使希特勒强大了。斯大林政策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1933年1月，纳粹分子获得了一千一百七十万张选票，社会民主党人获七百二十万张选票，共产党人得六百万左右选票。如果那时能将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也许还能挽回局面。但是当时没有这样做，于是，法西斯分子上台了。

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记得，当时他在伦敦翻开报纸时简直是惊恐万状……各种报纸上登满了希特勒的照片、希特勒的亲信和他的冲锋队员的照片。希特勒在演讲、在向检阅队伍致意，希特勒同戈林、同戈培尔、同里宾特洛甫、同青年在一起，在工人们面前，最后，也是最可怕的要数德国总统兴登堡元帅同希特勒握手的照片了：总统祝贺他就任总理职务……希特勒身穿便服，手中拿着帽子，得意洋洋地微笑着向兴登堡鞠躬；总统则身穿军装，戴着普鲁士头盔，佩带长剑，忧郁而又恐惧地注视着新任德国领导人。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1933年4月1日的决议中遮遮掩掩地用无可奈何的口气承认了自己这一最可怕的失败：“公开的法西斯专政的建立，使群众的一切民主主义的幻想宣告破灭，使群众得以摆脱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这将加速发展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斯大林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就是这个辩证法使得斯大林在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肯定地说：“法西斯分子的胜利是社会民主党叛变工人阶级的结果，”是“社会民主党为法西斯主义扫清了道路。”

法西斯分子的胜利并没有使他们清醒过来，甚至没有使他们感到沮丧。

有什么可害怕的？用联共(布)在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马努伊尔斯基的话说是“世界历史的全部经验教导我们，最反动的政府最能为最伟大的革命作准备。”这就是说，法西斯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

所有这些见解是否在自欺欺人呢？教条主义者马努伊尔斯基可能就是这么看，也是这么想的。

斯大林可以这么说，但他不可能这么想。过去不可能，现在也不可能，他对政治是很在行的。他虽然从不承认失败，但他对自己的失败是清楚的。斯大林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把社会民主党人称为“社会法西斯分子”。他说：“现在，相信社会法西斯分子的说教的工人能够找到很多吗？”“工人阶级中的优秀人物已经离开‘社会法西斯’分子了”……他是这么说了……但是，他实际上想了些什么？……他恨不恨社会民主党人？当然恨。第一，由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工人阶级中的不同影响，他们之间存在着传统的敌对态度；第二，这是主要之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持亲西方倾向，而斯大林则

认为英国和法国是主要敌人。

而纳粹分子则相反，他们反对凡尔赛体系，也就是反对英国和法国。因此，按斯大林的意见，纳粹分子同苏联有共同利益。因此，纳粹分子在德国的胜利是反西方力量的胜利，这对苏联有利。相反，如果社会民主党人获胜，就等于亲西方力量的胜利，对苏联就不利了。

斯大林在去年对布佳金说的那句话不是偶然的。他说：“我们对强大的德国感兴趣，德国是与英国和法国相抗衡的力量。”这才是他的政治路线的实质，其余全都是废话。

他布佳金究竟该怎么办呢？……心平气和地眼看着苏联最凶恶的敌人、整个文明世界最凶恶的敌人、法西斯主义力量成长、发展并巩固起来？还是断然说出自己的主张，反对这一政策？……

和平时一样，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回家很晚。列娜和弗拉德连已经睡了。阿什亨·斯捷潘诺夫娜在自己的房间里工作。她是一个中央国际问题方面的教员，在谨慎地准备讲课。用她的话说，是把官方的胡言乱语翻译成人的语言。

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在她的小桌旁边的沙发椅里坐下。

“要吃东西吗？”——阿什亨·斯捷潘诺夫娜问道。

“不要，我已经在小吃部稍微吃了点。”

阿什亨·斯捷潘诺夫娜对自己那张小桌、桌上放着的纸和书不乐意地扫视了一遍，坚决地说：

“应当换一个别的工作干干了。”

“说具体点，换什么工作？”

“随便去哪个博物馆都行：历史博物馆、考古博物馆、革

命博物馆……实在不行，就去卫生保健部门……”

“亲爱的，”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笑了起来，“医学知识你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那当然。但我是指行政工作。除了这个工作以外，我干什么都行……”

她重又用敌视的眼光环视了一遍小桌，把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拿在手中。

“这本书是今年的版本，印数是二百一十一万一千册。我们很快就只剩下这一本书了，象圣经似的。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著作只印了十万册。而且已无法引用他书中的话了，因为现在只准重复斯大林同志引用过的那些话。而且，最好不要去重复引用，而是直接引用斯大林同志的话，并且不能作解释，只有他自己可以解释。伊万，你信吗？已经没法工作了。讲课之前，我交给宣传部的一定得是讲稿全文，而不是只交提纲。审查讲稿的是个半文盲，一个胆小的人，他可以勾掉我讲稿中的任何一个意思，只留下报上登的那些材料，而且同报上登的毫无二致。我则应该去重复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并且全都照本宣科。那还要我干什么呢？读讲稿谁都行嘛！我甚至无权对事实进行评价。可我的题目是国际形势，而国际形势是每天都在变化的……我讲课的时候只能讲一个月以前发生过的事情，这还算是最好的情况了。在谈到昨天和今天发生的情况时我只能说：‘正如斯大林同志正确预见到的那样’，‘正如斯大林同志准确预言过的那样’，‘正如斯大林同志对此已经正确说过的那样’。然而，顺便说一下，事实上发生的往往与他所预见的、预言的、说过的相反。可我是给全党的积极分子讲课，稍微有点文化的人都盯着我看，

要么象是在看一个满腹经纶的书呆子，要么象是在看一个恬不知耻的撒谎女人。我好歹也在党内生活了二十五年了呀！”

“二十六年，”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更正她。“我和你相识正好是二十五年。不过这不是党龄，所以你别自己说年轻了。”

她笑了。

“是啊，你说得对，”她重又忧伤地说，“伊万，你还记得帕维尔·拉季奥诺夫吧？他也在伦敦待过。我都不想对你说了。我到了喀山，开始讲课。你想不到吧，谁坐在第一排？是帕什卡。他向我微笑。我们已经多年不见了。我在照本宣科，我看到我的帕维尔垂下了眼睛。他开始为我感到害臊了。讲完课以后，他也没有到我这儿来，这使我理解到，他对我的一切都已清清楚楚了。那时我在旅馆里彻夜难眠，你知道，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对拉季奥诺夫记得很清楚，过去他还曾经因阿什亨而对他吃过醋呢。帕什卡也在医疗系学习，听完课后他总是把阿什亨送回家，不是偶尔如此，而是每天缠着她。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有一次看到他俩走在一起，有说有笑。阿什亨才21岁，是个苗条姑娘。但后来他俩结了婚，这种陪送到家的事也就自然而然随之告终了。

她出身于亚美尼亚巴库的一个富裕家庭，参加了革命，追随布尔什维克，与父母的关系破裂了。她无所顾忌，英勇无畏，勤勤恳恳为革命工作。她人很聪明，懂得三种语言，而且帮助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他们俩一天说德语，一天说法语，一天说英语。

她曾同李特维诺夫一起工作过，将秘密读物运到俄罗斯。

国内战争时当过部队的政治部主任。那时他们把列娜送到莫托维利哈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的父母处。阿什亨染上了斑疹伤寒。他好不容易才把她救活了，好不容易啊……总而言之，她的经历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地下党员干部的典型经历。如今，她在全国到处作报告。不过，假如真是难以坚持下去，那倒确实应当另找工作了……

“也许，你就转到李特维诺夫那儿去吧，何况你还懂几门外语呢！”

“不！”她断然表示不同意。“我不想继续执行这个政策了。李特维诺夫的表现也很消极，至于他在把事业引向何方，我看得清楚。”

“7月25日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就要召开了，”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说道，“我考虑，我应当把我的报告寄出去了。”

她骤然向他转过身来，眼睛瞪得滚圆：

“这么干你是要掉脑袋的！”

“如果这么看，阿什亨……”

她打断他的话说：

“大家都是这么看的，而且也是对的。时机已经错过了，亲爱的！你们过去总是想，托洛茨基啦、季诺维也夫啦、加米涅夫啦、布哈林啦，最好不要让他们掌权。只有他一个人在考虑他自己如何才能上台，他还真是掌了权，而且还要消灭所有挡他道的人。那些过去挡他道的人已经遭到了灭亡的命运，这你是知道的。顺便说一下，昨天捷尔一瓦加尼扬被捕了。”

捷尔一瓦加尼扬也是巴库人，她了解他的一家。

“因为他是托洛茨基分子呀，”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说道。

“过去是的！伊万，别忘了，他过去是托派分子，早在1928年就放弃了托派立场，所以当时就恢复了他的党籍。他是真心实意放弃托派立场的，这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但这对他斯大林来说，反正是那么回事。哪怕这个人只挡过他一次道，也要被消灭的。他会把他们全部消灭，你会看得见的。可你从来也没有参加过哪个反对派，你这方面的历史是最清白的，千万不要送上门去挨打。现在跟他什么事也不能干，应当等待。”

“等什么？”

“等他的政策垮台。”

“那就为时太晚了。”

“不！只要党的干部能保存自己，就不会晚。到时就可以从他的手中夺回政权。但一定得保存自己，保存自己及自己的孩子们。对，对，还有孩子。我不认为，人们为自己的子女的命运担忧是什么反党的行为。这样做是明智的。”

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站起身来。

“老实说，阿什亨，我没有料到你会说出这种话来。”

她也站了起来，严肃而又坚决地说：

“我不得不提醒你，伊万，弗拉德连才9岁。至于列娜，你昨天也已知道，快要生孩子了。请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话。”

她走出了房间。

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听到她在他办公室走动和把长沙发拉开的声音。

他苦笑了一下。阿什亨向来有一个习惯：只要她对他不满

意，或者不想继续谈话，就给他在办公室搭个铺。

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以后，他抱住了她的双肩：

“你可别生气啊！”

“我不是生气。但我要再一次提醒你，希望你能为你的儿女和未来的外孙或外孙女着想。决不能就这样轻率地把他们牺牲掉！”

只剩下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一个人在房间里。

阿什亨很害怕，现在许多人都很害怕。但是他有权害怕吗？是的，是困难的年代，艰难的时代。但是他应当履行自己的职责，这一点也将迫使其他人履行自己的天职。现在，正当共产国际的斯大林战略宣告失败如此明显的时候，而由于这一战略的失败又导致希特勒上台的时候，正好是发表自己意见的时候。否则，希特勒将会纠集强大的兵力迫使斯大林向他让步，谁又能知道这种让步会达到何种程度呢？

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曾指望他同斯大林的会见会取得某些成效。他知道，斯大林反对他的观点，但这还不意味着斯大林会不认真听取他的意见。斯大林常常会借用别人的思想，那些人后来被陆续消灭了，而且往往是先消灭人，然后仿效此人的思想。5月2日同法国签了互助条约，5月16日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同样性质的条约。表面看来这样做是故意刺激希特勒。这是战略呢，还是策略？无论如何，应当稳住，应当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斯大林会不会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宣布实行统一战线政策？会不会终止工人运动内部的分裂活动？会不会以此阻挡住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呢？

仿佛一切都是为此而进行的，整个宣传机器都在为反希

特勒而转动。那么这一切究竟是战略呢，还是策略？

布佳金在去年同斯大林会见之后曾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整整一年来，他一直在犹豫，是把它发出去，还是不发？同斯大林的谈话表明，这样做是不会有结果的。阿什亨认为，报告决不能寄出去。

但是去年9月德国和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后，苏联加入了国联，同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同盟条约。这使他下决心将自己的报告寄给中央。第七次大会应当制定统一战线的政策。

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重新看了一遍报告。那些可能使斯大林恼火的尖锐之处他已经去掉了。现在这个报告听起来还是尖锐，但批评的是德国共产党。他提到了马努伊尔斯基，指出此人所说的话太荒唐。他还指出，国家的主要危险是德国——虽然他明白，斯大林对此会做出何种反应。

14

马拉谢维奇教授对于女儿的再嫁与她的第一次出嫁一样，抱十分冷漠的态度。他想，儿女们都已经是成人了，是现代派的人物，比他这个老头更加了解时代，随他们去怎么过吧。

但是，瓦季姆却勃然大怒了！什么？嫁给一个外国人？去巴黎？这下填表的时候，在“有无亲属在国外”一栏里，他就得填上“有”。而且不是什么远房姨妈之类的人，而是亲妹妹，是自己走的，嫁出去了。嫁给了谁呢？嫁给了一个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对呀！就是那个夏尔，他是一个反对苏联的人。

《消息报》上已经刊登两篇文章批驳夏尔在巴黎报刊上发表的诽谤性报道了。他之所以未被驱逐出莫斯科仅仅是由于明年2月法国议会将批准法苏条约。现在他自己走了。她那亲爱的丈夫将如何污蔑苏维埃国家是可以想象的。她的丈夫，他的妹婿……是的，是他瓦季姆·马拉谢维奇的妹婿，他唯一的妹妹的丈夫将在巴黎报刊上发表恶毒攻击苏维埃的文章。嘿！

还在上中学的时候，瓦季姆就试图教育妹妹了。他讨厌

她的生活方式：讲究衣着，喜欢逛餐馆，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后来他也就迁就了，时代变了嘛！妹妹与新的环境倒还协调。他虽然依然不尊重她，但和平共处变得可能了。

他们一家人过去和睦相处过得挺顺当。大家都该为阖家平安作出自己的贡献，不该也不准给家庭带来不幸，这就是他们的家规。往后还会有许多艰难困苦呢！可是维卡破坏了这个家规，做出了有辱门风的事，毁了一家，也毁了他的命运，他的前程。

至于父亲，当然没有什么关系。他的一生是很有出息的，谁也夺不走他的那些荣誉称号，他的高薪和奖赏。

可他瓦季姆会落得个什么下场呢？开始时他可真算是一帆风顺了，随便哪一家杂志都乐意发表他的文章，他已被公认为一名最有原则性、最不调和妥协的评论家，而且还几乎被认为是一名最出色的演说家，他在所有的讨论会上都发言……现在他的后台叶尔米洛夫和基尔波京会说些什么呢？要知道，基尔波京是多么信赖他啊！在作家代表大会上，他既为基尔波京出过力，也曾为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叶尔米洛夫效过劳。后者是编辑委员会委员。受他的委托，瓦季姆既审查过马尔夏克（儿童文学的报告人）的速记记录，还审查过斯塔夫斯基（论我国文学青年的报告人）和库兹马·戈尔布诺夫（论青年作家作品的出版工作的报告人）的速记记录，甚至还到过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和卡尔·拉狄克那儿。而且不是作为通讯员，而是作为编辑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派去的。速记记录可以校正，但不能歪曲发言本身的意思，不能把所说的话加以改动。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叶尔米洛夫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

现在这一切都完了。现在他不得不去进行解释：她的妹妹是个逛餐馆的放荡女人，同某个外国人混上了，到国外去了。

他在家里面踱来踱去，直哼哼，就象是在牙痛。放荡女人，放荡女人，讨厌的放荡女人！最后他终于克制不住，冲进了维卡的房间。

“不要歇斯底里大发作，”维卡不动声色地说道，“你是个娘儿们！这与你有什么相干？哥哥？又怎么样？这是什么意思？根本不相干。我又不是一个小女孩，我又没有离开家。我只不过离开了一个丈夫嫁了另外一个丈夫。我和阿尔希捷克托尔离婚了，你明白吗？去问问他吧，他为什么对妻子这么不好，以致妻子去找了别人？”

“你没有姓他的姓，你是姓的我们的姓，”瓦季姆喊叫起来。“你为什么不跟他一起去登记结婚？是因为他有正式的妻子。可你不是妻子，你是个情妇，你就是这种货色！你顶多跟他睡睡觉而已。你姓马拉谢维奇，明白吗？”

“我做了什么违法的事啦？”维卡冷冷地问道。“我同夏尔已经正式登过记了，姓了他的姓，我已经正式获准出国了。我哪儿违法了？”

“你做的事比违法还要厉害。你违反了一个苏联公民最起码的道德和最起码的职责。驱逐出境是一种惩罚，最严厉的惩罚。可你却自愿离开。可耻！”

“啊……”维卡冷笑了，“你有多自觉？你有多虔诚？你早就是这样的人了吗？要知道你是个胆小鬼，你是因为胆小才为这些卑鄙小人服务的。大家都瞧不起你，说你是刽子手。我就亲耳听到过，说你是刽子手和走狗……所以你用不着担心，

不会因为我而让你遭难的。总之，别再教训我了，我都听腻了！把那边的门关上！”

瓦季姆关上门走了出来。贱货！出卖灵魂的家伙！败类！如果是由于她同外国人的关系把她关进监狱，他的滋味也不会好受，但毕竟要好一些。顶撞一下，哪怕找个托辞，说妹妹关起来了，或者因为某种原因被驱逐了，也就完了！可现在她的丈夫今后每个星期都会提醒人们他的存在。

瓦季姆因为具有演说家的才能，所以常常发表演说：讲课啦、做报告啦、在各种会议上，在编辑委员会和艺术委员会上发言啦……等等。不仅如此，他写得也很多。成百上千的人听他演讲，成千上万的人读他的文章，成千上万哪！

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结束了作家们与世隔绝和组织派别活动的现象，团结了作家的力量。从此之后，文学家们开始创作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题材，国家面貌改观的题材。文学事业蓬勃发展。卡达耶夫写的马格尼托建设工程，爱伦堡写的库兹涅茨克煤炭工程，马·伊林写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马·沙吉尼扬写的关于水电站建设的情况，列昂诺夫的《索溪》，阿列克赛·托尔斯泰写的《彼得大帝》等长篇小说都证实了这一点。

不错，这些作品大部分是作家们在代表大会之前创作的，但也应该辩证地看待代表大会对文学的影响。代表大会是从1932年斯大林同志同作家谈话开始的全过程的一个尾声，是他写给杰米扬·别德内、别济缅斯基、比利-别洛采尔科夫斯基的几封信的结果。正是斯大林同志的谈话和他的信件给了文学中的资产阶级反党倾向、给文学界的各种派别、给庸俗社会学和形式主义流派及各种学派以毁灭性打击。正是在

1932年那个时候，斯大林同志为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苏维埃文学下了定义。斯大林同志所开创的过程的结束和終了就是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的召开。三十年代初期文学的繁荣正是应该归功于斯大林同志的文章、谈话和演讲所起的良好作用。

戏剧也得到了发展：波戈廷、维什涅夫斯基、考涅楚克、阿菲诺根诺夫、罗马绍夫等的剧本都是见证。虽然人们对于象征派美学的残余，对于梅耶霍德和泰罗夫创作中未来派和结构主义倾向都怀有戒备。

“怀有戒备”是评论家瓦季姆·马拉谢维奇最喜欢的用语。对于预料要彻底批判的那些作品，他就用这句话；一旦作品被彻底批判了，他就合法地参与这种攻击。而对于那些没有料到要彻底批判的作品，他就用“怀有戒备”这几个字来说是指修辞方面和结构方面的差错、个别人物塑造太晦暗，语言绕口啦等等。如果这个作品顺利通过了，那么瓦季姆的腔调就随大流地一味赞扬，当然，毫无疑问，赞赏之余难免要添上几句友好的、不会使人见怪的批评意见。如果偏偏碰到了过去曾高度评价，尔后又遭到了彻底批判的作品，那么又要靠这句“怀有戒备”的话来救驾了。

瓦季姆的主要才干在于他善于随机应变地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达上级已经说过或打算要说的正式指示性的观点。

瓦季姆与那些笨拙的学究不同。学究们在这种情况下只会逐字逐句、引经据典重复别人的话，甚至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敢用错。他则常常利用早就死去的因而也就没有危险的作者的话，哪怕是拉丁文也行，他都能找到合适的用语，出人意外地引用。这就给自己的立场，自己的独立判断和博学

才智造成了一种错觉。他被认为是一个奉公守法但又是进步的人。文学方面的领导认为他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文学知识界则认为他是一个进步的人。

并且，他还是一个朴实的、和蔼可亲的、善于交际的人，一个民主主义者。瓦季姆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具有这种作风了。当时他就能适应二十年代共青团员的民主化行为，竭力不暴露出他那特别的大知识分子出身的特征，尽力避免使人觉察出他曾受过，这么说吧，资产阶级教育的特征。

现在，这种民主主义，这种工人的、无产阶级的朴直作风，在他与那些读了许多书，但不理解而又喜欢讲陈词滥调的大老粗们打交道的时候还是有用的。这种人他虽十分害怕，但对待他们又表现得那么不拘礼。当他单独遇见他们时，对他们写的那些文理不通犹如念经似的文章大加赞扬，但从不在讲台上说夸奖话，然而在讲台上他也从不批评那种爱唱陈词滥调的人。因此，瓦季姆在保持崇高的知识分子威望的同时，还赢得了大老粗们的信任。

他没有入党。他是一位党外布尔什维克，这就足够了。如今党外布尔什维克的价值要比党员布尔什维克高得多，因为对党员的要求不同。

做一名党员有优越性，那是从前。现在相反，清党，检查党的证件，什么都瞒不住。如果他是一个党员，他就得去向党组织汇报，他的妹妹嫁给了一个外国人，出国去了。现在他是一名党外人士，就用不着去向什么人报告这个情况，他只须在表格里注明就行，但现在什么表都已经填满了。

在党外他的处境更自由一些。

瓦季姆在同那些爱唠叨陈词滥调的人进行友好交谈时从

不超过界限。对他们得提防着点，这些人对每个细小错误都是不会放过的，而且他们不见得每句话都懂。他们嘴里说出来的，就是用文字堆砌起来也不会超过一百个词，充其量也不会超过一百五十个词。

在自己这个圈子里，情况就不同了。任何言外之意大家都懂。和他一样的那些厚颜无耻的家伙可以接受任何提供给他们们的生活条件，可以接受所要求的思维方式，怎么要求怎么写，怎么要求怎么说。就在他们之间谈话，也只是奉命说所要说的，赞赏所要赞赏的，谴责需要谴责的。赞扬起来毫无激情，谴责起来毫不愤怒，好象是在用说笑话，说俏皮话来为他们所参加的无情的攻击进行掩饰、辩解和伪装，或者相反，用以掩饰过分的颂扬。

怎么办呢？好处不是白给的，应当报答嘛！

随着时间的消逝，瓦季姆关于维卡的问题已经放心了。她已经走了半年了，谁也没有问起过什么。莫斯科的报亭不出售巴黎的报纸，所以瓦季姆也无从知道她那亲爱的丈夫是否还在从事诽谤活动。

维卡没有写信回家，毕竟她是明白的，不能这样做。半年来曾来过两封信，是盖的莫斯科的邮戳，那就是说，信是托人捎来寄的。信很简短：活着，身体健康，回信请通过某个涅利娅·弗拉基米罗娃转，并告诉了此人的电话号码。

瓦季姆绝对不许父亲回信。

“这个涅利娅·弗拉基米罗娃是什么人？”他问道，“这封信她不会先送到卢比扬卡^①去？能保证给我们捎来的信没有

^① 指肃反委员会所在地。——译者

到过卢比扬卡吗？这种同国外的通信，同国外联系会有什么结果，难道你不明白？你倒给我说说看，哪一个人是和国外通信的？有亲戚在国外的那些人尚且隐瞒这一点，难道我们反要向人炫耀？”

“不过，瓦季姆，”老人慌忙叽咕说，“难道我不能同自己的女儿通信？”

“不能。她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没有写我们的地址，而是通过别人之手转来的。她想象得出，直接写信给我们是危险的，知道会引起怎样的后果，所以决定秘密写信。她很快就忘记了我们所处的条件，我们这儿任何秘密的东西一小时后就会全部公开。”

“不过，瓦季姆！”

“爸爸，看待事物请冷静些。她把我们抛弃了，永远抛弃了。再也不会从法国回到这儿来了。出国的人回来我们是不接受的。她想去过那种生活，而不考虑一下，准确些说是不愿意考虑，由于她的离去，我们的生活将会是个什么样子。现在你填表时不得不写上，‘女儿已出国，现住法国’。当然。你是知名人士……但是，现在不受侵犯的人是没有的，请记住这点。可我在思想战线上工作，那儿不会用亲属出国的人的。对这样的人是不信任的。当然，我明白，你认为我是一个利己主义者，我想她也会说，我只考虑自己，考虑自己的前程。不！我考虑的不仅仅是我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前途，在目前情况下，我首先考虑的是精神、道义，道德方面的问题。既然她不顾及我们，那么，为什么我们就应该考虑她呢？她离我们而去，这一事实本身就打击了我们，为什么我们还要讨好她呢？她没有任何风险，可我们有失去一切的危险。

她已经把我们从她的生活中排除掉了。她的信是一纸空文、她是以此聊以自慰她那思亲之情的……啊！怎么样了，亲爱的爸爸、哥哥……啊！法国人就喜欢这样。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早就看透了……记得吗？在《战争与和平》中他说，‘啊！我的母亲，我可怜的母亲……’这统统是虚情假意……就是这样，父亲，我绝对坚持这一点。”

“好吧，瓦季姆，就照你说的办吧。”安德烈·安德列耶维奇同意了。

但马拉谢维奇教授还是给涅利娅·弗拉基米罗娃打了电话，到她那儿去了一趟，请她给维卡转交一封短信：他和瓦季姆都活着，身体健康，他们一切都好。知道了维卡也一切均好后，很高兴。

“不过我请求您”，老人对涅利娅说道，“对我的儿子不要提起我发过信，他同妹妹不和。”

“我不认识您的儿子，”涅利娅说明。

“那也可能碰上、见面的嘛。所以，要是你们互相认识了，也请不要说起。”

“行！”——涅利娅冷冷地答道。

马拉谢维奇教授再也没料到，维卡确实收到了他的信。回信说：“爸爸，亲爱的爸爸，你的短信收到了……”不过，这封回信落到了瓦季姆的手中。

“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父亲叽哩咕噜地说，他给这位太太打了个电话，只不过请她代为问候，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难道也够得上是什么问题？老头子脑子里突然想起了什么，这与瓦季姆毫不相干，不用管……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瓦季姆冷漠地说，“不过，假如你打算继续通信，那我就不得不同你分手了。”

“这是指什么？”教授没听懂。

“很简单，我们就不得不把这套住房换成两套小的，我要单独住。”

这种威胁可把老人惊呆了。他没有考虑过也无法想象自己会搬出这幢整个莫斯科都有名的住宅。当然，现在维卡不在，家里也就不象从前了，客人也少些了。孙巴托夫-尤任死了，阿纳托利·华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死了，叶卡捷琳娜·华西里耶夫娜·黑尔策尔老了，卡恰洛夫也老了，还有伊古姆诺夫·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也老了。但有人还常打电话来，比如梅耶霍德昨天就来过电话，还有人来祝贺新年，祝贺生日，来看望他，请他指教。不错，戏剧界的青年来得少了，瓦季姆不喜欢他们，不过这些年轻人过去也常常把安德烈·安德列耶维奇搞得非常疲劳。国外来的客人也少些了，教授又没有结识新朋友。但是，是凡老朋友到莫斯科来，那是一定要来的，他就在自己家里接待他们。所以一般说来，他没有想过他会一个人孤单单地搬到这所住宅外面去住，既没有妻子，也没有女儿。而现在他又将失去儿子——瓦季姆说话的意思应该这样来理解。

“你这样做未免太残酷了，”安德烈·安德列耶维奇伤心地说。

“随你的便吧，怎么指责我都行，”瓦季姆答道，“不过，我告诉你，但愿你不要只凭自己的经验来考虑问题。我毕竟有几分是对的。你有不少概念已经过时，虽然想得很好，但不合时宜了，懂吗？不合时宜了。好好想想吧。”

“好吧，”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不知所措而又害怕儿子威胁，只好表示同意。“以后我不再给维多利亚写信了。”

谈话到此结束，各自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早晨，电话铃声把瓦季姆吵醒了……见鬼！谁也没有这么早给他打过电话。他拿起了听筒，听到一个不熟悉的男人的官腔：

“是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马拉谢维奇吗？我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今天中午12点，你必须按下述地址来一趟：库兹涅茨克桥24号，通行证发放处，找阿尔特曼同志。明白了吗？”

“是，我明白了。”瓦季姆赶紧用嘶哑的声音答道。

“随身带上身份证，明白了吗？”

“当然，明白了。”

听筒内响起了短促的嘟嘟声，于是瓦季姆把它挂上了。

是这样吧！他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个结果。贱货！出卖灵魂的家伙！放荡的女人！到哪儿都放荡。在这儿放荡，在巴黎也是这样！

见鬼！他为什么不说他今天忙，要开几个会，他不能去，不能……不过，为什么打电话叫他去呢？假如他哪儿做错了，可以正式来通知嘛。对他们来说，他又不是一个孩子！他是作家协会会员。再者，他还不是国内最蹩脚的评论家么。那儿不会不知道他的，假如打算同他谈话，他们总是看过他的文章了，想必一定看过他的文章了。

不过，也可能正因为如此，才不发正式通知的吧？他们也许想预先警告一下。与维卡通信，对他，对父亲都会投上阴影，所以不该这么做。不正式通知是他们出于最美好的动机。至于那蛮横的腔调，那是普通工作人员打的电话嘛。

那么，可能会向他提出些什么问题呢？他同妹妹关系早就破裂了，那还是在她去巴黎之前的事呢！他过去曾是一个共青团员，她不过是一个爱逛酒馆的姑娘。近三年来他们互相之间连话都没有谈过，父亲呢？说到这位老人，那当然是出于家族的偏见，因为是女儿嘛！

上帝啊，上帝……可要是那儿突然不放他走呢？不过，不会不放他走的。逮捕人的时候会出示逮捕证的。总之，这个机关总有点让他感到害怕。他童年就是在恐惧中度过的。这种恐惧在入团后克服了。可现在虽然地位似乎已经相当稳固了，恐惧却重又侵袭了他。成了一名最最正统的评论家之后，实质上是成了一名象叶尔米洛夫之类顽固派手中的“知识分子大棒”之后，他完全可以什么也不怕了。国家需要他呀！是啊，国家需要的正是象他这样的人。这一点，召他前往的那个地方应该是明白的。

他站在镜子前面，系着领带。见鬼，两只手在发抖，领带的一头怎么也套不进结子里去，到12点钟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父亲怎么会去干这种蠢事的呢？给叫什么涅利娅·弗拉基米洛夫娜的打什么电话。也许她就是告密者，是作诱饵用的鸭子。要知道，他早就警告过父亲，因为父亲尽管地位很高，但仍和以往一样地担惊受怕。他的那些职位很高的病人现在有不少被关押、被流放了。为此，他所有的同事，这些教授

们和知名人士都害怕得发抖。那他瓦季姆的同事又怎么样呢？他们把自己打扮成思想的主宰者，实际上也害怕得发抖，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要是他出了什么事，那就会一阵风把他们都吹掉，一个也不剩，还要表示仇恨、愤怒。他们怎么会“忽略”这一点呢？他非常熟悉他们那过于自信的微笑，以及一文不值的刚愎自用。

那么是否同拉尔卡·沙罗克商量一下呢？

真的，他们好久没有见面了。不过，他们是朋友，童年时的朋友，同坐一张课桌椅将近九年，以后也常常见面……尤尔卡曾多次到过他们家，只要瓦季姆挂个电话，他们就一起去看戏。所以，实质上他们俩还是要好的同学。

尤拉会帮忙的，一定会帮忙的。他不但了解瓦季姆，而且了解他的父亲，他的全家。让他去那儿解释好了。可能这个阿尔特曼也就不会怀疑他不仅是名教授、克里姆林宫医院顾问医生马拉谢维奇的儿子，而且本人也是一个有名的批评家。

而且，最最主要的是，尤拉可以肯定瓦季姆是坚定地站在苏维埃政权的立场上的。

更何况，尤拉一定认识阿尔特曼。

对，应当给尤拉打个电话，商量一下，好象是顺便说起似地谈一下这件事，这样既可保持自己的尊严，也可以不暴露出自己的激动与不安。

顺便提一下，尤拉也会因此而担心的，可能还并不亚于他。尤拉和维卡之间曾经有过那么一段，这是事实，这是确实的。有一次，瓦季姆回家后顺便到维卡房间去的时候，尤拉就坐在那儿，瓦季姆从他们的脸部表情看就什么都明白了。

而在这之前，那时萨什卡还没被捕，在尼娜那儿迎接新年时，在走廊的某个地方，尤拉和维卡紧紧地拥抱过。尼娜还为此大闹了一场。在这之后，这种情况在维卡的房间里也常有。此后，他们还常见面。对，自从尤拉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以后，就再也没有到他们这儿来过，但很可能他们在悄悄相会，鬼才知道呢！维卡是个放荡的女人，而尤拉则是一个相当好色的家伙。总之，尤拉应该帮助他，不可能不帮助他。

他拨了尤拉的电话号码，从听筒里听到一个低沉粗鲁的声音，那是尤拉父亲的嗓音。他是个裁缝。他连瓦季姆的名字和父称都不知道，活见鬼！

“不在家，”——这个低沉的、陌生的声音说道，“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接着就把电话挂上了。

是啊……可是他又不知道尤拉办公室的电话号码。何况，象这种事情电话里也不便说。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阿尔特曼是何许人也？年轻人？老年人？知书达理的人还是蛮横无理的人？一般说来，阿尔特曼是知识分子的姓。

纳坦·阿尔特曼是位艺术家，以他那一系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速写画和列宁写真雕像面闻名，也是位写生画家，为一些戏剧演出画过布景，如马雅可夫斯基的《宗教滑稽剧》，在加比马剧院中的“加季布克”，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的《装甲车14—69》等。但在他的作品中，公式化和抽象化的成分非常严重。对这个问题，瓦季姆写过文章。

另一个阿尔特曼·约翰是文学家和戏剧评论家，老党员，现任《苏联艺术报》编辑。

因此，这个阿尔特曼也可能是个知识分子。

最好是个知识分子，或许还可以向他作些说明。可要是个不讲理的家伙呢？穿着靴子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吸着劣质马合烟，故意发出一种难闻的味道，以表现自己是个无产者。

近几年来，瓦季姆已经学会了同这些蛮横无礼的家伙打交道，对他们就应当那样，好象他早就不怕他们了。不！老沙罗克的声音使他仓惶失措。他仍然怕他们，在他们面前还是发抖。

瓦季姆在那个坐在卢比扬卡等着他的神秘莫测而又强大无比的蛮横者面前感到越来越恐惧了。

这位强大的蛮横者原来是个穿军装、有棕红色头发的犹太人，鼻子长长的，有一双阴沉的眼睛。

见到了阿尔特曼之后，瓦季姆轻松地叹了一口气。这个头发棕红的瘦弱军人肯定没听说过与自己同姓的那些知名人士的情况。看来文化程度超不过六至八年级，但不象是个不讲道理的人。凹陷的双颊，狭窄的双肩……很可能在幼年时还吱吱呀呀不成调地拉过小提琴呢！无论如何，不是用两个手指头，而是用手帕去擤鼻涕的人，因此，他是不会把审讯对象的手给拧下来的。

出现了一线希望。也许他瓦季姆一切都会对付过去的。

“请坐！”

瓦季姆坐了下来。阿尔特曼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表格放在自己的面前，将钢笔在墨水中蘸了一下。

“姓名、父称？出生年月、出生地？工作和职务？”

是审问吗？为什么？加上阿尔特曼那种单调的声音，使他的神经紧张起来。

瓦季姆对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样回答的：

“苏联作家协会会员。我希望能知道……”

“您一切都会知道的，”阿尔特曼打断了他的话，“职务？”

“在作家协会里没有职务。”

阿尔特曼对他看了看。

“那您在那儿干些什么呢？”

“我是评论家，文学评论家和戏剧评论家。”

阿尔特曼的眼睛又死死地盯住了他。

“我写了文章在那儿拿稿费，”瓦季姆明确地说。

阿尔特曼还是若有所思地看着他，然后写下了“评论家”几个字。

这一小小的胜利鼓舞了瓦季姆。他补充道：

“稿费当然并不多。从这个意义上讲评论家的工作简直太亏了。不过，我们过得……我和父亲俩人。我父亲是马拉谢维奇教授……”瓦季姆故意停顿一下，以观察阿尔特曼对这一知名人氏的反应如何。但是阿尔特曼毫无反应，他脸上的肌肉纹丝未动。于是瓦季姆接着说：“他是克里姆林宫医院的顾问，门诊部的领导人。”

阿尔特曼那呆板的脸上仍然毫无反应，他翻过了一页，把折弯处弄平整，用肘抚摩一下，那是一页没写过字的格子纸。

阿尔特曼把这页纸看来看去，问道：

“您同什么人进行过反革命谈话？”他的声音很平稳，跟那张面孔一样毫无表情。

这可是瓦季姆怎么也没有料到的。他预料的谈话内容是维卡的事，对此作了准备。根据他的想法编好了合乎逻辑、令人信服的说法。但是，“您同什么人进行过反革命谈话？！”他没有同什么人进行过反革命谈话，不可能呀。他是一个苏联人，诚实的苏联人。提这种问题是个圈套，让阿尔特曼说说，是根据什么案件把他召来的。他虽准备好了回答，但应该先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假如他开始表示异议的话，那定将触怒这个蠢货。这儿是四壁空空，窗户有一半涂上白涂料，钉有金属栅栏。在这儿他是个说了算的人物。

“我不完全明白您的问题，”瓦季姆开始说了。“您指的是什么谈话？我……”

阿尔特曼打断了他：

“我的问题您非常清楚。您完全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奉劝您老实些，坦白些，别忘了您这是在什么地方。”

“是的。但是我不知道，”瓦季姆不想说，但不得不勉强地说道，“我没有同任何人进行过反革命谈话。这是某种误会。”

阿尔特曼看了一眼审讯记录：

“您是作家协会会员吧，是不是？您周围都是作家吧？那么，依您看，他们之中谁也没有进行过反革命谈话？”他一个接一个问题地问着，声音却是单调的。似乎他不是问瓦季姆，而是在训斥他。“您想让我相信这一点吗？您想向我证明所有的作家对苏维埃政权都是忠诚的？您想证明这一点吗？您能为所有的作家和知识分子承担责任？可能您的担子太重了吧？”

瓦季姆默不作声。

“怎么？”阿尔特曼问道，“我们就这样玩沉默游戏，是吗？”
瓦季姆耸了耸厚实的肩膀。

“不过，谁也没有同我进行过反革命谈话呀！”

“您不愿意帮助我们，”阿尔特曼低声地威胁说。

“为什么不愿意？”瓦季姆反对说，“帮助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关是每个人的义务。但是，没有进行过这种谈话，我当然想不出来啰。”

虽然整个气氛——这个办公室，这个机器人似的阿尔特曼以及他那单调乏味的腔调——使瓦季姆感到害怕，但他的内心却多少还是平静的。他最敏感的薄弱环节只有来自维卡方面，然而现在没有谈到维卡。至于反革命谈话之说，那是搞错了，是误会。

阿尔特曼默不作声。在他的眼神里既看不出有什么想法，也看不出是什么感情。接着他把纸翻转过来，看了看瓦季姆的姓名和父称。

“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

这个动作是侮辱性的。阿尔特曼并不掩饰他连瓦季姆的名字和父称都不记得，其实要记住并不难。这就是说，用不着记。

“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

他第一次睁大着眼直视着瓦季姆，这就使瓦季姆害怕得毛骨悚然：在这目光中，在这铁石心肠的刽子手的眯缝着的双眼中，蕴藏着多少仇恨哟！

“可是我……”

“什么‘我’呀‘我’的，”阿尔特曼低低的声音已经极端愤怒，进而转为仇恨的大吼了：“我再对您说一遍：您忘了您现在

是在什么地方了。我们把您叫到这儿来，不是为了让您来开导我们。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应当知道什么。您是明白还是不明白？”

“当然明白，当然明白，”瓦季姆讨好地、肯定地说。

阿尔特曼沉默了一下。然后用原先那种没精打采的声音问道：

“您经常会见的是哪些国籍的外国人？”

终于问到这个问题了！快要谈到维卡了！很明显！

瓦季姆装出莫名其妙的样子。

“我个人不同任何国籍的外国人见面。”

阿尔特曼又直视着瓦季姆。于是瓦季姆重又被这刽子手的眯缝眼吓得毛骨悚然。

“也许，一般说来，您一生中从未见过一个外国人？”

“这是为什么？当然见过。”

“在哪儿？”

“外国人常到我父亲家中来。我父亲是个医学教授，一个大人物。您知道，是世界有名的……那么，当然，外国学者常来拜望他，这是很自然的，而且这是上级领导机关正式同意这样做的……我不大了解他们，我不是医学家，不参加他们的谈话。顺便说一下，他们谈话时总有官方人士在场……不过，我记得一些名字。几年前，柏林大学教授克拉默拜访过父亲，另一位教授好象是罗索利尼。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我记不清他姓什么了，大家叫他谢姆·韦尼阿米诺维奇。”

阿尔特曼在纸上记了些什么。难道在记这些教授的姓名？怪事！这些都是可以在报上读到的。

瓦季姆还提到了同外国人一起到他家来的伊古姆诺夫教

授和阿纳托里·华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说出了一位波兰教授，那是同著名的党的工作者格林斯基一起来的，格林斯基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朋友和战友，他还说出了几个人的名字。

接着就不说话了。

阿尔特曼也沉默了一阵，然后问道：

“那么您同这些外国人交谈了些什么问题呢？”

“我个人没有同他们谈什么，他们是父亲的熟人。”

“你们在一起吃饭吗？”

“有时我也在。”

“那么，怎么样啊？”

“我不明白……”

“我问：那么，怎么样？你们在吃饭的时候做了些什么？说话了吧？”

“不，我和他们有什么可谈的？他们都是些科学界的人士……”

“啊！那就是说，没有说话，光是吃了，喝了。那耳朵干什么了？塞了棉花了？吃了，喝了，还听了他们的交谈。他们谈了些什么？”

“话题是各种各样的，主要是谈医学。”

“同音乐指挥也谈医学？”

瓦季姆随即说了一句他自己觉得颇为得意的话，这句话甚至给了他勇气：

“是啊，也谈医学。他是向我父亲请教自己的病情。”

阿尔特曼把纸拿到手里，念着瓦季姆所说出的一些姓名，重音常常读错。

“就这些?”

从他那单调乏味的腔调中可以听得出，他相信这并不是全部。

“好象就是这些。”

“再想一想。”

就在这问话中听得出，他是在等瓦季姆说出那个他唯一需要的人的名字。他就是为这才把瓦季姆叫来的。

瓦季姆开始听明白了：侦讯员指的是维卡的丈夫夏尔。这位子爵真是可恶透顶！他虽常到维卡这儿来，但瓦季姆几乎没见过他。当维卡把夏尔介绍给他和父亲的时候，他只不过干巴巴地问个好，但没有留下来同他们一起吃晚饭，借口有个紧急会议走了。因此，维卡把夏尔带进他们家的时候，不仅他事前不知道，而且也没有参与活动。所以问题当然出在夏尔身上，都在夏尔身上。应该把他的名字说出来，应当是他自然地、平心静气地说，而不是被迫说出来的。

“哦，”瓦季姆说。“还有一个我妹妹的丈夫，他们现在住在巴黎……但我同他们毫无联系。”

“就这些？”阿尔特曼又问了一遍。

“对，我记得起来的就这些。”

阿尔特曼把表格往身边移了一下，开始用工工整整的抄写员的书法记下来，把那张填满了瓦季姆说出来的姓名的表格看了又看。

瓦季姆注视着他是怎么写的。他写得不慌不忙，不急不慢，任什么也阻止不了他这么干。这种无法避免的情况真是可怕极了，也使他沮丧极了。

写完以后，阿尔特曼把记录递给了他。

“您看一下，签个字。”

他带着原先的那种仇恨注视着瓦季姆，仿佛是在决定怎么办更好：绞死瓦季姆，还是砍掉他的脑袋？而瓦季姆则被这种目光盯得不寒而栗。他胆战心惊地读完了记录。

两页纸，既不分段落，也没有插话，其中包括对“您同哪些国籍的外国人见过面？何时？何地？有谁在场？”这个问题的回答。

瓦季姆所说出来的那些姓名都记对了。不过，原来他们有那么多啊！都是些俄罗斯人和外国人的名字！外国人的名字是指到他们阿尔巴特街来的人；俄罗斯人是指带外国人来的人。可是这种情景本身是没有道理的，不足信的。结果变成：他们家常有外国人来拜访，而瓦季姆唯一的任务就是同他们进行交谈。何况一切都是从维卡开始的，都是从她嫁给某个法国人开始的，所以外国人才常到他们家来。

但是，表面看来，记录全部与瓦季姆的证词相符，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何况反对是很可怕的。这双刽子手式的眯缝眼，这种单调乏味的腔调所反映出来的铁石心肠，这种难以预料的、突发的愤怒与仇恨，使瓦季姆感到十分压抑。瓦季姆在两页纸上都签了字。

阿尔特曼把记录放进了卷宗。

“关于把您叫来的事以及您的证词是谁也不应该知道的，明白吗？”

“那当然，”瓦季姆赶忙答道。此时此刻，只要能让他尽快离开此地，他准备接受一切条件。

“您不得对任何人谈这件事，否则等待您的将是更加的不愉快。”

“看您说到哪儿去了！”

“请您把自己看作是事先受到警告的人！勿谓言之不预！”

“明白了。”

阿尔特曼抬起了头，又恶狠狠地眯缝起眼睛来了。

“至于你们的反革命谈话问题，以后再说，我们还要详细谈的。我给您打电话。”

15

瓦里娅当然没有给维卡打电话，维卡也没有给她打。谢天谢地。那种生活永远结束了。自从绘图仪器的事情之后，瓦里娅把卓娅也甩开了。讨厌透了，况且也没有时间。

她只有在上班的时候才见得到列沃奇卡和丽娜，从不谈起科斯佳。列沃奇卡有一次本想只简略地提一下，瓦里娅立刻制止住她，粗暴地制止了她。不这样不行，这是让她记住。于是列沃奇卡记住了，一点不再提科斯佳了。而丽娜尤其如此。对她这个嘻嘻哈哈的人呀，反正全一样。

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待人接物还跟从前一样地高尚，殷勤、稳重。但瓦里娅感到，在她与科斯佳的关系破裂之后，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觉得有了某些希望。但他以特别礼貌的态度掩盖了这种希望。在工会开会以后，在《卡纳季克》^①之后，他对她所提的意见佩服得五体投地。和其他人一样，他也象一只家兔，胆小怕事，但是一个好的领导者，无疑还是一个天才的建筑设计师。瓦里娅对他的思路很感兴趣，很爱听他对一些问题作出的解答，十分欣赏他的论据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凡是讨论建设的技术问题的会议，凡是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要阐明自己的设计方案和建议的会，他总是只带瓦

^① 莫斯科一餐厅名。瓦里娅加入工会讨论通过之后，伊戈尔、丽娜、列沃奇卡等人在此举行小庆宴向她表示祝贺。——译者

里娅而不带列沃奇卡和丽娜。就带一个瓦里娅。挂图纸、取下图纸或者换用别的设计图，选择必须的材料，这些事本来是任何一个有条理的制图员都能做的，别的设计师都是带上自己最亲近的助手，因为他们自己就能对这个或那个细节的用途作出解释。所以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本来应该由列沃奇卡陪同前去的，但仍是由瓦里娅陪同去了。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这么做的时候，往往做得非常巧妙：常常让列沃奇卡完成重要的紧急任务，让丽娜做复杂的重要工作，因而她们都走不开，只有瓦里娅能跟他去，因而结果就总是瓦里娅陪同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去出席技术会议了。

她能去参加这些会议很高兴，因为气氛很愉快，都是些知识分子，很机敏的人，是各自领域中的大专家。渐渐地，她也熟悉了建造宾馆中的各种复杂问题，而且不得不佩服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在发言中渊博的知识和出色的逻辑。他甚至在这儿，在这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中也是很突出的。正是这一点，使得瓦里娅在某种程度上顺着他。

当然，象其他人一样，他也时刻担惊受怕。他并不是英雄，但也不是混蛋。他尽量使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正派人，热爱自己的事业。他虽是有创造性的人，但也是个性格软弱的人。虽然，这些有创造性、有才华的人常常是很软弱的。看看报纸就够了：一些著名的作家、演员、艺术家都在要求歼灭、消灭、枪决人的要求书上签了名，而那些人的罪名尚未得到证实。难道作家、演员、艺术家们会相信这么多的人有间谍行为和破坏行为？就连她瓦里娅都不信，他们当然也不会相信。但是他们害怕。

幸好，瓦里娅在各报上都没有找到伊戈尔·弗拉基米罗

维奇的名字，他没有在这种要求下面签名。至于他在工会会议上的表现，一般说来是小事一桩，尽管这在当时也使她讨厌。

下班后有好几次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送她回家，他们顺道……不知为什么，走的是赫尔岑街。电影院放的电影是《为了孩子》，他们就顺便买了票。电影不错。

另外一次是走在阿尔巴特街上。他给瓦里娅讲了个什么故事，讲得入神了，脱口称她为“你”，难为情极了，哈哈大笑起来。于是他们便开始做起游戏来：“让我们用‘你’称呼，一直走完这个街区，到下一个街区，再用‘您’……”瓦里娅不喜欢这个游戏，才走几步路她就说错了，后来就一直称他为“您”。游戏便结束了。

第二天，他们穿过红场，来到莫斯科河边，坐在栏墙上看着过往的行人，心里想着他们的命运。

有一次，在阿尔巴特广场地铁附近走过的时候，他给她买了三支玫瑰花。瓦里娅在拨弄它们的时候，偶然掉了一支。他们同时弯腰去捡的时候，额头碰到了一起，便放声大笑起来。

这些漫步逐渐变得危险起来。瓦里娅不希望有的殷勤讨好开始了。她便设法让卓娅和他们一起走，因为卓娅和她同住在一幢房子里，她们一起走是很自然的。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没有流露出什么不满，照样开玩笑，有说有笑，但有点扫兴。所以第二天看到卓娅和瓦里娅在一起时就说：

“我和你们同路同到沃兹德维任卡大街。”

他就在那个拐角处同她们分手了。

另一次，瓦里娅和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一道走出来的时候，卓娅不在，但瓦里娅说：

“我得赶回去，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所以要乘电车

了。”

“我送你上车。”

他默默地把她送到车站，默默地站在旁边。当电车驶近时，他突然问道：

“允许我给您打电话吗？”

“打吧！”瓦里娅上车时说。

他没有打电话，但送来了一个花篮。

“这算什么？有了新的追求者了？”尼娜问道。

“也许是……”

她立刻便明白了：花是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送来的。花儿很美，但她不需要这个。她并不爱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而且永远也不会爱他。爱上他就意味着象他一样地接受一切现存的制度。

她在等待萨沙……她在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最近的一封信中加写了一句话：“亲爱的萨沙，我们在等你。”后来把“我们在等你”划掉，写上了“我在等”。

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看了以后，微笑了，说道：

“谢谢，瓦里娅，萨沙读到这里会高兴的。”

把花退回去？当然不礼貌。而且她哪能提着这花篮在莫斯科市内慢慢地走呢？上班时去解释也不大好。瓦里娅决定给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写封信。

“亲爱的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谢谢您那可爱的礼物，花儿美极了。但是，在我们这可怜的公寓房里，这花篮引起了轩然大波，还招来了同我前夫有关的各种闲言碎语。为了今后不再惊动我的邻居，不给搬弄是非的人以口舌，请您以后不要再送花来了。”

致以亲切的问候。

瓦里娅”

她贴好了信封。第二天，顺便走进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的办公室，把信放在他的桌上，笑眯眯地说：

“请看完这封信，别生气！”

接着她走出了办公室。

过了一段时间，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到她们的房间里去，也对瓦里娅微笑了一下，表示他读了她的信，理解了她的意思。

瓦里娅日夜地忙碌着，但她还是忙里偷闲去看望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还跑去看望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他们是她唯一想见的人了。

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心脏有病。她从不诉苦，但瓦里娅发现她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很吃力，还喘气，要吃药。

“怎么帮帮您呢？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

“没什么，就会过去的，”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往往这样回答，“我会拖到萨沙回来的。”

“别这样想，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瓦里娅不高兴了，“千万别这样想。您这样痛苦，我真看不下去。别再说啦！准备去门诊部吧，我陪您去。”

“你没有时间，你要工作，还要学习。让医生看病得去排队坐等整整一天。在这以前，还得花一天时间排队找地区段的医生，请他开转诊单去找心脏病专科医生。”

“没关系，我请两天假就是了。”

就在第二天傍晚，瓦里娅来了。

“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们明天去吧，我已向工作单位说好了。”

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走不快。她们走了很久，好不容易才走到索巴奇广场，区门诊部就在那儿。瓦里娅让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椅子上坐下。人确实是多，不得不等很长时间。最后总算轮到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了，她走进了医生办公室，瓦里娅跟在她后面。

“您是她什么人？”医生问她。

“女儿，”瓦里娅答道。

“请到走廊去待一会儿。”

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

“瓦莲卡，你去坐坐，等一等。”

瓦里娅在走廊上等了五分钟左右，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出来了。

“她对您说什么了？”

“什么也没说。填了一张卡片，问了问，什么地方不好受。我说，心脏不舒服。她就给了我这张转诊单。”

她把转诊单递给了瓦里娅。那上面“心脏病专科医生”几个字划了着重号。

他们下来到了挂号处，那里到处是人，连椅子、凳子都没有。瓦里娅排队占了一个位子，便把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带到了街上。楼房的底层很矮，她让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窗台上坐下。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拉住了她的手。

“要是没有你，我能做什么呢？瓦莲卡！”

“我不在时，您就什么也别做！”瓦里娅微笑着说，“我会

陪着您的！”

于是她就跑到挂号处去了。

正如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所说，她们回家时，一天已快过去了，可是手上有了请心脏病专科医生门诊的凭据了。

“到那儿去干吗？瓦莲卡，他们一定告诉你服用硝酸甘油。我现在就在吃这种药。我们别去了。”

“不，一定要去。”

后来，找心脏病专科医生看了病，确实毫无结果。医生开了心脏病滴剂，万不得已时才服用硝酸甘油，连病假条也没有开，所以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还得继续去祖博夫斯基街心花园那儿的洗衣店上班，还是干从前的活——接需洗的衣服。

瓦里娅很难过，她想象着那些顾客火冒三丈，他们由于洗衣店常常搞错或者丢失衣服冲着可怜的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大发雷霆，而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则用病弱的声音回答他们。当然，这时就得立刻放一片硝酸甘油到舌头底下。不仅如此，这店的主任还不知从哪儿得知了萨沙的情况，开始对她挑剔起来，甚至想解雇她，说她来店工作的时候隐瞒了这一点。可又无法辞掉她，因为找不到自愿来这儿工作的人。这儿工资太低，工作太累。而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对于主任的挑剔也只能以病弱的声音来答话。真可怕！难道能让病情如此严重的人去干这种工作？什么大夫？是瞎子吗？

瓦里娅现在已无法到洗衣店去帮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干活了，她自己也有工作。但她还是尽力设法帮她，哪

怕减轻一点家务。瓦里娅有时间就来，因为这才是她真正的家。只有在自己的家里才能感到如此自在和轻松。奇怪的是，这儿已经没有任何东西使她想起科斯佳了，仿佛科斯佳从未在这里住过。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这里住，萨沙似乎也在这里，只是看不见而已。

瓦里娅一有空就来看望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他的房间里黑洞洞的，摆满了柜子、书架，上面紧紧地排放着书本、画册、卷宗。只有桌子照得到一点亮光，桌上也摆满了瓶瓶罐罐，插满了蘸水笔、钢笔和铅笔的杯子，胶水、颜料、小刀子、小刀片也放满了一桌。总之，他工作需要的一切东西全在桌上放着。瓦里娅得踮起脚才能坐到那张旧的高靠背椅子上去，坐垫已经下陷了。

房间里散发出浆糊和颜料的气味，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是一个戴夹鼻眼镜的守旧的单身汉，穿着一件家常穿的格子上衣，看上去挺舒服。他的身子俯向书桌，在粘贴一本旧书。

有一次瓦里娅看见他桌上有一卷斯大林著作，吃惊地问：

“您看这书？”

“为了工作就得看。”

“您在哪儿工作？”

“中央国民经济核算局。”

“中央国民经济核算局？……这是个什么单位？”瓦里娅笑道，“第一次听说。”

“中央国民经济核算局，从前叫中央统计局，这更正确

些。瓦莲卡，我是个统计学家。您知道这门学问吗？”

“一定是门枯燥的科学。”瓦里娅说，“净是些数字呀数字。”

“怎么会枯燥呢？数字的背后反映生活。”

“每当我看到报上的数字，就不看了，多乏味。何况还老是撒谎，不说真话。”

“不，数字倒不一定总是胡说八道的。”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认真地说，“也有时说的是真情。比方说，”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把斯大林书中夹好的一页打开：“这是斯大林同志在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斯大林同志将1933年同1929年作了比较，马匹的总头数减少了，”他举起一个手指重复说，“由三千四百万头减至一千七百万头；大牲畜头数由六千八百万头减为三千八百万头，羊的总数由一亿四千七百万头减为五千万头，生猪由二千一百万头减至一千二百万头。总之，这些年来我们损失了一亿五千三百万头牲口，即一半以上。”

“怎么会有的？流行病？瘟疫？”瓦里娅以嘲弄的口吻问道。

“问题很复杂。斯大林同志对此是这样解释的：首先是由于集体化时期富农分子们自己屠宰牲畜并唆使旁人也这么干。”

“富农分子？”瓦里娅依然用讽刺的口吻问道，“富农分子总共有多少？”

“是这样的。斯大林同志就在这个报告中说，富农分子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

“就是这百分之五杀光了全国的一半牲口？这个说法您相

信吗？”

“瓦莲卡，我并没有说我相信这个说法，我是把斯大林同志的话读给你听。”

“您的斯大林说的不是真话！”瓦里娅愤慨地说，“在我们那套住房里住着科夫罗夫一家，他们在红玫瑰厂工作。他们来自农村，农村人也常到他们这儿来。我已经无数次地亲耳听他们说过，集体化是在1月份几天之内强制搞的，既没有牲口棚，也没有饲料，只是叫快、快、快！牲口都赶到了街上，他们就直接这么说的：‘你得来凑满百分比’。百分比完成了，可是牲口完蛋了……集体农庄庄员们毫不在意：他们被迫进了这些集体农庄，可牲口被夺走了——牲口已经是别人的了，那就让这些牛、羊、猪、马去死吧。而这些，您的斯大林同志没有说！欺骗，欺骗，到处是欺骗！”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向她看了看，想了想，说道：

“瓦莲卡，您应该正确理解我，我会分担您的愤恨的。但是，您同时应该考虑到我们所处的时代。表示自己的愤慨并不是没有危险的。周围有许多坏人，您要小心一些。”

“但是我和您总能开诚布公地谈的吧？”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没有立即回答，而且不是十分有把握地说：

“和我谈是可以的……但是我希望我们的谈话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那没问题。难道说，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您不相信我？”

“我相信。瓦莲卡，相信。您是一个诚实的小姑娘。”

“小姑娘，”瓦里娅无可奈何地说道，“我都已经嫁过人

了。”

“这没什么。对我来说，您还是个小丫头，瓦莲卡……我也为您担心哪！您太直率，不会提防别人。您每一步都可能遭到危险。说了一句不谨慎的话，您就可能受罪，甚至可能毁掉自己的一生。您答应我，除我之外，不同任何人谈这些问题。”

“我答应。”

“坚决吗？”

“绝对。”

“注意，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指望得到我的信任。”

“当然，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

“那我还可以对您多说点。牲畜总头数减少了二分之一，可它的产量却只是过去的十二分之一……对，对！1929年肉类产量为五百八十万吨，而1932年总共为四十五万八千吨。牛奶、肉类、羊毛、蛋类也一样。所以商店里空空如也。莫斯科也是如此！可是您看一下，省里又怎么样？我们损失了一千七百万匹马，那是我们牵引力的一半。用什么耕地呢？瓦里娅，您想想，农业减少了一亿五千三百万头牲畜之后，要损失多少肥料？而且这是有机肥料！那矿物肥料呢？在哪里？农业的危机是由此而产生的。”

瓦里娅没有作声，她在思考。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是个好人哪！可是如今大家都只有一个办法……说得多么谨慎啊……农业危机。她苦笑了。

“您怎么啦，瓦莲卡？”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问道。

“怎么啦……您刚才说了‘危机’、‘肥料’、‘产量’。所有这些，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请原谅我，都是一般的说法。可

您知道，我们这儿整村整村的人饿死，这是科夫罗夫家人告诉我的。而我也在这儿，在莫斯科布良斯克火车站亲眼看到了。”

“现在这个车站叫基辅车站了。”

“好吧，就算是基辅车站吧。有什么区别呢？那儿男男女女，小孩，活人和死人就那样横七竖八地躺着。由于饥荒，从乌克兰逃出来许多难民。可是民警不放他们进城，怕他们影响‘美丽的莫斯科’的市容，死尸都是在夜间运走的，以便给新来的饥民腾出地方，使他们能够哪怕死在屋檐之下，而不是死在马路上。这样，他们的尸体就用不着从莫斯科各处集中了，只需从车站运走……我们常常先从他们身旁经过，再乘上火车到朋友家的别墅去。其他人也是经过他们身旁去坐火车到别墅去的。大概，大家都还认为自己是道德情操高尚的人哩。”

“瓦莲卡！您和我，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着急地说。

“做些什么？奇怪的问题！我曾在哪儿读到过，革命前在饥荒时，我记不清是哪一年了……”

“九十年代初曾有饥荒，”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说道。

“那次饥荒的时候，人们慷慨解囊，组织发放救济食物，我还在哪儿看到过照片呢：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在为饥饿的儿童所设的食堂里……我还记得，我那时还小，我的姐姐尼娜和萨沙·潘克拉托夫，马克西姆·科斯京，还有一些同伴同几个小组一起为伏尔加河流域的饥民到处募捐，并不掩盖伏尔加河流域有饥荒，救济难民。”

“那时候有列宁在，”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说。

“这就对了。”瓦里娅非常赞同这个说法，“可现在呢？‘感谢斯大林同志创造的幸福生活’。感谢他让人们有权不是死在街上，而是死在火车站上。死了多少羊和猪，斯大林同志公开承认了；可是，死了多少人，他说了吗？”

“这在报告中可没有说，”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承认了。

“您瞧，”瓦里娅洋洋自得地说，“就讲了猪的情况，可是人的情况却不说。猪的产量减少可以记到富农的帐上，说是给反革命分子、富农分子宰了；可是死了人得自己承担责任，没法推到富农反革命身上了。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您是统计学家，请问，我国在集体化时期究竟死了多少人？”

“很难说……过去没有任何官方的正式材料，今后永远也不会有。死了多少人不统计的。饥荒地区简直就是同我国的其他地区隔绝的。只有一个地区有反映。据1933年3月12日《消息报》载，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三十五位领导干部同该部副人民委员科纳尔一起，未经审判就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决定枪决了。罪名是组织破坏活动，在国内制造了饥荒。”

“他总能找到替罪羊的，”瓦里娅讥讽地笑了一下，“不是富农，便是科纳尔。不过，究竟死了多少人呢？难道你们统计学家算不出来？您可是自己说的，统计学是一门科学。”

“对啊，”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深表同意，“统计学是科学，它可以非常准确地弄清楚，官方正式史料隐瞒了什么情况。”

“结果到底是什么呢？”

“您瞧，……1933年初我国人口为一亿六千五百七十万，但1934年1月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

拍了拍书说，“斯大林同志报的人口数字1933年底为一亿六千八百万。这个数字，我们统计学者没有交给斯大林同志。这个数字甚至使我们产生了恐怖情绪。我们很清楚，说1933年的人口增长二百三十万，这就意味着说的不是实话。相反，1933年全国人口减少了，由于饥饿，人口的死亡率很高，尤其是儿童的死亡率。就连在粮食状况要好得多的城市里，出生率也低于死亡率。”

门外响起了邻居加利娅的声音：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您的水壶开了。”

瓦里娅站了起来。

“我去熄火。要不要给您泡茶？”

“不，谢谢，我不想喝。老实说，我都忘了烧开水这回事了……不过，您想不想喝一杯？”

“我已经在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那儿喝过了。”

瓦里娅到厨房去了。回来以后，又坐到了圈手椅里。

“是这样的，”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说，“斯大林的一亿六千八百万是怎么得出来的呢？我来讲给您听。大家知道，在二十年代后期，新经济政策提高了生活水平，人口大致每年增长三百万。斯大林同志机械地把这个增长率照搬到三十年代初期了。他算得很简单：1926年人口的最后调查为一亿四千七百万，过了七年， 7×3 ，就得二千一百万，一亿四千七百万加二千一百万就等于一亿六千八百万。斯大林同志的统计学就是这么回事。他还断定，今后还会是这样的。今年，就在不久以前，他还说每年人口的增长相当于‘一个芬兰’。但是，实际并不是这样，大家也都默认了。1937年初又将进行人口调查了。不仅统计学者，政府也同样预计为一亿七千万

这个数字。好，我们会同意的，那就会得出下面这个数字，我再再说一遍：1926年我国人口为一亿四千七百万，正常的年增长率为三百万，那就是说，1937年的人口应该是一亿七千七百万。可我们的领导人预计至多为一亿七千万。那七百万人到哪儿去了呢？怎么不见了？瓦里娅，我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统计学家，我要告诉您，1937年的调查不会是一亿七千万。据我的推测，至多是一亿六千四百万。那就是说，直接间接损失了至少一千三百万人，这就是饿死的人。在没收富农财产过程中死去的人以及出生率下降造成的损失。”

“一千三百万！多么可怕！”瓦里娅一面沉思一面说，“俄国在世界大战时死了多少人？……”

“一百五十万……世界大战中总共死亡一千万人。”

“这是指世界各国的死亡总数？”

“对。”

“所有国家一共死亡一千万人……这已经算是世界大战了。我自己也看到过……可一个俄国在集体化时期就死了一千三百万人……世界大战时死一百五十万，集体化时死一千三百万……因为死了那一百五十万人，才把沙皇推翻了。可是死了这一千三百万还得高呼‘感谢斯大林同志给我们的幸福生活！’……不过，我还是不懂，这些人怎么会死的呢？牲口是死了，但还播种粮食，收获粮食呀，面包总是有的呀？”

“面包没有，”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阴沉地说，“就是在这个报告中，斯大林同志断定，1933年我们收获了八千九百八十万吨谷物。但这不是事实。我们只收获了六千八百四十万吨，比斯大林同志所说的要少二千一百万吨，面比集体化以前的1927至1929年则要少得多。此外，到1933年，城市人口

增加了一千二百万。这些居民是不生产粮食的，相反要供给他们粮食。也确实给了。在1927至1929年的丰收年里出口二百五十万吨，在1930至1932年的歉收年内出口差不多是一千二百万吨。我国从未这样出口过粮食。”

“已经在饿死人了，粮食还往国外运？”

“是的。要购买西方的技术就得要有外汇，工业化嘛！”

“简直是夺走农民的粮食。”瓦里娅说，“有人对我说过，是民警、军队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人抢走的。农民如果不交出粮食，就会受到审判，说他们阴谋破坏，没收他们的财产并驱逐出去。”

他们都不说话了。

“是啊！”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最后说道，“集体化以前粮食产量较高，平均每年只收购一千万吨。集体化时期粮食减产，可平均每年却要收购二千二百万至二千五百万吨。全都抢光了，人当然只好饿死……在这方面，瓦里娅，您是对的……可是没收富农财产呢？其实没收的不只是富农，而且还有中农，甚至还有荒唐地被称作‘富农的应声虫’的贫农。根据我最保守的估计，我们至少没收了一千万人的财产。我再说一遍，至少一千万。他们大部分被驱逐到北方和西伯利亚去了，其中很多人当然死了。”

“这一切都是奇闻，”瓦里娅说，“而这一切又都瞒着人民。”

“算了，”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微笑道，“您还想干什么呢！”他又把一瓶浆糊拿到手里。

“难道不作出这种牺牲国家就没法搞工业化吗？”

“我想是可以的。1922年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之后，国家

遭到了破坏，完全崩溃了。工厂完了，设备被拆得七零八落，去做打火机了。可是，只花了五年，从1922年至1927年全都恢复了，一切都从废墟上建立起来了，工业也好，农业也好，交通运输也好，并没有人员伤亡，没有大批的死亡，没有饥饿，没有驱逐，没有枪杀。所以看来工业是在没有任何人为破坏的条件下发展的。新经济政策就是这样考虑的。可是现在呢？现在很明显，情况改变了。这全都是重大的政策性问题。”他向瓦里娅看了一眼，“但是，瓦莲卡，我所说的这些数字，您可不能引用啊！”

“为什么？这些数字都是斯大林同志说过的。”

“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只是说了牲口总头数减少的情况，关于人员死亡他可什么也没有说。这么说吧，这全是我个人的估算，所以请您哪儿也别去说，把它们忘掉算了。”

“请放心，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您的估计数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我把它忘了，全忘了！我只说斯大林同志说过的关于牲口总头数减少的情况。”

“就这也不应该说！”

“为什么？这是斯大林同志亲口说过的。”

“斯大林同志可以说的我们普通人也不该说。斯大林同志说出这些数字是为了克服缺点。同样的问题从您的嘴里说出来会让人觉得您是在幸灾乐祸，何况斯大林还说了其他领域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所以，这个题目您千万不要发挥，正如我理解的那样，您会被指责有片面性的。”

“那斯大林同志说就不片面了？”

“您是指什么？”

“只说牛马，不谈人！多了三百万，少了一千三百万！真难以想象！死了，就这么算了！”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把自己那些文具用品整整齐齐地放在一起，把卷宗扎好，报纸就是从这里拿出来的。他认真而又关切地望着瓦里娅，说道：

“瓦里娅，我很后悔和您谈了这些话。我真担心，这些话对您，对我，都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是，我已经老了，我早死还是晚死无所谓。可您还年轻，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我们是生活在困难的、不好对付的、甚至是很残酷的时代。我们遇到了俄国历史上伟大的转折关头，有什么办法？我们无法为自己选择出生的年月日，我们一定要考虑到时代的因素。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应该姑息迁就，逆来顺受，满口谎言，叛变出卖；但是这也意味着，我们应该谨慎小心，会导致我们自己 and 亲人们遭灭顶之灾的话不要说。难道萨沙是个坏人？让我们直率地说，难道他不是苏维埃人？可对他干了些什么呢？不就因为他在墙报上写了篇闹着玩的东西？不就因为他参加了与某个老师的争论？会计学的老师……这张墙报加上那个老师的事。能把萨沙的一辈子都毁掉，值得吗？不，不值得……他可以不出这种墙报，可以不同会计学的老师争论，也仍不失为一个诚实正派的人。您也一样。假如您去发挥这些题目，人们照样会象毁掉萨沙一样，把您的一辈子毁掉。更有甚者，现在至少要流放三年。如今刑期不同了，惩罚的措施也不一样了。就因为这样，瓦里娅，我要求您必须谨慎从事。”

瓦里娅沉默不语。是的，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是对的。他为自己担心，也为她担心，大家都担惊受怕。既然如此，就

不要说什么道德精神之类的大话，因为害怕说真话就是不道德，反道德的。

她已不想同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争论了，但还是忍不住要说：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您不是说过吗？我们不能背叛道德精神的原则。可如果我们身边有人在饿死，我们不但不帮助他们，反而不吭声，就好象什么事也没有，这道德吗？精神高尚吗？”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摘下了夹鼻眼镜，用细软羊皮擦了擦。他的眼睛里露出心慌意乱、束手无策的神情。他一除下眼镜就和所有近视眼的人一样。瓦里娅开始可怜他了。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她说，“我并不想使您生气，假如已经使您生气了，那就看在上帝的面，请您原谅我，对不起。我觉得弄明白这一切对我自己很重要。可是，看来结论只能是这样的：不要做坏事，但好事也做不得。更准确些说，是好事可以做，但要谨慎。只有对自己没有危险的情况下才能做。”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向她看了一眼：

“不，您对我理解错了。谢天谢地，要求做好事是一个人的天性，也确实应该做好事，做好事为什么要谨慎从事呢？我说的是另一回事：不要乱说。离政治远点儿，瓦里娅，远点儿。您看见了吧，什么都倒过来了。从事过革命工作的人，领导过国家的人都在受到审判，并作为杀人犯、恐怖分子和间谍被枪毙了。离这远点儿吧，瓦里娅。您爱自己的工作和学习，就工作和学习吧。别的什么都不要管。”

16

斯大林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亚戈达和叶若夫面对面地坐在桌子两边。

和平时一样，在叶若夫面前放着一本大的记事簿。亚戈达面前没有本子，他从来什么都不作记录，而是都记在脑子里。

斯大林默默地踱着步，不时地斜眼看看亚戈达那张阴沉的脸。叶若夫在场他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呢？叶若夫如今是中央书记，主管行政机构，其中包括内务人民委员部，而且还是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党交给亚戈达的重任他应当完全了解，更何况，叶若夫还将监督这一重任的执行情况。

亚戈达已习惯于他同他两人单独交谈了。亚戈达想成为他的同谋者，但是，他不需要同谋者，他需要的是执行者。他的指示就是党的指示，这些指示应在党中央书记叶若夫在场的情况下下达。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悔悟、承认自己的罪过已有九年了，”斯大林终于开口说话了，“往自己身上泼脏水，请求宽恕。他们承担了暗杀基洛夫的道义上的责任，并为此被判了罪。他们为什么接受呢？目的何在？为了保住性命。他们决

定用这种方法来逃避真正的责任。他们是为自己着想，他们不为党着想。他们从不为党着想，始终只考虑自己，只考虑他们什么时候能报复。不！要叫他们永远、彻底地解除武装，让他们最后能真正地帮助党。”

他沉默了一下，又在办公室踱来踱去，接着又说起来：

“当前的国际形势不仅要求国内一切无产阶级力量的团结，而且要求国外的力量也团结起来。是谁在阻挠团结呢？是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吗？他们始终在阻挠，现在还在妨碍这一工作。但是社会党人的上层同法西斯主义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了。他们正在把自己的党由社会民主党变为社会法西斯党。在这种情况下，觉悟最高的工人离开社会党人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应该向我们靠拢，倒向我们这一边。是谁在挡他们的路呢？托洛茨基在挡路，托洛茨基分子和托洛茨基主义在挡路。托洛茨基主义在俄国工人运动的整个历史时期内都起了这种作用，现在还准备在国际舞台上起这种作用。托洛茨基正在建立第四国际，将敌视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力量，将敌视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造谣中伤，向我们泼脏水，使左倾的社会党、工人党党员、先进的知识分子、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解放运动疏远我们。这会对谁有利呢？这对英、法帝国主义有利，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有利。团结国际无产阶级以粉碎他们的敌对计划，与此相反，隔断国际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将促进这些计划的实现……瞧，托洛茨基是在为谁工作？他一生都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现在仍在反对我们。党的整个历史都是同托洛茨基斗争的历史，现在还将进行斗争。要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这一斗争中帮助党，要他们最终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证明他

们对党的忠诚，让他们用行动证明在党的面前彻底解除了武装。”

斯大林又开始沉默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亚戈达和叶若夫也沉默不语。

“基洛夫被刺杀对谁有利呢？对托洛茨基和同情托洛茨基的那些人有利。谁要杀害基洛夫呢？托洛茨基和同情托洛茨基的那些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这对托洛茨基有利？他之所以要这样做，这样做之所以对他有利，原因有两条：第一，向世界表明苏联国内局势不稳，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德国法西斯分子、英、法帝国主义分子打气；第二，将苏联国内的反革命活动引向恐怖手段，向反革命势力指明恐怖的手段，使恐怖手段成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唯一手段。托洛茨基以暗杀基洛夫来策动在苏联进行个人恐怖活动。因此，我们必须向全世界揭露，托洛茨基是苏联恐怖活动的组织者，是苏联一些恐怖小组的缔造者。这些组织已准备进行反对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恐怖行动。托洛茨基是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同盟者。所以要让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他们的追随者……”在这里，斯大林停顿了一下，意味深长地重复说，“让他们的追随者来揭露托洛茨基是暗杀基洛夫的组织者，是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苏维埃政权领导人的恐怖活动的组织者和鼓舞者。对他们的要求不高，只要承认是托洛茨基命令杀害基洛夫的，命令准备反对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恐怖活动就行。他命令了谁呢？命令了他们的组织，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联合组织，我们把它叫做‘联合总部’吧……名称很好听。列宁格勒有过一个‘列宁格勒总部’，可这是‘联合总部’，就是把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

联合起来并受托洛茨基领导的总部。”

叶若夫在记事簿上作笔记，斯大林向他斜视了一下便移开了视线，继续说道：

“为了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证词更有分量，更具有说服力，无疑必须使托洛茨基分子和他们一起成为受审判的人。托洛茨基分子越多越好，而且，这些托洛茨基分子越大越有名越好。我想，找到这类托洛茨基分子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在狱中和劳改营里多得很。他们坐牢已经很久，想必已经坐腻了。对托洛茨基骨干分子起诉甚至还能改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处境，让他们感到，暗杀基洛夫的不单是他们，不必单由他们对此次暗杀事件负责。他们只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是奉自己的领导人托洛茨基之命转而进行个人恐怖活动的。他们从暗杀基洛夫开始，只是执行了自己领导人的命令。让他们把一切都推到托洛茨基身上好了，让他们去诅咒托洛茨基好了。托洛茨基是我们国家最凶恶的敌人，这一点早已众所周知了。在一月份的审讯中，他们已经对暗杀基洛夫承担了道义上的责任。不过，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道义责任与直接责任之间区别何在？在道义责任与直接教唆之间区别何在？我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他又沉默了，在房间里来回地走，然后接着说：

“当然，托洛茨基骨干分子会很难对付的。那些家伙比较顽固，他们不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是在背地里也多年不悔悟，从不捶胸顿足，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况且他们已在牢里和劳改营里关了多年，监狱和劳改营正好证实，事件发生时他们都不在场。可他们是证明不了的。无论是监禁还是劳改营都不足以证明他们不在现场。况且，革命者的经验和反

革命运动的经验一样，都证明即使关在监牢里，革命者照样可以参加革命活动，或者与此相反，反革命分子也完全可以照样参加反革命活动，可以给自己的追随者发指令，可以同自己的领袖们通信联络。”

亚戈达的脸上掠过了一丝难以捉摸的疑虑神色，但斯大林觉察到了……亚戈达不高兴，亚戈达不同意，他在说，怎么能把从前沙皇的监狱同今天的相比呢？今天的监狱是连苍蝇也飞不过去的……他是在说，亚戈达了解自己这个部门，并对自己的部门负责……他是在说，可是现在这个斯大林同志却不了解，还凭老的印象过日子。

斯大林望着亚戈达，重复说了一遍，从声音里听得出，他在施加压力：

“可以通信联络的。完全可能。何况现在正在进行着这种联络。那儿的秘密工作者都是些经验丰富的人，就是那个斯米尔诺夫，那个姆拉奇科夫斯基……我总是认为，姆拉奇科夫斯基坐牢已经坐得发腻了。他是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但组织能力很强，认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军事战略家。”

叶若夫在毕恭毕敬地记着笔记。

“总而言之，”斯大林作总结了，“假如你们从监狱里和劳改营里带出几百个托洛茨基分子，那你们一定能从中找到二、三十个能够深明大义的人，知道自己反对党是没有前途的。他们会明白，托洛茨基已使他们陷入了多么深的泥坑，他们会愿意老老实实承认，希望从泥坑里跳出来的。当然，任务不会轻松，不过，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任务从来都是不轻松的。同敌人作斗争是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肃反工作人员在完成此项任务的时候应该明白，他们是在完成党的重托。”

他在亚戈达面前停了下来，缓慢而又庄严地说：“党拥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托洛茨基在从事反对苏联的狂妄的破坏活动。调查机关的任务只剩下一项了，那就是迫使‘联合总部’的成员承认自己参与了恐怖活动，特别是参与了暗杀基洛夫同志的活动。”他停顿了一下，阴沉的目光一直盯着亚戈达。“他们不会不承认的，因为这与事实相符。他们如果不承认事实，就将面临最最严重的后果。”

亚戈达和叶若夫走出了办公室。

斯大林一人留了下来。

亚戈达对于叶若夫在场所表示的不满情绪并不是偶然的。在不满情绪的后面，潜藏着某种比一般竞争对手更大的问题。亚戈达明白，他斯大林并不把他视为同谋者。他明白，他不需要同盟者，而需要执行者。他明白，他将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旁人谁也不会来替他分担。

亚戈达今天的令人注意的抗议性行为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唯一的一次。他并不掩饰他对梅德韦季和扎波罗热茨的好感与同情。送走他们的时候，他没让他们乘囚车，而是坐的供其直接使用的专车车厢。在发配之前，他把他们叫到自己跟前谈了话。

他为什么要叫他们？谈了些什么？

宽慰了他们，让他们忍耐。说是伙伴们，一切都会平安无事地过去的。事已如此，这不是由于我们的过错，是他在顽固坚持。不过，我们不会委屈你们的。他们对处境不满，认为不应该平白无故地处理他们。为了党，他们一点牺牲也不

愿付出，还对此表示反对，流露不满情绪，想让基洛夫案件搞不清真相。

他们为什么让梅德韦季的妻子去看她的丈夫而又放她回来呢？而且这种做法还故意引起大家的注意，为什么？

内务人民委员部交通局长沙宁给扎波罗热茨送去了两本俄罗斯古典歌曲的唱片，为什么要送呢？为了安慰倒了霉的朋友？扎波罗热茨没有这些唱片在那儿就过不下去了？

就连保克尔，他斯大林同志贴身的卫队长，一个不知自尊，专事献媚的胆小鬼，一个布达佩斯来的理发师，竟然也敢给扎波罗热茨送去一架收音机，也不害怕。他们在可怜，在同情哪！说是我们的万尼亚是无缘无故地倒了霉……他们的工作是不应有丝毫怜悯心的。扎波罗热茨没有唱片，没有收音机，本来也对付得过去嘛，在那儿他过得挺不错，而且梅德韦季的妻子本来也可以跟丈夫在一起住的，根本用不着来来回回地坐车！

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示威性行动，说明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什么都知道，不会让自己人受委屈的。

他当然理解他们的“人之常情”，那他们可以把这种情意含蓄地暂时克制一下，不要故意在大家的面前表现扎波罗热茨无罪嘛，不要怀疑基洛夫案件嘛！

可他们偏偏要做给他看，要他看到他们是强有力的。不管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是互相关照的。他们不是孩子，更不是幼儿。他们知道，他不是闹着玩儿的。难道他们不明白，他会把梅德韦季和扎波罗热茨怎么处置？就连政治局委员他们也没保住嘛！

他可以枪毙他们。

当时应当枪毙他们。

可是他却把他们派到领导岗位上，实际上是送进了疗养院，一个是两年，另一个是三年。这就使他们觉得他们是他的同谋者，他害怕他们，他在他们的手掌心里。这才故意显示一下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独立性和不满情绪。这是一个阴谋的萌芽，新的阴谋，“肃反工作人员们的阴谋”。

亚戈达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这部机器执行的是他的意志。暂时是如此。只是暂时的。因此，亚戈达和他的机关必须换班。亚戈达是同党内的敌人进行斗争，他的机关也是这样，但只是同那些正式参加过党的派别活动的人进行了斗争，即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萨普罗诺夫分子，可能还有右翼分子。不过，关于右翼分子还有点怀疑。但是，他们不会再继续往前走了。在眼前的这场干部队伍的革命中，他们不是帮手，实质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基本骨干都还是些老的肃反工作人员，也就是党的干部。他们认为自己是思想工作干部，他们同敌人的斗争是“思想斗争”。

他们在惩治党内敌人的时候认为自己是政治工作者，自己的工作政治工作。他们忘了，他们已经不是总政治部，而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他们应当关心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和党的领导的安全。他们正好是执行者和保护者。

假如他们能继续前进，那就更加会认为自己不是保护者，不是执行者，而是参与者了。这一点，他们已经表现出来了，越往后将表现得越明显。

但是，目前把他们换班为时尚早，让他们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案件办完吧——这，他们是做得到的，他们已经做了；这，他们也办得到，他们办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

也夫分子的案件已经很久，了解他们的骨干，能作好审讯的准备工作。

而审讯工作本身是由维辛斯基负责的，此人是能干好的。就在这段时间内，叶若夫作为中央书记分管内务人民委员部，就可以熟悉工作了。等审讯一结束，立即就撤换亚戈达，并带一批人去接管亚戈达的机关。

会出现反抗吗？值得怀疑。打击将是很突然的，而且还有一支抗衡的力量，那就是军队。抗衡虽是暂时的，但暂时也还是抗衡的力量。

军队始终是不可靠的。只要你片刻放松警惕，只要你稍稍放松一点领导，任何一支军队都是不可靠的。所有的宫廷政变都是军队干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军队的上层干的。只有十月革命没有依靠军队的上层，相反，依靠了士兵群众——他们手中有武器。

而军队上层从来都是不可靠的。如今的军队干部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干部更不可靠，其中有许多隐蔽的托洛茨基的追随者。许多人同他一起工作过，那时他曾任海军人民委员。对很多人来说，托洛茨基是他们“英雄的”过去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自己是国内战争的英雄，内心里并不承认斯大林同志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和意义，他们仇视他。

直到现在，他只要一想起施密特这个败类，这个混蛋，他心里总不是滋味。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施密特支持了反对派。在辩论之后，当他斯大林走出克里姆林宫的时候，施密特打扮得象鸚鵡那么漂亮，穿一件高加索山民穿的那种束腰无领的黑袍子，胸部背着弹夹，佩有带银饰件的腰带，那顶毛皮高帽歪戴在一边。又象是在开玩笑，又有点象是爱抚

似地向他走过来，不拘礼节地对他粗野地大骂。

那时大家都把这件事看成是一个士兵式的粗俗的玩笑，没有赋予任何政治色彩，说那是一个年老的武夫逗着乐的。施密特是1915年入党的党员。世界大战中就得过四枚英勇的十字勋章，国内战争时期又得过两枚红旗勋章。

但是斯大林全然不把此事看作一个玩笑。假如算是一个玩笑的话，那也是反映了所有这些骄傲自满的国内战争“英雄们”对他斯大林的态度。

现在施密特正指挥亚基尔的一个坦克旅。他是亚基尔和前红色哥萨克指挥员普里马科夫的朋友，而普里马科夫指挥部的常任参谋长图罗夫斯基是施密特的亲戚，他俩娶了姐妹俩，足见图哈切夫斯基最忠实的战友亚基尔在照顾着一窝什么人。

他们暂时不说话。即使承认他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那说这话时也是透过牙缝，极为勉强地说出来的。潜藏的波拿巴分子、沙皇军官、贪图功名才参加革命的图哈切夫斯基依靠的也是这批干部。

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老战友永世也不会忘却1920年他们在华沙附近的一次失败。当时他们曾企图将失败归咎于斯大林同志，甚至连列宁也曾用挖苦的话间接地支持过他们：“有谁会经过里沃夫去华沙呢？”

但是列宁总是过分相信人，把图哈切夫斯基看作一个诚实的、忠于革命的军事专家。是瓦列里安·古比雪夫使他相信了这一点，而古比雪夫则是听信了他的兄弟、图哈切夫斯基的同窗、如今的军长的话。

托洛茨基当然也支持过图哈切夫斯基，想要他紧跟着攻

到柏林。

所有这一切都是冒险举动，轻率的、危险的、对苏维埃政权的命运会产生最为有害后果的冒险行为，会从华沙冒出一个恺撒^①再世、新的波拿巴分子来的，不能让图哈切夫斯基有这种机会，所以他也就没有给他这种机会，因此也就保住了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国家。

至于图哈切夫斯基在自己的《进军维斯拉河》一书中是怎么写这方面的问题的，不去管他了。他反正是对的，历史也将证实这点。

现在图哈切夫斯基隐蔽起来了，仿佛钻进了军事科学，在写军事著作。从不参加任何反对派，看上去是在走自己的路。他谁也不指望，只指望自己本人，是一个独立的，不搞任何政治阴谋和纠纷的职业军人，需要的时候能在国内进行整顿。假如需要，图哈切夫斯基也能使革命理想免遭专政之苦，也就是使苏维埃政权免遭他斯大林的毒手。这就是他的最终目的，这就是他的主要任务。他看到自己可以扮演一个专政者的角色。

政治机关也不可靠，其中的托洛茨基分子比军事指挥人员中还要多。军队还和从前一样是一支农民军队，自集体化和没收富农财产之后，这些人不大可靠。现在即使是在工人中，也有四分之三是从前富农和富农帮手们的子女。

只解决图哈切夫斯基一个人还是不行，应当消灭军队中一切潜在的危險势力。主要的是：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

^① 古罗马皇帝，公元前49年依靠军队争夺独裁统治权，公元前44年起为终身独裁者、统帅。——译者

博列维奇。

当然，这是一些名人，是今天的名人。不过，明天谁还记得他们？十月革命实际上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领导的。他们是：托洛茨基、德边科、克雷连科、拉斯科利尼科夫、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斯米尔加、布勃诺夫、捷尔任斯基、波德沃伊斯基、斯维尔德洛夫、米柳京……现在谁还记得他们？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死了，托洛茨基在国外，他是最凶恶的敌人。斯米尔加关在狱中，其余的人也要走这条路到牢里去的。

人们也会把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和乌博列维奇忘记的，或者记得他们是间谍和叛徒。这是三个志同道合的人，跟在他们后面的还有别的人，差不多是全体指挥人员。军队可以支持得住的，在3—4年间新的指挥干部就成长起来了，战争不一定非要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不可，尤其不能要沙皇军校的毕业生。

内战时期的军长、师长、旅长是些什么人？是伏龙芝、布琼尼、伏罗希洛夫、帕尔霍缅科、拉佐、基克维泽、邵尔斯、科托夫斯基。第一位总司令是克雷连科，他是什么人？一个准尉。海军人民委员托洛茨基是什么人呢？一名新闻记者。

拿破仑的元帅们又是些什么人呢？面包铺的老板和卖肉的。

战争是很简单的，他整个国内战争时期都是在前线度过的，但在这之前从没有在军队服过役。

作战指挥人员的换班不会给军队带来任何损失的，低级的指挥官会成为高级的，高级的会成为最高级的，这一切都得归功于他，也只能归功于他，这将是他的军队。国内战争

的一切神话将随着那些被消灭了的指挥官们一起不复存在，将要创造一部新的国内战争史，其中将正确地、公正地反映他的作用。

要闪电式地对付军队，暂时应当仅限于施密特、普里马科夫和普特纳。师长普特纳是图哈切夫斯基革命前的朋友，曾一起在谢苗诺夫团的御林军中服役，1923年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表面上脱离了它，但毕竟是参加过的。把施密特、普里马科夫和普特纳三人同即将进行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审判案联系起来，让他们出来提供证词，这当然会使图哈切夫斯基警觉起来，但法律终究是法律，证词必须经得起考验……

但暂时得让他们失去警惕，要表现出关切和关注的样子。

现在军队表面上坚如磐石，由伏罗希洛夫领导，图哈切夫斯基是他的副手，正忙于军队的重新武装问题，他作为我们主要的军事理论家正在从事未来战争的预测工作，深入研究新的军事学说，形成“纵深战”的理论，以与他所说的“阵地战”相对抗。

是的，国内战争并不是阵地战，因为当时全国都是前线，差不多每天都出现许多前线，从而战争就具有运动战的性质。

但是，将国内战争的经验扩大到国家之间的战争对不对呢？每个国家都会加强自己的边境，正因为如此，世界大战就是阵地战，未来的战争也将会是阵地战。法国人在同德国的边境线上建设了马奇诺防线，这不是偶然的，这条防线约有400公里长，而且还在完善它的建设呢。

怎么，法国军事理论家会比图哈切夫斯基愚蠢？怎么，魏刚^①将军不比图哈切夫斯基懂得多？就是那个魏刚把图哈切夫斯基从华沙附近赶跑的，魏刚正在建设马奇诺防线，准备进行阵地战，可是图哈切夫斯基将它否定了，他肯定地说，战争一开始，在它的第一阶段就将插到敌人的后方去。

图哈切夫斯基要这个理论做什么？是为了便于在他需要的时刻在自己的指挥下集中部队的优势兵力进行突击，把军队推向他图哈切夫斯基所需要的方向。图哈切夫斯基在准备这样的战争，他在讲课和分析时不止一次地肯定地说，潜在的敌人是德国，这当然只是说说而已。无疑，图哈切夫斯基是仇视德国的，这是由于个人的原因，因为他被俘过，逃跑过五次，只有第五次才成功。还有就是传统历史的原因，他曾是一名沙皇的军官，上一次战争中德国人打过他们，所以他们仇视德国……而且，作为一个沙皇的旧军官，他把法国看作是德国的天然的敌人，是俄国的天然盟国。他不可能理解，也不愿意理解，德国在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使形势发生了变化。德国的主要敌人是那些迫使它服从凡尔赛和约的国家：法国和英国。

无论希特勒是怎么说的，也不管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是怎么写的，更不管他是怎么声明的，这一切都是虚张声势而已……希特勒一面威胁东方，一面使法国和英国放松警惕，德国潜在的盟国不是法国，也不是英国，而是苏联。苏联潜

^① 魏刚·马克西姆(1867—1965)——法国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918年起任最高统帅部参谋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1940年5月起任总司令。法国投降的祸首之一。——译者

在的敌人是法国和英国。法国在争取它在欧洲的影响，英国在争取它在亚洲和非洲的影响。

图哈切夫斯基正在以自己的立场把德国推向法国和英国的怀抱，客观上促成这三国集团反对苏联。图哈切夫斯基在搞乱军事形势，并据此为自己训练一支军队，使这支军队能在适当的时机用于军事政变，在政变之后再进行运动战。

我们这儿搞得成军事政变吗？毫无疑问，是可以的，只需军队听命于自己，再依靠象乌博列维奇、亚基尔、别洛夫之流忠于他的军事首脑人物，蛊惑性地利用农民阶级的不满，利用被撤换下来的那班人马的不满，蛊惑性地宣布是为了防止斯大林的专政而进行革命，政变不仅能搞成，而且能巩固政变，在政变过程中将所有忠于他的干部斩尽杀绝。图哈切夫斯基在鲜血面前是不会却步的，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和伊万诺夫叛乱都证明了这一点。

好吧，让他们靠这种希望去自我安慰吧。应当任命图哈切夫斯基为国防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人民委员，让他感觉一种信任，让他觉得斯大林同志什么也没有料到。

但是，这块顽石必须砸碎，军队必须同政治分开，同人民分开，并使得军队在很大程度上服从国家的领导。军队应该是国家的工具，革命创建军队是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国内战争中为了保住政权这是需要的，可是现在用不着这样做了，现在这样做是有害的，也是危险的，如果军队是一支政治力量，那它就会追求政治上的权力，或覬覦在为政权的斗争中担任某种角色。

军队应当分层次，授军衔，就象沙皇军队一样，世界各国军队都是授军衔的。授军衔，可以将指挥人员和普通战士

区别开来，而指挥人员本身又分成许多等级，这将使得那些追求功名利禄的军官不去考虑他在国内和党内的地位，而去考虑他自己在军队内部的地位。

最重要的是给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布柳赫尔、叶戈罗夫、图哈切夫斯基授以元帅军衔，以下就是将军。看来，给“将军”称号还为时过早，很容易联想到沙皇的将官们。“元帅”这个词是从哪儿来的？噢，来自法国革命，来自拿破仑，沙皇俄国是没有这个军衔的，元帅只有一个，没有很多元帅。代替将军这个军衔的是集团军司令员、军长、师长、旅长；再往下，就可以象沙皇军队一样了：上校、少校、上尉、陆军中尉，陆军中尉也是白卫军中有的，我们说的中尉也大致是这一类。就让叶戈罗夫同图哈切夫斯基去考虑吧，他们是很懂得军衔这一套的，早在沙皇军队里服役时就很熟悉了。

对不同级别的指挥人员应该确定不同的工资级别，给高工资，研究制订一个优惠的制度，按服役期限的长短给补贴，高额养老金，为指挥人员建造住房、俱乐部及类似的设施，这会使得军队更加远离人民，人民从来也不欢迎军官，为了突出他们，甚至还可以为指挥人员制作新制服，废除对哥萨克的任何限制，恢复哥萨克兵团的原有装束。

哥萨克对集体化特别不满，习惯于自己的那一套等级制度，可是把他们统统变成了普通的集体农庄庄员，所以应当恢复顿河哥萨克、库班哥萨克、捷列克河哥萨克及其他哥萨克的传统装束，让他们穿带颜色镶条的裤子，戴有帽圈的制帽和平顶羊皮帽，这样既可以满足他们的自尊心，从而也可使人民更加分化。应当向军队表明他热爱军队，培养军队，完全信任军队，而首先是信任指挥人员。为此，甚至可以

对政治机关进行某种改组，以便让指挥员们看起来有更大的独立性。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使军队在内务部机关进行换班时持中立态度。以后，便依靠内务部新的机构对军队干部、对图哈切夫斯基及其同伙、对那些所谓的国内战争的英雄们进行迅速而又坚决的打击，这些“英雄们”坚信他们过去的赫赫战功可以使他们不承担必须忠于党的领导的义务，如今这些“英雄”谁也不需要了。

当然，国内战争的豪迈精神是一种资本，应该用来教育青年。据说，《夏伯阳》是一部好电影，连孩子们都常扮演夏伯阳玩。

让他们去创作更多的电影来反映国内战争的英雄好了，但不要写现在还活着的人，只能写已经牺牲了的，如邵尔斯，还比如：科托夫斯基、帕尔霍缅科、拉佐、基克维泽。只能这样！描写活人的电影一部也不能有。谁知道这些活着的人今后的情况如何？绥拉菲莫维奇是一位好作家，他写的《铁流》是一部很受欢迎的小说，但主人公是真人真事，是当时的塔曼人的指挥员科夫丘赫，原沙皇军队的一个上尉，是一个各方面都值得怀疑的人物。

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利用基洛夫被杀这一事实，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案件的公开审讯，是一次很大的审讯，它一开始就应该牵出更多的人来受审，然后把所有的人都枪毙。

这次审讯一开始就要消灭所有积极的、隐蔽的和潜藏的敌人，接下去便是另外一些审讯：公开的和秘密的，为干部队伍的革命奠定基础。

啊，基洛夫，基洛夫、基洛夫！您的牺牲人民是不应该

忘记的。人民应该记住，而且应当为此进行报复，为您的牺牲进行报复。应当使它深入人心，使人民自觉地热爱基洛夫，人民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基洛夫。

需要出版一些有关基洛夫的书，有关基洛夫的电影。城市、农村、工厂、博物馆和剧院要以他的名字命名。一切都应当提醒人民想起基洛夫。他应当成为一种圣物，一种永恒的创痛，人民难以愈合的伤口。应当不时地去触及这个伤疤，它应当永远提醒人民去歼灭再歼灭敌人！

基洛夫在列宁格勒一路工作的战友全部被消灭。

列宁格勒州党委的委员、同时又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于1937——1939年被枪决的有丘多夫、科达茨基、阿列克谢耶夫、斯莫罗金、波泽恩、乌加罗夫、斯特鲁佩等。

党的列林格勒州委会、市委会、党的监察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也被枪决。

从1933到1938年五年间，列宁格勒党组织成员减少了一半。

在党的第十七先代表大会上，基洛夫领导的列宁格勒党组织的代表团成员为154人，其中包耗斯大林、安德烈耶夫、什基里亚托夫。到1939年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时，这些代表中只剩下三人：斯大林、安德烈耶夫和什里亚托夫。

17

1935年的秋天来临了，这是萨沙流放生活中的第二个秋天。

牛棚修好了，萨沙又无事可干了。河上快要结冰了，当然他在河不结冰的时候就已经是孤独的了，如今就将完全与世隔绝。秋雨绵绵，下个没完，村子里象没有人似的，连那些狗都躺了下来。萨沙翻来覆去地看那些旧的报章杂志，都快背出来了。

1935年夏，济达到女儿那里去过暑假了，但她在9月1日前没有回来，给学校派来了另一位女教师。这就是说，她永远走了，从他的生活中奇怪地消失了。这和她进入他的生活一样奇怪。直到冬天，萨沙才收到她一封信：“别了，萨沙，谢谢你给予我的一切。愿你自由和幸福。偶尔也可以想想我……”还有叶赛宁的诗句：“难道我会忘却你吗？不管我会漂泊到何方，都将告诉我远近的亲人，关于你的情况！”

信上没写回信地址，信封上的邮戳很模糊。总之，人无影无踪了。为什么？由于那日记？但是，那日记是他当时的真诚忏悔，请求宽恕，证明他担心别人会上当。她并没有表示反对，没有与人争论，没有感到委屈。他们的关系好象已

经协调了。不过，看得出已经留下了隔阂。还有瓦里娅。萨沙在想她，济达感觉到了，但没有流露出什么神情，没有吃醋。也许是因为别的什么事？她看到了人们把流放犯从安卡拉河上带走了。萨沙也可能会被带走？也许是她不愿意亲眼看到这一幕，从而自己走了，不回来了？大概这样做是对的。

给斯大林的信萨沙没有发。

当然，报上报道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消息。出现了许多新的名字，新的人民英雄：采矿工斯塔哈诺夫、火车司机克里沃诺斯、铣工古多夫、锻工布瑟金、制鞋工人斯梅塔宁、纺织女工叶夫多基娅和玛丽娅·维诺格拉多娃、集体农庄女庄员玛丽娅·杰姆琴科、玛丽娅·格纳坚科、女拖拉机手安格林娜和卡瓦尔达克——这都是些开创群众性劳动功勋的人们。莫斯科地下铁道首批工程竣工，许多新的工厂开工了。

难道说，受迫害，受恐怖威胁的人民能创造出这样的丰功伟绩？不，人民没有受迫害，人民也没有受到恐吓。人民拥护党，拥护斯大林，相信他，忠于他。斯大林也与人民不可分离。他常常会见冶金工作者，集体农庄庄员突击手，红军指挥员、军校毕业生，农庄女庄员，斯塔哈诺夫工作者，男女康拜因手，植棉专家们。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既然列宁战友们的脑袋都飞了，那么，他萨沙的脑袋又值什么？

从前，“共产党员”一词意味着思想上志同道合的人们的伟大团结；如今，这个词听起来要比“白卫军”更危险。白卫

军没有任何伪装，共产党员则有党证伪装。所以，应当象现在报上所说的那样，对他们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可是，他这个小傻瓜总认为自己是个非常关心政治的人，共青团辅导员，幻想什么时候能进入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然后到红色教授学院，始终幻想成为一个党的工作者。但是，最终他选择了工程师这个职业。国家需要专家嘛！将来，他既是一位经济工作者，同时又是一位政治家。可他算是个什么样的政治家哟？而且，什么叫政治家？政治根本不是他幼年时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是某种率直、诚实、有思想有原则，没有阴谋没有欺骗的东西，所以天真的小傻瓜才落到了这地步。假如他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既机智又灵活，他就不会在节日的墙报上不提到斯大林同志的名字了！他就不会在学习积极分子的肖像之下搞上一段对他们的讽刺短诗了。即使那位教会计学的老师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掩饰自己，他也不会去同他发生冲突的。如果把你拖到党的会议上去，那就应该检讨，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在索尔茨给他恢复名誉以后，不要去同包林和洛兹加切夫发生冲突。真正的政治家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

尤尔卡·沙罗克并没有急于去干装卸工，他在明亮暖和的车间里工作，可萨沙无论下雨下雪都要在背上背一筒油漆。尤尔卡法律系毕业了，现在在“那儿”工作，妈妈来信是这么写的，萨沙立刻明白了，“那儿”是指什么地方。尤尔卡·沙罗克实质上是个反对革命、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他现在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可萨沙却在受监禁；尤尔卡是个狡猾的机灵鬼，而他萨沙则是笨蛋。他满可以过得很好，可以象千百万人那样虔诚地只相信一种主义，但不要去介入政治；他

可以跟千百万相信共产主义但不介入政治的人一样地干自己的活。政治这不是他干得了的，政治家们都追求功名利禄，权欲熏心，并力求保住政权，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耍政治手腕，搞阴谋诡计，心狠手辣，虚伪撒谎，要背信弃义地消灭对手，最近进行的审讯就证明了这一点。

萨沙违背了自己真正的兴趣爱好，没有上大学文科，上历史系，而上了工科大学。实际上他喜欢文科，懂得历史，但是难道历史学家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吗？历史学家找到古代的文献，从而为自己带来了荣誉，但这与为高炉打基础的砌砖工相比有多少价值呢？文献是过去，高炉是未来，他向来都是这样看的，他一向相信，物质财富一般说来对人类有决定性意义，对俄国尤其重要，因为俄国要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变为先进的国家，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变为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大国，未来世界的堡垒，哪还顾得上研究历史档案？

毫无疑问，没有精神财富人类也是无法生存的，但它们应该为教育人民服务。萨沙不仅喜爱历史，也喜爱文学，既看俄文书，也看法文书，无论有多忙，总是看很多书，记诗歌很容易，在小时候就从来不哭，但是一读到令人感动的好诗，眼泪就能夺眶而出。

和他同住一个套间的邻居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常常问他：

“萨沙，您为什么不写作？”

“我为什么应该写呀？”

“写作的人都习惯于通顺流畅地、文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会写作是有知识的首要标志。从前在古典的学校里是教写

作的,尽管他们并不培养作家。您想想皇村中学吧,要是那里没有手抄本的中学杂志、文学小组、即兴作诗,甚至即兴写小说,讽刺性的冲突,也就是现在我们称之为文学活动的一切,我不相信,我们会有普希金……写作,哪怕是为了自己,也能发展观察力、创造力、想象力,使人文明起来。我觉得,您犯了一个大错误。”

萨沙常常想起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萨沙小时候,在他房间的厨房旁边常常是一坐几个小时,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常常悄悄地一会儿给萨沙这一本,一会儿给那一本书让他读,既给文艺书籍,也有历史方面的书,萨沙对历史特别感兴趣。

就在萨沙被捕的时候,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还到走廊上送他,问他要不要钱……他是个洁身自好,正正派派的好人,对自己的观点和信念宁折不弯。皇村。中学。萨沙苦笑,在这流放地,在这安卡拉河上听起来格外现实。

在安卡拉河上他不仅不写日记,甚至连笔记也不记了。他记得妈妈的地址,父亲的地址,马克的、姨妈们的地址,这就够了。他连笔记本也没有。要是明天来搜查,你去回答吧,谁是什么人。在笔记本里提到这些人是会把这些人的。毁掉的。

但求不牺牲在这绞肉机里。但求释放就好。因为对他没什么可指控的……

当然,即使什么也没有指控,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特别会议也可以向你出示新刑期的决定,你还不能对他进行上诉?!不过,要是出其不意呢?突然走运把他释放了呢?!

当然,释放人没那么简单。可以是无罪释放你,但不准

你在某二、三十个城市定居，在身份证上注明。这样，一有机会便可随时将你抓走。因此，当你将在某地安顿下来的时候，就不得不填表，不能隐瞒你曾有前科。这样，人家会不会要你又是个问题。

他可以当司机，但随便到哪个汽车场，随便到哪个车库，都有干部在那儿坐着，要检查每一个人，在那儿你也不能隐瞒前科。

这就是说，无论是机关，还是企业都不能去。应当找一个不需填表的工作，找一个不会落入他们的视野之中的工作。

那怎么办？自由职业。什么样的自由职业呢？画画吧，他不会；唱歌吧，嗓子不好；当演员吧，从没试过，何况当演员也得填表。他不应该不向费佳学拉手风琴，要不然就可以到舞场或婚礼上演奏，就可以常常换换地方了……可现在学习已经晚了，费佳马上要走了。

不过还是需要找一个自由职业，那就可以用笔名了，这是最主要的。只有用笔名，才能躲过“千里眼，顺风耳”。但笔名只有作家、诗人才用，而要当作家、诗人就得有才华，他又没有才华。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曾劝他写作。他们中学里曾组织过文学小组，同学们都在文学小组里朗诵自己写的诗和故事。萨沙从没到那儿去过。有了普希金和托尔斯泰、有了巴尔扎克和莎士比亚，朗诵那些平庸的作品太可笑了。

他倒是去参加过历史小组的活动。历史老师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斯特拉热夫是一位好老师，一位很聪明、很出色的故事员。他们在小组里是按主题活动的。萨沙选的是法

国大革命史。他入迷了。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表扬了他写的文章，有一次还把他请到自己的家里去，同他就萨沙的文章《圣茹斯特政治和心理人物画像的经验》进行长时间交谈。他说，如果萨沙要认真研究这一时期的问题，将来他会帮助他发表某些文章。至于在哪儿发表，萨沙已经不记得了，不是在哪个历史杂志上，就是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上。

但是萨沙后来没有搞历史，他上了交通学院，然而对历史的兴趣未减。手边能搞到的书还常常看，至于法国大革命问题的书，只要能买到，他还收集了一些呢。

现在可用得上了！多好啊！早在冬天的时候，他就让妈妈把这些书给他寄来了……这不，现在这些书正放在他的桌上呢！译自法文的马泰兹和饶勒斯的书，法文的勒费弗尔和卡德尔的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法国大革命的文章，卢金、塔尔列的书……

实质上，材料他是有的。当然，研究历史的文章用笔名是不登的。不过，假如把历史写得比较轻松浅近，只写些随笔或故事，如关于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丹东、马拉；写写马拉·夏洛特·科尔黛的被杀；写写关于路德维希十六世和玛丽·安托内瓦特被判处死刑；写写关于雅科宾党人同吉伦特党人之间的斗争；关于攻占巴士底监狱；关于马赛曲的创作者鲁日·德·李尔，关于米拉波侯爵、拉斐尔特……还有共产党人乌托邦主义者巴比奥尔的悲剧命运。多少人物，多少事件，多少革命浪漫主义啊……

萨沙没有忘记阿尔塔耶夫描写胡斯^①战争小说《在草鞋

^① 胡斯——十五世纪捷克民族解放反罗马天主教运动的领袖。
——译者

的旗帜下》。他在童年读这本书时就象读阿尔塔耶夫的另外一些小说一样地津津有味，如林肯的《解放宣言》、《艰难的死》、《在宗教裁判所的压迫下》……这些都是描写人民运动、人民革命时代的儿童历史故事。

他是偶然得到这些书的，而当他长大成人，认真阅读时，他才明白，阿尔塔耶夫的这些小说是很肤浅、幼稚、感伤的，但对孩子们来说情节却引人入胜，因为历史人物的事迹总是非常使人感兴趣。但是，主要的是，他知道了阿尔塔耶夫原来是女作家玛加丽塔·弗拉基米罗夫娜·亚姆希科娃的笔名，她就这样一辈子都是用的笔名，不断地为孩子们把历史情节改写为引人入胜的书。

也许，他也会成功的。别的怎么样，他不敢说，而历史他是知道的，他可以看历史文献嘛，这正是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教过他的。

他已经没有别的出路了。

第一个故事萨沙写的是圣茹斯特，他写得好不好，他不知道，但是他写了，即使重新被捕，再次搜查时这些纸张都被搜出来，他可以说：“我是为儿童少年写一些特写和故事”，他们当然会讥笑的，认为居然发现了一位“作家”，但这不构成犯罪，每个人都有权写故事，这些故事不是反苏维埃的，相反，写的是革命故事，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高度评价过的革命事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就曾称它为伟大的革命。

主要的是要多写一些。

现在基本的开支是煤油。萨沙常常写到深夜，清晨便起身，扑向桌子。他的希望、他的自由就在这些创作的书页之中。他写啊，写啊，写啊，反复改写每一页，每一章，然后

整个故事都重写，最后一稿他誊抄两份(复写纸他没有)：一份给自己，另一份给妈妈，不去管他会出什么事，只要故事能保存下来就行。萨沙赶着写，为的是赶上入冬第一个邮班就能把它们寄给妈妈，但是，当他为妈妈重抄一份的时候，又觉得有些地方不大满意，只好再改，好象是改个没完似的。

头几个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故事直到1936年冬萨沙才寄给妈妈。

“空闲时间有的是，所以我就要要笔杆子了，不过你不要给任何人看。”

可是萨沙目前还象过去一样地忧郁和孤独，利季娅·格里戈里耶夫娜那里也去腻了，总是争论不休。

萨沙只是常到费佳那儿去。

在他那个窄小的铺子里有一种特殊的舒适感，铺子里散发出的一种特别的化学制品杂货和食品杂货的味儿也很使人感到舒畅，这大概是因为这种味儿与令人腻烦的农村里的味儿不一样的缘故。柜台是一块劈成两半的宽圆木，从天花板上悬下一杆秤，象一根扁担。靠墙放着一排货架，货架上摆的有烟草、火柴、砖茶、钮扣、线；小铜锅里是霰弹铅粒、铅块；洋铁罐里是子弹帽儿、火药；蓝色的纸里面是小砂糖块。铺子里还有农民喜欢的呢子缎料，花布块，鼯皮洋缎块，墙上的钉子上挂有项练、廉价的戒指、耳环、小链条……

每一根针，每一个戒指都值钱，什么都得随时照看好，得对一切负责，人们什么都会问的，而且什么都得卖，只要

还没有腐烂变质、发臭，还没有失去价值，什么都能销售。要是突然来了个什么检查官，你还得招待他吃，侍候他喝，给他喝一口酒精，还得给他带点儿上路……这儿成为一个舒适的地方，也归功于费佳的勤奋，他象店主一样地在经营。萨沙自己没有站过柜台，但小时候喜欢斯摩稜斯克市场的拥挤热闹劲儿。二十年代初莫斯科闹饥荒，他就同妈妈一起到外公家去过夏天，那是切尔尼科夫州的一个小城市，在那里萨沙也喜欢到那五光十色、生气勃勃的乌克兰市场里挤来挤去，在这劲头十足的瞎跑乱串之中倒也自得其乐。

费佳总是亲热地接待萨沙，与人交往的时间他有的是。不会再为他进货了，新来的售货员将搭第一班雪橇来莫兹戈瓦，费佳已派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去上训练班了，1936年1月1日起开始学习，二年后他就要当区消费合作总社的主任，要是上级看中的话，就会留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消费合作总社。

“现在专区取消了，知道吗？改为州或者边疆区了，州是俄罗斯人居住的地方，边疆区是除俄罗斯族以外还有其他民族居住的地区，如通古斯人——现在叫埃文基人，哈卡斯人；多尔甘人；聂聂茨人等等，所以叫边疆区，这下以后说什么都顺当了。我在这儿有什么前途？没有提拔的机会！当售货员是上不了区消费合作总社的，上面会派受过教育的人来。再说，在莫兹戈瓦你能看到什么人？什么人也看不到！去跟谁做买卖？没人可作买卖！我在这儿怎么办？干坐？打瞌睡？……松鼠跑了，打猎也就没有指望了，但是谁也没有钱。父母亲很快就要死了，玛丽娅出嫁了……拉里斯卡呢？我要拉里斯卡干什么？离婚吗？我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去挑

个城里姑娘，不要乡下姑娘，有点文化，这样在众人面前更体面些。”

费佳为自己描绘了一幅光辉的前景图，虽然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流放犯，他也毫无愧色，也不知道，流放之后，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命运。费佳坚信世界是公正的，他认为，一些人加官晋爵，一些人降级贬职，另一些人依然故我，这是很正常的，每个人都应该对命中注定的一切感到满意，要是人人都想当头儿，那不乱了套了？只有头头脑脑们亲自给每个人确定位置，才谈得上秩序。

费佳身上还有一点使萨沙大吃一惊。萨沙从前常与农村共青团积极分子们见面，这可完全是一些不同的人，他们谁也不考虑功名利禄，不考虑个人的利害关系，他们都忠实于公共的事业，党的利益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主要的，而且是唯一的。而费佳却只想自己的利益，他真诚地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个想法是哪儿来的呢？不发达、文化低？或者这是某种新型的积极分子的特征？这些特征萨沙过去在洛兹加切夫和沙罗克身上就已经发现了，那时他觉得这是少数人，原来这样的人还不少？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类型的人。

但费佳是萨沙能与之交往的唯一的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萨沙就怎么接受他了。

他们常常坐在小仓库里喝酒。有时费佳拿起手风琴，自己低声地伴奏，唱起来：

在那美丽的地方，
在那小河旁，
有一座美丽的小屋，

住着渔妇和渔郎。

夫妻在那小河边，
每日打渔又撒网。
三个小子都漂亮，
美得简直没法讲。

大小子爱上了村姑娘，
二小子找了个党员做对象，
三小子偏偏爱上了
那猎人年轻的婆娘。

费佳在这个地方停下来，向萨沙使了一个眼色，做了个神秘莫测的鬼脸……

猎人打算捉松鼠，
去到森林跑一趟，
偶然遇见了女茨冈，
她既会算卜又看相。

女茨冈把牌儿一撒开，
战战兢兢地开了腔：
你的老婆不忠实，
方块王牌这儿放。
方块六告诉你，
那就是她葬身的地方。

猎人心里着了慌，
急忙付钱给那女茨冈。
自己飞身跃上马，
快马加鞭往回闯。

飞马来到小屋旁，
举目朝着台阶望，
妻子躺在人怀里，
甜甜蜜蜜地吻渔郎。

他摘下挎在背上的枪，
瞄准了渔郎放，
渔郎应声倒在地，
鲜血在流淌。

每当门铃一响，费佳就到小铺去看看。一般时间不长，因为他不愿同顾客多话，宁可同萨沙一起坐坐。如果他在那里耽搁了，那就是说，来的是农庄主席伊万·帕尔菲奥诺维奇。但伊万·帕尔菲奥诺维奇通常都是急匆匆的。他是一个闷闷不乐、忧心忡忡的庄稼汉，平常不大注意萨沙，但也从未对他使过坏。萨沙对他来说并不存在。对他来说，只存在一个集体农庄。应当恢复已破坏的农业，可是耕地已经长满了小树，必须连根拔掉，可又没有干活的人，农民都跑到城市去了……总得给农庄庄员支付劳动日的工钱呀，但又付不出什么。萨沙眼看他那些无效劳动，挺可怜他。当然，萨沙是不会忘记那一回事的，所以在同他接触时总是持戒备态度。可

费佳对伊万·帕尔菲奥诺维奇的评论是很不错的：

“这是一个讲道理的庄稼汉，”费佳说，“还给你活儿干呢。”

最后费佳说，晚上他要同萨沙乘小船靠照明去叉鱼。

“水草沉在水底，河水清彻透明，鱼还游得不深。今天夜里会很静，很暗的。碰运气的话，还不是满天星星。午饭后，你睡上一会儿，这样夜里在船上不打瞌睡。等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就到这儿来，帮忙把船搞好。你要戴顶有硬帽沿的帽子。”

萨沙没有睡觉。他白天从不睡觉，天还没黑时就回到了费佳那儿。他们把一个火盆搬上了船，还有一些劈成一段段短木头的干松树桩，这种木头树脂很多；带了一根装在杆子上的八齿鱼叉。杆子长1.5到2米，头上系了一根长长的结实的细绳子，绳子末端带了一个漂子。费佳解释说，这是以防万一用的。如果叉住一条又大又重的鱼，比如一条鲶鱼，而且受了伤，那么当鱼想挣脱的时候，鱼叉就可能脱手。

“如果这么猛烈使劲一拉，”费佳说，“你就可能站不稳，从船里翻出去。可能捉到一条三普特重的鳊鱼呢！你试试要握紧！”

费佳把火盆在船头上摆稳当，加上了干松树段，点上了火，黑暗的水中映出点点红色的火光倒影。

“你在船尾坐一会儿，”费佳说，“我先叉，然后让你来。桨要轻轻地划，别把鱼给吓跑了。就这样沿着岸边划，不要离开。只要我一叉，你就把船停住……”

萨沙沿着河岸向前轻轻地划着桨。干柴烧旺了，亮光照到水中。费佳拿着鱼叉站在船的前右舷，仔细看着亮点，它和船一起静静地前进。后来，他用力把鱼叉往水中一叉，水被搅浑了。萨沙停住桨，把船桨贴在船舷上，这样船就不会转弯，不会被水流冲走。费佳使劲握住了鱼叉，显然，有一条大鱼被叉住了，他把鱼拖了上来，扔到船底，果然是一条大鱈鱼。

萨沙又继续轻轻地向前划去，他们来到了游牧人的驻扎地。费佳叉鱼是百发百中的，船舱底已堆满了各种各样的鱼：鱼背上粘糊糊的大肚子江鳕、狗鱼、鱈鱼，都是大的。可是费佳许诺要叉的三普特重的鱼一条也没有捉到，茴鱼费佳只打大的，小的看不上眼。

“停住！”费佳终于说话了。

他把鱼叉交给了萨沙，往火里添加了干柴，坐到了船尾，使船保持平衡。

萨沙拿起了鱼叉，站到了费佳的位置上，茴鱼使他非常激动，他想控制自己——发抖的手是捉不到鱼的。

小船无声无息缓慢地前进着，亮光射到水上，萨沙清清楚楚地看到水底下的东西：黄沙、石块、倒下的水草、贝壳、树叶……但没有鱼。萨沙用左手把帽子向下拉拉遮住前额，费佳是对的，没有硬帽檐是不行的。突然反射光照到了一条鱈鱼长长的身子，鱼没有游动，好象不知所措的样子，还没有弄明白碰到了什么，只是轻轻地动了动鱼翅。萨沙竭尽全力，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要是我又到这条鱈鱼，我就把信发出去。”于是他马上使劲叉了下去，鱼叉上的齿随着碎裂声刺进了鱈鱼的背，水混了，萨沙手中的杆子抖动了一下，他

用劲往下一压，把鱼捺到了水底。

“行了，把鱼叉出水吧！”费佳低声说道。

萨沙费劲地从水中提出鱼叉，叉齿上大鱈鱼仍在颤抖，萨沙把它抛到了舱底，那里已堆满了鱼。他把鱼叉拔了出来。

“你会学会捉鱼的，”费佳说。

萨沙不相信什么预兆，也不是刚才在船里用鱼叉来占卦的事加强了决心。一天天地将结薄冰了，明天的邮班将是最后一班了，如果他的信明天不发出，那就要等到冬天的道路了；如果发出，那末这封信很快就能到达莫斯科。于是转瞬之间，转瞬之间就放到了斯大林的办公桌上。

萨沙工工整整地把信重抄了一遍，封好了信封。“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同志收”，然后贴上了邮票。第二天，邮船到了，邮递员看到信封上写的是“挂号”，就预先警告说：“收据要冬天才有！”（收据是在克日马开的。）说过之后，把信往邮袋里一扔，就坐下划桨了。

萨沙的信就这样沿着安卡拉河顺流而下，到莫斯科、到克里姆林宫、到斯大林同志那儿去了。

18

1935年12月冬季的第一个邮班到了。同一天利季娅·格里戈里耶夫娜·兹维亚古罗被遣送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从克日马派来了一驾矮而宽的无座雪橇，萨沙把她两只用绳子捆好的旧箱子放了上去，又回来抱那个用一条厚实的灰色头巾裹住的塔拉西克。

“他头戴一顶三角尖帽，身着一套灰色军装，”萨沙开玩笑地说。

塔拉西克低声说起什么来了……

“你怎么了，塔拉西克？”

“死人是不会从棺材里站起来的。爸和妈死的时候我亲眼看见的。也不能乘船。你老是瞎说。”

他带有责备意味地看了萨沙一眼。

拉里斯卡站在台阶上嚎啕大哭。

“别哭了，拉里莎，”利季娅·格里戈里耶夫娜庄重地说，“您会吓着塔拉斯的。”

拉里斯卡不出声了，只是啜泣着，鼻子呼哧呼哧地抽气，用头巾角擦去泪水。

利季娅·格里戈里耶夫娜向萨沙伸过手去。

“再见，萨沙，谢谢您为我做了不少事。”

“我为您做了什么呀？”萨沙笑起来了。

“做了的。谢谢。”

“也许，您到新地方以后能来封信吧？”

她揶揄地笑了一下，那难看的脸上露出的讪笑看上去仿佛是在扮鬼脸。

“未必能写。戏才开场。”

赶车的抖了一下缰绳。滑木嘎吱嘎吱地响了起来，雪橇出发了。驾车的先在橇旁走着，随后坐到橇边的栏杆上，重又抖了一下缰绳，马顺着细小的辗平的车辙小步跑起来了。萨沙目送他们离去，雪橇渐渐远了，最后消失在树林之中。利季娅·格里戈里耶夫娜一次也没有转过身来，塔拉西克也没回头看一眼。

现在只有萨沙一个人留在莫兹戈瓦了。

晚些时候，8月里，在审判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时，被审的不仅有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那样从去年起就在押的人，还有象伊万·尼基季奇·斯米尔诺夫和姆拉奇科夫斯基那些已被监禁了多年的人，这时萨沙认为，利季娅·格里戈里耶夫娜被送往莫斯科正是与这一审判案有关。但是在法院的调查报告却一直都没有提到她的名字，因此她和她的塔拉西克的情况究竟如何，萨沙一直也无从打听到。

他送走了利季娅·格里戈里耶夫娜之后，回到家里，坐下来整理邮件，这些还是夏天和秋天从莫斯科寄出的信和报纸，数量很多。

妈妈来信说，记分册和汽车驾驶证已找到了，她将保存

好等萨沙回来。萨沙要的书已寄出。这封信很使他高兴，萨沙认为他请母亲找那些证件会使她感到安慰，他的想法是对的。瓦里娅在信中告诉他，她已进了建筑学院的夜大学。

尽管写的都是些日常生活琐事，内容泛泛，但在妈妈的信和瓦里娅的附言中仍有一种使人感到鼓舞的东西——生活在继续向前，他的证件完好无缺，他们在等着他，从记分册上可以看出，他实际上已大学毕业，他将来还可以干个汽车驾驶员什么的工作……当然，这只是一些证件，如果他不被释放，证件对他来说一无用处。可毕竟是某种正式的、实质性的文件，是通向未来的某些线索。其实即使在劳改营可能也用得着，有了证明别人就不会派他去砍伐木材，而将按他的专业分派工作了。给斯大林写的信没有回音——二、三月份之前萨沙也不指望会有回信。

他的胡子又留长了——在这儿刮胡子给谁看？干什么要刮？虽然天气严寒，一月份在这儿还冷得够呛，但他常去滑雪，试着去打猎，虽一无所获。不管怎么说，总是一种活动。

有一天，完全出乎意料，迎面朝他驶来一些头戴红军盔形帽的滑雪者，萨沙从滑雪板上下来，给他们让道：他只一个人，而他们有五个。

他们也停下了。

“你好，老大爷！”

大约是由于他留了大胡子，所以他们喊他老大爷。

“你们好，”萨沙饶有兴味地仔细打量这些红军战士。萨沙在这儿从未见过红军战士。小伙子们健康、年轻、双颊红润，眉毛和睫毛上都挂满了霜，身穿高领毛线衫、棉裤、有毛皮领的棉袄、脚穿从鞋底起就镶有皮革和毡子的毡靴，戴

着毛皮手套，有帽垫的防寒盔形帽。每人一副短而轻便的狭长雪橇。

“这里是什么村子？”第一个红军战士问道。

“莫兹戈瓦。”

“那么的确是莫兹戈瓦。到克日马有多少公里？”

“12公里。”

“对的，”滑雪者证实说，“应该是这样。”

“你们从哪儿来？”萨沙问。

“从下安加尔斯克来。你听说过没有？从贝加尔湖到巴伦支海远程滑雪比赛。”

“没听说过。”

“应当看报纸，老大爷，你识字吗？”

“识字，”萨沙微微一笑。

“识字，那就看一下报纸。”

“我一定看一下。你们雪橇上是什么东西？”

“睡袋，行军用具。全程是四千公里哩。”

萨沙摇了摇头说：

“好远啊。”

滑雪者们支着杆子站在那儿休息。

“你们滑了很久了吗？”

“有一个月了，贝加尔山脉可给我们出了个难题。你知道贝加尔山脉吗？”

“知道。”

一个滑雪者啞了一下嘴。

“真是难于登天的事啊！山坡陡峭，荆棘丛生，难以通行。狂风怒吼，天气你是看到的，又这么的酷寒。我们登山时雪

橇得用手拿着。可越过山去一看，一片原始森林，根本没有滑雪道，我们硬是在没有人迹地方走，开辟出一条滑雪道来……”

“真够你们受的，”萨沙表示同情地说。

“问题不在这儿！主要的是耽误了进度，我们要迟到了。有人在克日马等我们，已经等了五天了，我们的基地在那里。”

“从克日马再上哪儿？”

“从克日马嘛，”滑雪者看来已很久没同旁人谈话了，因此很乐意地回答说，“再从克日马到石泉通古斯卡……”

他站直了身子。

“好了，老大爷，只顾跟你讲话了……”

他转身对同伴们说：

“我们走吧，怎么样？”

“走吧。”

“让我们猛冲12公里，到那里可以先去澡堂洗个蒸汽浴，休息一下，再好好睡上一觉。”

他举起杆子，指了指自己的队伍说：

“老大爷，你记住吧！历史性的时刻。你亲眼看见了伟大的北方马拉松赛跑。你知道，马拉松是怎么回事吗？”

“我知道，”萨沙又微笑了一下。

“你，老大爷，看来是个有文化的人。是打猎的吗？”

“是打猎的。可我怎么记住你们呢，你们叫什么名字？”

队长用手套指指自己的胸口说：

“我叫叶夫根尼·叶戈罗夫，”他指着自己的同志们说：“伊万·波波夫、安德烈·库利科夫、康斯坦丁·布拉日尼科夫、亚历山大·舍甫琴柯，你记住没有？”

“我一定记住。一定。”

“那好吧。你给你的儿女们，给你的孙儿孙女们都讲讲：你说，你看到过伟大的北方马拉松赛的英雄们。那么再见了，老大爷！”

于是他们迈着有经验的滑雪者训练有素的步伐，从容不迫、很有把握地前进，朝着克日马滑去。萨沙怀着羡慕和惆怅的心情目送他们远去：一群年轻、健康、快活的小伙子，自由的人，从贝加尔湖到巴伦支海。在他的青年时代一般不大赞成热衷于创纪录的做法，因为运动不是为了争冠军，而是为了群众，为了锻炼他们的体魄。可是不管怎么说，只要人们能考验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潜力，自己的意志和性格，总是好的。而且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流放，什么是不自由，这该有多幸福。

已经是夏天了，他在五月份的报纸上读到一条消息：五名勇敢的滑雪者经过151天的远程滑雪，于1936年4月30日18时到达终点摩尔曼斯克。

而同滑雪者们见过面之后，萨沙一直在等待他给斯大林写的那封信的回信。

然而二月、三月、四月都过去了，仍然杳无音信。

依旧是严寒天气，树林里仍然白雪皑皑，但雪地上已可见到兔子和狐狸的踪迹，鸟儿更频繁地从树上飞来飞去，太阳也显得愈来愈热了。向南的斜坡上有些地方雪已融化，一、两个星期之后，在太阳暴晒的地方已无积雪，山涧小溪欢腾起来了，被冰封住的泉水也苏醒了。天寒地冻，暴风雪，连绵不断的时节已为几乎象夏天般温暖的日子所代替，眼看冰雪即将被太阳全部融化，露出了发黄的草地、枯萎的落

叶。

安加拉河上的冰终于开始流动了……砸碎了的冰块在小岛之间狭窄的通道内，在急转弯处，在坡度不大的深水段里停滞不动，堆积成巨大的冰坝，但一、二天之后，它被高过河床的积水的重量所摧毁，巨大的冰堆急速地向下冲去，发出瀑布般的轰鸣声。巨大的冰块撞击并毁坏着河岸，将它们割裂成一座座小岛，高大的树木连根掘起，连同峭壁上掉下来的大块石头一起被冲走。

浮冰全都融化，安加拉河水又沿着堤岸流淌了，蒙着烟色霜花的落叶松开始绽蕾长叶。清晨，松鸡开始啼唱，喧闹地飞到地面上，求雌的鸣声响彻四方。

过去萨沙最爱春天，春天使他兴奋，世界充满了快乐和希望。但在这里，在安加拉河畔，春天却意味着孤独、愁悒，有一种阴郁的预感。一直到六月，那唯一能使他同世界联系起来来的邮班又中断了。

冬天 he 可以到树林里去滑雪，而春天则无事可作。报纸、书籍、信件已经读了又读，又没人可以说话。连那个费佳也走了。

在温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萨沙常到安加拉河河岸上去。男人们在那些底朝上的小船上涂树脂，女人们则整理鱼网，将一张张鱼网挂在木桩上。萨沙往往坐到从水里抛上岸的一棵树上，一坐就是几小时，望着河流，望着远方的河岸，岸那边是陆地，是故乡。

那个长着鹰钩鼻子的农民斯捷潘·季莫费耶维奇走到他身旁，过去他曾同萨沙一起建造过牛棚。

“干吗坐着，小伙子？”

“没事干，只好坐着。”

“去吧，跟我们一起来往船上涂树脂吧……”

岸上有两条运货的大帆船。

萨沙站起身来，帮忙把两条船翻过来侧着放好。然后擦干船身、填塞好缝隙，再涂上滚热的树脂，放在太阳下晒干，等春汛到来，一切就绪后，交给伊万·帕尔菲奥诺维奇下水。整修这些船只也是按区里的命令办的，用来从岛上运喂牲畜的干草到陆地上去。

伊万·帕尔菲奥诺维奇将萨沙挣的劳动日记在他房东名下，夏天萨沙在岛上割草得的劳动日也记在房东名下。这样，房东便免费供给萨沙食宿。

但是干活也救不了他，忧郁越来越经常地向萨沙袭来。到1月29日他的刑期只剩下半年多一点儿了，刑满后会给他延长期限吗？会送他去劳改营吗？他的信到不了斯大林手上，当时对此抱有希望是愚蠢的，早就归档或是扔到字纸篓儿里去了……这一辈子算完了！即使让他在这儿永久流放，那他又能干什么呢？象卢克什卡所说的那样，在安加拉河畔安家落户，娶一个不识字的，一天到晚咀嚼树脂的姑娘？这里的人常咀嚼一种从落叶松的树墩中取出来的树脂，据说可以保护牙齿，预防坏血病。萨沙也曾试着咀嚼过这种树脂，想借此少抽点烟，但不习惯，树脂嚼成了一种甜得腻人的黏糊糊的东西，粘连在牙齿上。这儿的一切都使他生气，他对一切都感到讨厌腻烦。索洛韦伊奇克从这里逃跑，做对了。要是他能活下来，那就是说，他现在自由了；要是被抓住，那就是说，在坐牢。那又怎么样呢？其他没有逃跑的人，反正也和坐牢一样。索洛韦伊奇克毕竟还有得到自由的某种可能哩。

19

沙罗克是被召到莫尔恰诺夫那里参加会议的唯一的侦缉人员。桌旁坐着各局、处的负责人和他们的助手，大约有三十人左右，也许有四十人。沙罗克没有仔细算总数，只注意到参加会议的只有他一个人的军衔是一道杠的，其余的人都是两道杠，三道杠的，有的人还有几颗当政委才有的星星。

莫尔恰诺夫是个中等偏高身材的男子，体格健壮，栗色头发长着一张朴实而令人感到愉快的脸，虽然外表冷漠，却不乏幽默感，特别喜欢同季亚科夫开玩笑，笑他过于认真、吹毛求疵。

“嘿，胡扯，胡扯！”他经常一面听取季亚科夫的报告，一面揶揄地笑着说。“让我们言归正传吧！”

但是今天莫尔恰诺夫的态度很严肃。会上气氛紧张，一片寂静。他用平稳的声音一字一句地通报说，揭露了一个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阴谋集团。由托洛茨基从国外亲自筹划，在国内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巴卡耶夫、叶夫多基莫夫等季诺维也夫分子以及著名的托洛茨基分子斯米尔诺夫和姆拉奇科夫斯基领导。斯米尔诺夫和姆拉奇科夫斯基虽然早已关在狱中，但他们仍在活动。

接着莫尔恰诺夫说，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们都参加了“联合总部”，这个总部在全国建立了一些恐怖小组，旨在谋杀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并夺取政权。他们已经杀害了基洛夫。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一月份受审时承认对基洛夫的凶杀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只不过是耍了个花招，为的是逃避刑事责任，掩护“联合总部”，掩护他们的恐怖组织、恐怖小组，以赢得时间。

莫尔恰诺夫停顿了一下并意味深长地补充说：

“政治局和斯大林同志认为这些指控已被证实。对此已没有任何怀疑，而且也不可能有怀疑。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使被告人供认。请注意，斯大林同志和党中央书记叶若夫同志亲自监督这次侦讯。明白吗？！”

他又停顿了一下，然后坚决地说：

“责成我们办的是一件责任极其重大的工作。布置下来的任务我们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为了报答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同志本人对我们的高度信任，我们应当证明，肃反工作人员无限忠于党，忠于党的最高利益。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都默不作声。

“好，”莫尔恰诺夫说，“那么请你们听着……按照亚戈达同志的命令你们大家把自己手头的案件移交给别的侦讯员，前来听从我的指挥。”

在结束时他宣布了各侦讯小组人员名单，沙罗克听到其中一个小组里有他的名字。

在莫尔恰诺夫召开的会议上谁也没有提什么问题，尽管

沙罗克很清楚，每个人都产生了一些问题。

内务人民委员部拥有巨大的间谍机构，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情报网，每一个原来的反对派分子，无论他在何处，都在他们的密切监视之下，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却不知道有如此庞大的组织在搞阴谋活动，不知道存在为数众多的，象莫尔恰诺夫所说的，散布在全苏境内的恐怖小组，这可能吗？这样的事可能发生吗？内务人民委员部怎么没察觉有这样的组织呢？尤其是，照莫尔恰诺夫的说法，这一组织已存在若干年了。而他们，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们，却疏忽了。那就应当对他们所有的人进行惩处呀，可是却一句话也没责备他们。要知道，在武特科夫斯基供职的部门，由他领导的那个处，正是分管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右翼分子的，可是他们却从未听说过有什么阴谋，有什么恐怖小组的事。

在莫尔恰诺夫召集的会议上沙罗克不时看看武特科夫斯基，只见他也同大家一样沉默不语，正襟危坐，毫无表情，但是沙罗克感觉到，武特科夫斯基同其他人一样对莫尔恰诺夫的话感到震惊，也许，比其他人更甚，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涉及到他的处，这些人是这个处分管的，而他和他的同事们都疏忽了。

其实他们什么都没疏忽，这沙罗克明白，而且大家都明白这点。事实上并不存在任何恐怖小组，不存在任何庞大组织的阴谋活动，而且也不可能存在。莫尔恰诺夫提到的所有的人都关在监狱里，有的是不久前，基洛夫被杀害后才坐牢的，有的在监狱里已很久了。为了处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和姆拉奇科夫斯基以及其他过去反对过斯大林的

人需要制造这个阴谋。

因此侦讯任务，包括他沙罗克的任务在内，在于迫使受侦讯者招认所需要的供词。但他们是不会招认的。不管怎么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些大头头们……真是，见他妈的鬼，把他们枪毙算了。他们自己搞死了多少人，而且还是些犹太人。托洛茨基分子如斯米尔诺夫、姆拉奇科夫斯基、皮达可夫、穆拉洛夫等虽然大多数并不是犹太人，但这些人固执、顽强，从他们那儿是逼不出口供来的。

现在这个案件是列宁格勒案件的继续。1934年12月1日打上了一个主要的结子，需要很久才能把它解开，那儿头绪繁多，盘根错节。将以什么告终呢？对扎波罗热茨来说，基洛夫案件最后的结果将是什么呢？

那个时候就应当到分管搞宣传宗教和教会思想的人的那个部门去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连这也未必能脱身，其他各处的人都吸收来参加侦讯小组了，其中也包括第五处——要投入很大的力量，很多的人力。

按武特科夫斯基对本处工作人员的解释，计划如下：从各地监狱、劳改营和流放地押送几百个原来的反对派分子到莫斯科来。他们中间只要有十分之一承认存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组织的话，就将有二十至三十份供词，有这样的压力，何愁主要被告人不被摧毁。但要做到这点首先需要“雷管”。预定三人担任这一角色。瓦连京·奥利别尔格、伊萨克·赖因霍尔德和理查德·皮克尔。

沙罗克不认识奥利别尔格：他过去住在柏林，后来到土耳其、捷克，来苏联之后在高尔基市的师范学院工作。

莫尔恰诺夫和武特科夫斯基马上看出奥利别尔格对于审

判有重要的意义：他不久前刚从国外回来，同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认识，让他招认，他是由谢多夫按托洛茨基的指示派遣到苏联来组织谋杀斯大林的。况且在高尔基师范学院里还流传着“列宁遗言”，因此就是这些大学生组织了准备杀害斯大林的恐怖小组。

奥利别尔格是个“容易对付”的侦讯对象，但是没有分给沙罗克，这项工作交给了一个由外事局的工作人员组成的小组。

理查德·皮克尔，前季诺维也夫秘书处主任也没分给沙罗克。皮克尔曾短时间参加过反对派，尽管很快就同他们决裂了，但已记录在案。沙罗克看了他的专案卷宗。他曾参加过国内战争。二十年代后半期脱离政界，从事文学活动，在剧院里工作。案卷中还有他的个人鉴定：是一个温和的、容易接近的人，朴烈费兰斯牌打得很好。顺便说一句，有些事也未列入案卷，而是留在情报员的报告中了：皮克尔过去常常同著名的肃反工作人员——加伊和沙宁玩牌。加伊是特别局局长，沙宁则是交通局局长。皮克尔常到他们的别墅去，当然他出国也少不了他们的帮助。沙罗克明白，也不会把皮克尔分给他的，那些同他要好的人将把他留给自己。结果确实如此：皮克尔由加伊手下的人来审讯。

分到沙罗克所在的侦讯小组的是伊萨克·赖因霍尔德，他是这三个人中最困难的一个。

赖因霍尔德过去曾一度参加过反对派，虽然很快就离开了，但是象皮克尔一样，已被记录在案：是个著名的经济工作者，前棉纺织工业总局局长。去年1月他的副手法伊维洛维奇因杀害基洛夫一案被逮捕。赖因霍尔德也立即被撤职并开

除出党。1935年1月11日《真理报》上这样写道：“赖因霍尔德在八年中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可耻败类法伊维洛维奇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而且交往频繁。”

那时就有了长远打算。赖因霍尔德是索科利尼科夫的亲戚，而且在他的别墅中同加米涅夫见过面。显然，正因为如此才决定试用他来充当“雷管”的；原反对派分子，索科利尼科夫的亲戚，是被告加米涅夫的熟人，由于同杀害基洛夫的凶手之一——法伊维洛维奇的关系而被开除出党并被捕。根据那些材料分析，此人坚强，有意志力，好发号施令。不会轻易突破的。

处长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武特科夫斯基也同意沙罗克的这一预测。武特科夫斯基是个小心谨慎、镇静自若的波兰人，沙罗克认为，他在国家安全管理委员会里，也可能在全人民委员部里是最聪明的人之一。

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武特科夫斯基合上案卷，将臂肘放在桌上，用拳头托住下巴，用那双灵活而聪明的眼睛看了看沙罗克。

“无论是法律上，还是事实上都……”

沙罗克习惯于理解武特科夫斯基话里的弦外之音，而且只要他一开口，就明白他想说什么。“不论是法律上，还是事实上都……”的意思是：看来从赖因霍尔德身上搞不出有用的供词的，他也决不会好好跟他们谈话。

“是的，看来是这样。”沙罗克恭敬地表示同意。

“那好吧，”武特科夫斯基结束了这一简短的谈话，“你作他的保护天使吧。”

指示很明确：如果赖因霍尔德不招供的话，那就不让沙

罗克去“搞垮”他，而让别人去“搞垮”他，沙罗克应当博得赖因霍尔德的好感，取得他的信任，如果其他人无法将他“搞垮”的话，沙罗克应当继续扮演这样的角色。

沙罗克对此感到满意。“搞垮”人是件肮脏的差事啊！让其他人去干吧。

沙罗克的预测和武特科夫斯基的预言被证实了。

押解人员把一个身材高大、四十岁左右的人带进了他的办公室，此人有一张精力充沛而漂亮的脸，穿着一套宽松的时髦西服，尽管在牢房里已揉皱了，但仍是一个派头十足的典型的莫斯科知识分子，阿尔巴特街上住了不少这样的人，在沙罗克住的那幢楼里这种人也相当多。沙罗克憎恨他们，这些人的脸上明显地有一种知识分子的自高自大，党员的妄自尊大的神情。这样的混蛋应当掐死，对他们不该姑息。

沙罗克按早已经仔细研究制定的第一次审讯方式来对付赖因霍尔德：先用灯照他一下，将灯放下，冷淡地命令他坐下，然后全神贯注地看文件，仿佛在研究赖因霍尔德的案件——这是一种久经考验的“稳当的”方式，可以让本人仔细斟酌采用哪种方法审讯。一般有二种方法，沙罗克暗自开玩笑地称之为演绎法和归纳法。第一种，一开始就向被侦讯人宣布分量最重的罪状，然后再转向各个细节；第二种，归纳法则相反，最先问细节：姓甚名谁，跟人们碰头的情况，碰头的日期，不正确之处，准确详细的说明，供词中不一致的地方，先问一大堆某些仿佛无关紧要的，次要的情况，搞乱了因而难以理解的情况，然后才提出最主要的罪状；如果对方不承认主要的罪状，那也可以从他的个别、局部的口供中引出这一指控

来。沙罗克采用了第二种方法，假如立即向赖因霍尔德提出参予恐怖活动的罪状，一般说来他会不作回答的。

沙罗克看完文件之后，将它们搁在一边，拿过审讯表，心平气和地提出表格上的那些问题。

赖因霍尔德同样平静地，自信地回答，他凝视着沙罗克——是的，他也在准备搏斗，他的眼神中既无焦急不安，亦无巴结之意，他在研究对手，他的声音坚定，悦耳，是一个习惯于发命令，作演说，读讲稿的人的声音。

这种过于自信的声音很惹沙罗克生气。他本来可以一句话不说就毫不费力地迫使这个娇生惯养的狗崽子自己说出来的。不过为时尚早。

沙罗克在表格上所写的其他问题中提出了赖因霍尔德参加反对派的问题。赖因霍尔德回答说，那是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前党内讨论时，他赞同反对派的观点，然而不久就改变了看法，已同反对派决裂，此后同他们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了。

沙罗克仅仅记下了这样一句：“参加过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

沙罗克将笔放下说：

“请您比较详细地叙述一下您的反对派的活动。”

“这算什么活动呢？参加讨论的时候，我投票赞成反对派的提纲，后来同反对派决裂，再也没有参加过了。”

“投票赞成反对派的时候，您跟其他的反对派分子会过面的。究竟跟哪些人见过面呢？”

“沙罗克同志，”赖因霍尔德很有感染力地回答说，“这是差不多十年前的事了。我这个事情在党组织内已弄清楚了，在

那儿我已作了全面的，详尽无遗的解释。您可以了解一下，对此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

“伊萨克·伊萨耶维奇，”沙罗克皱着眉说，“如果您指望用同侦讯人员发生冲突的办法来改善自己的处境的话，那您就错了。就是为了您的利益您也应当同我们合作。”

“我的利益我自己知道，”赖因霍尔德反驳了，“而且我自己将捍卫自身的利益。您用这些诡计，”他朝审讯记录表点了一下头，“是抓不住我的。到别处去找头脑简单的人吧……总之，在没有提出公诉之前，您不会从我这儿听到一个字的。请注意，我对法律的了解不亚于您。”

他嘲讽地看着沙罗克，认为他是个职位很低的侦讯员，并不明白坐在他面前的是个什么人。

“伊萨克·伊萨耶维奇，”沙罗克尽可能使口气缓和些，“我跟您交谈是想弄清一些情况，可您却要求提出公诉。您想当被告吗？”

“假如为了愉快地交谈您本可以直接找我来嘛。可我是个被逮捕的人。由此可见，有人控告了我什么。控告了什么呢？”

对沙罗克来说一切都清楚了，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手段了。但是还应当再作一次尝试。

沙罗克叹了口气，翻阅着桌上的文件，同情地看了看赖因霍尔德。

“那好吧，伊萨克·伊萨耶维奇，请记住：我曾尝试同您用商量的办法谈妥一切，努力同您找到共同的语言的。总有一天您会理解并重视这点的。”他意味深长地看了一下赖因霍尔德。“是的，是的，您会重视的。”

他重又沉默了。

赖因霍尔德坐在他面前的姿态，显示出他对自己的力量非常自信的样子。

“您最后一次同加米涅夫见面是在什么时候？”沙罗克问。

赖因霍尔德冷笑一下。

“侦讯员同志，提出罪状吧！”

沙罗克皱起了眉，沉默了一下，他在拖延时间。不管赖因霍尔德态度如何坚决，毫无所知对任何人都是一种折磨。

然后沙罗克说：

“赖因霍尔德公民，我希望您记住我对您说过的话。而现在我来满足您的要求。那就这样吧。我们掌握了绝对可靠的情报，您同列夫·波里索维奇·加米涅夫公民见过面。”

他又停顿了一下。

赖因霍尔德沉默着。

“那么是不是这样呢？”

“这就是罪状吗？”赖因霍尔德反问。

“是的。”

“我同加米涅夫见过面，”赖因霍尔德耸了耸肩膀说，“这究竟犯什么罪呢？”

“罪名在于加米涅夫是恐怖组织的领导人之一，而且他吸收您参加了这个组织。”

赖因霍尔德在椅子上挺直身子，他第一次注意地看了看沙罗克。

“是这样，还是不是这样呢？”

赖因霍尔德继续看着沙罗克。

“是这样，还是不是这样呢？”沙罗克提高了嗓门。

“您这是当真的吗？”赖因霍尔德终于问道。

“当然。经过侦查，掌握了绝对可靠的，确凿的材料。”

“那好吧，”赖因霍尔德沉着地回答，“你们就以这些材料为依据审判我吧。”

“会审判的——还会枪决的。”

“请便吧。”

“您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吗？”

“爱惜的。但是在任何时候我也不会承认自己没有干过的事。关于这点没什么可说的。请您别费劲了！”

“您设想一下，如果您作为间谍和恐怖分子被枪决的话，等待您的家庭的将是什么呢？”

“别吓唬人，”赖因霍尔德冷冷一笑。“你们可以处决我，处决我的一家，然而你们决不会因为办我的案子而获得晋升的。”

沙罗克站了起来，整了整制服。

他按了一下铃。

“那好吧，真遗憾。您自己给自己选择了这样的命运。”走廊里出现了押解人员。

“带走吧！”

“请问，”赖因霍尔德指指记录，“为什么不把我的供词记录下来？”

“因为您没有招出任何口供呀，”沙罗克回答。

“但是我否认了你们对我提出的罪状。”

“我没有对您作任何正式的书面的起诉。因此，您也没有

任何正式的供词。我们的友好交谈不作记录。还有，请记住，伊萨克·伊萨耶维奇，我同您谈话的态度是友好的，而您同我谈话时却抱有敌意。”

他转身对押解人员说，

“带走吧！”

所有侦讯小组的工作由莫尔恰诺夫负责协调。过了一天，他将侦讯员召集到他那里，每个人都汇报他所负责的侦讯对象的情况，因此，沙罗克对侦讯的总的进程很清楚。

奥利别尔格立即开始按他们的需要招供了。他承认自己是按托洛茨基的指示受他儿子谢多夫的派遣带了谋害斯大林的任务来莫斯科的。准备游行时在红场上暗杀斯大林的高尔基师范学院的师生也已被逮捕并送到莫斯科来了。

皮克尔暂时还没有招认所需的供词，但是根据莫尔恰诺夫讥讽的笑容以及他简短的插话：“加伊和沙宁会处理好的，”沙罗克明白了，皮克尔的案子也会安排妥当的。而且确实，后来据沙罗克了解，特别局局长加伊和交通局局长沙宁不拘礼节地来到皮克尔的囚室内，他们直呼其名，他也称呼他们的名字，他们劝他招供反对季诺维也夫以换取性命和自由。不管法庭如何判决，他都将任命为外省一个建筑工程的负责人。否则他作为季诺维也夫过去的秘书处主任大概要完蛋的。

皮克尔最后终于同意了，但有个条件，他只招认反对季诺维也夫，其他的受侦讯的人，他或是很少了解或是根本不了解。还有，更主要的是：加伊和沙宁所许诺的事应当由亚戈达来确认一下。亚戈达接见了皮克尔，重申了加伊和沙宁

所许诺的事。

关于这件事以及许多其他的情况，沙罗克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是随着侦讯的进展逐渐在莫尔恰诺夫召开的会议上了解到的。会上，他们使所有搞到的口供相互吻合，不出现牛头不对马嘴的情况；台词只规定了一个大概的轮廓，它将随着“供词”的积累不断明确并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

而沙罗克暂时只弄清楚，奥利别尔格的事已安排妥当，皮克尔的问题也将一切就绪。只有他所侦讯的赖因霍尔德还没有进展。

会后莫尔恰诺夫把武特科夫斯基和沙罗克留下，对他们表示不满：外事局负责搞奥利别尔格已经得手，加伊负责皮克尔也定会有成绩的，而“雷管”中唯一分给他莫尔恰诺夫的秘密政工局的赖因霍尔德却没有招供。

沙罗克警觉起来了，紧张了，他在仔细考虑行动方针。如果莫尔恰诺夫对他的审讯策略表示不满的话，那就不得不说出武特科夫斯基的话了——是他指使他采取这样的策略的，他将被迫“出卖”武特科夫斯基了。但武特科夫斯基也可能突然否认，因为他并未直接向他作过这样的指示。那末沙罗克就成了不仅是一个糟糕的侦讯员，而且是个居心叵测的侦讯员了。

沙罗克的担心原来是完全多余的。武特科夫斯基替他回答说：“在这个侦讯阶段，我指的是开始阶段用高压的审讯方法对付赖因霍尔德不会有什么成效的。他是采取攻势的。我们应当用计谋。让米罗诺夫的人来搞他吧。他们负责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我们正在把赖因霍尔德往加米涅夫身上引。他们那儿如果有结果就好。如果没有结果，再回到我们

这儿来解决。”

沙罗克心想，武特科夫斯基是好样的，总之他们要是能摆脱赖因霍尔德就好了。

“嘿，”莫尔恰诺夫挖苦地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米罗诺夫那里，斯米尔诺夫和姆拉奇科夫斯基在加伊那里，交通局实际上退出比赛了。”

沙罗克知道交通局为什么退出比赛。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交通人民委员，从第一天起他就按他自己的方式来整顿秩序和纪律——不断地枪杀铁路员工，交通局连办理这些处决的手续都来不及。当然，准备审讯是首要的任务，应当集中全力来干，但是亚戈达怕跟卡冈诺维奇发生冲突。

“那还有谁留给我们搞呢？”莫尔恰诺夫问。

“留给我们的是那些最难对付的人，”武特科夫斯基表示异议，“需要从监狱和劳改营里挑选几百个托洛茨基分子，他们都是第一次也没认错的人。”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一下莫尔恰诺夫。

这一目光的含义是清楚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悔悟认错已有九年了，而且多年来已经承认越来越多的罪过，他们已从这条道上滑下去了，一定会沿着它滑到底的。他们对谋杀基洛夫已承担了道义上的责任，以后一定会承担刑事责任的，对此谁也不会怀疑，这是铁一般的逻辑。然而那些托洛茨基骨干分子是毫不妥协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变得越来越倔强，在监狱和劳改营里锻炼出来了，赤手空拳是降服不了他们的，没什么东西可以降服他们……可是他们现在应当从这样的人中间至少挑选出二、三十人来，迫使他们承认自己是恐怖分子和奸细，而他们却一本正经地自命为布尔

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他们不仅不认错，甚至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公开痛骂斯大林，指责他背叛革命。对他们你简直毫无办法，他们什么都不怕，死也不怕，是些狂人，狂热者……

“总之，”武特科夫斯基作结论了。“对付赖因霍尔德我认为没有其他的办法。”

“干吧！”莫尔恰诺夫脸色阴沉地说了一句。

20

1936年春斯大林参加了同培植亚麻、大麻的先进工作者的会见，参加了同纪念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政权建立十五周年代表团的会见，出席了工程技术人员妻子们的会议，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哈萨克艺术工作者，在克里姆林宫视察了新型小轿车“齐斯——101”，同科洛缅斯基工厂领导人谈了关于成批生产冷凝蒸汽机车的问题，主持了制订苏联新宪法草案委员会的会议。

啊，当然还出席了为庆祝五一节而举行的阅兵式和隆重的招待会。

“五一”游行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游行的人举着几千幅，也可能是几万幅他的肖像，肖像四周环绕着春天的花朵，人们一字一顿地高呼他的名字，标语牌上除了“伟大的”、“天才的”、“英明的”等修饰语之外又加上了新的修饰语：“亲爱的”、“亲密的”、“敬爱的”、“最亲爱的”、“最亲密的”、“最敬爱的”、“最仁慈的”。在坚不可摧的权力的首要条件恐惧之外又增添了第二个条件——热爱。

然而主要的还是其他一些事件：第一件是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斯大林、日丹诺夫和基洛夫关于〈苏联历史〉教科书

和〈新历史〉教科书纲要的意见》，第二件是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代表大会。

《意见》写于1934年夏，到1936年1月才公布。这些意见终于确定了党的领导所需要的对待俄罗斯和苏维埃国家历史的正确态度。

现在一切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历史是意识形态的实质，是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的手段，因为，广大人民群众不是从抽象的教条和概念中，而是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从具体的历史人物的活动中受到教益的。这样的历史就生动了，这样的意识形态就可以理解、可以接受了，它容易被记住，成为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东西。波克罗夫斯基的历史学派终于被彻底粉碎了。波克罗夫斯基被作为假学者、假历史学家揭露出来了，他的观点被作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取消主义的和反科学的观点被揭露了。现在他本人成了党的主要的历史学家。

第二个事件看来是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代表大会。他参加了大会的工作，对共青团的纲领和章程本文作了某些修改。

共青团代表大会给他留下了双重印象。当然，代表大会的气氛象往常那样是活跃的，青年化的……当然，共青团作了一定的工作，动员了成千上万的共青团员去参加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筑工程突击工地。可是毕竟还存在疑虑。

他在代表大会上待了好几天，注意地听取代表们的发言。他估量过，共青团以其目前的状态是否可以作为反对老的党的机关的突击力量来使用。他得出的结论是：不能。毫无疑问，今天的青年已不是二十年代初在很多地方跟着托洛茨基

走的那些青年了。今天的青年反对托洛茨基。对今天的青年人来说托洛茨基是敌人。对今天的青年人来说唯一的领袖就是他——斯大林同志。但是青年人是一回事，而共青团的机关却是另一回事。各地的共青团机关同党的机关完全结合在一起，就不是他的人了，他们是党的州委书记的人。列宁格勒共青团的教训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列宁格勒的共青团跟谁走了呢？跟季诺维也夫走了。那些科托雷诺夫们等等是些什么人呢？是季诺维也夫分子。

而目前共青团的领导干部是些什么人呢？科萨列夫、米尔恰科夫、戈尔舍宁呢？……全是1918年加入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那些人，1919年入党，内战的参加者，全都感到自己是老布尔什维克，全是“帮内”的人。你不能用这些人来取代党的老干部，他们本身就是些“老干部”，是沙茨金、希塔罗夫、恰普林、洛米纳泽的当之无愧的继承者。而且他们给自己挑选的也是这样的一些人：卢基扬诺夫、切莫达诺夫、萨尔塔诺夫……

共青团处于这样的状态，有这样的领导层，决不能作为更新老的党的机关的力量来使用。在撤换各地的老干部时应当将全班人马都换掉，这全班人马中也包括地方上的共青团领导人。科萨列夫会把他们交出来吗？未必会同意。这些全都是他的人，是他从1927年起逐渐挑选出来，同他观点一致的一伙人。必需更换。

但这是以后的事。

现在主要的是即将举行的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审判，对“联合总部”的审判。为了今后能迅速地、突然一次接一次地进行连续不断的打击，审判应当在这一年举行，无论

如何要在这一年。不能让他们恢复常态，不能让他们清醒过来。

斯大林命令波斯克列贝舍夫不要将任何人的电话接到他这儿来，他要自己的办公室里仔细研究亚戈达呈报的几个作为即将举行的审判中的被告人的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名单。

季诺维也夫分子的问题很清楚：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巴卡耶夫、叶夫多基莫夫——他们是主要人物，对他们只要加压到底就行了。

托洛茨基分子的问题比较复杂。索科利尼科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皮达可夫、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现在还是自由的，他们表面上奉公守法，对他们不必着忙。关在监狱和劳改营里的那些人中间最大的是斯米尔诺夫和斯米尔加，他们都很顽强。但是打开斯米尔加这把锁的钥匙暂时还没有。而斯米尔诺夫……那个前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战胜高尔察克的人，托洛茨基个人的朋友……对他的钥匙是有的，是姆拉奇科夫斯基，斯米尔诺夫最亲近的朋友，过去在西伯利亚历次战斗中的战友。

姆拉奇科夫斯基受过震伤，不止一次负伤，神经衰弱患者，癔病患者，容易动怒，缺乏自制力。他在狱中出生并长大，母亲是个革命者，父亲也是，甚至祖父也是南俄工人联盟的成员。但是虽然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长大，文化水平却不高，而且也不太坚定。他追随托洛茨基是受斯米尔诺夫影响，另外，他作为一个军人，曾指望胜利之后托洛茨基会把他作为自己的伏罗希洛夫。象所有的眼光短浅、一知半解的军人

那样，把自己想象成伟大的战略家，虚荣心很强。

1932年，他曾同姆拉奇科夫斯基交谈过，劝他和斯米尔诺夫决裂，姆拉奇科夫斯基没有听从，但是从他的眼神内他看到姆拉奇科夫斯基在动摇，时光在流逝，他对自己的默默无闻已经厌倦了……对他略有加压，他就会让步的。而如果他妥协了，那么就会拖出斯米尔诺夫来并把对斯米尔诺夫所要求的一切和盘托出。

在这份名单上戈尔茨曼也是个合适的人物。他革命前侨居国外，起初在英国，后去法国。国内战争时期在东方方面军第五集团军中工作，这个集团军当时的司令员是图哈切夫斯基，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是斯米尔诺夫。戈尔茨曼从那时起同斯米尔诺夫一直是好朋友。他曾一度参加过反对派，后脱离了关系。内战结束后在共产国际工作，然后在国外搞外交工作，从1933年起一直到日前还在外交部的领导岗位上，仍然经常出国。有什么能妨碍他在那里同托洛茨基见面呢？是个合适的人物！

德赖采尔——前托洛茨基贴身警卫队队长，然而根据亚戈达的情报，这是个可靠的见证人。

还有捷尔-瓦加尼扬，是个性情温和、待人委婉的理论家，过去某个时期曾担任过《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杂志的编辑，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对他需要注意方法。

斯大林冷笑了一下。要知道捷尔-瓦加尼扬是维辛斯基个人不共戴天的敌人。连他都感到惊奇，这样一个温和委婉的人也会有那么大的仇恨。当然，维辛斯基是个恶棍。但是难道恶棍还少吗？而捷尔-瓦加尼扬的所有仇恨都集中在维辛斯基身上。从革命前巴库时代就开始了；捷尔-瓦加尼扬

当时是布尔什维克，维辛斯基是孟什维克，然后1915年在莫斯科他们两人又会面了，各人都坚持原来的立场：捷尔-瓦加尼扬是布尔什维克，维辛斯基是孟什维克。1920年，捷尔-瓦加尼扬要求逮捕维辛斯基，正是在那时维辛斯基急忙跑到他那儿求救。这一切维辛斯基都记忆犹新。1929或1930年，当捷尔-瓦加尼扬醉心于建立大企业附设的高等技术学校的想法时，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的维辛斯基坚决反对，虽然应当说，对那个时期来说这个主意并不坏。总之，让这两个朋友”在审讯时会面吧。

而且，虽然捷尔-瓦加尼扬曾一度参加过反对派，他很多地方还多亏了他斯大林个人。第一次流放时，捷尔-瓦加尼扬从比斯克转到喀山，在那里的鞑靼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在当地的杂志上发表过文章，由于直接给他个人写了申请书，捷尔-瓦加尼扬才提前获释，回到莫斯科，还恢复了党籍。

1933年，捷尔-瓦加尼扬第二次被判罪——流放到塞米巴拉金斯克，为期五年，但一年之后，又是经他的请求，提前获释，让他回到莫斯科并恢复了党籍。

是啊，现在对这一切他必须设法偿还。他是斯米尔诺夫在第五集团军时的战友，一度参加过反对派，而党两次都宽恕了他，让他来帮助党吧，哪怕审判他的将是他个人的仇敌维辛斯基；要知道党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好恶。

斯大林在戈尔茨曼、德赖采尔、捷尔-瓦加尼扬姓名旁边打上了钩。名单上还有其他二十多人的姓名前也划了钩，意思是对这些人要特别注意。他将这些人标出来是因为认识这些人，对其中一部分人了解得多些，另一些人了解得少些，只

是认识，什么时候曾经见过。既然是一些人，就是说，象所有的人一样是软弱的，对他们施加压力，他们定会说出所需要的东西。

人是软弱的，只有在软弱的政权面前他才变得有力。资产阶级民主注定要失败，原因就在于此。最高政权更迭的原则本身决定了政权不能持久。这不合他的意。

列宁看清了历史给真正的领袖提供的夺取政权的时机。但是列宁是作为西方流派的伟大革命家预见到这一时机的，历史给他提供的却是在东方出现的机会。他看到了当时政府的软弱性，利用了这种软弱性，但是并不知道产生软弱性的原因。当时的政府软弱的原因在于：俄国人民虽能起来进行罕见的极其激烈的暴动，然而却习惯于受人支配。克伦斯基政府是个软弱的政府，对议会制共和国抱有幻想，因而势必垮台。在俄国建立议会制共和国是不可想象的，有健全的理性的农民自己要求政府管束他们。

列宁知道，专政要求大权独揽，但他不明白，独揽大权要求有统一的思想。俄国人民就大多数而言信仰同一宗教，不论是历次宗教战争，还是重大的宗教运动，西方了解的，他们都不了解。在近一千年的过程中俄国人民一直保持着政府给他们规定的宗教信仰。现在又有了新的信仰，它应当是统一的，否则人民不会相信。

沙皇政府并不容许最高政权更迭，其软弱性表现在处理事件迟钝和妄自尊大上，官僚主义使它的残酷变为软弱，惧怕世界舆论迫使其不能肆无忌惮，法律制度的虚伪给它的敌人以行动的机会，革命者感到自己坚强有力，而这样的敌人对政府是有威胁性的。在最高政权面前要使每个人都感到

自己无能为力。

在即将举行的审判中应当对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将在以后几次审判中出庭受审的人表明这一点。这次审判十分重要，它可作为以后几次审判的跳板。

这是否可以称为恐怖手段呢？

斯大林走到书橱跟前，取出一卷恩格斯的著作，翻开夹起来的那一页。这是恩格斯1870年9月4日给马克思的一封信。

“恐怖手段——这绝大部分是那些自己感到恐惧的人们，用以自我安慰而作出的毫无益处的残忍行为。”

这里所说的一切，从头至尾都不对。

恐怖手段决计不是毫无益处、毫无意义的残忍行为。是的，恐怖手段是残酷的，但它通常是有意义的，总是在追求一定的目的，而且常常不是那些吓破了胆的人所能干得了的。相反，被吓破了胆的人们不敢采取恐怖手段，不能自信不疑，而是向敌人让步。正是恐怖手段实现了法国大革命的任务，使革命引起的进程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虽然后来出现了热月政变。与之相反，不采取恐怖手段导致了巴黎公社的失败。恩格斯在巴黎公社成立前一年写下的这些话对公社起了不好的作用。

斯大林从另一只书橱中取出了一卷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又翻开了其中夹起来的一页……

“什么是恐怖手段呢？”普列汉诺夫写道，“这是以恐吓政治上的敌人并在其队伍中散布恐惧情绪为目的的一些行动方法。”

这一定义比恩格斯的要正确些，因为它肯定了恐怖手段

的正面作用，不过也还不够。这种说法将恐怖手段的对象仅局限于敌人、对手。普列汉诺夫对拉丁语terror(恐惧、恐吓)这个词的解释太肤浅了。

实际上，恐怖手段——这不仅是镇压异端的手段，首先是确立一种由于所有人一致感到恐惧而产生的统一观点的手段。只有这样才能管束人民，这也是为了他们的，即人民的利益。过去从未有过人民政权，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不可能有人民政权，只可能有统治人民的政权。大规模地秘密镇压会使人产生最大的恐惧，因此恐怖手段的主要方法应当是大规模地秘密镇压。

但是，现在重要的是应当公开地进行准备工作，重要的是让那些头目们，那些全国闻名的人承认自己的罪行。而且他们这些人越有名，就越能使人民确信进行干部队伍的革命、大规模地更换人员是正确的，更能使人民确信采取那种人们称之为恐怖手段的做法是正确的。

沙赫特案件的经验、审判“工业党”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点。“破坏分子”一词已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的标志。现在，“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这些词亦将成为这些不共戴天的敌人的标志……

这些公开审判困难不少。有消极的方面，有缺点，但其正面的效果更显著，其优点更多。从受审者的知名度方面，从他们的罪行方面，都应当增加和扩大这些公开审判的力量、意义和范围。谋杀基洛夫事件应充分加以利用，这是张只赢不输的牌，基洛夫应当成为无法偿清的牺牲品。他的被谋杀应当成为所有即将举行的审判的基础，被审者就是谋杀基洛夫的凶手，党和人民的死敌。即将进行的公开审判应当成为规

模宏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审判。其余的和以后的一切要在暗地里迅速展开。可是最重要的审判是第一次的审判：只要这次审判成功，以后的几次审判也一定会成功的。

这一环将牵出一连串的人：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好妄自尊大的党内官僚和年轻的党内官僚主义分子，那些权欲熏心、阳奉阴违的党的十七大的代表，那些在梦里都恨不得能践踏侮辱他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们、以及他们在各州、区、在各加盟共和国和人民委员部中的朋友和安插的亲信。

根据1922年的党员登记，党内有四十万人，其中革命前以及1917年入党的占百分之十一，或者是四万四千人。他对这些数字记得很清楚……过了将近十五年，他们之中许多人去世了，不少人已作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萨普罗诺夫分子、布哈林分子被开除出党。究竟还剩下多少人呢？最多不过是二万或三万人。可怜的一小撮！但是仍然自以为是局势的主宰者……二百万党员中的二万人！百分之一！没有他们党也能行。

他将掀起狂澜，扫除成千上万不可靠的人，为忠于他的，只忠于他的那些人开辟道路，他，只有他才会为他们那些人考虑。这次干部队伍的革命定将建立一支新的，真正社会主义的干部队伍，这支队伍将有保障，不会受到任何谋害。这种干部队伍的革命将不断进行，它将使全体工作人员听从指挥，使人民处于恐惧之中。

干部队伍的革命还有另一面，相当重要的一面。恐怖手段不仅使人民养成一种无条件服从的习惯，而且还培养他们对牺牲者的冷漠态度，灌输一种人的生命并不珍贵的意识，

消除他们头脑里那些资产阶级的道德、道义的概念。到那时，人民就会绝对服从，不会反抗了。集体化和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和土地极其充分地证明了这点。没收了农民的土地、牲畜、用具，农民就服从了。三十年代初的饥荒夺走了几百万人的生命，人们连去死都是驯服的。

现在最困难的事是需要征服机关的全体工作人员、征服老干部、征服布佳金之流，不过他们这些人是可以征服的，只要消灭掉就行了。审判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将为此奠定基础。任何人也想象不出面临的干部队伍的革命规模将有多大。只有他一个人在想象。但是他的时代不应当作为一个恐怖的时代载入史册。他执政的时期应当作为苏联人民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最伟大的成就的时代载入史册。他在人民的记忆中应当是一位坚定、严厉、公正而人道的执政者。是的，他对人民的敌人是无情的，但对人民是宽厚的。在尼禄^①死后，他的雕像全部被砸碎了。可他的纪念像决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

至于说到肃反机构，那么对政府机构的原则应当也适用于他们：人们应当惧怕他们，但人们还应当热爱他们。“肃反工作者”一词应当使之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在人民中间这个词应当为革命的无情，布尔什维克的毫不妥协、党的原则性、正直、无私等优秀品质的光圈所环绕，这样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等罪犯才会显得更加丑恶。不过肃反人员英勇的化身应当只同一个名字——捷尔仁斯基联系在一起。捷尔仁斯基已死，不会再有危险的。

^① 尼禄(37—68)——古罗马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皇帝(公元54年起)。据文献资料记载，为人暴虐，放荡，妄自尊大。因实行高压政策遭到罗马社会各阶层的反对。——译者

21

沙罗克觉没睡足，疲惫不堪，他每夜都要进行审讯，每天得向处长报告，隔天在莫尔恰诺夫处参加会议。被侦讯的是一些从监狱和劳改营里弄来的托洛茨基派骨干分子和民主集中派的骨干分子，他们不招供，毫不畏惧，无论是拷问、鞭打、“车轮战”、还是以枪决来威胁都不起作用。他们憎恨斯大林、憎恨国家安全机关，对任何诱饵都不上钩，对侦讯员的任何话都不相信。这些人多年来在劳改营内锻炼出了技巧，回答问题天衣无缝，你一个字也抓不住，要想让他们诬赖自己和别人，根本谈不上。他们对托洛茨基忠贞不渝，因此强迫他们供认托洛茨基是恐怖分子，杀人凶手和间谍分子是不可能的事。

由于这该死的差事，沙罗克甚至开始掉头发了。

有一天早晨，母亲凝视着他的后脑。

“儿子啊，你是怎么了，好象开始秃顶了……”

他大声吼了几句作为回答，母亲委屈地闭上了嘴，连真情实况都不能说了。要知道是亲生儿子啊，多让人心疼，简直憔悴不堪，这样很容易病倒的。

三个星期连续不断的夜间审讯使沙罗克变了，变得很厉

害。以前他对那些可以粗暴、放肆、厚颜无耻地对待的人，态度素来很粗暴、放肆和厚颜无耻的，但是过去他总是把肮脏的活儿留给别人，留给那些执行者，而自己不想弄脏手的。

他少年时代从不打架，怕对方还击，这种恐惧心理至今未能克服。过去人们当着他的面把一个人摔倒，用橡皮棍子抽打，沙罗克便俯下身去，摇晃他的头，要他招供。但是以前他从未把什么人摔倒过，没用橡皮棍子打过任何人，也没用靴子去踩过什么人。

可现在他亲自动手将人摔倒在地上，用靴子踩，用橡皮棍抽了。

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送来的利季娅·格里戈里耶夫娜·兹维亚古罗使他失去了自制力，她是个老党员，早在1927年就被开除出党，是民主集中派分子，萨普罗诺夫的追随者，这是些最疯狂的，最不妥协的狂热分子，恶棍和狗崽子！

她甚至拒绝谈话。

“我的儿子塔拉斯在哪儿？”

这个塔拉斯是个什么人呢？案卷里没有什么塔拉斯，从档案里取出来的老案卷里的“婚否，有无家眷”一栏中清楚地填写着：“无子女”。

“您没有子女。”

“您从哪儿知道的？”

“瞧，是您的案卷，1927年的审讯记录。”

“那时没有，现在有了。”

“您儿子几岁？”

“七岁。”

沙罗克惊奇地注视着她。儿子。七岁。谁会迷恋这个牙

齿突出来的丑老太婆呢？可是你看，她生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在监禁地任何一个女人，反正是个女人嘛，哪怕是个一百岁的女人！她从27年起就在监狱和劳改营里转来转去了，不过在她这种年龄还怀孕，真怪！

“您得子晚了些。”

“这是我的事。”

“当然，”沙罗克疲倦地笑了起来，“就算有……那么他在哪儿，您的儿子？”

“我正问您呢，我的儿子在哪儿？！把我从安加拉河边带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带进了管理局，塔拉西克留在下面接待室里了。我再也没见过他。有人把我带到院子里，让我坐上汽车，后来又上了火车，一直送到这里，到你们卢比扬卡这儿来了。路上我宣布绝食，现在还在绝食，我要求告诉我，我的儿子在哪儿，他的情况怎么样。”

沙罗克饶有兴趣地瞧着她。看来，他机会来了。象她这样的人通常是不为亲人的命运担忧的，他们为了政治可以将一切都置之度外。但这个老太婆的全部希望原来不仅寄托在政治上，还寄托在儿子身上。

“您绝食是徒劳无益的，”沙罗克说，“您别绝食了，您一死，您的儿子就会成孤儿的。”

他将墨水瓶、便条本朝自己身边稍稍移了一下。

“准确地说一下：孩子的姓名和父称？”

“用我的姓兹维亚古罗，儿子叫塔拉斯·格里戈里耶维奇。”

“他的证件在哪里？出生证呢？”

“他没有证明文件，没有出生证。”

齿突出来的丑老太婆呢？可是你看，她生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在监禁地任何一个女人，反正是个女人嘛，哪怕是个一百岁的女人！她从27年起就在监狱和劳改营里转来转去了，不过在她这种年龄还怀孕，真怪！

“您得子晚了些。”

“这是我的事。”

“当然，”沙罗克疲倦地笑了起来，“就算有……那么他在哪儿，您的儿子？”

“我正问您呢，我的儿子在哪儿？！把我从安加拉河边带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带进了管理局，塔拉西克留在下面接待室里了。我再也没见过他。有人把我带到院子里，让我坐上汽车，后来又上了火车，一直送到这里，到你们卢比扬卡这儿来了。路上我宣布绝食，现在还在绝食，我要求告诉我，我的儿子在哪儿，他的情况怎么样。”

沙罗克饶有兴趣地瞧着她。看来，他机会来了。象她这样的人通常是不为亲人的命运担忧的，他们为了政治可以将一切都置之度外。但这个老太婆的全部希望原来不仅寄托在政治上，还寄托在儿子身上。

“您绝食是徒劳无益的，”沙罗克说，“您别绝食了，您一死，您的儿子就会成孤儿的。”

他将墨水瓶、便条本朝自己身边稍稍移了一下。

“准确地说一下：孩子的姓名和父称？”

“用我的姓兹维亚古罗，儿子叫塔拉斯·格里戈里耶维奇。”

“他的证件在哪里？出生证呢？”

“他没有证明文件，没有出生证。”

我理解您，您依恋孩子，他也依恋您。但是我们——不论是我，还是任何其他的人，都没有权利忽视形式这一面。国内有成千上万的犯人，因此我们只能考虑他们真正的，合法的亲属的情况。请理解我们吧！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宣布谁是自己的儿子或女儿啊！那男孩子是孤儿，我想他一定是到孤儿院去了，就这么回事。”

“在你们没有告诉我他的下落之前，我继续绝食。”

“不要使自己陷到一种进退两难的地步。对您的绝食谁也不会去注意的。在集体禁闭的牢房中怎么绝食呢？您不进食，同牢房的人会喂您的，现在不是1927年。那时对绝食很重视，现在不，对您的绝食可以毫不在意的，难道您不明白这点吗？”

“随便好了，”兹维亚古罗斩钉截铁地说，“在没有告诉我儿子在哪儿的确切消息之前，我绝食并且不跟您作任何谈话。”

“那好吧，要是我打听到了，告诉您，他在某个孤儿院里，在某处某地，下面怎么样呢？”

“我要知道他在哪里，暂时这对我来说就够了。你们可以枪决我。但是，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想要并且有权利知道我儿子的情况。”

“您没有任何权利，这点我已向您解释过了。不管您给哪儿写信，您都不能写‘我的儿子’，他不是您的儿子，甚至不是养子，只不过是别人的一个孩子，因此谁也不会去注意您的控告的。”

他开始沉默了，仔细打量着利季娅·格里戈里耶夫娜。她多么可怕啊，真见鬼！但是姓倒是很响亮的——兹维亚古

罗！在党史教科书上曾出现过，虽然现在去掉了。如果能使这样的人招供，就可以弥补在赖因霍尔德身上的失败。

沙罗克向后往椅背上一仰。

“利季娅·格里戈里耶夫娜！您是位聪明人，有经验的政治家。您很清楚，您的要求是徒劳的，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我没有义务去寻找您那偶然遇上的一个孤儿。他决不会饿死，一定被人安顿到孤儿院去了。不过当然不会用兹维亚古罗这个姓，他无权这样做。安置进去时用什么姓，您永远也不会知道，送进哪个孤儿院，您也永远不知道的。这一切您都很明白，但是看来，您对这男孩的依恋之情比这种理解更为强烈。这是很有人情味的，因此我同情您：我跟您的事儿会过去的，会被忘掉，瞧，这间办公室，”他用手环指房间，指指桌子，“这些公文，我和您，可孩子会留下来的——他应该活着。因此您应当为他而活着。我明白，思想、观点——这一切都很重要，意义很重大，但是孩子更重要，意义更重大。我直言相告，我们不仅可以打听到您儿子的下落，而且一定帮助他回到您的身边来。但是您也一定得帮助我们。”

她仍然一直这样低着头坐着，目光避开，望着一旁。

沙罗克继续说：

“如果您一直保持您现在的身份，您的养子是不会需要您的，请原谅，他叫什么名字？”

她没有回答，低头坐着，她的目光仍然象刚才那样避开他。

沙罗克很注意她的沉默：她正试图弄明白，他奉送给她的是什么东西，准备反击，也许，打算同意。

“您如果继续维持现状的话，注定要进监狱、劳改营和流

放地。”沙罗克继续说，“您已经看到发生了什么事。党正在加强同反党分子、反苏维埃政权分子的斗争……”

他故意强调了“反苏”这个词——每当这样称呼他们的时候，他们总是很愤怒，表示抗议。但是兹维亚古罗依然沉默。

“党一定会将同反党分子、反苏分子的斗争进行到底的。”沙罗克说，“反对派已经失败了，人民和党抛弃了他们，反对派没有任何指望了。你们仍能构成对党和人民的威胁吗？不能！只要稍稍动一下手指，你们就完了。您回到党和人民这边来吧，帮助建设社会主义，您正是为了这个才参加革命的。”

沙罗克停顿了一下，等待兹维亚古罗的反应。但她仍然沉默不语，低头坐着，不看沙罗克，仿佛在用目光搜索监狱的地板似的。

“我知道您一定会回答说：我出生的时候您已经入党了，因此不是我能说服您的。但现在不是我在说服您，而是党在说服您，人民在说服您，也可以这么说，是您的儿子，您将他置之不顾的儿子在说服您。”

他又停顿了一下，然而兹维亚古罗这个鬼婆娘仍然一声不吭，仍然以那种姿势坐在那里……

但从另一方面看，她的沉默给了沙罗克以希望——她在听，没有反驳。

“请您帮帮忙，让托洛茨基不要在政治上再继续为害吧。他在国外开展反苏运动，分裂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的宣传机构提供材料，在国外领导派到苏联境内来从事恐怖破坏活动的小组。通过在莫斯科的‘联合总部’行动，这个‘联合总

部’一方面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的季诺维也夫分子，另一方面包括过去著名的托洛茨基分子斯米尔诺夫和姆拉奇科夫斯基。按照这个‘总部’的命令杀害了基洛夫，并准备进行反对斯大林同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恐怖行动。您对此一点也不知道吗？现在您可从我这儿知道了。那就帮助我们给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以最后的打击吧。在这方面，有许多原来的季诺维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民主集中派分子正在帮助我们。您也来出把力吧。我们不打算审判您，我们希望您能证明这个恐怖组织的存在，还发过关于恐怖活动的指示。内容、地点、方式，对谁下达的指示——这由您自己决定。这是技术性的问题，重要的是必须证实，托洛茨基从国外通过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姆拉奇科夫斯基等若干人领导了阴谋活动……我们也不打算惩处他们。我们想要给托洛茨基以最后的打击。所有正直的人都在帮助我们，您也来助一臂之力吧。您不是去作任何背叛的事。放弃错误路线，放弃无益的斗争并不羞愧，并不可耻。然而您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也就可以保住您养子的性命。很遗憾，我们的孤儿院是怎么回事，您可是知道的。”

她的沉默开始使沙罗克生气了，他提高了嗓门说：

“利季娅·格里戈里耶夫娜！我一切都给您解释了，而且解释得相当清楚。您应当作出抉择。我不坚持要求您立即答复。我不会催促您的。您考虑一下，我明天找您。”

她没有抬起头来，问道，

“塔拉斯会怎么样呢？”

“只要我一得到您肯定的答复，我一定立刻采取措施。不但如此，我们还将把他带到莫斯科来给您看一下，办理您收

养他为义子的手续，并送到莫斯科最好的一所孤儿院里去，而且假如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就把他送到您的亲属那儿去，”他翻阅了一下案卷，“您在雅罗斯拉夫尔好象有个侄子，好吧，我们把您的塔拉斯送到他那儿去好了。”

“明白了，”兹维亚古罗低声说，“要是我不同意参与这一闹剧，您就不会去了解塔拉斯的任何情况，也不为他作什么事。”

“绝对不作，”沙罗克加以肯定，“除非在例外的情况下，如果您帮助我们，我们就可以帮助您。”

他平静地，甚至仿佛是同情地看着她，但内心却得意洋洋：一个有先进思想的、革命前就蹲过监狱的人，在我们的监狱、劳改营和流放地漂泊了八年，可眼看他要使这样一个人屈服了，他找到了她的薄弱点，找到了要害，她自己说出了她的塔拉斯。

可是区特派员阿尔费罗夫关于塔拉斯的情况一点都没写，下的评语是：执拗不妥协的民主集中派骨干分子，连她抚养了一个男孩子都没有写，他知道这点，是从兹维亚古罗本人那儿知道的，但是没有写下来。他是明白的，不会不明白这一情况对于侦讯具有何种意义，可是没有提到。为什么？好吧，我们会弄清楚的。现在这位大娘可走投无路了。

“您跟其他人也作类似这样的交易吗？”

“是的。那是个别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毋需作任何交易。”

“您用孩子进行讹诈吗？”

“利季娅·格里戈里耶夫娜！”沙罗克严厉地说，“我没有时间来讨论。我给您提出了一个简单、直截了当而无严重后果

果的摆脱困境的办法，这对您、对我们同样都有利。您很清楚，我们一定会从您那儿得到所需要的供词的。对此我们有足够强有力的手段。我希望不动用它们就能解决问题。任何反对派在我们国家里都将彻底被消灭。凡是明白这点并帮助我们的人，我们一定保全他们的性命，谁要反抗，我们就消灭他。我同您这么久地交谈只是因为同情您的处境。您愿意的话，就接受我的条件，您不愿意的话，那么不论是您的生命，还是您养子的性命，我都不能担保。”

她抬起了头，看了看沙罗克。沙罗克从未见过这样仇恨的神情，他甚至有点害怕，甚至感到有点不自在了。接着，她，真不得了，她这恶棍、坏蛋，突然朝他脸上啐了口吐沫。这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沙罗克急忙闪开，吐沫落到了他的胸前。哎呀，你这下流氓，死尸！

沙罗克站了起来，用手帕将制服擦干净，走到兹维亚古罗跟前，将她的头抬起来，她挑战似地看着他，他用拳头从右边照这令人极其讨厌的脸上揍了一下，然后从左边又是一下，她的头被打得象木偶戏中彼得鲁什卡的头那样摇晃着，这个牙齿突出的丑婆娘，甚至都不象个人，象一只令人厌恶的猴子！他从右边、从左边，一下接一下地打她，不让她从椅上倒下来。而她这个坏蛋却沉默着，不出一点儿声，也不呻吟一下，败类，连眼睛都不闭，憎恨地看着他。

最后她终于从椅子上倒下去了。……沙罗克把押解人员叫来，于是他们把她拖到牢房里去了。

从那晚起，从审讯兹维亚古罗开始，沙罗克已经不再害怕抽打被侦讯的人了。他用拳头打脸，用靴子踢，用橡皮棍

子抽。而且打的时候，感到更为愤怒，但逐渐他也学会了控制自己。只要被捕的人一投降，就不再打他，回到自己的桌子旁坐下，开始抽烟，默默地坐上几分钟，休息休息；打人也不是个轻松的活。然后又重新开始审讯。沙罗克在记录口供时，一副受委屈的样子；仿佛不是他打了人，而是他挨了打，仿佛是被捕者本人有错，是他们强迫他去完成这件不愉快的工作似的。

然而招出口供的都是些无足轻重的人，甚至连二流的都不是，是些三流人物。一些要犯都未招供。沙罗克未能获得任何实在的，非常重要的结果。

这时，在莫尔恰诺夫召开的会议上弄清楚了，几个“雷管”中除奥利别尔格之外，皮克尔也已开始招认所需要的口供了，可赖因霍尔德还是不招供。他在切尔托克手中已有三个星期，对他什么办法都用过了，就是不招认。现在武特科夫斯基和沙罗克只好采用他们那个同时有一个人装扮“保护天使”的后备计划了。

赖因霍尔德又送回给沙罗克侦讯了。

切尔托克这个机关里最可怕的侦讯员，是个极其残忍的刽子手，三周来对赖因霍尔德进行“车轮战”——四十八小时不准睡觉，不准进食，严刑拷打，当着他的面签发逮捕他妻子和子女的命令，但他一无所获。

然而出现在沙罗克面前的已不是第一次审讯时坐在他面前的那个赖因霍尔德了。他身上穿的那套讲究的西装现在已肮脏不堪，已撕坏了，破破烂烂，穿在他身上就象挂在衣架

上似的——三个星期内他体重减轻了大概十五公斤左右（这点沙罗克能目测出来），长满了胡子，一双眼睛因好多天没吃没睡，遭受屈辱、毒打和拷问而激怒得发亮。不过不管怎样，赖因霍尔德看起来还跟过去一样，恶狠狠地、毫不妥协的样子。

但是沙罗克清楚地知道：这种仇恨、不妥协是对那些拷打他、折磨他的人的，首先集恨于切尔托克。“计谋”的用意就在于此——从热的到冷的，从冷的到热的，象在醒酒所里那样。武特科夫斯基和沙罗克曾坚持要使用这样的“计谋”，现在他们有责任成功地将其付诸实施了。因此他们对一切作了仔细而周密的策划，想出了一个厉害的办法。

沙罗克请赖因霍尔德坐下。

“伊萨克·伊萨耶维奇，当时作您的侦讯员我曾希望同您找到共同语言，但是结果没能如愿，这可并非由于我的过错，并非我的过错，伊萨克·伊萨耶维奇，是由于您的过错。您在切尔托克那儿有没有好一些呢？我不这么想。我们这儿对他很了解。”

沙罗克讲的是真话。这儿大家都知道切尔托克是个极其残忍的人，恶棍，喜欢溜须拍马。因为他同切尔托克的姓相似，人们有时甚至将他们两人弄错，沙罗克因此常大发牢骚。

“这样一来，伊萨克·伊萨耶维奇，”沙罗克继续说。“这个令人难受的任务又落到我身上了。”

他同情而又想避开地看了一下赖因霍尔德，就象在看一个注定要灭亡的人，在看一个死人一样。他就这样对赖因霍尔德看了一眼并将一份决定递给他，这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特别会议的决定，因伊·伊·赖因霍尔德参与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的阴谋活动被判处死刑，其家属流放西伯利亚。决定上盖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大圆章，证明无误。

赖因霍尔德读完了公文，将它放在桌上，问道：

“我要在上面签字吗？”

“当然。”

赖因霍尔德用目光在桌上搜索，寻找钢笔。沙罗克对他的坚强感到惊讶，也许，这是在切尔托克对他作了那一切之后使他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不想再活了？

他默默地注视着，赖因霍尔德用目光寻找钢笔，但未找到。

“我本来可以向您提一个很好的建议，但是您不听我的劝告。”

赖因霍尔德疑惑地看了看他。

沙罗克贼头贼脑地回头朝门口看了一眼——这是一种老的手法，这种做法往往表示对谈话特别信任。

“您给叶若夫同志写封信，随便您写什么，自然，坚持要求复查这个案子，但主要的是请求缓期执行判决。为此您可以找这样一些理由：由于突然被捕不知所措，在切尔托克那儿受审讯时你受尽了折磨等等，总之，您想要仔细考虑一下自己的处境，为此就需要时间。试试看吧。我答应您，过一、二天您的申请一定会放在叶若夫同志的桌上的。而且我设法让叶若夫同志下令复查这个案子。我一定命令他们把纸和墨水送到您的牢房里去，您在早晨之前一定要写好，好吗？”

赖因霍尔德沉默不语。

“那好吧，”沙罗克冷冰冰地说，“上一次您也不接受我的劝告，落得了这么个下场，”他指指那份假的内务人民委员部

特别会议的决定，“您现在还是不听。可惜，您为此将付出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

“好，”赖因霍尔德表示同意，“我写。”

第二天早上，沙罗克亲自到赖因霍尔德的牢房里去了，给中央委员会书记叶若夫的信已写好。信很长，前后不连贯。赖因霍尔德发誓他忠于中央委员会，忠于斯大林同志本人，坚持说自己是无辜的，咒骂自己曾短时间赞成过反对派的观点，当时他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党员，但他早已真心诚意地同反对派决裂了。他确实常去索科利尼科夫的别墅，有一次在那儿看见过加米涅夫，但没有同他有任何罪恶的勾结。他恳求复审他的案子，他不怕死，准备去死，但不是作为党的敌人，而是作为党的忠实的儿子去死。

沙罗克拿走了信，拿走了墨水和钢笔，答应很快就给回音。

他很满意。暗定的计划正在实施之中，即使计划告吹，在赖因霍尔德的这封信中也已包含了许多怎么也无法强迫他说出来的东西。赖因霍尔德谴责自己过去的观点，承认同索科利尼科夫有直接的密切联系以及同加米涅夫认识。而这本身就已在某些问题上打开了“缺口”。

夜间，沙罗克将赖因霍尔德叫来。

沙罗克显得非常满意、高兴，甚至兴高采烈。

“祝贺您，伊萨克·伊萨耶维奇，叶若夫同志读了您的信了。”

他注意观察赖因霍尔德的反应。然而那个人却镇静自若，不动声色，很善于掌握自己。

“是这样，”沙罗克继续说，“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将您的信

呈报给党中央书记叶若夫同志。叶若夫同志同意下命令撤销判决。”

他仍然目不转睛地看着赖因霍尔德，但是那个人却丝毫不动声色。

“叶若夫同志同意下令撤销判决，”沙罗克重复了一下，“但是有一个条件——您应当帮助我们侦查粉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用什么方式来帮助——这是技术性问题，关于这点我们会同您商量妥当的，但是您应当帮忙，这就是叶若夫同志的条件。您接受的话——判决将撤销，如果您拒绝——判决将立即执行。”

赖因霍尔德沉默不语，他在考虑，后来突然用他过去的那种坚决的语调说：

“好。我同意。但是我也有一个必须的条件：叶若夫同志或者其他政治局委员要以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对我说，我是清白无辜的，但是党的最高利益要求我招认你们所坚持要求的供词。”

沙罗克往后向椅背上一仰，装出一副十分惊讶的样子看了一下赖因霍尔德。

“您认为自己有权向党的中央委员会提条件吗？”

“我认为有。”

“那您不怕反过来提出条件，你这样做实际上，按实质来说，是拒绝执行中央委员会的要求？”

“我不怕。”

“您知道，您这是打算干什么吗？您想要让中央委员会同您来讨价还价？”

“我不想讨价还价，”赖因霍尔德执拗地反驳，“我不是从

叶若夫同志本人那儿听到叶若夫同志的要求，而是从您这儿听到的。而您不是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不是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您是侦讯员，因此您的话对我来说不是一种保证。你们可以枪决我，可以把我送还给刽子手切尔托克——请吧，但只能按我说的那样，否则不行。”

沙罗克明白，赖因霍尔德决不会让步的。一个坚强的人！不过成绩还是有的：对某些条件同意了，这是主要的，其余的也会迎刃而解的。

“我会把您的请求转告领导的，”沙罗克冷冰冰地说，“上一次您不信任我，结果到了切尔托克那儿，现在又不信任我，我不知道，将是个什么结局。但是我重复一遍：您的请求我一定转告人民委员部的领导。”

他说了这些话之后，让赖因霍尔德回牢房去，自己则去向武特科夫斯基报告了。

“那好吧，”武特科夫斯基说，“对他可以理解。不过我认为，他有莫尔恰诺夫的许诺，也会满足的，况且他们还是老熟人。”

可是赖因霍尔德并不满足于莫尔恰诺夫的许诺，尽管他们是老熟人，尽管莫尔恰诺夫对切尔托克的行为表示气愤，答应惩罚他。赖因霍尔德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坚持某个中央委员会的最高代表应当向他宣布，他赖因霍尔德是清白无辜的，而且党的最高利益确实要求他在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阴谋”的侦查中予以合作。

沙罗克确信，赖因霍尔德的要求会照办的——他对未来的审判是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一个经济部门的高级领导人，老共产党员，加米涅夫个人的熟人，这样一个人的口供同奥

利别尔格(信使——托洛茨基的信使)和皮克尔(季诺维也夫的秘书)的供词结合起来可以作为未来这场审判的有效的证人的基础。

但是沙罗克想错了。亚戈达对于去找叶若夫一事根本不愿考虑。他下令，在赖因霍尔德未同意彻底合作之前，将其按死刑犯监禁，并一步一步地取得口供，而且不能拖延，三天之后他必须投降。

亚戈达不愿意让叶若夫帮忙，因为这种帮忙将意味着他的机关不能独立胜任处理此案。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内曾有过关于叶若夫和亚戈达暗中勾心斗角，亚戈达妒忌叶若夫的谣传，但是这并不使沙罗克感到怎么高兴；城门失火，将殃及池鱼。

对赖因霍尔德一案沙罗克有什么材料呢？奥利别尔格和皮克尔关于他是阴谋活动的参加者的供词吗？能让他们当面对质吗？但是不论是奥利别尔格对赖因霍尔德，还是赖因霍尔德对奥利别尔格，他们从未见过面。赖因霍尔德会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他们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见过面，请描述一下行动的地点、见面的时间等等，这会使奥利别尔格不知所措的。至于皮克尔，那他们只不过是点头之交，而且皮克尔的表现将会如何，也不得而知。他招认了反对季诺维也夫的供词，但是让他同季诺维也夫当面对质时，却变得那样胆怯和不知所措，甚至都说不出一句话来。就这样他一句话也没说，就从当面对质的地方被带走了。现在是否会重演这样的事呢？当面对质不成，剩下来只能采取极端措施了。还有什么呢？给叶若夫的信——这是重要的，他已承认参加过反对派，认错了，发誓忠于党，在一定的条件下准备合作，当然他还是怕

死的，虽然装出不害怕的样子，也怕回到切尔托克那儿去，虽然口头上一再要人相信，他并不怕。

沙罗克反复思考这一切，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研究赖因霍尔德的那本薄薄的卷宗。他，沙罗克要把它变成一本厚厚的供词。而且这是他最后一个机会。现在他处于最落后的人之列，他没有让任何一个人屈服，也没得到任何一份口供，季亚科夫这个恶棍，故意暗暗地把那些最不可救药的，中毒最深的人扔给他。

沙罗克坐在桌旁，试图集中思想，可是他做不到。夜间是忙乱的，所有侦讯员的办公室内都在进行审讯，到处是吵闹声、受拷打人的叫喊声、靴子的踩地声、某个女人的哀号声。加之售货亭又关门了，有些侦讯人员的香烟抽完了，他们便互相讨香烟，也来向沙罗克要，他不推辞，不停地给，但当他看到那一包中总共只剩下六支香烟时，想到他自己到早晨都不够了，就把这包烟藏到桌子里，对每个来要烟的人都回答说：

“没了，没了，跟你们说，没有了！”

但这一层楼上的人都认为沙罗克吝啬，不住死乞白赖地央求，硬把门打开……沙罗克把所有的人都赶走了：

“没了，我说得很清楚，连我自己都没烟抽了。”

于是当有人又把门打开时，他头也不抬地说：

“滚你妈的……！我没有香烟！”

门没有关上。他回过头去，吓呆了：门口站着一个身材矮小的人——沙罗克立刻认出了他……这是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

沙罗克跳了起来，拉了一下制服。

“中央委员会书记同志，一级行动特派员沙罗克向您报告。请原谅我的粗鲁。我的案子很复杂，可同志们老是来要香烟。我都发完了。我总共只剩下六支了，我得工作到早晨。”

在沙罗克报告的时候，叶若夫走进了房间，跟着进来的是阿格拉诺夫、莫尔恰诺夫和武特科夫斯基。领导人进行夜间巡视是常事，但叶若夫来到沙罗克办公室还是第一次。

虽然他个子矮小，但身材很匀称，行动迅速，有一张严肃的士兵的脸和一双紫罗兰色的残酷无情的眼睛。

“您在搞哪个案子？”

“伊萨克·赖因霍尔德的。”

“这是个十分重要和有用的人，案件很重要，进展如何？”

沙罗克立刻对情势作出了估价。现在正是决定他命运，决定他在这个机关中的未来的时刻。他期待着莫尔恰诺夫或武特科夫斯基会替他报告案情处于什么状况，他可不能越过他们报告，说什么曾经向赖因霍尔德出示过对他处以极刑的假判决书，说曾建议他写信给叶若夫，而赖因霍尔德写的信按亚戈达的命令又没有交给叶若夫。

但是，莫尔恰诺夫和武特科夫斯基都没说话，隐瞒着。假如叶若夫知道了这个情况，他们会把一切都推到他沙罗克身上的。赖因霍尔德案件过去是他抓的，现在也是由他抓，将来还由他抓，他要对这一切负责。

当叶若夫跨进办公室的时候，当沙罗克无意地对他骂娘的时候，在沙罗克心中一刹那间所产生的那种感觉，即此时此刻将会决定他命运的那种感觉加深了。这个时刻过去就应该来的。

沙罗克以清晰、沉着、平稳的声音报告说：

“赖因霍尔德一案进展极为缓慢。赖因霍尔德在他的亲戚索科利尼科夫的别墅里认识了加米涅夫。我试图说服赖因霍尔德招认同加米涅夫的关系但没有结果。行动局局长助理切尔托克进行了三个星期的审讯也没有结果。又让赖因霍尔德回到我这儿。我明白这个同谋犯的意义，因此采取了极端的措施：我建议他帮助我们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阴谋，并警告他，如果他拒绝，将被枪决。为此我不得不写了一份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判处他死刑的决定并向他出示。赖因霍尔德同意了，但有个条件，要求您，中央委员会书记同志亲自向他证实，他参与揭露这一阴谋符合党的最高利益。但我不敢为此事找您，中央委员会书记同志。”

叶若夫那冷冰冰的，残酷无情的目光一直盯着沙罗克看。然后将目光一一转向阿格拉诺夫，莫尔恰诺夫和武特科夫斯基。那几个人大概为沙罗克出乎意料的坦率的报告所震惊，都沉默不语。

“请您立刻把赖因霍尔德送到我这儿来。”叶若夫命令，接着走了出去。

阿格拉诺夫、莫尔恰诺夫和武特科夫斯基跟随他也走出去了。

沙罗克一个人留在办公室里。

他坐下，喘了口气。

他在向叶若夫报告时，丝毫没有感到恐惧。在那时他没有其他的出路。他只是仔细地斟酌词句，不给任何人添麻烦。当然，如果叶若夫当时就仔细询问详情，他就得报告了，可能那时他就不得不既说出武特科夫斯基，又说出莫尔恰诺夫来，可能还得说出亚戈达。

叶若夫什么也没问，因此他谁也没提。但现在那里，在叶若夫的办公室里——他在离亚戈达办公室不远处有一个自己的办公室，不是正式的，谁也不去使用，也不进去，大家都知道，这间办公室是专为叶若夫准备的——那么就是在这个办公室里叶若夫正在详细询问莫尔恰诺夫，询问阿格拉诺夫，于是他们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当然会把一切都推到沙罗克身上的……叶若夫会怎么处理他或者叶若夫走后，亚戈达会怎么处理他，这不知道，可能会作为一个犯人打发到牢房里去。

门敞开了，亚戈达的办事员出现在门口。这意味着叫他去人民委员本人那儿去。

沙罗克站了起来。

办事员走进办公室把一件什么东西放在桌上。

“叶若夫同志给您的。”

接着马上就出去了。

桌上放着一盒未启封的格尔采戈维纳弗洛尔牌香烟。

22

那一次瓦季姆从阿尔特曼那儿回来，对一切都考虑过之后，感到胆战心惊。他列举了二十个左右过去常到阿尔巴特街他家来的人之后，不敢肯定他们除了医学之外什么也没谈过。这是很可笑的。阿尔特曼直截了当地宣称：有反革命言论。就是说，有什么话从他们家传到那儿去了……但究竟是什么话呢？他确实对此一无所知。过去，二、三年前，一些有天才的戏剧界的青年人曾在他家聚会，还有德高望重的一些演员也来过，但是从不谈论政治，甚至连笑话也没说过。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他们想从他这儿得到什么呢？

他张皇失措，非常害怕再同阿尔特曼见面。这个刽子手给他准备的是什么呢？在织网，从一件事上已开了头，又在考虑另一件事，还将突然转到第三件事上，他在捕捉什么东西，真让人蒙在鼓里……要反抗、要摆脱这件荒谬的事，他必须准确地知道，事情的实质是什么，想从他这儿得到什么，究竟想要什么。无法生活，简直无法这样毫无所知，莫名其妙地活着。

他一直不停地在想这件事，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总是心惊肉跳。应当同尤拉谈一谈。是他的同学，童年时代的

朋友么，让他讲一下，向他解释一下，他们想从他这儿得到什么。他不会请求他帮助或保护的。瓦季姆自己能自卫。他整个一生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是一个最诚实的苏维埃人，是在为真正的党的艺术进行斗争的一个可靠助手，一个对斯大林同志本人无限忠诚的人。

当然，他保证过不对任何人说任何情况，但是对尤拉是可以说的，因为他在那儿工作。而且应当在那些人第二次来找他之前马上去做。在家里虽很难碰到尤拉，但他应当无论如何想法找到他。

尤拉恰好在家，他自己接的电话，令人愉快地表示惊奇：“瓦季姆吗？从哪个星球上掉下来的？”

“是你来无影，去无踪。我总是在老地方。我给你去过电话，可你总不在。”

“工作很忙。”

“该见个面了。”

“是的，当然啰，我自己也想同你见面，有些事情可以聊聊。但是什么时候好呢？”

“我们今天就见面吧。”

尤拉笑起来了。

“马上就可以看出来，你是个自由职业者。亲爱的，我所有的晚上都不空，只剩下一个星期天。但是连这个星期天也得工作。我们下星期天再打电话联系吧。”

“尤拉，这不行。我一定要见到你。而且很急迫。”

“瞧你，一年没见面了，可是突然却这么急迫。”

“是的，尤拉，是的！我急切需要见到你。”

“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需要你替我出出主意。”

“我可以在电话里给你出主意。”

“这不是在电话里谈的事，”瓦季姆绝望地说。

他感到要失去依靠了。如果在阿尔特曼找他去之前他同尤拉见不到面的话，一切都完了。阿尔特曼随便哪天都可能来电话的。

“尤拉！是你的老同学在跟你讲话，你要明白！如果这对我不是那样重要的话，我是不会来打扰你的。你如果愿意的话，我就上你那儿去一下？”

“我马上就要走了。母亲已经去热午饭了。”

“尤拉，那就在我这儿吃午饭吧。费尼娅搞了小牛排烧蘑菇，大馅饼，还有汤，”他用一种央求的声音说道……

沙罗克沉默了一下，然后说：

“好吧，过十分钟我再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我能不能来。”

十分钟之后，他打电话来了：

“你把我说服了，我就来。但是你注意，我没时间久坐，我们吃饭也得快些。”

沙罗克很高兴见到瓦季姆，微笑着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你越来越发福了，瓦季姆，牛排，馅饼，你不注意体形。”

“没时间注意，我亲爱的。”

“当然，把所有的人都记下来，瞄准所有的人，不停地一炮轰……哦，那你出什么事了？”

他们来到吃饭间。费尼娅端进来一只盛汤的大碗，把汤倒在盘子里，放上一盘大馅饼。

瓦季姆等着她离去。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大概我白白地打扰你了。但是，你

明白，我不习惯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因此虽然我清楚地知道，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对我没有任何威胁，但叫人不愉快。”

沙罗克笑起来了。

“有人教育我们法律工作者讲话要开门见山，直截了当。”

“尤拉，”瓦季姆说，“他们把我叫到卢比扬卡去了……”

沙罗克的脸一下子就绷紧了，显得很不自在。他没有皱眉头，没有沉下脸来，而是不自然地绷紧了。嘴唇紧闭成一线，目光变得无情了。

“一个叫作阿尔特曼的人把我找去，我没弄清楚他的官衔，对官衔我不大懂，这个家伙极其可怕，是个形式主义的家伙，一个冷冰冰的，残酷无情的人，我完全愣住了，看来，作了不少蠢事。那时我只有一个愿望——尽快从那儿脱身。”

他的声音颤抖了一下，难道尤尔卡真的会不同情他吗？

但是尤拉的脸仍然象刚才那样不自然地绷紧着。他沉默不语，目光避开瓦季姆。

费尼娅张望了一下。

“牛排要端上来吗？”

“端来吧，”瓦季姆嘟哝了一下，等她把门带上，“其实在那里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他问了我所认识的外国人的情况。我说了所有我认识的人的名字，他记下来，我签了字，于是他就放我走了。然而他说，还要找我去。可是不明白为什么。他需要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呢？我同外国人没有发生任何关系，也没谈过任何话，你是了解我的……喏，至于那件事，就是维卡去法国那件事，这与我有什么相干呢？”

可这时沙罗克突然感兴趣了。

“她去法国了吗？去干吗？”

“她出了嫁，就走了。”

“她嫁给谁了？”

“嫁给一个新闻记者。”

“哦，”沙罗克嘟哝了一句，“嫁给了一个反苏分子。”

“他是个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你知道？”

“所有新闻记者都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除了共产党报纸的记者。就是对他们也不能特别信任。”

他们开始吃牛排。

“那么事情的实质是什么呢？”沙罗克问道。

“我不明白把我牵到那儿去的真正原因。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常到我爸爸这儿来的外国人吗？但他们是官方安排来的，在官方人士陪同下来的。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问我：‘您同谁进行过反革命的反苏的谈话？’什么谈话，是些什么蠢话？我不可能跟谁作这样的谈话。我是个最诚实的苏联人。”

“一次也没有说过什么反苏言论的苏联人是没有的。”尤拉不容反驳地说。

这种论断倒不错，瓦季姆想。

“可在这一点上我是例外，”他回答，“我没有过这类的谈话。去跟这个阿尔特曼解释这点使我感到很不痛快。我本来可以去找作家协会的领导人，甚至一直找到阿历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但我愚蠢地向阿尔特曼保证过，对任何人也不说这件事。”

沙罗克把身子探过桌子去，将自己的脸凑近瓦季姆的脸。

“你作了这样的保证吗？”

“是的。”

“那你为什么对我讲了？”

“可你是在那里工作的，”瓦季姆胆怯地回答，明白他又犯了个什么过错了。

沙罗克猛地将盘子从身边推开。

“你明白不，你让我处在什么样的境地了？”

“尤拉……”

“尤拉，尤拉……”他象阿尔特曼那样生气地重复着瓦季姆的话。“什么尤拉？！人家信任你，你保证沉默，你违反了自己的保证。我，你要明白，我是在那里工作……可是你知道我在干什么工作呢？！也许，是个扫院子的！”

他重又沉默了，然后阴沉地说：

“我是这个机关的工作人员，你对我泄露了我们工作上的秘密，我应当向自己的上级报告这个情况。”

瓦季姆不知所措地看着他。

“是的，是的，”沙罗克非常生气地接着说，“按照职责我应当这样作。你告诉了我，怎么能保证你不再对别人说呢？而且你还会再补充说：‘我有个熟人在那儿工作，我把一切都告诉他了，他一定会救我的。’”

“尤拉，你相信我吧……”

“我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沙罗克宣称，“我们机关的特殊性要求每个工作人员向领导报告所有涉及这一机关的情况。”

他从桌旁走出来，看了一下表。

“我该走了。”

“尤拉，难道你真会这样做吗？”

瓦季姆哀求地望着他。

沙罗克并不看瓦季姆，皱着眉问道：

“你能答应不把我们今天的谈话告诉任何人吗？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干吗问你。要知道你也答应过阿尔特曼的。”

瓦季姆将两手放在胸前。

“我向你发誓……对任何人都不说一个字，除了你之外，我没对任何人说过，你相信我吧。我拿定主意只对你一个人讲这件事。我以为……”

沙罗克打断了他：

“你想说的已经说过了，别再重复了。我作为朋友对你有一个忠告：不要把事情搞得更复杂化，无论对什么人都什么也别讲——不论是关于盘问的事，或者同我见面的事都别讲。不要再乱扯了，继续象以前那样生活，否则人家就会猜到你发生了什么情况了，有人就会强迫你说的。”

“谁猜得到，谁会来强迫呢？”瓦季姆感到惊讶。

“需要的人，”沙罗克庄严地说，“不会无缘无故地把你找去的。我们那儿不会平白无故去干什么的，我们决不会无缘无故去打搅人的，杀鸡不会用牛刀。有人把你找去，盘问你，作了记录，预先警告你不准泄露出去，这就是说，是有事情，而且是严肃的事情。这些人在你周围，难道你知道，他们实际上是些什么人？！你觉得是些不值一提的小事。不是琐碎小事！我非常明白，不论是你，还是你父亲不会有反苏言论的。但是要知道你不仅在家里同人们见面。你还跟许多人见面。瓦季姆，你的交游很广，我对这点很清楚，你仔细思量思量。”

他注意地看了一下瓦季姆并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

“说了或听了一个笑话，就是个事情。”

他穿上制服大衣，扣上钮扣。

“再见！”

可是毕竟有了一线希望。

傍晚，瓦季姆沿着阿尔巴特街朝斯摩棱斯克广场走去，从沙罗克家旁边经过时，他向院子里伸展的弓形结构瞥了一眼，那里是他家的台阶。他又怀着感激的心情想起了尤尔卡。沙罗克毕竟是好样的，毕竟是个真正的朋友。

朋友有难时他没有置之不顾，他暗示了一下，让人明白，事情全出在笑话上。啊，上帝，说了一个笑话也可以遭灭顶之灾的啊！

他逐一回想最近期间所听到的笑话。全是不值一提的胡扯。何况讲笑话通常都是两人单独在一起时匆匆忙忙随便说的。“听说了吗？”“没听说过吗！”所有他回想起的笑话中只有一个关于拉狄克和斯大林的笑话可以认为或多或少有点犯罪的味道。他是从谁哪儿听到这个笑话的呢？埃尔斯拜恩，文艺学家埃尔斯拜恩，对，正是他讲的。瓦季姆跟比他年长的朋友和靠山叶尔希洛夫在作家俱乐部的饭店吃午饭，门口出现了埃尔斯拜恩，他环视了一下大厅，然后侧着身子，侧身朝他们的桌子走来——他有点跛，因此行走时，肩膀向前挺出。叶尔希洛夫为他稍稍移开了椅子，瓦季姆皱了下眉：他不喜欢这家伙。老一套的笑容，眼珠子不停地乱转。

“你们知道有个新的笑话吗？”埃尔斯拜恩问。“斯大林把拉狄克叫去，对他说：‘听着，拉狄克，你爱编笑话，据说，还

编了关于我的笑话。那就不该这样，别忘了，我是领袖！”拉狄克回答：“你是领袖吗？瞧，这个笑话我还没对任何人讲过。”

叶尔希洛夫微微一笑，瓦季姆也微笑一下，埃尔斯拜恩站起来又往前走了。

那时瓦季姆对这种事没特别在意。当然，笑话中提到了斯大林同志，不过拉狄克是有名的共产党员，虽然曾是反对派，认错和悔过了的托洛茨基分子，但是位名人。别的不说，他素以善讲笑话闻名，正是由于拉狄克是位官方人士，因此那些笑话就仿佛具有合法的性质。他过去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目前是位名记者、政治家，他的文章定期地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发表，都是些指导性的文章。在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他作了题为《当代世界文学和无产阶级文艺的任务》的报告。确实，在埃尔斯拜恩讲笑话时，叶尔希洛夫的微笑是相当酸溜溜的，他那双眼睛并无笑意。但要知道，他瓦季姆，从来没向任何人转述过这个笑话呀！

不过，不对，说了的……对理发师谢尔盖·阿历克谢耶维奇，自己的理发师谢尔盖·阿历克谢耶维奇说过，他在这条阿尔巴特街夏洛申拐角上那个理发店里工作，瓦季姆从小就认识他，一直是瓦季姆父亲的理发师，革命前就替他理发，现在还替他理发；父亲生病时，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就到他们家里来为父亲理发、刮脸，已去世的妈妈也常带瓦季姆上他那儿去理发，他很有风度，仪表堂堂，留着漂亮的大胡子，彬彬有礼而且很和善……他把一块小木板架在圈椅的扶手上说：“来吧，年轻人，”把瓦季姆抱起来，让他坐在木板上，给他剪发，同他说笑话，同小孩子开玩笑……后来就不用妈

妈陪伴，他自己上谢尔盖·阿历克谢耶维奇那儿去理发了。妈妈去世后，他度过少年、青年时代，最后是成年人了，仍一直在他那儿理发，现在谢尔盖·阿历克谢耶维奇已经不象保护人那样对待他，而是瓦季姆以一种宽容的态度跟他谈话了。谢尔盖·阿历克谢耶维奇未必看过那些刊登瓦季姆文章的报章杂志，但是关于他的成就肯定早就听说了，至少从费尼娅那儿听说过，费尼娅是大约十年前由谢尔盖·阿历克谢耶维奇介绍到他家来的；也许他们原来是一个村子的，也许费尼娅是他的什么亲戚。

瓦季姆凭交情常告诉他各种各样的政治新闻，评论报上的消息。他想让人看起来是个接近上层的重要人物，这样自尊心得到了满足。

谢尔盖·阿历克谢耶维奇意味深长地抬起眉毛，对所有听到的东西都用一句温厚的话来作为结束语：“少了列夫·达维多维奇是不成的。”他讲这句关于托洛茨基的话时，就象过去讲：“英国女人随地大小便……”一样。

谢尔盖·阿历克谢耶维奇听了关于拉狄克的笑话之后，有礼貌地微笑了一下并说了他通常说的那句话：“少了列夫·达维多维奇是不成的，”——就是说，这是托洛茨基给拉狄克出的主意，让他这样挖苦地回答斯大林的。

难道果真是谢尔盖·阿历克谢耶维奇告密的吗？他是个很知己的人，可以说，象家里人一样，认识父亲已有二十年左右，也熟悉已去世的妈妈，对他，瓦季姆，几乎是从幼年起就认识了的，还有费尼娅又是他的亲戚。他也许是个职业告密者，他那儿的地点很方便，有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请他理发，而且全都津津乐道地和他说一通。他常常面带含有双

关意味的微笑，那句“少了列夫·达维多维奇是不成的”话，老挂在嘴边，不仅在同瓦季姆谈话时插进去说，而且对大家都说，可见，大家都应该知道并且也确实知道，列夫·达维多维奇指的是托洛茨基。他是不是故意这样挑动大家来谈论托洛茨基呢？

瓦季姆突然回想起费尼娅谈的关于他们在农村如何逃避粮食收购的事。“我父母亲有七个子女，”费尼娅说，“靠什么来养活呢？粮食给收得一干二净，什么地方都翻遍了，每个角落都搜到了。我那已故世的妈妈想了个办法：床垫里不放稻草，而把粮食塞在里面，虽然我们睡在上面，很硬，谷粒又刺人，但是至少稍许有些面包了，烤的时候得偷偷地，不能让邻居们证明我们隐藏了粮食，没全部上交。”

费尼娅出身富农家庭，这很清楚，她生于被没收了生产手段和土地的富农家庭。她的父亲曾来过一次，坐在厨房里，谄媚地、戒备地看着你，当然他是个被没收了生产手段和土地的富农分子啰。可是费尼娅是谢尔盖·阿历克谢耶维奇的亲戚。他瓦季姆，过去怎么就没考虑到，对这点未加注意呢。家里的一个朋友，自己人，可是他对阿尔巴特街上所有的人来说都是自己人。他写告发所有人的“情报”。也写告发他，告发瓦季姆的材料，他能写的。

瓦季姆到作家俱乐部，遇到埃尔斯拜恩和叶尔希洛夫时，就仔细观察他们的脸，也许，会露出什么马脚来——神情不安或者眼神中会流露出什么来。不，他们的举止如常。可毕竟还是有什么人告发了他。

是埃尔斯拜恩吗？众所周知，埃尔斯拜恩以前几乎每天都上加米涅夫家去，曾在科学院出版社当编辑。加米涅夫入

狱了，可是没有触动埃尔斯拜恩。当然，很奇怪。可从另一方面看，笑话是埃尔斯拜恩本人讲的，他总不会去告发自己吧。

是叶尔希洛夫吗？叶尔希洛夫不是那种级别的人，不是打小报告的人。他的专业是从事重大的告发，他的每一篇批评文章都是政治性的告发，他的每篇揭露性的文章，实质上已是一种判决。他不会去干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

因此，如果问题真是出在笑话上的话，那么告发他的只有谢尔盖·阿历克谢耶维奇了。

这样一来，他瓦季姆·马拉谢维奇，就成了反苏笑话的传播者，在到处传播这些笑话，甚至在理发店内也传播。他的妹妹去巴黎了，嫁给了一个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而他瓦季姆，则在此地从事反苏活动。

但这不对呀！不对！不对！他不是反苏分子！当然，对谢尔盖·阿历克谢耶维奇讲这样的笑话是愚蠢的，况且他也未必能理解这种笑话。可要知道笑话不是讲斯大林的，而是讲拉狄克的，拉狄克对知识分子来说仿佛已成了苏联的科济马·普鲁特科夫了。他的名字本身就是许可的象征，至少是党的、官方的、默许的自由思想的象征。

不论瓦季姆如何安慰自己，让自己放心，他还是明白，他的事情不妙，很糟。阿尔特曼对这个笑话完全是另一种理解：他讲了些反对苏维埃的笑话，而且是关于斯大林同志的笑话。再说是在哪儿讲的呢？在理发馆里！对什么人讲的呢？对一个理发师讲的。那么还对什么人讲过呢？再没对谁讲过了。嘿，没对任何人说过，可我们凭什么该相信您呢？

他被卷进一个何等可怕的事件中了。任何事情他都无法

否认，否认是愚蠢的，只会加深自己的罪过。

但是，如果他承认对谢尔盖·阿历克谢耶维奇讲过这个笑话，他就应当说出来，他是从谁那儿听到的。应当说出埃尔斯拜恩来，那么当时还有谁在场呢？叶尔希洛夫。必须把他也说出来。如果瓦季姆想开脱、隐瞒的话，那他就要坐牢了。

难道会把他监禁起来吗？那样的话一辈子就完了。他为什么应该毁掉呢，要知道他总共才二十五岁啊！为了谁呢？！为了编造这种笑话的拉狄克吗？为了传播这些笑话的埃尔斯拜恩吗？拉狄克可以若无其事地很轻松地说：这一切全是硬加在我身上的。确实有许多是硬往他身上加的，而埃尔斯拜恩，这个狗崽子，是个挑拨离间的人，讲这样的笑话，并且还当着第三者，当着叶尔希洛夫的面。叶尔希洛夫也够好的！是个党员，而且是党委委员，他为什么不给埃尔斯拜恩以反击呢？他如果反击，对瓦季姆就会是个信号，他也就会反击埃尔斯拜恩而且不会再去对谢尔盖·阿历克谢耶维奇讲这个笑话了。这样说来，他们俩——埃尔斯拜恩也好，叶尔希洛夫也好，都是够好的。他也不准备饶过他们。对！埃尔斯拜恩讲过这个笑话，但是在党委委员叶尔希洛夫在场时说的，那一个赞赏地笑了一下，因此他瓦季姆就认为笑话中没有任何可指责之处，也有点不够谨慎地对理发师讲了这个笑话。

不过，为什么是“不谨慎”呢？恰恰相反，是故意讲的，是自己想要弄清楚他谢尔盖·阿历克谢耶维奇的真正的政治面目。谢尔盖·阿历克谢耶维奇对所有事件都用一句话来评注：“少了列夫·达维多维奇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他每次都提起托洛茨基。为了什么呢？他是为了引起关于托洛茨基

的话题吗？是为了袒护他吗？他是在强调我们这儿把一切都推到托洛茨基身上去了吗？是在强调我们没有根据地把所有的失败都说是他的罪过吗？工厂没有完成计划，是谁的罪过呢？嘿，当然，是列夫·达维多维奇。在西伯利亚某个地区粮食遭受了巨大损失。谁的罪过？嘿，当然，是列夫·达维多维奇，归根结底，这一切使瓦季姆感到可疑，他讲关于拉狄克的笑话是想考察一下理发师的反应。当然，如果谢尔盖·阿历克谢耶维奇对于为了表示信赖才向他讲的笑话报以某种反应的话，那他瓦季姆，就会知道该怎么办了。然而接着并没有任何反应，因此瓦季姆认为，关于列夫·达维多维奇的话只不过是俏皮话。就这些，完了。

这些方案中哪一种更好些呢？在这两种情况下他将三个人全都“放进去”了：埃尔斯拜恩，叶尔希洛夫和理发师。但是埃尔斯拜恩有过错——不应该讲挑拨离间性质的笑话，叶尔希洛夫也有过错——没有按党的原则作出反应，至于谢尔盖·阿历克谢耶维奇——一个告密者，不管是这种情况也好，另一种情况也好，他都不会有任何事的。而对于他，瓦季姆来说，两个方案都有利，哪一个更好些，他得等到了那里，在卢比扬卡的办公室里看事态发展再作决定。

可是瓦季姆仍然焦躁不安，思绪紊乱。他害怕再次同阿尔特曼见面，那个人目光忧郁，突然会眯缝起那双剑子手式的眼睛，说起话来毫无表情，索然寡味，但经常又出乎意料地勃然大怒，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真可怕！

从另一方面看，事情不明朗，凶吉未卜也使人感到的沉重、难受、无法安宁。最好快点把他找去，听他讲一讲，把该记的都记下来并让瓦季姆放心，因为他诚实地履行了自己

的职责。当然，事情可能会是另一个结局，叶尔希洛夫一定能脱身的——这个人太有名了，他们不会去指责他的，可是埃尔斯拜恩，嘿，见他的鬼，让他愿意怎么摆脱就怎么摆脱吧，让他去承认，是谁对他讲了这个令人恶心的笑话的，并且解释清楚，他为什么在整个饭店里传播。

是的，最好快些把他叫去吧。瓦季姆坐在家里，等着电话铃响，如果他耍离开，他就严厉地嘱咐费尼娅问清楚，是谁打电话来的并且把姓名记下来。费尼娅没有记下姓名，瓦季姆就大发雷霆，用拳头敲桌子，尽管他很清楚，人家不会通过保姆把他叫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去的。

“要知道我对你说得一清二楚——记录下来，你看，还专门替你^把铅笔和纸放在电话机旁边。难道写几笔歪七扭八的字就这么困难吗？”

但是费尼娅不愿“写歪七扭八的字”，第二天她报告说，有个男的打电话来的，但没有说，他是谁。

“那你问了没有？”

“我问了，但他把电话挂了。”

或者是这样：

“他没告诉姓名，只是问，你什么时候在家。”

“那你怎么回答的？”

“回答什么？！我说，晚上在家。”

“可是我吩咐过你：七点钟在家。”

“我是说了：七点钟。”

“你说了！你什么也没说。”

“不，我说了。”

但是阿尔特曼为什么不打电话来呢，他真该死！也许，他

在休假，也许，事情中止了……尤尔卡对阿尔特曼说了：“我了解瓦季姆·马拉谢维奇。这是我们的小伙子，我们的人！”

“我们的小伙子，我们的人！”非常靠得住的话，有力的话。他素来希望他们把他看作是自己人，自己的小伙子，自己人。不论是在中小学里，还是在大学里都想让他们不是把他看作是“我们的同志”，而正是把他看作是“自己人”。“同志”——这是某种同路的、临时性的东西，而“人”——是稳定的，是永久性的。

大约，尤尔卡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小伙子，我们的人，”——因此阿尔特曼把这个荒谬的记录扔掉了。要能打个电话给尤拉，打听一下，用个什么办法探询出来就好了，但是去电话不方便，而且尤拉什么也不会说的，他暗示了关于笑话那一点就足够了。其实，他连这也是无权作的。他的行为是高尚的，尤拉是好样的，因此不应当去向他要求更多的东西了，这过于率直，太不巧妙了。

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生活回到了习惯的常轨上，于是瓦季姆开始比较冷静地考虑：即使阿尔特曼是去休假的话，那他也早该休完假回来了，三个月的休假在我们这儿是没有的。也许，他被撤职了，那又怎么办呢，这样更好些，就是说，有个比他更聪明些的人来接替他的职位了，这个人马上就发现瓦季姆的事是臆造出来的，于是停止不再搞了。而主要的，大约是尤尔卡说了些关于他的好话，说是，别去打搅我们的小伙子吧。

瓦季姆完全平静下来了。报章杂志上重又出现了他的文章，他重又站在讲台上猛烈地去抨击和揭露了。

人们对他很满意。甚至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叶尔米洛夫也说：

“好样儿的，你想得很正确！”

23

同叶若夫谈话之后，赖因霍尔德完全变样了。现在他不仅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阴谋分子，在沙罗克所要求的一切东西上签字，而且还补充了许多东西，使自己的供词更加尖锐、更有说服力。

叶若夫对他作了些什么许诺，他们商量妥了什么，沙罗克只能猜测。答应保全他的性命，肯定他无罪，对他说明了党的意图——这是清楚的，但是以谁的名义呢？叶若夫的名字是有权威的，但它能否使赖因霍尔德满足呢？是否向他传达了更高领导人的决定以致于在这之后他感到自己是党和国家一次极其重大的行动的参加者了呢？赖因霍尔德身上重又出现了那种沙罗克素来仇视的东西：知识分子的高傲、身居高位人的好发号施令。他修改了沙罗克记录中的措词，使之更巧妙、更通顺，说“请这样写”，他居然能建议说“是否这样写更好些”，有一次在读沙罗克的记录时，皱了皱眉说：“不好，让我们按另一种方式来作，”——于是不等沙罗克表示同意，就写了一篇新的。

这一切对事情都很有利，但却使沙罗克十分生气，因此他不准赖因霍尔德太任性了。他听赖因霍尔德说话时，脸上

毫无表情，对他的努力一点也不流露出有看重之意——处于赖因霍尔德的地位这种努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注意地听赖因霍尔德说话，但是作为一个决定问题的人在听，而赖因霍尔德仅仅是在建议，赖因霍尔德是个聪明人，这个距离他感觉到了，也接受了——他害怕同侦讯员发生冲突，何况沙罗克几乎一切都接受，驳回的是同总的方案有分歧的那些东西，赖因霍尔德不了解全局，而沙克罗了解，因此沙罗克是根据某种更高的意图在行动，赖因霍尔德应当考虑这一点：他是个受侦讯的人，而沙罗克是侦讯员，他是被监禁的，而沙罗克却是自由的，如果案子结局顺利的话，沙罗克将获勋章，而赖因霍尔德会得到什么，还不清楚，虽然罗沙克觉得，他对于向他作出的许诺虔诚地深信不疑。

总之，已达到相互理解，建立了默契。沙罗克的声望大大提高了，他的侦讯对象赖因霍尔德招认了内容最丰富，最有说服力，最尖锐的供词。奥利别尔格能证明的只是在国外发生的事，他在所有要求他签字的材料上签了字，但他缺少想像力，侦讯员不得不代替他来考虑。而他们对国外的情况又了解极少，除了以下几点：奥利别尔格是按托洛茨基的指示由谢多夫派遣到苏联来的，任务是组织反斯大林的恐怖行动，他打算在莫斯科庆祝五一节游行时借助高尔基师范学院的大学生实现这一行动……除此之外，其他任何绝对可靠的内容他们一点都想不出来了。

至于皮克尔，他只招认了反对季诺维也夫的供词，在同季诺维也夫当面对质失败之后，他消沉了，冷漠了，最后处于一种很深的抑郁状态之中，以致不得不重又找他的朋友沙宁和加伊来帮忙。皮克尔被转到一间条件好的牢房内，沙宁和

加伊同他一起一直坐到很晚。他们喝酒，吃晚饭，打牌，想方设法让皮克尔振作起来。侦讯员曾使皮克尔相信，季诺维也夫招认了同样的供词。在当面对质时皮克尔断定，并非如此。季诺维也夫央求他拒绝作伪证。皮克尔大为震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于是他被带走了。

现在沙宁和加伊让他相信，季诺维也夫以前确实招认过所需的供词，但在当面对质时突然又推翻了，以后一切都会好的。在这些劝导的影响下，再加上边喝酒、边吃菜和玩牌，皮克尔稍稍平静下来了，这才使亚戈达和莫尔恰诺夫放下心来，他们曾担心皮克尔处于抑郁状态，到时候无法出庭作证。

这样一来，方案在进行过程中不得不更改，当然奥利别尔格和皮克尔还是有用处的，毫无疑问他们在起他们的作用：证词总是证词，同谋者总是同谋者。而赖因霍尔德却成了主要的“雷管”，负责赖因霍尔德一案的沙罗克成了最引人注目的侦讯员。

赖因霍尔德把他同任何一个原来的反对派分子的偶然相遇，不论是在私人住宅里或是正式公务上的会面，各类会议上、甚至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上的相遇都说成或想象成是讨论阴谋活动细节的那种接头。重要的只是他必须准确地回想起见面的日期和地点，以便使那些被他揭发的人无法证明自己当时不在现场。

赖因霍尔德原来是个有声望的经济部门的领导人，国家机关中的显要人物，参加过许多会议，而其他的原反对派分子，现在也是大人物的那些人往往也出席这类会议。

这样一来，赖因霍尔德的供词在地点和时间这方面具有

充分的可靠性，而这本身也使他关于谈话内容的说法有了说服力。

赖因霍尔德表明，他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阴谋活动的参与者，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巴卡耶夫领导下行动，准备暗杀斯大林以及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暗杀基洛夫是按季诺维也夫的直接指示进行的。

当然，赖因霍尔德还完全证实了皮克尔和奥利别尔格的供词，就象皮克尔和奥利别尔格同样也证实了赖因霍尔德的供词一样。

根据莫尔恰诺夫的命令，他们三人——赖因霍尔德、皮克尔和奥利别尔格——在经济局局长米罗诺夫的办公室里会面，使他们的供词协调一致，相互吻合。

赖因霍尔德、奥利别尔格和皮克尔的供词互相之间完全吻合，彼此又相互证实，经过莫尔恰诺夫和亚戈达的仔细检查，沙罗克猜到，这些供词还向斯大林同志作了报告，现在这些东西可以向主要被告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出示了，应当成为即将来临的审判的基础。

有一次沙罗克在同武特科夫斯基谈话时，他甚至对赖因霍尔德异样的热心表示惊奇。

武特科夫斯基是个聪明而谨慎的人，他想了一下说：

“赖因霍尔德明白他的任务是党交给他的一项任务。您知道，我觉得他真诚地相信这点。他是个纯真的、刚强的人。”

沙罗克装作对这样的解释很满意。武特科夫斯基和赖因霍尔德之间有什么区别？一个编造假东西，另一个假装相信

伪造的东西。而且仿佛是为了党的利益才这么做的。他们在撒谎，不管是这个或是那个都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连他沙罗克也是在保自己的性命，但是他不以党的利益来掩饰自己，他是在完成本职工作，就是这样，仅此而已。他在执行上级的指示，不是盲目执行，而是执行那些符合法律和实施细则的东西，谁颁布这些法律并在实施细则上签字，谁就承担责任。

最高的法——这是斯大林。因此为了斯大林的利益所作的一切证明都是正确的。沙罗克一生憎恨共产党员。只有一个人例外，就是斯大林。斯大林自己在消灭共产党员，特别是老党员，要知道这个专政令人害怕的力量正在这些人身上，他们自己无情地消灭了所有的人，现在轮到他们了，现在斯大林在镇压他们，愿上帝保佑他身体健康。沙罗克在这个机构里工作，因此永远把自己同这个制度联系在一起，他个人的一生也取决于这一制度的巩固与稳定。而巩固与稳定的保证是斯大林，只有斯大林。所以沙罗克忠于他，只忠于他。因此为斯大林的利益而作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他感觉到，他也明白，赖因霍尔德遵循的也是这一最终的结论。沙罗克向叶若夫本人汇报了他的供词，虽然莫尔恰诺夫和阿格拉诺夫也在场。有一次，叶若夫在审查赖因霍尔德的供词时发现，在赖因霍尔德参加的那个晚会或庆祝会上，李可夫也出席了，在另一个会上，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也出席了，还有，在二十年代赖因霍尔德在某些会议上也见到过伊凡·尼基季奇·斯米尔诺夫、姆拉奇科夫斯基、捷尔·瓦加尼扬和德赖采尔。

“他为什么对这些人的情况保持沉默呢？”叶若夫说。

叶若夫这句话的含意很清楚。紧接着在下一次审讯时，赖因霍尔德就证明并写上，参加阴谋活动的不仅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有托洛茨基分子伊凡·尼基季奇·斯米尔诺夫、姆拉奇科夫斯基和捷尔·瓦加尼扬，也有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沙罗克按照对他的指示将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姓名写在另一份记录上。

赖因霍尔德、奥利别尔格和皮克尔的供词在即将举行的审判中只能构成对恐怖集团主要成员指控的基础。还需要参加恐怖阴谋活动一般成员的供词。从监狱、流放地和劳改营中带来的原反对派分子不肯招供。莫尔恰诺夫承认事情依然如故，毫无进展，因此叶若夫亲自参加了下一次召开的各侦查小组的联席会议。

沙罗克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受季亚科夫的委托他火速到列宁格勒，到那儿去了解适合参加审判或可提供所需证词的几个原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情况。他挑选了几个教社会科学的教员，吩咐将他们送往莫斯科。

从列宁格勒回来之后，沙罗克去找季亚科夫。

季亚科夫的办公室里坐着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卢宁，他在负责社会党的那个处里工作。沙罗克以前就发觉，卢宁坚决回避参与审判的准备工作。而且现在他也对季亚科夫说，他正在搞无政府主义小组的事，不能丢下不管。

季亚科夫撇了一下嘴。

“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现在有什么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您，卢宁同志，为什么推三阻四不愿参加集体

的工作？顺便说一句，您知道叶若夫同志在最近一次会议上说了什么吗？叶若夫同志说，即将到来的审判对国家、对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侦讯人员对待人民的敌人应当毫不留情，所有的，我重复一遍，所有被侦讯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党中央、政治局和斯大林同志本人也坚决这样认为。”

卢宁一面听季亚科夫说话，一面用手帕擦眼镜片。擦好之后，瞥了季亚科夫一眼。

“我打哪儿知道呢？我又没有参加会议。”

“那么听着，叶若夫同志说的主要点是：如果你们中间有人动摇、怀疑、感到无力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匪徒们进行斗争的话，那就让他老老实实地承认这点，我们就解除他在侦讯小组中的工作。您明白这些话的意思吗，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每一个‘老老实实承认’自己不能进行侦讯工作的人，就将作为被告的同情者立即被逮捕。”

沙罗克平静地听着季亚科夫的高谈阔论。他负责的是主要证人赖因霍尔德，那人写的证词越来越多，沙罗克巧妙地将这一切拖长，每天夜里同赖因霍尔德见面，白天将他的证词同其他被侦讯人的供词进行核对，使其吻合，没有漏洞，以此来逃避去承担对那些不可救药的托洛茨基分子的审讯工作，尤其是在同兹维亚古罗打交道遭到失败之后。因此他很理解，为什么卢宁也回避这类审讯。

“我没有担绝任何工作，”卢宁镇静地说。“我在完成领导上交给的任务。如果我从自己的上级那儿得到搞其他案件的命令，我会去干的。毫无疑问，你们的被侦讯人是恐怖分子，但是顺便说一句，真正的恐怖分子通常都被认为是无政

府主义者。全世界都知道……假如您向领导上证明，无政府主义者的案件应当搁下来，那么请吧，他们命令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卢宁说完这些话之后就从小椅子上站了起来，他高高的个子，衣着整齐、神态端庄地从办公室走出去了。

“怠工者！”季亚科夫仇恨地在他身后说道，“一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沙罗克感到惊奇，“他，依我看，过去是骑兵排副排长。”

“反正一样。是个彻头彻尾的知识分子。而且遗憾的是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他指的是武特科夫斯基）纵容他。”

“那有什么，”沙罗克微笑了一下，“武特科夫斯基也是知识分子。”

瓦连京·奥利别尔格供认，在高尔基师范学院的师生中所建立的恐怖小组内有历史教师、共产党员索科洛夫和化学教师涅利多夫，他是非党群众，而且还是贵族，沙皇驻法大使的孙子。

季亚科夫认为，涅利多夫是个比较容易对付的对象，可以利用他把托洛茨基分子同沙皇贵族阶层联系起来，就把他留给自己，而把索科洛夫交给了沙罗克。

但是，原来一切并非如季亚科夫所料。索科洛夫是有经验的宣传工作者，他非常清楚：这次审判是一次矛头针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行动，法官们只不过是在执行斯大林的意志，因此他索科洛夫要想反抗是徒劳的。他向沙罗克声明，他明白侦讯的任务是什么，明白他应当帮助侦讯员。何况他是个历史教员，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一直教

育他的学生要仇恨托洛茨基，他自己本人对托洛茨基也很仇恨。

沙罗克没有具体说明，高尔基师范学院的大学生们打算用什么方法谋杀斯大林，他懂得，任何虚构只能使人对事实本身产生怀疑。总的说来，索科洛夫在他那儿很容易就通过了，第二天早晨他就将索科洛夫的供词放到了武特科夫斯基的桌上。

涅利多夫的情况完全是另一码事。出乎季亚科夫的意料，他原来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人，也许是所有被侦讯者中最棘手的一个，他不必为家庭担心，因为他的亲人几乎全已不在人世。涅利多夫对党也毫无虔诚崇敬的感情，因为他从未加入过党组织。

有一次，沙罗克顺便上季亚科夫那儿去，见到了涅利多夫：他是个三十五岁左右的年轻人，有一双聪明的眼睛，高高的前额。沙罗克似乎觉得，涅利多夫在季亚科夫面前有点提心吊胆的样子。季亚科夫由于连连失败变得冷酷无情，失去了通常的自制力，狂怒起来了，歇斯底里大发作，朝涅利多夫大喊大叫。那个青年人脸上恐惧的表情变成了含有歉意的微笑，但是他什么也不招认。

对第二个人的侦讯再次失败使季亚科夫有可能引起领导上的不满，停止他的侦讯工作，叫他离开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沙罗克认为这对季亚科夫来说是个最好的摆脱困难的办法。但季亚科夫不这么想，他千方百计想要证明在新的条件下他能胜任工作的。就象起初他所预感的那样，很快就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个机会。

按照奥利别尔格的说法，高尔基师范学院的大学生们打算

用手枪来暗杀斯大林。

出席参加讨论这一方案的边防部队管理局局长弗里诺夫斯基哈哈大笑说：

“在通过红场的游行队伍中能用手枪射中站在陵墓上的斯大林吗？你们知道，距离有多远？你们有远射程手枪的话，请给我看看，我可从没听说过。你们没见过警卫部队吗？他们决不容许任何一个人走出队伍，朝陵墓那儿跑过去的。原来高尔基师范学院中有这样的神枪手。把他们交给我吧，我一定用自己部队里整整一个师来换他们这些人。”

大家都明白，弗里诺夫斯基的话是对的。虽然侦讯人员准备去干许多不合情理的事，认为这些事在法庭上出自被告人之口在一定程度上听起来还是近乎情理的，但不管怎么说，用手枪朝陵墓射击的方案简直荒谬可笑。

莫尔恰诺夫的脸涨得通红。他也明白这个方案是荒谬的，但他感到让被告承认准备谋杀，这事实本身是重要的，至于用什么方法，在总的公诉过程中一晃就过去了，不易被人察觉的。现在弗里诺夫斯基这样一说，使他失去了这种机会。

季亚科夫发言了。他站起来建议用另一种方案——炸弹！他负责侦讯的对象是化学教师涅利多夫——为什么这个人不能在高尔基师范学院的化学实验室里制造炸弹呢。的确，涅利多夫很倔强，不肯招供，但是如果将证人的证词和物证放在他面前的话，他一切都会承认的。

这个想法很合莫尔恰诺夫的意。第一，用炸弹的说法听起来比用手枪更令人信服；第二，所提到的物证也很重要，因为这个案子总的来说没有任何其他的物证，不论是证件、信件、或是传单都没有。总之，除了这些被告本人的供词之外，

什么也没有。而在师范学院的实验室里想必会得到某些爆炸物的。

季亚科夫立刻带了一组工作人员动身去高尔基市，很快就回来了，于是在莫尔恰诺夫办公室召开的会议上，季亚科夫取出几个直径六至七厘米的生了锈的空心金属球，放在桌上。他宣布，这是作炸弹用的外壳，并宣读了在高尔基市匆忙编写的正式文件，内称某个时候大学生中的恐怖分子将炸弹壳藏在学院的校园内，以便以后装入炸药。季亚科夫宣读了高尔基市兵役局的一份结论：此确系炸弹壳，如装入炸药，将产生巨大的破坏力。

这份正式结论使人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此。

特别局局长加伊将一只球拿在手中，讥讽地笑了一下。

“这些球既适合制造炸弹，也适合用它们来做鸡肉饼。任何炮兵都会对你们这样说，任何厨师也会这样断定的。”

接着是令人难堪的沉默。但是看得出，莫尔恰诺夫非常想在法庭上出示“炸弹”，想以此切实证明控告他们进行恐怖活动是有根据的，也可能此事他已向上面作了报告，现在已无退路。

“把这些球给涅利多夫看，”他命令季亚科夫，“如果遇到困难的话，就把他带到我这儿来。”

他朝沙罗克膘了一下。

“请协助一下季亚科夫同志。”

这是预先给季亚科夫的一个警告，对他的下级比对他本人更为信任。

涅利多夫看到球之后笑了，他还解释，为什么这些球怎

么也不能用来制造炸弹。

富有知识分子气的、性格温顺的涅利多夫虽已被折磨得相当厉害，但态度仍然很坚决。沙罗克内心甚至对他产生了好感，他专门去查阅了大百科中关于涅利多夫一家的词条——这是一个古老的贵族世家，在约翰三世之前就很有名，至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不是一下子发迹起来的暴发户式的新贵。而且涅利多夫的举止就象一个真正的俄国贵族。

沙罗克明白：向涅利多夫出示这些球是个战术上的大错误，这是向涅利多夫表明，侦讯人员手中没有任何反对他的材料，就将更加坚定他的信心，使他更加顽强。这次涅利多夫仍未招供。

夜间把他带到了莫尔恰诺夫那里。

“您干吗装糊涂，为什么不招供？”

“您要知道，”涅利多夫回答，“我不习惯说假话，况且我不能容许自己诬赖我那些无辜的学生和同事们。”

莫尔恰诺夫打断了他的话：“您把什么人称作是无辜的人？您应当证实其他被告的供词，那些符合真情实况的东西，只有您一个人否认这些。或者，也许所有的人都在说谎，只有您一个人讲真话？”

“是的，我说的是真话。而且您决不会从我这儿听到一句假话。”

莫尔恰诺夫提高了嗓门：

“涅利多夫，我最后一次警告您：别装糊涂！我们能把您的贵族的傲气打掉的，您别忘记：我们战胜了你们整个阶级，你们整个国家，你们的军队，那么您，一个人，我们很快也能战胜的。”

涅利多夫突然向莫尔恰诺夫的桌子跟前跨了一步。这完全出乎意料，以至莫尔恰诺夫不由得急忙闪开了。

涅利多夫用双手撑住桌子的边缘，正视着莫尔恰诺夫，理直气壮地说：

“我不怕你们，请您记住这点。您可以任意处置我，但是我永远，永远也不会诽谤自己，诬赖无辜的人们，请记住这点。”

24

6月初，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全会赞同这一草案并通过了一项决议：召开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讨论该草案。

但是在全会上主要的问题是关于更换党证的问题。

1935年12月在中央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更换党证的决定。还在1933年就开始对清党工作进行总结，宣布清党已经结束。但在清党过程中发现党务被弃置不管，有些党员有两张党证，登记卡片混乱，一些党证落到了敌人手中。因此那时决定更换党证。

这是他的主意。这一主意的用意何在呢？表面看来这一手续纯粹是技术性的，而实际上更换党证却意味着对每个共产党员进行普遍、全面、仔细的审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清党未达到目的。当时是一个共产党员往讲台上一站，讲述自己的情况，接着其他人发言，朋友们夸奖他，仇敌则辱骂他，而党龄则起了决定性作用。“1917年4月入党的党员”是纯洁无瑕的，至于“1905年入党的党员”就完全是神圣的了。这样的清党不能反映党员的真实面貌。

检查党员的证件则是另一回事了：在这个过程中将仔细研究每个党员的全部履历，逐年逐日地研究他一生中的关系、亲戚、朋友，工作上有联系的人，他的言论，他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关中的专案卷宗，以及他对自传中某些不清楚的地方所作的书面说明。

更换党证对于干部队伍的革命是个很好的基础。每个共产党员应当感到自己时刻受到严格的，愈来愈紧的监督。

他不得不亲自就这一问题发表意见，号召各地党组织不要仅仅将登记卡片重抄一下，而应当只给那些经过全面仔细考察的人更换党证。他不得不公开提醒全党，在当前条件下每个布尔什维克必须具备的品质是：不管敌人伪装得多么巧妙，都善于识别敌人。他不得不提醒说，对那些辜负了共产党员称号的人，党组织有权不发给党证。

6月是紧张的。在第一个报告之后，过了一星期，他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作了第二个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这时未来的宪法已称为斯大林宪法了。他会见了飞行员，同古布金交谈了关于乌拉尔石油的问题，同卡冈诺维奇和奥尔忠尼启则一起视察了莫斯科—伏尔加运河的佩列尔温斯基水闸。运河工程明年应当竣工，莫斯科将成为五海——白海、波罗的海、里海、亚速海和黑海——的港口。运河将解决莫斯科的供水问题，增加莫斯科河、克利亚济马河、亚乌扎河和乌恰河的蓄水量。莫斯科—伏尔加运河是改建莫斯科总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他的计划。

斯大林视察了几块场地，准备在那里按照雕塑家梅尔库洛夫的设计建立苏维埃国家缔造者列宁和斯大林的全身纪念像。

地点选择得很成功，纪念像从这儿看起来一定很壮观。

6月8日他去哥尔克探望了病中的高尔基。和他同去的有莫洛托夫和优罗希洛夫。十天之后，6月18日高尔基去世。宣布全民志哀，6月20日高尔基被安葬在红场上。

对高尔基之死他是否感到惋惜呢？每个人死亡的时刻是命中注定的，高尔基作为一个艺术家已完结了。《耶戈尔·布雷乔夫》当然是他创作的顶峰。至于《克里姆·萨姆金》，他迄今为止都无法读完这本冗长无味的东西。是的，创作史诗不是他高尔基的志向，写史诗需要有伟大的历史人物，可是《克里姆·萨姆金》一书中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呢？！《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这是他高尔基的作品，是些好作品，作品中描写的生活真实，不象《克里姆·萨姆金》是虚构的。他好象曾经想要写关于他的书，但老是在“搜集材料”，不知为什么搜集得这么久。当然，那时由于《少女与死神》他曾奉承过他：“这本书胜过歌德的《浮士德》”。本来这两本书是无法相比的，可是他不仅说了，他还这样写了，在历史上留下来了。他向高尔基表明，他把同他的关系看得比后代的指责更重。一百年之后，文学家们将如何解释这些话他并不在乎，而高尔基现在怎样在国内外解释他的政策，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高尔基做了他自己的事——将知识界团结起来了。要征服人民，就必须消灭或者收买他的知识界，更正确地说是消灭一部分人，收买其余一部分人并使其处于恐惧之中。高尔基完成了这一使命，因为他说了“假如敌人不投降，就把他消灭”，他以知识界的名义对于干部队伍的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作家们并不是经常，也并不是始终意识到他所说的是什么，他们往往为了追求一个精确的词，一个漂亮的句子

而牺牲所说的一切，说的不完全是他们所想的。不知道高尔基在审判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布哈林等坏蛋时会有什么表现，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同他有私交。

这么说他死得对，死得及时。他死了，但对干部队伍的革命却是赞同的：“假如敌人不投降，就把他消灭。”留下了一句口号，一句好口号。

总的来说他的表现是忠诚的。有时也炮轰子，去年不得不用潘菲奥罗夫的文章来制止他，表明在我们这儿没有什么碰不得的人。要知道高尔基同志本人也曾肯定，艺术和文学应当在自由交换意见的条件下发展。潘菲奥罗夫正是自由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高尔基全都明白。他也不再固执了。有人敲了一下肖斯塔科维奇，批判了一下形式主义作曲家们，他没有吭声；有人批评了一下建筑学家梅利尼科夫及其形式主义的建筑学家，他也没有吭声；有人打倒了拙劣的画家，其中包括加米涅夫的兄弟，他还是没有吭声。好吧，那是些相邻的艺术，不是文学。但是三月里有人鞭挞布尔加科夫了，这可是文学。是以高尔基为首的戏剧呀，可他仍然没说一句表示异议的话。

不过高尔基毕竟不是一个完全可靠的人。1917年证明了这点，他对十月革命的态度证实了这点。因此，在进行干部队伍的革命时他将是何种表现尚不得而知。也许，他不会愿意在所谓的世界社会舆论面前丢脸的。

所以他死得对，死得及时。应当让他流芳百世，他的名字应当留在人民的记忆之中。“假如敌人不投降，就把他消灭。”对于知识界来说他应当成为为党和苏维埃国家服务的榜样，忠诚于现领导的榜样。

然而，不论是谁死了，生活还在继续。生活应当继续。根据他的倡议通过了几项重要的决定：“关于高等学校工作的决定”、“关于禁止堕胎的决定”、“关于儿童学的畸形现象的决定”。

这些决定应保证国家人口的增长、家庭的巩固，保证中小学及高等学校中正在成长的一代受到正确的教育。

新的国家应当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革命摧毁了旧的秩序，但革命需要建立新的秩序，坚定稳固的秩序。为此应当利用几百年来所形成的、固定下来的并且证明行之有效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如果它们被革命摧毁了，必须使它们重新恢复。

不能容许任意地离婚，这会使家庭遭到破坏，而摆脱了家庭义务和教育孩子的责任将使社会成员变态，使他们变成对自己亲人的生活不承担责任的人，变成没有义务和无所事事的人。

不能在孩子们身上进行儿童学的试验，不能靠一些毫无意义的、愚蠢而有害的表格和心理测验题来研究孩子，把孩子变成那些形形色色利用科学进行招摇撞骗的人用于实验的兔子。对孩子应当象过去那样，象过去人们教育和培养他那样来教育和培养。当然现在教学的内容和教育的目的不同了，但其实质仍然是教育与培养。

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找出时间来同参加合唱团观摩演出的人交谈。合唱是一种真正的民间唱法，他本人过去也曾在合唱团里唱过，合唱能培养一个人的集体感，再说，这又是一种崇高的感情，一种美感。这应当竭力予以支持和鼓励。

7月9日晚上贝利亚从第比利斯打电话来了，

“斯大林同志！今天边区委员会常务局听取了外高加索联邦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揭露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反革命恐怖组织的汇报。向亚美尼亚党中央书记汉姜提出严重的指责，认为他丧失警惕性。汉姜对此断然否认。晚上，一小时之前，他来到我这儿，一副挑衅的样子，指责我屠杀党的老干部，篡改党的历史。他处于一种疯狂的非常激动的状态，威胁要杀我，差一点得逞，但我抢在他的前面，为了自卫，开枪把他打死了。”

斯大林沉默。

“您听见我的话了吗，斯大林同志？”

“听到了。”斯大林回答的声音不高。

又重新沉默了。

贝利亚也不再说话。

斯大林终于问道：

“您对机关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自杀。”

“公开的说法呢？”

“我想，用同一个说法。”

“他多大了？”

“35岁。”

斯大林沉默了一下，然后说：

“明天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干部乘飞机到你们那儿去。”

接着把电话挂了。

他站起身来。

在办公室里走了走。

边区委员会书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开枪打死了共和国共

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在党内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件。

当然，贝利亚不是防御，也不是自卫。汉姜并无杀害他的企图，他不是那样的人。他是个坏人，但不是那种人。他不会去杀害边区委员会书记的，他明白，这样作有多大的危险。

当然是贝利亚就这么把他枪杀了。不过对他还是诚实地承认了这件事。他可以说谎嘛，仿佛汉姜是自己开枪自杀的，他可以挑选几个证人，编写一份笔录。一切都可以作的。不，他不敢对他撒谎。当然他是个刑事犯，但是个忠实的刑事犯。

毫无疑问，贝利亚过去处境很困难。外高加索不愿承认他——1931年他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一个代表当上了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而1932年又升为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一个普通的肃反工作人员，连个联共(布)中央委员都不是，而且这是在格鲁吉亚，那里有党的有名的高级领导干部，联共(布)中央委员。例如，马米亚·奥拉赫拉什维利，1903年入党的党员；卡尔特韦利什维利，1910年入党的党员。他们都自认为是外高加索党组织的缔造者，而这时却来了个什么贝利亚，肃反委员会的一个侦讯员。

他清楚地了解贝利亚是1931年在茨哈尔图博休养的时候。

贝利亚那时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外高加索的代表，亲自负责他的警卫工作，以250名肃反工作人员组成三层包围圈进行警戒，一个半月从未离开过他。

一个半月时间对一个人可以考察清楚了。他对他很好地

进行了考察。贝利亚将所有外高加索领导人的详尽无遗的材料，对他们每个人最详细的情报都向他和盘托出。他了解了他们每个人对他议论了些什么，对他是怎么看的。贝利亚正确、诚实地提供了消息，证实了他本人对他们所怀疑的情况。他们都是“修改历史”的反对者，他们都把确定他在革命前高加索历史上的真正作用叫做“修改历史”。因为他们是“见证人”，他们是“直接参加者”。在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中间他们是最不能接受“修改历史”的，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同他平起平坐，认为自己同他一样，都是“外高加索革命斗争的参加者”。连忠厚的阿维利在自己写的那本小册子里也表达了他们的真实思想，他们的真实情绪，贝利亚理解得很正确，对他们了解得一清二楚。

贝利亚也讲了自己的情况。讲得很详细，但是诚实不诚实，这谁也不知道。他生于苏呼米附近的梅尔海乌利村，在巴库的一所技术学校上过学，1917年3月参加党，作地下工作。党组织委派他同木沙瓦特^①的侦察机构联系。

贝利亚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说了作出这一决定的巴库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名字，将他们写的曾委派他去办此事的书面证明材料放在桌上。

他不管这些文件，把它们推开了。他明白，文件都没问题，否则贝利亚不会拿出来的。不过这个人现在已掌握在他手中了，曾经同木沙瓦特的侦察机关有联系。因为将一个人

^① 木沙瓦特 (Mycabat)——1911—1920年阿塞拜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其纲领是民族地域自治，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联合土耳其和英国武装干涉者反对苏维埃政权。1918年9月主持阿塞拜疆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1920年4月废不再存在。——译者

作为过去的奸细枪决时，那么，他已经没有时间来证明，他同暗探局有联系是出于自愿还是受了党的委派。

不管怎么样，这个人善于服务的，这个人将为他服务，而且知道该怎样服务。

在那儿，在茨哈尔图博他认定：贝利亚正是那个能够在外高加索对付好妄自尊大的帮派的人。但是为此他应当拥有足够的权力。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领导岗位上他是对付不了他们的。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领导人的岗位上他彻底消灭了木沙瓦特分子、达什纳克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残余，镇压了托洛茨基分子，但是为了外高加索干部队伍的革命，他应当成为外高加索的党的领导人。他只有从这个高位上才能更换人员，将一些不需要的人解职，安上所需要的人。

他回到莫斯科之后，于1931年秋立刻将来自三个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的领导人召至中央。会议议程没有宣布。他讲了一个小时——关于经济情况，关于民族事务，还讲了些别的什么，说话很平和，他想和和睦睦地把一切办妥。他在快站起身来时说道：

“假如我们这样组成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的领导班子：第一书记是拉夫连季·卡尔特韦利什维利，第二书记是拉夫连季·贝利亚，你们看如何？”

他看到了他们的反应：他们简直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瞪大了眼睛坐着，甚至没有从自己的位子上站起来，虽然他已站起来了。

接着只有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本人粗鲁地回答说：

“我不跟这个骗子一起工作。”

瞧，拉夫连季·卡尔特韦利什维利——化名叫拉夫连季耶夫，居然敢这样回答他。不过，在1931年他们还很放肆。敢于指责他，说他推荐了一个骗子来担任党组织的领导人。

大家都讥讽地笑了一下。不论是奥拉赫拉什维利也好，穆萨别科夫也好，布尼亚特扎德和其他人也好，全都冷笑了一下。连边区委员会的普通工作人员，组织部部长斯涅戈夫也胆敢冷笑。对他们这种讥讽的笑容他决不会忘记的。

只有汉姜一个人没有冷笑。他面部毫无表情地坐着，他明白现在露出讥笑的神情不合适。他是个狡猾的人，而狡猾的人是危险人物。

于是他那时就说：

“好吧，你们回去吧。我们按工作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那时他我行我素。拉夫连季·卡尔特韦利什维利（他命令他只改名为拉夫连季耶夫）被派往西伯利亚担任党的工作，任命马米亚·奥拉赫拉什维利为第一书记，而贝利亚则为第二书记。

几个月之后，奥拉赫拉什维利被调到莫斯科担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的副所长。于是贝利亚成了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

在这将近五年之中他表现很好。所有格鲁吉亚过去的领导人都分别派到其他的党组织去了，更换了所有党的区委书记，对全体机关工作人员都重新进行了审查，成功地大规模地进行了外高加索干部队伍的革命，他是自己进行的，没有亚戈达，也没有叶若夫参与，他作为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的书记，可以直接通到他那儿。这里不需要亚戈达和叶若夫。

他和贝利亚对高加索的情况了解得更清楚。

在阿塞拜疆，贝利亚有他自己的人——巴吉罗夫。不管是穆萨别科夫，还是其他不满的人，巴吉罗夫都对付得了。当然，不满仍然存在，但是它很快会随着不满的人一起消失的。

可是对贝利亚来说亚美尼亚是个难题。汉姜是卡在他喉咙里的一块骨头。汉姜不承认，也不能承认贝利亚：为什么是贝利亚，而不是他，汉姜呢？两人都是1917年入党的党员，他汉姜虽然小两岁，但1931年贝利亚是一名普通的肃反工作人员，而汉姜1921年就担任埃里温党的市委书记了，1930年起是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他是真正的党的领导干部，而贝利亚是上级机关委任的，而且为什么委任他，大家都明白。因此汉姜不让他的亚美尼亚人受委曲，甚至维护他的教育人民委员斯捷潘尼扬。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叫涅尔西克。涅尔西克·斯捷潘尼扬。当那个狗崽子批评贝利亚写的《论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问题》一书时，汉姜保护过他。

贝利亚是受他的委托写这本书的。这部书驳斥了阿维利·叶努基泽，说他凭空捏造。书中正确地阐明了他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整个历史上，其中也包括他在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的作用。书不无缺点，不过他贝利亚又不是什么文学家。还有人传说，不是他自己写的呢。可这有什么关系呢？这本书是需要的。这点大家全都明白。而斯捷潘尼扬，你知道，却嘲笑、批评它，说这本书是假科学，有数不清篡改历史的地方。斯捷潘尼扬在反对谁呢？反对贝利亚吗？不，他是在反对他，反对重新恢复他在党史上的真实作用。贝利

亚要求把斯捷潘尼扬作为人民的敌人枪决。汉姜不同意，他给斯捷潘尼扬判了罪，但不同意枪决他。他不让触动任何人。他是个狡猾的人，口是心非的人。

他想起了1932年或1933年有一批亚美尼亚人到索契去找他。大家坐了一会，喝了酒。然后走到凉台上，太阳晒得厉害。汉姜看了看他的一双脚问道：

“您穿着靴子不热吗？”

坏蛋。要知道这是所有人都习惯的他的装束，领袖的装束，人民所熟悉的，全国、全世界所熟悉的。他就是这样的。他居然带着彬彬有礼的同情的笑容问他。认为笑容可以掩盖掉对他的嘲弄和挖苦。这个恶棍！

“不！”他回答汉姜说。“不热。而且穿了靴子这样行贿容易些，打人嘴巴也容易些！”

汉姜有礼貌地微微一笑，但是全明白了。因此他当然成了更大的敌人。

可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枪杀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毕竟是件太出格的事件。

当列宁得知奥尔忠尼启则打了科巴希泽一记耳光时，是怎么处理的呢？差一点要求将奥尔忠尼启则开除出党。可这个科巴希泽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的一名普通委员。况且又是个犯过错误的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了解高加索人的性格，不真正了解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谢尔戈能打人嘴巴，然后又能同那个被他打嘴巴的人一起喝葡萄酒，拥抱和亲吻。

当然，汉姜是个恶棍。可这毕竟是未经法庭审判和侦查就在办公室里把他枪杀的呀！

从另一方面看，能够失去贝利亚吗？

斯大林按了一下铃，吩咐波斯克列贝舍夫将马林科夫召来见他。

马林科夫来了。

斯大林脸色阴沉地对他看了一下。

长久地看着他。

于是马林科夫明白了：斯大林或是有什么事不满意，或者打算交给他一项重要的任务。

斯大林没有请马林科夫坐下，一面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一面说：

“今天汉姜在贝利亚的办公室里开枪自杀了。经受不住指责他丧失警惕的沉重压力。您订一张早晨的飞机票，马上去梯弗里斯。要严密监视，让一切都平静地过去。”

他沉默了一下，然后又补充说：

“还有件重要的事。请转告贝利亚：让他把今天他在电话中对我说的一切写在纸上，签上名，放在信封内，用火漆印加封，由您转交给我，您回来之后，将这封公文交给我本人。贝利亚写的这份东西不应当指名写给谁，不管是我，还是其他任何人。只需要叙述事实并签上名。完了！请执行吧！”

斯大林在门口又把马林科夫拦住：

“请您同贝利亚商量一下亚美尼亚新的领导班子的人选。等您回来后我们最后决定这个问题。要设法争取后天上午回来。”

两天之后斯大林拆开马林科夫带来的信封。贝利亚一切都按他吩咐的那样做了，详细地叙述了枪杀汉姜时的情况。信上未写送交给谁。贝利亚没有援引他同斯大林在电话中的谈话，信中也未提及他的名字。

斯大林将贝利亚的信放进了他私人的保险柜。

又过了两天之后斯大林和叶若夫接见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亚戈达、阿格拉诺夫、莫尔恰诺夫和米罗诺夫。

莫尔恰诺夫一边解释，一边将一张用图解的方法表明托洛茨基同在苏联的“联合总部”领导人之间联系的联络图摊开放在桌上。

斯大林对莫尔恰诺夫的报告不满意：

“不能令人信服。只有供词，需要证明文件、信件、札记……”

“没有这样的证明文件。”莫尔恰诺夫回答说。

斯大林没有讲话，但注意到了这句答话很坚决：他们不愿意造文件。他们害怕，害怕什么呢？如果被告同意招供，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能证明向他们出示的文件是真实的呢？人们会要求法院鉴定吗？谁会要求呢？

莫尔恰诺夫，还有他们所有的人都被那些形式主义的观念束缚住了，不管是什么样的笔录，只要被告人签了字，照他们看来就是真正的证明文件了，而他们害怕的是不真实的证明文件……真是些吹毛求疵的人……或者他们认为，他会下这样的命令，自己对这件事承担责任吗？不，这样的问题他们应当自己去解决。

“证明文件没有，”斯大林重复了一下，“那有些什么呢？谈话的情况吗？跟谁的谈话呢，跟谢多夫吗？没有说服力，应当直接从托洛茨基本人那里接受指示。戈尔茨曼断言，他是从谢多夫那儿得到指示的。可是也许戈尔茨曼说谎呢？也许他不是同谢多夫，而是同托洛茨基会面的呢？”

莫尔恰诺夫将两手一摊，表示没有办法。

他没什么可以反驳，斯大林想，这下他就没什么可反驳，也没什么可害怕的了，这一下他就会有了文件了，会有戈尔茨曼签字的笔录了。至于戈尔茨曼同托洛茨基是在什么地方，如何见面的，那是他们的事。托洛茨基在丹麦，戈尔茨曼在德国——并不远，乘车只有几小时的路程，他们能会面的。

莫尔恰诺夫没有反对，就是说，他会去执行的。还有亚戈达和阿格拉诺夫也沉默不语，就是说他们也会去执行的。

然后米罗诺夫报告了侦讯的进程：谁招供了，究竟供认了些什么，谁没招供，还在顽抗。

斯大林注意地听完了，然后惊奇地抬起了眉毛。

“加米涅夫不承认吗？果真这样？”

“是的，他不承认。”

“果真不承认吗？”斯大林阴沉地重问一遍。

“不承认。”

“作恶多端，还不承认？”

“不承认。”

“他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吗？”

米罗诺夫耸了耸肩膀。

“对自己子女的生命也不爱惜吗？”

米罗诺夫默不作声。

“他有两个儿子。难道无论对大儿子，还是小儿子都不怜惜吗？”

米罗诺夫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您为什么不说话？！我在问您！”

“我想，他是怜惜的。”

“啊，您这么认为！”斯大林恶狠狠地说，“那就不要对我说，加米涅夫或是季诺维也夫，或是那儿还有什么人不招供。”他用令人沉重的目光向大家扫视了一下。“告诉他们，不管他们做什么，不管他们怎么想摆脱，他们无法阻挡历史的进程。他们或者保全自己的性命，或者就死掉，就这样转告他们吧！想保命的话，就招供！对他们下点功夫，下点功夫，直到他们低三下四地嘴里衔着供词来见你们为止！”

大家都沉默不语。斯大林发怒时，任何一句不谨慎的话都能让说这话的人付出昂贵的代价的。

停顿了一下之后，斯大林平静而低声地说：

“请转告季诺维也夫：假如他自愿同意出庭，公开出庭受审并承认一切的话，将保全他的性命。假如不愿意，则由军事法庭审判他。他就将被枪决。而且他的追随者们，现在的和过去的，全都将被处死。如果他不需要个人的生命，那么让他为那些被他拖入泥坑的人的生命考虑考虑。”

亚戈达和他的助手们走了。

斯大林站起来，在办公室内踱步。叶若夫也站了起来，但斯大林示意，让他坐着。

“他们实际上能让多少人出庭呢？”

“十六个人。”

“他们之中只有八个人有点价值，”斯大林冷笑了一下，“其余的毫无价值。”

“其余的是执行者，”叶若夫小心地说。

斯大林仿佛没听到他的回答似的，接下去说：

“押送来差不多四百人，仅仅使十六个人屈服。成绩不坏，没什么可说的。”

叶若夫非常清楚，这些责备是针对亚戈达的，同时也明白，斯大林在等待他对自己的话作出反应，但是应当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他还没有嗅出来。

“米罗诺夫和莫尔恰诺夫是很好的工作人员，特别是米罗诺夫，”斯大林继续说，“但是他们是形式主义者，是些吹毛求疵的人，对他们来说笔录就是一切！为什么对他们来说笔录就是一切呢？他们想以笔录来使自己得到保险，万一有什么意外，可以用笔录来证明自己无罪，从而逍遥法外。请问，‘会有什么意外’呢？他们害怕会出什么样的‘意外’呢？苏维埃政权倒台吗？唉，如果苏维埃政权被推翻的话，他们将是第一批被绞死的人，他们无法用任何笔录证明自己无罪，谁也不会去看一下他们的笔录的。他们究竟害怕什么呢？更换党的领导人吗？如果更换了党的领导人，他们可以保全自己吗？看来，是这样，他们是为了在这种情况下保全自己。何况他们是亚戈达的人。而亚戈达对审判的准备工作怠工，消极怠工。由于同样的原因他在怠工。但是，并不象莫尔恰诺夫和米罗诺夫那样害怕更换领导人，而是希望更换领导人，对更换领导人很有信心。”

斯大林走到桌子跟前，将刚才亚戈达和他的助手们坐过

的椅子挪得靠桌子近一些。

“但还是让他去搞这次审判吧，不要去干扰他。不过在这次审讯中他应该为下一次审判作好准备。在这次审讯中应当把季诺维也夫分子消灭掉，下一次消灭托洛茨基分子……让他们把那些人的名字说出来……名字，名字，再说一遍，要这些人的名字。他们应当明白：他们说出来的这些托洛茨基分子越有名望，他们关于托洛茨基的说法就变得越可靠，他们对法庭的帮助也越大，他们保全自己性命的可能也越大。我再重复一遍：要这些人的名字，名字，再说一遍——名字。这些人名声越大越好。应当要求亚戈达，要求他的助手们和所有侦讯小组做到这点。我认为，您应当全力去抓这个机构的工作，渐渐地把侦讯机关抓在自己手里。亚戈达是个不可靠的人。但是，我重复一遍，他还是要在这次审判，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审判搞到底。”

斯大林继续在办公室里慢步踱来踱去。

叶若夫耐心地等待着，他明白并感觉到，斯大林马上就要告诉他某件重要的事，或许，是最主要的事。

“所有托洛茨基分子过去都是军事干部。他们不少人还留在军队里。例如，师长施密特1923年曾投票赞成反对派，据说是脱离了，但谁相信这点，他是普里马科夫的密友，这对普里马科夫更糟，让他选择朋友时要小心些。当然，亚基尔同志会保护施密特和普里马科夫的，但是让亚基尔同志等到侦讯结束吧。普特纳师长1923年时也曾投票赞成反对派，是个不真诚的人，顺便说说，他是图哈切夫斯基的亲密朋友和同学，他们的联系也应当审查一下。很有意思，不知关于他的朋友和保护人图哈切夫斯基同志的情况普特纳会说些什么。我想，特

别有意义的是图哈切夫斯基同志和德国军界的联系。材料您随身带来了吗？”

“带来了。”叶若夫将公文夹打开。

“请讲讲，您那儿有些什么？”

叶若夫从夹子里取出最上面的一页纸。

“个人经历材料……”

“不需要。我了解他的履历。您那儿有什么他同德国有关的东西吗？”

叶若夫取出了另一张纸。

“首先是被德国人俘虏。1915年2月19日在喀尔巴阡山第一次被俘，关在施特拉尔松海边的战俘营内。他逃跑了。逃跑之后，过了三星期又被抓住，是在寻找去瑞典的船只的时候。他被囚禁在梅克伦堡的巴特什图耶尔集中营，又逃跑，在丹麦边境附近被截住。囚禁在明斯特附近的士兵战俘营里，再次逃跑，在离荷兰边境30米的地方又被抓获。在这之后被囚禁于丘斯特林要塞、措里多尔夫堡，再次企图逃跑，他突破了地下通道，但在那儿被截住，转至专门囚禁屡次逃跑的人的因戈尔施塔特的巴伐利亚要塞九号堡。1917年深秋又从那儿逃跑，这一次，第五次逃跑成功了。”

“从这个巴伐利亚要塞到俄国边境距离是多少？”斯大林问道。

“1120公里。”

“这么长的距离他怎么能通过呢？一个俄国军官？”

“他的德语和法语很好。”

“在敌人的国土上通过这么长的距离，只有这点还不行。有谁帮助过他吗？”

“这方面没有材料。他是同军官切尔诺韦茨俩人一起逃跑的。但是那个人三天后被抓住了，而图哈切夫斯基走掉了。”

“一个人被抓住了，另一个走掉了。有意思。有人已找到蛛丝马迹了。一个人被抓住了，另一个人却没被抓住，让他自由地走完了一千公里。有意思，很有意思。请继续说下去！”

叶若夫取出了另一页纸。

“这里是一些正式访问的材料。第一次是1923年图哈切夫斯基以红军最高统帅部联络官的身份被临时派到德国国防军那儿去工作。参加了苏德军事谈判及有关德苏签订拉帕洛条约的准备工作，然后在缔结了条约之后又参加外出巡视，接着在1926年和1932年之间又两次为军事合作方面的问题去过德国。因为这些谈判和条约涉及德国在我国境内利佩茨克、喀山、哈尔科夫的军事设施，那么，无疑，他们会留下由图哈切夫斯基签字的证明文件的。最后一次是今年二月在英国参加国王格奥尔格五世的葬礼的回国途中曾顺路去过柏林。”

“在高级将领中还有谁曾到过德国？”

“有亚基尔，乌博列维奇、艾德曼、铁木辛哥，他们在德国总参谋部的军事学院学习过。”

他又含有愧意地补充说：

“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去过和在那儿学习过。”

惭愧的是没有准备一份名单。斯大林明白这点，严厉地说：

“请准备一份所有同德国有过联系的军人的名单。毫无疑问，他们并不全是德国间谍。例如铁木辛哥，是人们派他去学习的，他就学习了。至于他究竟学得怎么样，这我们会看

到的。不过他在军事工作中表现不错。是个朴实的人，出身平民，至于亚基尔、乌博列维奇、艾德曼和其他一些人——对他们需要仔细进行审查。”

斯大林默默地在房间内走了走，在窗口旁站住了。是时候了呢，或者还不是时候？

一切都应当由叶若夫掌握，这事不能信任亚戈达。亚戈达可能会去预先通知的。但是现在让叶若夫代替亚戈达还为时过早。亚戈达一定要负责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审讯工作。可是毕竟该开始了，叶若夫是善于保密的。

斯大林离开窗口，在他的圈椅上坐下，阴沉地看了叶若夫一眼。

“图哈切夫斯基在口头上是德国不共戴天的敌人。但实际上我认为，在德国的将领中他有不少朋友。他的履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而军人们，不论是我们的军人，还是德国军人，都想摆脱党的领导。我想，德国侦察机关会有关于这类联系的情报的。真遗憾，德国侦察机关比我们工作得更好，我们没有掌握这样的情报。我不知道，如果德国侦察机关同我们交流这些情报，会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他们。不过应当尝试一下，设法搞到这些情报。我想，任务是可以完成的。但应当在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审讯结束之后再着手去干。”

想了一下，又重复了一遍前面说过的话：

“亚戈达是个不可靠的人。”

25

关于在高尔基师范学院化学实验室内制造炸弹的说法不了了之了。金属球没有作为物证向法庭出示。季亚科夫在高尔基市伪造的证明文件都附在案卷里，只在法庭上作为被告准备恐怖行动的证据。

然而作为实现涉及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恐怖阴谋的证据，它是无力的。这一点不仅沙罗克明白，大家都明白。

曾经试图使原来的反对派分子屈服，但没有结果。从监狱、集中营、流放地带来的四百人中间只有两个人招认了所需要的供词：德赖采尔——托洛茨基过去的贴身警卫队队长，1927年就已脱离反对派；还有戈尔茨曼，外交人民委员部的负责干部。可是仅这两个证人还是太少。为了证明托洛茨基在国外还领导苏联国内的一个恐怖活动的总部，不得不牺牲了四名德国共产党员，他们是希特勒上台掌权前夕来莫斯科的。这是过去德国共产党主要的机关报《红旗报》的编辑弗里茨·达维德、前苏联驻德国的记者科农·贝尔曼—尤林，还有两个同姓的人：纳坦·卢里耶和莫伊谢伊·卢里耶，前者是外科医生，后者是学者。对这四个人全都说，他们应当履行党员的义务，招认所需的供词。自然，为此答应保全他们

的性命。

各侦讯小组加紧对七名主要的被告人发起进攻：原季诺维也夫派分子季维诺也夫、加米涅夫、巴卡耶夫、叶夫多基莫夫以及原托洛茨基派分子斯米尔诺夫、姆拉奇科夫斯基和捷尔·瓦加尼扬。

从武特科夫斯基和莫尔恰诺夫无意中说出的话里，沙罗克猜到对这些被告人的侦讯是由斯大林亲自指挥的，斯大林亲自下达指示，需要从他们口中取得些什么样的供词，并对已取得的供词亲自进行检查和修正。

对付原托洛茨基分子的困难还在于，他们，譬如伊凡·尼基季奇·斯米尔诺夫，从1933年1月起就已被囚禁，他们以此证明自己不在现场，与此案无关。他们怎么能从监狱里来领导恐怖活动呢？

但是斯大林不愿考虑这点。

“审讯斯米尔诺夫要同对姆拉奇科夫斯基的审讯工作一起进行。”他命令说。

不难猜出，为什么斯大林想处死斯米尔诺夫。伊凡·尼基季奇·斯米尔诺夫，过去是工人，1899年他才十七岁时就入了党，积极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在沙皇的牢狱和流放地度过了许多年，内战时期带兵打败了高尔察克，在党内享有很高的威信，虽然曾一度追随反对派，但1929年就脱离了。然而当初他曾坚持要执行列宁关于撤去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要求。斯大林如果使斯米尔诺夫招供，就能使审判具有更大的说服力，而且可以满足他个人固有的复仇欲。

斯大林指示，审讯伊凡·尼基季奇要同对谢尔盖·姆拉奇科夫斯基的审讯工作同时进行，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理

解的。这两个人在内战时就成了亲密的朋友，而且至今仍保持这样的友情。尽管关在不同的监狱内，应当把他们之间的友谊看作为同谋者的私交。况且姆拉奇科夫斯基深受斯米尔诺夫的影响，如果斯米尔诺夫屈服，姆拉奇科夫斯基也会屈服的。负责办理此案的斯卢茨基就是根据这个情报来行动的。

斯卢茨基是个高级官员，外事局局长，所以能以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的名义说话。对斯米尔诺夫和姆拉奇科夫斯基这样的人，任何残酷的侦讯手段都无法使他们屈服的，应当由一个虚伪的、狡猾的、善于博得被告好感和信任的人来跟他们打交道。而斯卢茨基正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天生的演员，善于装出善良和诚恳的样子。

然而，斯米尔诺夫对指控他进行恐怖活动的回答是：

“这一招儿是行不通的。我从1933年1月1日起就在监狱里了，因此你们证明不了我在这方面有任何问题。”

“伊凡·尼基季奇，我们不会去证明什么事情的，”斯卢茨基温和地说，“如果您不觉悟的话，将以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的决定不经法庭审判就处死您。可是在法庭上其他的被告会把您当作一个恐怖分子和杀人凶手来指责的，苏联人民也将会记住您是这么个人。假使您执行政治局的建议，帮助党彻底揭露托洛茨基，那么您将会保住性命，随着时间的推移会给您分配适当的工作，而且归根到底一切都会被忘掉的。”

斯米尔诺夫默不作声，嘲弄地看着他。

“您不相信我吗？”斯卢茨基问。

斯米尔诺夫一句话也不回答，继续嘲笑地看着他。

“伊凡·尼基季奇，”斯卢茨基尽可能亲切地说，“您从1927年起就反对党，很快就要十年了。是的，1929年您脱离了反对派，但是您并未完全缴械。您看，您已有十年没有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了，十年来您同社会，同人民隔绝。您是党的骄傲，工人阶级的骄傲，可您却在监狱里，在流放地。但现在您有可能一下子就从这种可怕景象中摆脱出来。伊凡·尼基季奇，请考虑一下。您已到了最后关头，请相信我，到了最后关头了。难道您真愿意可耻地结束您这样英勇的一生吗？为了谁呢？为了列夫·达维多维奇吗？但是他的事情已失败了。要知道您只是在形式上，同反对派断绝了关系，形式上……请从实际上也割断吧！请您帮助党彻底粉碎托洛茨基。为此您得承认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可耻的事，其实您跟这些事毫无关系，这我知道。但是别无他法。如果您想重新取得党的信任，就应当在党的面前彻底解除武装，而解除武装只能用一种代价——承认侦讯员所要求的东西，其他的代价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请您考虑考虑吧，伊凡·尼基季奇！我恳求您。您甚至都无法想象我对您尊敬，崇拜到什么程度。伊凡·尼基季奇，我替你感到害怕。我明白，您受委屈了，您被激怒了，您珍惜自己的荣誉，然而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最高的荣誉是捍卫党的利益，向党屈服吧，伊凡·尼基季奇，屈服吧，否则死路一条，而且将可耻地死去，”他用手指指着地板，“死在那里，地下室里。有谁需要这个呢，伊凡·尼基季奇？”

斯米尔诺夫继续一句话也不回答，一面嘲讽地冷笑着，一面看着斯卢茨基。

“那好吧，”斯卢茨基叹了口气，“我把一切都对您说了，

伊凡·尼基季奇，请相信我，全都说了！我对您说的已远远超过我有权说的了，许多事得由我自己承担责任。可我要再重复一遍：或者您公开缴械，诚实地承认一切，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您就可以活下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果您不缴械投降，那就将被处决，而您的名字在法庭上将受到侮辱，您将作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死去。”

伊凡·尼基季奇脸上那种蔑视而含有讥讽的笑容简直仿佛凝固不动了，他一直以这种神情望着斯卢茨基，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回答他。

斯卢茨基的失败引起了亚戈达、阿格拉诺夫和莫尔恰诺夫的不满，首先是因为斯卢茨基不听斯大林同志的话。斯大林同志说得很明白：“应当把他同姆拉奇科夫斯基联系起来。”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斯大林同志指出了这一对伙伴中的薄弱一环是姆拉奇科夫斯基。就是说，应当从他开始，而不是象斯卢茨基那样从斯米尔诺夫开始。

斯卢茨基急忙改正错误，尽管担心同姆拉奇科夫斯基打交道会比同斯米尔诺夫打交道更加复杂。

斯米尔诺夫是个很有才能的人，虽然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但文化修养很高，姆拉奇科夫斯基则是个天性勇敢，但是暴躁而粗鲁的人。在被捕时曾进行搏斗，人家把他捆绑起来，关进单身囚房，总的来说是个难对付的被告人。

斯卢茨基是个胆小鬼，所以他决定对姆拉奇科夫斯基作工作时采取一种很有礼貌，但完全是公事公办的态度，十分矜持，甚至是例行公事式的。他向他阐明了事情的本质，说政治局决定彻底粉碎托洛茨基，这在当前的情况下完全必须，没有其他的出路，因此让姆拉奇科夫斯基作出抉择，或是帮

助党，这样就可重新回到党的队伍中来，或是作为托洛茨基的信徒被消灭。他又补充说，基洛夫是按托洛茨基的命令被暗杀的(这不是事实)，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此已供认不讳(这也不是事实)，只有伊凡·尼基季奇·斯米尔诺夫还在顽抗(这是事实，这使斯卢茨基前面的几种说法具有一种仿佛是真实的假象)。这样，姆拉奇科夫斯基就面临着抉择了：或是同党一起反对托洛茨基，那就能活命并有前途；或是同斯米尔诺夫一起拥护托洛茨基，反对党，那就既不能活命，也没有前途。他斯卢茨基，在此地只不过是个侦讯员，由于工作需要才向姆拉奇科夫斯基说了他应当说的话。但是如果姆拉奇科夫斯基不反对的话，那么他斯卢茨基将大胆地说说他个人的意见。

“请讲吧。”姆拉奇科夫斯基回答。

“谢尔盖·维塔利耶维奇，”斯卢茨基诚挚感人地说，“您是内战时期的英雄，人民、国家、党都知道您是这样一个人。您是个伟大的军事长官，如果您不参加反对派的话，您现在大概是我们军队的领导人之一了。如果您服从我们的要求，无疑您在法庭上将不得不熬过几天不愉快的日子。然而以后……以后，谢尔盖·维塔利耶维奇，就要发生战争了。您可是清楚地知道的，希特勒在准备什么。战争一开始，您谢尔盖·维塔利耶维奇，一定会在保卫国家的事业中占有一个与您的才能、知识、经验和天才相称的适当的位子，那么在法庭上的这些日子谁还会记得呢？而且即使有人想起这件事，那也只是作为您的英勇，您对党的忠诚，对党的理想的无限忠诚的又一证明而已。我很难启齿说我要说的这些话，但我应当这样做。您必须作出抉择：光荣地活下去或者可耻地死

去。”

“我应当承认什么呢？”姆拉奇科夫斯基阴沉地问道。

姆拉奇科夫斯基不仅招认了所需要的供词，而且还负责去劝说伊凡·尼基季奇·斯米尔诺夫，但这一点他没有成功。在当面对质时，斯米尔诺夫大骂姆拉奇科夫斯基是懦夫，并且拒绝同他谈话。

姆拉奇科夫斯基也火冒三丈，又补充招认了反对斯米尔诺夫的供词：仿佛还在1932年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斯米尔诺夫就曾建议同季诺维也夫派分子联合起来转而采用恐怖手段了。

就这样，除了奥利别尔格和赖因霍尔德提供了反对斯米尔诺夫的证词之外，又加上了他最亲近的朋友姆拉奇科夫斯基的证词。也许这已足以将斯米尔诺夫拖到法庭上受审了，但是要迫使他承认什么，还是不行。

斯卢茨基失败之后，斯米尔诺夫就转给加伊了。他是领导间谍情报机构和“行动技术”的特别局局长，这种技术在这里亲切地称呼为“娜久莎”行动，由其代号“H措施”而得名。

加伊是个厚颜无耻，残酷无情的人。有一次沙罗克得到指示，要他审讯一个认识斯米尔诺夫的托洛茨基分子，他说想先写一个审问提纲。

加伊蔑视地看了看他问道：

“您想了解一下我的审问提纲吗？”

“当然想。”

加伊从桌子的抽屉里拖出一根橡皮警棍来，在空中转动了一下。

“瞧，这就是我唯一的审问提纲。而且建议您也去弄一根这样的东西。”

但这还是在斯大林正式指示可使用体罚的方法之前，沙罗克一直不敢把这样的“审问提纲”放在抽屉里。

加伊开门见山地立即向斯米尔诺夫宣布，说他已被完全揭露，不仅有奥利别尔格、赖因霍尔德、德赖采尔、戈尔茨曼和姆拉奇科夫斯基的供词，还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供词都揭发了他（这次是事实，因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已招供），因此他只能证实他们的供词，承认自己的罪过。

为了证实自己的话，加伊将审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笔录递给斯米尔诺夫。

“请读一下吧！”

然而斯米尔诺夫拒绝读笔录。

“你们什么都能做的，”他回答说，“甚至能从马太那里把他在福音书里说我是恐怖分子的证明拿来放在我面前，你们有足够的印刷厂来做这件事。”

“您不相信吗？”加伊冷笑了一下，“马上您就会相信的。”

他拿起内线电话的话筒，同一个什么人说了几句斯米尔诺夫不大听得懂的话，放下话筒，然后开始写什么东西，不去注意伊凡·尼基季奇。

有人来敲门了。

“请进！”加伊喊了一声。

门开了。有一个人在卫兵押送下走进房间，斯米尔诺夫没有立即认出这人是季诺维也夫，季诺维也夫几乎站不住了，

他呼吸艰难，脸孔浮肿，满面病容。

在卫兵的搀扶下，他在椅子上坐下。

“季诺维也夫公民，”加伊说，“您承认您在侦讯时所招认的关于斯米尔诺夫，伊凡·尼基季尼参加‘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的恐怖活动的供词吗？”

“我承认，”季诺维也夫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说。

“可是斯米尔诺夫公民否认，”加伊说。

季诺维也夫抬起一双疲倦而空虚的眼睛望着斯米尔诺夫，轻声地说：

“伊凡·尼基季奇，需要从政治上来考虑。假如我们帮助科巴的话，科巴也会帮助我们的。这将为我们打开通向党的大门。”

“他为我们打开的是到阴间去的大门，”斯米尔诺夫回答，“你不了解科巴吗？你相信他吗？他是个撒谎的人和骗子。他想出这一切来，是为了要消灭我们。”

“我没有把握，”季诺维也夫低声说，“但是如果你不帮助他，那他一定会把你消灭掉的。”

“我宁愿作为一个正直的人死去，而不愿成为一个撒谎的人，懦夫和卖身投靠的畜生。”

听了这些骂人话之后，加伊在当面对质的笔录中写下季诺维也夫确认自己关于斯米尔诺夫参与恐怖活动的供词，而斯米尔诺夫对此却每次都回答说：我否认，我否认，我否认。

季诺维也夫被带走了。

加伊将桌子上的文件整整齐齐地叠起来，然后将几张纸重新挪了一下地方，仿佛顺便提及似的问道：

“您认识萨福诺娃吗？”

伊凡·尼基季奇第一次抬起头来。

“萨福诺娃，”加伊重复了一遍，“您知道这个名字吗？”

“知道。这是我的前妻。”

“那么读一下这个吧！”

加伊将萨福诺娃的一份“交代”放在斯米尔诺夫面前，她在其中证实了1932年底，也就是斯米尔诺夫还未坐牢时，就从托洛茨基那儿接受了关于建立反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恐怖组织的指示。

“这东西你们也可以编造的，”斯米尔诺夫把文件扔到桌上。

加伊按了一下电铃的按钮，命令卫兵将证人萨福诺娃带上来。

斯米尔诺夫紧张地注视着门口。萨福诺娃走进来了，斯米尔诺夫已多年没见到她了，这个女人过去有个时期曾是他的妻子，他们是作为好朋友分手的，而且后来还一直是好朋友。

加伊向她指了指一张椅子，她坐下就啜泣起来了。斯米尔诺夫从未见他的前妻哭泣过。过去她曾是位很坚强的妇女。她哭泣着，无法停下来，加伊也不去制止她——让她哭吧，哭得越久越好。最后萨福诺娃终于控制住了自己，擦去了眼泪。

斯米尔诺夫朝“交代”点了点头。

“是你写的？”

她又啜泣了，然后擦了下眼睛，开始断断续续地说：

“伊凡！我们没有别的出路。不论是你，还是萝扎（她说的是斯米尔诺夫现在的妻子的名字），还是奥莉加（斯米尔诺夫女儿的名字）。只有你能救我们的性命——你服从政治局

吧！要知道大家都明白：这次审讯目的是反对托洛茨基。连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都明白了这点。假如你出庭的话，那么全世界都将看到你，那时你也不会被处决了，而如果不这样，如果你不出庭的话，那么一定会处决你的，我们也将被处死，而且这事谁也了解不到的。”

斯米尔诺夫默默地听着。过去有个时期他尊敬这位妇女，她是个坚强的，有原则性的、毫不妥协的、勇敢无畏的女子。现在被摧残成这样，成了一个普通的婆娘，被死亡吓破了胆的女人。

“把这个蠢女人带走！”斯米尔诺夫说。

“您不愿同她谈话，”加伊冷笑了一下，“那好吧，这是您的事。”

他又叫来卫兵，用头指了一下萨福诺娃。

“带走！”

“伊凡！”

“滚开！”伊凡·尼基季奇粗暴地打断了她。

萨福诺娃被带走之后，加伊说：

“您跟人说话时很粗鲁，斯米尔诺夫！”

伊凡·尼基季奇沉默不语。

“请别忘记，要知道您还有其他的亲属。难道您跟他们也将这样谈话吗？”

伊凡·尼基季奇沉默不语。他不明白，加伊在说什么。萨福诺娃过去是党员、政治活动家，但是家里人呢！他的妻子萝扎是非党群众，女儿是个大学生，她们跟他的案件有什么关系呢？

关于这一点，十分钟之后，伊凡·尼基季奇明白了。他

被人带着沿监狱的走廊走过去时，突然在走廊的尽头看到了自己的女儿奥莉加。她遍体鳞伤，头发蓬乱、衣服都撕破了，被两个强壮的卫兵揪住了双手。奥莉加显然没有认出伊凡·尼基季奇来，没有向他扑过来，伊凡·尼基季奇自己向她扑了过去，但是押送他的卫兵从后面结结实实地把他紧紧抓住，奥莉加立刻被拖进了一间囚室，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伊凡·尼基季奇试图挣脱，但是卫兵们把他往牢房里一推，扔在地板上。

门咔嚓一下锁上了。

伊凡·尼基季奇站起来，开始敲门。

监视孔打开了，里面露出了在走廊里值班人员的脸。

“您为什么敲门？”

“请把我带回去见侦讯员！”

“请同楼里值班的人讲。”

“请叫楼里值班的人来！”

小窗口砰的一声关上了。

伊凡·尼基季奇在铺上坐下。瞧，这个恶棍加伊用这种事来威胁他。这么一个刑事犯，就同他的头头斯大林一样。斯大林在监狱里同刑事犯们交朋友不是平白无故的。不过他们对女儿还没有干什么，他们只是威胁，向他表明，他如再固执下去会有什么后果，就是说，你瞧，等待你女儿的是什么。必须控制住自己。他们明白，如果走了这一步，那么以后就永远不会从他这儿得到任何东西了，他们暂时还仅仅是威胁，用女儿来威胁，然后再用妻子来威胁。但是威胁会变为行动的。而且他本人也将不经法庭审讯而被处死。他的一生已经完结，这是明确的，招认也好，不招认也好，反正一

生都完了。斯大林肯定会处死他，这是明摆着的。就是说，应当救救妻子和女儿。应当作点让步。他们也会同意作点小让步的。会同意的。他们太需要他出庭了。少了他，他们所谓的联合总部就会缺少托洛茨基那个部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已是他们的掌上之物，这应当是意料之中的事——他们悔悟，承认自己各方面有罪已有九年了，因此也肯定会承认新的罪行，承认命令他们承认的事。但是他因为素来知道斯大林的为人，从未悔罪。1929年他脱离了反对派，当时是认为斯大林正走上反对派所建议的道路，走上同右的危险作斗争的道路，在党和反对派之间不再存在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为党工作。但后来他很快就明白自己想错了。斯大林象通常那样在耍手段，从政治上将反对派消灭之后，他把原来的反对派成员全部都关进了监狱。现在他还想要从肉体上将他们全部消灭掉。他斯米尔诺夫，也将被消灭。但是他应该救自己家里的人。为了这点不得不出庭。所以他要出庭。这样做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那些俯首听命的被告人和卖身投靠的证人对他的种种诬蔑。斯大林为了在被告席上看到斯米尔诺夫，不得不容忍他斯米尔诺夫干扰他导演的那出戏。

斯米尔诺夫向加伊声明，他同意承认，仿佛托洛茨基在1932年曾作过关于恐怖活动的指示，但是他斯米尔诺夫因一直坐牢，没有参予任何恐怖活动，也不了解其他的被告人是否参加了恐怖活动。作为交换条件他要求立即放他女儿回家并让他有可能确认这点。

加伊接受了这些条件。两小时之后斯米尔诺夫又被叫到加伊那儿，加伊建议他打个电话回家。斯米尔诺夫打了。妻

子来接的电话，然后是女儿。她们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斯米尔诺夫回答说：

“一切正常。”

斯米尔诺夫每天在加伊的办公室里当着他的面打电话，相信妻子和女儿确实在家。

26

在接收站里她们是三个人，三个妇女：一个人收内衣和家用布品，另一个人发，第三个人开收据和收款。

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立刻被安排去发内衣和家用布品——这是个费力和令人精神紧张的工作。一叠叠内衣和家用布品很重，向顾客们作解释非常伤神：一会儿缺少了什么，一会儿床单撕破了或者沾上了脏斑，忽而在哪一包内把别人的短裤当作背心放了进去等等。往往是工厂搞错了，还有柳夏，那个收东西的姑娘也有责任，她没有仔细检查，没有发现有的衣服原来就有毛病，这本来应当在收据上注明或者有些根本就不该接下。

塔玛拉·费奥多罗夫娜是个上了年纪的，严肃的，寡言少语的妇女。她坐着开收据并收款，在此地被看作是组长，有时她对柳夏提出意见。

柳夏是个年轻姑娘，噗嗤地笑了，她回答：

“我就得把他们的脏衬裤一条一条地细看啰！”

塔玛拉·费奥多罗夫娜无法都照顾到：开收据很复杂，挺麻烦，需要按价目表填上每件衣物的收费价格，并不是所有来件在价目表上都标明的，有的得根据类似的东西确定价格

并进行结算，还要数钱、给找头，而且还不能算错。

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替大家吃苦受累。她不会顶撞人，加上对明显的事情也不能提出反驳，就马上写一个短缺证明或废品证明。主任雅科夫·格里戈里耶维奇对此很不满意。

雅科夫主管五个接收站，有时早上来，有时下午很晚才来，皱着眉头看：是个驼背拱肩、脸色阴沉的男子，不吭声地听取塔玛拉·费奥多罗夫娜的解释，没有把握地把钢笔放进墨水瓶中蘸一下，迟钝地看着汇总表，然后费劲地画出表示他的签名的弯弯曲曲的名字来。

在表示短缺和不合格的证明上签字之前，他怀疑地仔细看看来，甚至还看看反面——有没有捣鬼，然后对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

“从来没有人写信告过您。”

“要知道内衣或家用布品不是我搞坏的，”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为自己辩解。

“您自说自话，”他把一块桌布拿在手里。“能在洗衣房里沾上这样的污点吗？”

“但是收据上没有注明有斑点，”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反驳说。

“干吗要注明呢？”柳夏发怒了，“我收桌布的时候，上面没有斑点。您为什么捏造？”

“柳夏，您没明白我的意思，”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试图解释一下，“我说的正是这个：既然收据上没有注明，就是说，是在工厂里弄坏的。”

虽然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清楚地看到柳夏马虎从事，

但她还是这样回答。

“难道这是个斑点吗？一点都看不出来嘛，”雅科夫·格里戈里耶维奇严厉地不容反驳地说，“可您不愿意向顾客解释。您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我应当向工厂去要求赔偿，我得为您工作。”

每天都是如此。而且时间越长，找茬儿的次数就越多，他的态度也越粗鲁。

雅科夫·格里戈里耶维奇走后，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把硝化甘油片放到舌头下面，坐到小凳子上，沉重地喘着气。塔玛拉·费奥多罗夫娜便默默地站起来，亲自去发内衣和家用布品。

“谢谢，塔玛拉·费奥多罗夫娜，我已经好一些了。”

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站起来，上了柜台。有时她试着去说服顾客，但那些人连听都不愿听，争吵得更厉害，还骂人，在意见簿上不仅写了洗涤质量不好，而且说工作人员态度粗鲁和马虎大意。

“有人告了您，”雅科夫·格里戈里耶维奇阴沉地说，“不得不给处分了。”

“您知道，”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回答，“这工作对我来说太重了，我的心脏有病，让我走吧。”

“如果您有病，首先应当领残废证，”雅科夫·格里戈里耶维奇说，“不过我可以作为工作不称职解雇您。我可以向工厂送份报告：由于顾客控告。”

“您可以按本人要求来将她免职，”塔玛拉·费奥多罗夫娜突然出来干预了。

“那让谁来接替呢？”

“您考虑嘛！您主任就是干这个的，就是该您来考虑，您要知道，她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又有病，您干吗捉弄人呢？！”

“嘿，嘿，塔玛拉·费奥多罗夫娜，您是否有点过分了，知道吗，您在维护什么人？哪儿也不会要她的，她的儿子在劳改营里。”

“他不在劳改营……”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开始分辩了。

但是塔玛拉·费奥多罗夫娜打断了她。

“有没有人会要她，让她自己去操心。她不能在这儿工作，您是明白的。您没有权利捉弄一个劳动者，我们是在苏维埃政权下生活！”

“谁，谁捉弄人了？”雅科夫·格里戈里耶维奇嘟哝起来了。

“您！是您在捉弄人。这点我们可以证明。”

“确实如此，”柳夏突然宣称，“我们肯定能证明。”

雅科夫·格里戈里耶维奇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脸色阴沉地对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不客气地说了一句：

“送一份自愿辞职的申请来。”

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洗衣店的工作就这样结束了。

现在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找一个新的工作。

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同薇拉和波林娜姐妹俩以及住在同一个大门内的邻居、年老的亚美尼亚人玛加丽塔商量，当然也同瓦里娅一起商量这个问题。

瓦里娅对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离开洗衣店感到高兴。

“您需要一个安静的，坐着干的工作。”

“可上哪儿去找呢？”

“我们会找到的。”

瓦里娅首先想到了维卡·马拉谢维奇，她有许多有势力的熟人。那些熟人能帮上忙的。而且她的父亲马拉谢维奇教授在加加林巷的门诊所里担任咨询工作，也许能将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安排到挂号处去。如果能行，这就很理想了，门诊部很近。

瓦里娅打电话给维卡。接电话的是瓦季姆，瓦里娅立刻听出了他的声音。

“你好，瓦季姆……”

“您好……您是哪位？”

“我是瓦里娅·伊凡诺娃，你还记得吗？尼娜的妹妹。”

“啊……”瓦季姆拖长了声音说，冷淡地补了句：“您说吧！”

“我要维卡听电话。”

“维卡不在。”

“那她什么时候在？”

“永远也不会来了。她不再住在莫斯科了。”

“啊，是这样。”

“是的，是这样。再见。问尼娜好。”

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他说话时粗野无礼。奇怪。是否维卡出了什么事了。关进监狱了吗？

维卡的丈夫阿尔希捷克托尔好象一切正常，他的名字常见到……可维卡出了什么事呢？

过了些时候瓦里娅才得知维卡出嫁了，去国外了。

但在这种时候维卡不在使她很难过——当然，要不她是会帮忙的。

瓦里娅甚至去找卓娅帮忙。卓娅的妈妈在“狂欢”电影院当检票员。也许，还需要检票员？

卓娅热心地去想办法。她希望，她参与此事能有助于恢复她同瓦里娅的友谊。

她每天告诉瓦里娅新的消息，不住地有一些给人以希望的消息。

“狂欢”影院那里确实暂时没有什么希望，但是估计在“阿尔斯”有个位置，在他们那幢房子里，倒很不错。

结果“阿尔斯”也没成功，可是在阿尔巴特广场的“艺术”电影院内有个位子。卓娅的妈妈认识所有电影院的经理，在这个行业里她有很多熟人。

后来又说“布拉格”电影院，也在阿尔巴特广场附近。接着说在尼基塔门附近的“联合”影院……

两个星期过去了，瓦里娅不再相信卓娅的废话了——她是害怕承认她毫无结果。

于是不得不去请求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了。而瓦里娅是非常不愿意去作这件事的。自从那次送花的事情之后他们的关系有些变化。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还象过去一样对她很好，彬彬有礼地微笑着，带她去参加技术会议，有几次甚至还送她回家——他们同路，但是态度上拘谨了。他明白，关于花的那封信当然不是由于住房内人们的惊慌所引起

的。只不过是瓦里娅要同他保持距离才这么说的。可表面上一切如旧。因此瓦里娅担心，对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提出这类请求可能会使他作出不正确的分析。她不愿让他了解同萨沙的母亲有关的事。

然而没有其他的办法。

“我有个熟人，”瓦里娅说，“她住在我们这座房子里。我很了解她，也很爱她。这是个孤独的上了年纪的妇女，诚实、善良而且品行端正。她早就同丈夫离婚了，而她的儿子已在前年被捕。她一个人。没有任何生活来源。她在洗衣店里工作过，交付内衣及家用布品，但这工作从体力上来说很费劲而且使人神经紧张，不得不离开了。她是个有教养的妇女，中学毕业，可以胜任任何办公室职员的工作。可不可以将她安排到我们这儿随便哪里或者到其他的设计部门？您能不能帮个忙？当然，得在离阿尔巴特街不远的随便哪个地方，您是知道的，现在挤电车是什么情形。”

“在我们这儿？”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重问了一遍。“但是，瓦莲卡，旅馆工程快结束了，未完工的部分——这已不算数了。我们局将转入其他工程项目的设计。项目尚未最后确定。甚至还可能要改组，现在正在议论这件事，有人要让我们同其他设计室合并，这就是说，是新的编制。总之，这一切都决定之后，到那时才可以想想办法。我指的是在我们这里。至于其他的地方，我……”他沉思了，“我可以试试，问问看。她能作什么呢，您推荐的这个人？顺便提一下，她姓什么？”

“潘克拉托娃，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

他记在台历上了。

“好！那么她能干什么呢？”

“任何办公室职员干的工作都行。整理文件、登记，也可作谁的秘书——她是个井井有条而且乐于助人的人。会计员或出纳员也行。不，出纳员不行。她会弄错钱的。收发员行。”

“她有什么专长吗？”

“说实话，我不知道。最近她在洗衣店工作过，但这是偶然碰上的。只不过是因为离家近。”

“我试试去打听一下，”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说，“不过我认为，比较现实的是等我们改组并且确定了新的编制之后。我看得出来，您很关心这位妇女的命运，”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微微一笑。

“是的，”瓦里娅说，“她是我一个亲近的人。”

又补充了一下：

“她现在遭受到很大的不幸。应当帮助她。”

傍晚瓦里娅对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讲了她同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的谈话情况。她不十分相信这个方案能实现，但她想使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振作一些，使她感到有希望了。

“顺便说说，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您有什么专长吗？我的领导问起这个。”

“职业吗？我没有什么固定的职业，瓦列奇卡。我中学毕业……在哪一年呢？在1910年。噢，想进音乐学院……我当时嗓子不错，但是出嫁了，萨申卡出生了。后来是战争，革命。萨沙长大了，大约是在1922年、1923年我工作过，说确切些，是稍微挣点钱。你知道，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萨沙的父亲，是个非常遵守时刻，要求很严的人，一切都得按

时——早饭也好、午饭也好、晚饭也好。而且家里必须井井有条。一切都要洗干净，熨平。因此我不能去作经常性的工作，那样我回家来就迟了。所以，我就寻找那种可以不离开家的工作。有一段时间我推销过奖券，我记得是那种援助伏尔加河流域饥民的奖券。当然，必须挨家挨户地跑，那时好多地方还没有电梯。不过我当时年轻，干得了。那样我经常可以顺便跑一趟商店或跑回家，烧烧煮煮，干点事。说实话，挣的钱不多。按提成的办法工作的。后来我推销过臭氧发生器。”

“那是什么东西？”

“这样，把它们挂在厕所里来驱除臭气。你知道，是一些有小孔的小盒子，盒子里有法兰绒的吸收各种有强烈气味的物质的象枕头那样的小垫子。二十年代中期，它们刚出现时很流行的，人们都买，但后来很快就过时了，也没人买了。当然，这一切都相当可笑，”她大笑起来了，“你来到一家人家。‘请购买臭氧发生器吧！’，‘这是什么东西呢？’你得解释，还给他们看。为了这个有时还得走到厕所里去作示范，如何挂法。有时厕所不空，就得等。而且住房是几家合住一套的。就是说，要由所有的住户一起来决定。一个发生器只不过值二、三个卢布，但是不管怎样得大家付钱。随便哪个人不愿买，他一说‘我不需要您的臭氧发生器，’大家也就不买了；干嘛，他想呼吸新鲜空气却要我们付钱？不！于是谁也就享受不到这新鲜空气了。”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又笑起来了，“我不得不放弃推销臭氧发生器，便干起了保险公司代理人的工作。我搞人寿保险，给财产保火险等等。总的说来，这工作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知道，很少有人愿意给自己保险。你给他保险之前，先得劝说一小时。可那人回答说：我干吗要保险

呢？我有什么财产呢？一张桌子、一张床、三把椅子。这石头房子里会有什么火灾呢？而有时还这样说：‘你们这些代理人说得倒是好听，可要是到你们那儿去拿钱的话，就连话都不愿意和你说了。’顺便说一句，这是事实；我们代理人，按提成的办法工作，我们努力去给人保险，而检查员们则相反，想方设法不付赔偿金或者少付……总之，很伤害人的自尊心。有的时候，也曾有过这样的事，简直就把人赶到门外。不过主要的还不是这点。你知道那儿，指定开会时间非常突然。快到五点钟了，你去交收据和钱的时候——突然把你拦住：你留下开会吧！而我应当回家，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很快就要下班回来了，午饭应当上桌了。有一次我留下开会，他对我吵得那么厉害，我只好不干这个工作了。有人邀请我去电台唱歌，虽然我没学习过。但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绝对不准。就这样，瓦莲卡，我变得没有职业了，说得确切些，找了个最平凡的职业——家庭妇女。”

薇拉到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这儿来了。她精神抖擞，活动能力很强。姐姐离开洗衣店，她十分赞成。

“你作得对。这工作对你不合适。让我们来找一个另外的轻松安静的工作。暂时你忍耐一下。而且别再固执了，哪怕是为了萨沙。”

马克·亚历山德罗维奇寄钱给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她拒绝接受，薇拉对她的固执很不赞成。事实上是，他没有直接寄钱给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因为他第一次汇来的钱她退还给他了，于是马克·亚历山德罗维奇把这些给索菲娅

的钱寄给了薇拉，请她说服妹妹收下，而且坚持每月都寄来。

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不收，因此薇拉便把钱储到存折上。

“你应当全面考虑一下，”薇拉理智地说，“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给你寄多少钱来？”

“五十卢布。”

“你寄二十给萨沙，二十五付房租。你没有什么钱可以过日子的了——只剩下五个卢布，你为什么拒绝接受马克的钱呢？关于萨沙，他是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但是你要理解他的处境。他没能给萨沙做什么，虽然他也有过打算，他自己讲过，发过誓，同最高级的官员们也谈过，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你很了解，马克不会说谎的。唉，至于他说的关于政府，关于斯大林的那些话，你毫无办法，他是这么个人，共产党员，应当这样相信，他相信一切都是正确的，一切都是公正的。他这样认为是他个人的事。”

“我不需要他的钱。”

“就算是这样，你不需要。但是萨沙呢？刑期快满了。不会让他在莫斯科报户口的，你应当知道这点而且应当考虑到这点。就是说，他得上别的什么地方去，找个地方安家，以他的处境，这不那么简单。索尼娅，你看事情要现实些，这已不是西伯利亚了，在那儿他一个月二十卢布就可以生活。现在东西要贵得多。花费要大好多倍。又是迁移，又是安家，又会有不顺利的事。索尼娅，你应当明白他的处境。他需要钱，否则他会完蛋的。”

“好吧，”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同意了，“把这些钱放在你的存折上吧，假使萨沙将来需要。我们就寄给他。归根

结底，是他们把他关起来的，是他们把他流放的，现在还把他赶来赶去，到处流浪，让他们用自己的钱帮助他吧。”

“索尼娅！唉，干吗这样？难道是马克让他坐牢的？”

“是的，是马克把他关起来的。马克或者是象马克这样的人。他们全都一个样，全都一模一样。是兄弟吗？是的，是兄弟！可是反正我一点也不打算宽恕他，而且不是因为萨沙。他们对俄国作了些什么呢？他们把人都变成什么了？他自己又变成了什么东西，你的马克？！他身上没留下一点人味儿。他是一部生产钢铁的机器。”

“索尼娅，你不公平。你很清楚，马克非常爱你。我、波林娜对他来说仅仅是姐妹，可你是他心爱的姐姐。还有萨沙，是他心爱的外甥。”

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打断了她的话：

“那是过去。现在他只有一个敬爱的人——斯大林。他们全都给迷惑住了，被这个名字遮住了眼睛，他们不愿意考虑斯大林在干什么；他们对他们来说是上帝，比上帝还高，因为对信仰上帝的教徒来说还有善恶、仁慈、赎罪、怜悯这些概念，而对他们来说却什么都没有。对他们来说只有斯大林。他是他们的上帝，他是他们的良心。”

她喘了口气。

“算了，关于这个谈得够了。现在重要的是我得找个工作。”

“找个工作不成问题，”薇拉说，“不过你仍然应当离家近一些。”

“现在比较简单，有地铁。”

“可毕竟离家近点好一些，我在找，波林娜也在找，还有

她的丈夫，还有我的丈夫都在找。我们去托熟人，一定能找到的。”

然而提出最好和最实际的建议的却是玛加丽特·阿尔乔莫夫娜。她是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邻居，一个年老而聪明的亚美尼亚妇女。

“您不必上哪儿去找工作，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她说，“在我们这幢房子里带几个小孩吧。瞧，古罗夫家有个五岁的小女孩，跟您一样，叫索涅奇卡，是个很可爱的小女孩，古罗夫夫妇都工作，两人全是工程师，小女孩没人照管，古罗夫夫妇曾从农村找了个保姆来，但不能给她上户口，只好辞退了。他们有个大女儿虽然已经是大孩子，十岁了，但她二点之前在学校里上学。古罗夫夫妇正在找人，希望二点之前有人能照看索涅奇卡。然后是福尔图纳托夫夫妇——也都工作，他们有个四岁的男孩鲍里亚。有祖母和外祖母，但她们彼此不和，两人都是隔一天来一次，也是二点钟之后来，因为她们自己家里有事。这可作为到您这儿来的第二个孩子。”

“但是他们好象夏天都上别墅去的，”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

“是的，福尔图纳夫的母亲有别墅，可能他们夏天打发男孩上那儿去。但不是整个夏天。老太太不会整天花时间照看孩子的，她那儿有花园。此外，韦利奇金娜，卓娅·瓦西里耶夫娜正束手无策呢。您认识住在第三个大门里的卓娅·瓦西里耶夫娜·韦利奇金娜吗？她的丈夫去年死了。”

“我认识。”

“是这样，她是位医生，在索科利尼基的什么地方工作，

而孩子得送到‘镰刀与锤子’工厂附属的幼儿园去，她死去的丈夫原来在那个厂工作。您想象一下，有多远的路程？她一清早几乎五点钟就不得不起床。她一定乐意把自己的小女孩送到这个组里来的。下面是萨波日尼科娃，柳博芙·米哈伊洛夫娜，女画家，丈夫上班，她在家画画，描绘领袖像的复制品，没人可陪小孩子玩耍，这已是可上您那儿去的第四个孩子了。我不了解，但是每人付25卢布他们出得起的，结果就有一百卢布了。您可以跟孩子们坐在后面的院子里，那儿有树，安静、很好。如果天气不好，可以在哪个人的家里，轮流好了。顺便说一句，古罗夫家是一套单独的两室住房。”

“我不知道，”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开始犹豫不决了，“从九点到二点可是要喂孩子们吃东西的，在哪儿呢？”

“这一切都可以安排好的，”玛加丽塔·阿尔乔莫夫娜有把握地回答，“孩子的父母们彼此之间会商量妥当的。您看着吧，其他的人也会要求到您那儿来的。”

“不，最多只能四个孩子，再多我照看不了。”

“当然，”玛加丽塔·阿尔乔莫夫娜表示同意，“四个够了。”

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照看这批孩子时间不长——4月和5月，然后孩子们就分散上各处去了，有的去别墅，有的去乡下祖父、祖母那儿了。

有一次，房屋管理员维克托·伊凡诺维奇在院子里遇到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站住了问道：

“您怎么不带孩子了？”

“夏天了，有的在别墅，有的在乡下。”

维克托·伊凡诺维奇沉默了一下，然后说：

“您上列夫申巷五号资产登记所去一趟，找阿法纳西·彼得罗维奇，告诉他，是我介绍您去的。请随身带上身份证。那里临时需要人手，秋天之前去工作一个时期吧。”

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去了资产登记所，她被录用了。她帮助另一个妇女，所里的一个女工作人员整理文件、图纸、房屋建筑平面图、预算。所有这一切都很长时期没有人过问了，因此工作很多，而且相当有意思：几乎所有的房子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都熟悉，是阿尔巴特街及其毗连的一些巷子。

文件整整齐齐地折叠在一本本大的活页文件夹内，装订起来，按房屋号数的顺序放在架子上。桌上放着一份资产登记册中应有的文件清单，如果缺少了哪些，那就得找。有时缺少的文件在另一座房屋的卷宗里被发现了。而且还要检查一下办理手续的情况：是否写上了日期、有未签字等等。

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一切都做得认真仔细，因此负责人对她很满意。她们在地下室工作，但那里很干燥。在人行道水平面上用格栅拦起来的窗户中甚至有太阳光透进来。

她们有电炉、茶壶，可以给自己热午饭、烧茶，所以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此地感到很好，很舒适。每月收入七十卢布。

但她经常想起她带的那些孩子，特别是常常想起古罗夫夫妇的女儿索涅奇卡。

“这样一个聪明、有天赋的女孩子，”她告诉瓦里娅，“多么善于模仿。在家里她听了好多童话故事，甚至还这样和我讲话：‘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我的美人儿，请您给我们读点儿什么吧。’如果我在沉思，她就问：‘你为什么忧伤起来

了，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假如有谁碰疼了，她就说：‘啊，别哭，好小伙子。’有一次，她对另一个小女孩说：‘喂，来玩吧，老家伙！’我对她说：‘索涅奇卡，不能这样讲。’而她回答说：‘这是童话里爷爷这样骂奶奶的。’”

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微微笑了。

“孩子们挺逗人发笑，而且全都不一样。有个小男孩叫鲍里亚·福尔图纳托夫，令人吃惊地会装假，你知道，他非常狡猾。‘鲍里亚，把玩具随身带走！’‘不，我不能，我是病人……’‘你哪儿痛啊？’‘鼻子里面有小水珠……’有一次在古罗夫家吃午饭，我给他们倒了酸糊汤。鲍里亚不想吃：‘不是汤，是个什么泥潭。’你注意，他想出了一个多么准确的比喻啊！有一天他跌倒了，我说：‘别哭了，难为情的。’‘不，不是难为情，而是痛，我跟路撞了一下。’‘全都已经过去了。起来吧！’‘我起不来了，我跌死了。’可有一天他爬到床底下去了。‘爬出来！’‘不，这儿好。房间里是白天，床底下是黑夜。’‘好吧，好吧，爬出来吧，你可是个好孩子。’‘不，我不好，我是个讨厌鬼！’”

瓦里娅对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如此善良感到吃惊，但对她能在生活中找到了某种乐趣感到宽慰。即使稍微使她解脱一下她那些令人痛苦的愁思和为萨沙的担忧也是好的。

“总之，”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继续说，“孩子们有惊人敏锐的观察力，对词的分辨能力很强。我给一个女孩子戴顶圆形软帽时，我说：‘看，戴上多好。’她回答说：‘坐着？’^①

① 俄语中 сидеть 一词原意为“坐着”，此处用于转意，是“戴着”。

可是小脑袋没有屁股啊!’她看着一幅上面有树林的图画问道:‘树林里有狼吗?’‘有。’‘那你害怕吗?’‘我害怕。’‘阿尼娅姑姑不害怕,她的牙齿是铁的。’有时她问起我们的电影放映员的情况:‘为什么叔叔叫达维德?他压迫大家吗?①……阿姨叫柳达,她是吸血鬼吗?②’这些孩子真逗!”

“快到秋天时他们都要聚到一起来了,您又要组织一个小班了。”瓦里娅说。

“可能的。我喜欢同他们在一起。的确,麻烦是麻烦。这一个想要喝水,那一个却要大便。伤风啊,感冒啊!鞋带松了啊。要知道,孩子们相当倔强。我对鲍里亚说:‘鲍里亚,不戴帽子别走!’而他对我说:‘我不是在走,是在跑。’他还是不戴。我担心,到冬天带他们不太容易了。总之,看看再说吧……我在资产登记所里也不错。工作虽多,可你知道,也很有趣。那儿有这样一些术语,我过去从没听说过,例如:蓝色晒图纸、摹图、剖面图、投影图等等。”

但是这些术语瓦里娅却很熟悉,她当过技术员,在建筑学院学习过。

“现在我跟您是同行了。”她开玩笑地对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

家里有封信在等待瓦里娅。

原来笔迹是熟悉的,瓦里娅拆开信封,看了看署名,对,

① 俄语中“达维德”和“压迫давить”读音相似。——译者

② 俄语中“柳达”和“吸血鬼людоедка”的读音相似。——译者

当然，是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来的信。

“亲爱的瓦里娅，”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写道，“您关于花的事情写的短信使我有勇气做我长久以来不能下决心去做的事了——给您写信。现在我可以不必责备自己硬要您同我通信了。我是在给您写回信。我在写信，这使您与我略为亲近些了，因此我感到高兴。

“您的信我反复读了几遍。这是我们认识以来的第一封信，我努力去理解每一句话，从各种角度去理解，寻求潜在的含义。有时在某个句子中突然觉得有一种亲切的、珍贵的东西，但是我常常想起您一贯的矜持态度，于是我仿佛感到您是在嘲弄我。我听不到您的语调，不知道应当如何理解您说话的意思。

“如果我那小小的礼物给您带来了麻烦的话，那么请您原谅，以后我再不这样做了。我郑重保证。

“我怎么也无法忘掉您跨上电车时随口对我说的‘请来电话吧’那句话。

“对不熟悉的人来说，这样一句话‘请来电话吧’——是允许继续交往。对于熟悉您的我来说，这‘请来电话吧’——只不过是‘再见’的意思，而‘再见’，遗憾的是并没有任何约会的暗示。

“假使您说的是‘请来个电话’，——这就不仅表示您允许，而且表示您有这种愿望。一字之差，意思却大不相同。互相认识的第一天是不讲‘请来个电话’的。

“您记得关了门的亚历山大公园吗？水洼，您的鞋，克里姆林宫墙，维纳斯石洞，长统袜上的小窟窿，看守人的哨子声，我们的奔跑，用长椅拦住的大门，乌拉!!!我们脱身了，

我们居然能戏弄看守人。这是一次雨中散步，自始至终细雨濛濛。

“请给我讲点什么吧……”

“您是个非常独特的人，难以接近。”

“我觉得您有不愉快的事，我非常想安慰您。您婚后那段时间我过去一点也不了解，但我完全理解。我曾想帮助您，但不知道该怎么办。”

“昨晚我有事来过阿尔巴特街，曾路过您的家，甚至在您那个站上搭乘了31路电车，我四面张望，可是，唉……结果您并没有出现。”

“您记得我们的游戏吗？到一个街区尽头互相称呼‘你’，然后到走完下一个街区时再称‘您’。您不愿玩这个游戏，不愿和我以‘你’相称。此后我久久感到惆怅……”

“您能否不要卓娅同行，让我单独送您回家呢？”

“很难同您搞好那种人家两个人在一起时由共同的情绪所建立起来的不可捉摸的联系。当时只要您一句话，就可以确立这种联系了，那该有多好。可是下一次一切又要从头开始了。”

“有一次，您病了。我决定来看望您，不打电话就上您那儿去（我作为领导，是应该关心自己下属的健康的。）。我上了楼，在门旁站了一会儿，举起手来想去按门铃，可又害怕什么，也许是怕您会冷冷地接待我，就从楼梯上跑下来，回家去了。这件事我从没对您讲过。”

“我爱音乐，常去音乐学院，我多么希望能同您坐在一起听音乐啊。”

“请原谅，我写了这么一封枯燥无味的信。我需要同您坐

在沿河街的拦墙上，观看过往的行人，您对人的评论是那么准确，那么机智。我需要您在广场上掉落一朵花儿，要知道，就这么一点儿琐碎小事就能产生丰富的感觉。

“上班时我同您整天在一起，但是工作又把我们隔开了。请给我写信，哪怕是两句话这么一种电报式的信，那样我们仿佛重又单独在一起了。我也会给您写回信的。我希望您会喜欢我写的信。

“那次，您第一次走进‘纳齐奥纳利’来时，您戴了一顶宽檐帽。您脱下帽子，于是我看到了一双大大的眼睛，一双清澈而无邪的眼睛。

伊·弗

“注意：这封信是差不多一年之前写的，但我下不了决心把它寄出去。现在我要发出了，丝毫未作更改，因为我对您的爱和我对您的钦慕一如既往。伊·弗”

瓦里娅将信放在膝盖上，就这样坐着沉思了很久。

信写得很好，很真诚。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是个非常好的人，而且她如果和他在一起生活，大概会过得轻轻松松、无忧无虑、快快活活的。他属于杰出人物，是个“受宠”的人，因此一切杰出人物生活上的种种享受他都可以享用。这是由于他有才能，工作能力强，而不是因为他听话。这就够了，完全够了，因此她尊敬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但是一年前她觉得仿佛是童话中的那种美好的生活，她在自己那昏暗的、几家合住一套的住房中曾努力追求过的那种生活，现在对她不再有吸引力了。现在她也知道了事物还有另外不美好的一面：当身旁有人正在受苦遭难，儿童、老人正因饥饿而死的时候，她不能，也不愿意无忧无虑、麻木不仁地生活。

她没有力量同饥荒和谎言作斗争，她不知道如何斗争，但是也不能醉生梦死，寻欢作乐。

她在等萨沙……萨沙知道他应该怎样生活，也知道她应该怎样生活！特别是现在，在他不得不经受种种考验之后，更是如此。当然他回来以后，也不会轻松的。大家都说，不会让他在莫斯科登记户口的。但是不论他住在哪里，她都应当帮助他。每个人都需要某种支柱。她瓦里娅，就将成为萨沙的一个支柱，他没有其他的支柱啊！

但那次因为萨沙的照片发生口角时尼娜说的话使她很痛苦，这些话她无论如何都忘不了。宁卡朝她喊叫：“假如萨沙是你的未婚夫，那你为什么不一直等他，而突然去嫁给一个骗子手呢？”难道萨沙也会把她同科斯佳结婚看作是背叛吗？这算什么背叛啊！她当时是个小姑娘，什么也不懂，她想要自立，因此她认为，出嫁会使她自立。她错了。她没有写信告诉萨沙关于科斯佳的事，这会刺激他的。但是等他回来以后，她会把一切都告诉他，他都会理解的，而且会原谅她和科斯佳这件事的。

瓦里娅对怎样答复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的问题考虑了很久。答复什么和怎样答复：写信呢，还是同他谈一谈比较好？应当正面回答，说实话。最后她决定：毕竟还是谈一谈比较好。那样他们的第二种生活，在办公机关之外的生活就可以结束了。

瓦里娅挑选了一个适当的时间，到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的办公室里去了。

“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我是为您的信来的。”

他的脸色变得苍白了。

“是吗？”

“我想告诉您下面这件事：我爱着一个人，他现在离这儿很远，一年之后回来。我在等他。”

他沉默了一会儿，控制住了自己，不那么激动了，然后温和地微笑着回答说：

“那好吧，瓦莲卡，我也将等待着……”

27

劝诱主要被告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事交给经济局局长米罗诺夫办理。他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所有领导干部中最有教养的一个。

斯大林对他的工作曾非常满意，正是由于斯大林的建议米罗诺夫才担任了经济局局长，他常把米罗诺夫同亚戈达一起找到他那儿去。

亚戈达对此也满意：米罗诺夫记忆力非凡，从斯大林那里回来之后，就将那一位所说的完全照原话一字不差地记下来。当着斯大林的面记录他的指示不是任何时候都合适的，而关于即将举行的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审判根本不可能作记录，因为斯大林是背着所有的人，甚至是背着政治局委员们秘密地领导审判的准备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们是在审判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之后才了解这件事的。

有人说，米罗诺夫打算离开他目前的岗位。一些人认为是亚戈达把他看作是对手，在排挤他；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个经济工作者，想到外贸人民委员部去供职。而沙罗克则从和米罗诺夫有私交的武特科夫斯基的暗示中得知，米罗诺夫不想参加对老布尔什维克审判的准备工作。而且沙罗克还

清楚地看到武特科夫斯基本人参予此事时也不大乐意。

米罗诺夫与奸诈险恶的斯卢茨基和残酷粗暴的加伊不同，他在机关里被公认是个温和的人。此外，他确信整个这一令人不太愉快的工作是根据党的利益提出的。他审讯过所谓的破坏分子，但没搞过党内的案件，跟逮捕、流放老党员的事都无关。他甚至不了解有关那一次行动的情况：亚戈达——扎波罗热茨——尼古拉耶夫。对搞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的工作没有经验，而现在突然让他搞原政治局委员、列宁的亲密朋友和战友加米涅夫。他过去某个时候曾经怀着狂喜的心情在会议上听过加米涅夫的讲话，把他当作党的领导人之一热情地向他鼓掌。现在这个加米涅夫被带进他的办公室来了，而且他米罗诺夫要审问他，必须设法使加米涅夫承认他是个恐怖分子和杀人凶手。

现在在他面前的是个年老而又被牢狱监禁弄得疲惫不堪的人。可是不管怎样，米罗诺夫还是在他身上认出了曾在会议上见过和听过他演说的那个加米涅夫本人。只是在那些年代里米罗诺夫给他取的“小圆面包”的绰号现在经过了那么些年可怕的审讯、流放、监禁之后已不大合适了。他个子不高，头长得很漂亮、一头浓密松软的金发已花白了，胡子也是金黄色的，但四周呈棕红色，一双蓝色的、略微突出的近视眼（他的夹鼻眼镜给没收了——不给戴）保持着有教养的人的稳重风度，一种特别的知识分子的“教授式”步态，动作从容不迫。甚至在此地，在这刑讯室里，他也是某种令人起敬的事物的化身，禁不住使人产生好感。

米罗诺夫指指椅子对加米涅夫说：

“加米涅夫公民！您的案子里有一系列反对派分子的供

词。供词说：从1932年起他们就在您的领导下准备暗杀斯大林同志和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其中，对基洛夫同志的暗杀已经实现。”

“您很清楚，事情并非如此，”加米涅夫回答说，“布尔什维克从不对个人施行恐怖的手段。”

米罗诺夫给他宣读了赖因霍尔德的供词。

“这里没有一句是真话。”

“赖因霍尔德能当面对质证实这一切。”

“请吧。”

在当面对质时赖因霍尔德承认，曾不止一次到过加米涅夫的住宅，当时在那里讨论恐怖行动的准备工作的。

“说谎！”加米涅夫说。

赖因霍尔德挑战似地回答：

“说谎的不是我，是您！”

“您究竟在什么时候到过我那儿的？”

“您自己清楚地知道，是什么时候！请别提挑拨性的问题。”

加米涅夫看了看米罗诺夫，以此目光要求他按法律办事。

“赖因霍尔德公民，”米罗诺夫说，“加米涅夫公民有权提问题。”

赖因霍尔德耸了耸肩膀。

“依我看，我清楚地指出了：在1932、1933和1934年间我到你那儿不少次。”

“如此说来，”加米涅夫说，“劳驾请您现在讲讲，而且尽可能详细一些，我的住宅和几个房间的布局。”

赖因霍尔德明白，他的弱点被抓住了，因此粗鲁地回答说：

“对这样一些问题我没有必要回答。您的住房又不是纪念馆，况且今后也未必会是，我上那儿去不是为了参观，并没有仔细观看。”

加米涅夫对米罗诺夫说：

“米罗诺夫同志，也许，您问一下赖因霍尔德公民这个问题？”

但米罗诺夫也明白，赖因霍尔德被抓住了破绽。

“加米涅夫公民，要知道不是在谈您的住房，而是在谈您和赖因霍尔德公民之间的谈话。”

“可我仍然请求写入记录，说明赖因霍尔德公民回避我的问题不予回答。”加米涅夫坚持说。

“但我现在未作记录，这是预备性谈话。我们还将继续进行的。”

当而对质就此告终。加米涅夫和赖因霍尔德被分别带回各自的囚室。

米罗诺夫立刻给沙罗克打电话，请他上他那里去一趟。

沙罗克来了。

“沙罗克同志，您在帮助赖因霍尔德准备出庭，准备得不好。”

沙罗克不禁吃惊地看了看米罗诺夫。实际上，赖因霍尔德的供词是整个指控的基础。可是原来他沙罗克未能帮助赖因霍尔德准备好。他的心一下子抽紧了——万一赖因霍尔德

的供词受到责难，所有的指控都将垮台，而责任当然将推到他沙罗克身上。

“在他的供词中不止一次地重复说，他常上加米涅夫的住处去。但在当面对质时发现，他甚至连住宅的布局都不知道。您应当事先考虑到这点。哪怕带赖因霍尔德上加米涅夫住所去一次也好。”

沙罗克安心了。当然，米罗诺夫是个高级领导人。但是高级领导人和好的侦讯员是两码事。让被审讯人屈服是一回事，准备让他去当面对质完全是另一回事。赖因霍尔德供认出许多人，沙罗克不能带赖因霍尔德挨家挨户去他们的住宅或者上其他地方去，而且谁也不会允许他这样做的。米罗诺夫应当事先提醒沙罗克，他应当让赖因霍尔德作好同加米涅夫具体地当面对质的某种准备。那么沙罗克就可以对一切进行检查，一切都作好准备，就会无懈可击了。可是米罗诺夫事先没有通知，没让赖因霍尔德作好准备，在这点上是他米罗诺夫的过错。

沙罗克以有礼貌的、有分寸的方式向米罗诺夫阐明了这一切。那位是个聪明人，明白是他自己的失误。

沙罗克也很聪明。因此，当米罗诺夫在莫尔恰诺夫召开的各侦讯小组的会议上报告说，审讯加米涅夫一无所得，他未招供，当面对质也无结果时，沙罗克对当面对质没有准备好这件事连提都没提。根据米罗诺夫向他投来的目光，沙罗克明白，米罗诺夫很看重他的持重和忠心。此外，沙罗克从武特科夫斯基那儿了解到，米罗诺夫向亚戈达报告说，审讯加米涅夫无效，让叶若夫象处理赖因霍尔德一案那样，同加米涅夫谈判一下并以中央的名义要求他帮助党，如果拒绝，就

直接以枪决来威胁他。

但是亚戈达这一次也不允许去求助于叶若夫，他吩咐残忍的切尔托克来参加侦讯，这是个同亚戈达很亲近的人，经常上他家去。亚戈达溜冰时（大家都知道，这个滑冰场在彼得罗夫卡26号）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工作人员们喜爱的消遣是观看切尔托克怎样在溜冰场上几乎是躺在冰上为亚戈达系冰鞋上的带子。切尔托克对上级百般奉承，对被侦讯的人却是残酷无情。

沙罗克的办公室和切尔托克的办公室在同一条走廊上，沙罗克从旁边走过时听到他审问加米涅夫。

“你是一个胆小鬼和叛徒，”切尔托克喊道，“列宁就是这样说你的。以前斯大林同志在进行地下斗争时，你在巴黎的咖啡馆里喝咖啡，你一辈子都骑在党的、人民的、工人阶级的脖子上。你是一个废物和寄生虫！你暗杀了基洛夫，你想把全党都杀光。现在要是把你放到街上去，人们一看到你就会把你当臭虫似地捻死。假如把你和季诺维也夫带到工厂去，厂里的人会把你们撕成碎块，我们连尸体都收不到。你们是臭狗屎，混蛋！你是个不可救药的人，不可救药，我下命令，十分钟以后就可以象狗似地枪决你，人们只会感谢我。大家来帮助你这微不足道的人，还保证你这卑鄙的生命，而你这臭狗屎，还在犹豫不决！立正站着，恶棍，别动！”

切尔托克就这样审问加米涅夫，搞“车轮战”，强迫他站着不准动。一直到加米涅夫倒下为止，但一无所获——加米涅夫没有招供。

由于对加米涅夫的失败和对斯米尔诺夫也令人怀疑能否成功，叶若夫顺利地将侦讯工作抓到他自己手里了。亚戈达即使想反抗也无济于事，因为斯大林在催促，而且继续延误对亚戈达也不会有好结果。现在一切责任都落到叶若夫身上了。

叶若夫考虑到对加米涅夫和斯米尔诺夫工作的经验教训，采取了新的策略：他直接、公开以政治局的名义要求季诺维也夫按所需要的招供，诋毁托洛茨基。

夜间，季诺维也夫被带进了阿格拉诺夫的办公室，他有病，勉强能站住。办公室里除了叶若夫和阿格拉诺夫之外，还有米罗诺夫和莫尔恰诺夫在场。叶若夫命令米罗诺夫作详细笔录。亚戈达找了个什么借口没有出席，不愿意在叶若夫出场的情况下扮演次要角色。他在远处妒忌地注视着叶若夫的行动，希望他失败。

叶若夫一刻不停地翻阅着他那本记录斯大林同志指示的专用便条簿，一面说，根据绝对可靠的情报，日本和德国打算于1937年春进犯苏联。因此此刻苏联特别需要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但是托洛茨基从中作梗。政治局考虑，季诺维也夫能帮助党彻底揭露托洛茨基及其反革命组织。如果季诺维也夫做到这点，那就证明他终于在党的面前完全投降了。

“你们具体地想要我干什么呢？”季诺维也夫艰难地喘着气问道。

“在公开审判时，您应当承认曾按托洛茨基的指示准备和自己的同伙们一起谋杀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其中之一已实现，即暗杀了基洛夫同志。”

“我任何时候也不会干这种事的，你们不会从我这儿得到

这种伪造的东西的。”

“那好吧，”叶若夫又看了一下便条簿，“我把斯大林同志的话转告您，‘如果季诺维也夫承认，他就可以保全性命。倘若拒绝，他和他的所有反对派成员将一个不留地全部交秘密军事法庭审判。’”

“你们要我的脑袋，”季诺维也夫轻声说，“好吧，请把它呈献给斯大林吧。”

“但是您还用几千名反对派分子的性命在赌博，他们的命运在您的手里。”

“不论我供述什么，不论我招认什么，你们都会处死我，还会处死成千上万的人，把整个的列宁主义的近卫军都消灭掉的。”季诺维也夫沉默了一下，鼓起了劲，坚定地、斩钉截铁地说了最后一句话：“我重复一遍，你们从我这儿什么也不会得到的。”

叶若夫命令将季诺维也夫带走并立即把加米涅夫带到他这儿来。叶若夫必须取得成绩，看来他指望经过切尔托克“精心加工”的加米涅夫容易顺从一些。不过毕竟对此没有把握，也不愿意在多余的见证人面前再遭到一次失败，因此他准许阿格拉诺夫和莫尔恰诺夫离开，只将办理加米涅夫案子的米罗诺夫留下。

叶若夫同样向加米涅夫阐述了对季诺维也夫说过的那些话，但在结尾时宣称：侦讯机关掌握有赖因霍尔德的供词，他承认曾和加米涅夫的儿子一起在多罗戈米洛街暗中窥视过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小轿车。

“有意思，我的儿子怎么能突然出现在那儿呢？他被流放到阿拉木图已经一年半了。”

“您指的是您的儿子亚历山大，”叶若夫反驳，“而赖因霍尔德说的是您另一个儿子——尤里，您读一下吧！”

他将赖因霍尔德的供词递给加米涅夫。

加米涅夫读完之后，不知所措、喃喃地说：

“这……这……可他还是个少先队员。”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1935年4月7日的决定您知道吗？或者，也许您把它给忘了？我提醒您：‘十二岁以上的未成年者，被揭发犯有盗窃行为、使用暴力、使人致伤、致残、有凶杀行为或谋图凶杀者应受到法律制裁，适用一切刑事处分的手段。’这个决定是由加里宁、莫洛托夫、阿库洛夫同志签署的。就是这样。您的儿子已年满十二岁。因他企图谋杀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将对他实行相应的法律制裁，也就是处以极刑。”

“你是恶棍！坏蛋！”加米涅夫喊叫。

叶若夫拿起电话筒，命令莫尔恰诺夫立即逮捕加米涅夫的儿子尤里·加米涅夫，准备让他在审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主义联合总部”一案时出庭受审。发出了这一命令之后，他对加米涅夫连看也未看一眼，就走出了办公室。

加米涅夫被带回了牢房。

他知道是什么在等待着他，而且也明白什么都帮不了他的忙了。

在可耻的1935年1月审判中他使自己相信，党的最高利益要求他对基洛夫被谋杀一案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为此他被判了五年徒刑。1935年7月由于臆造的克里姆林宫阴谋活动，他重又被拖上了秘密法庭，因为他的兄弟尼古拉的妻子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政府图书馆的一名工作人员似乎参与了这

一阴谋。尼娜也好，尼古拉也好，都被判了罪。给他列夫·波里索维奇又判处了十年徒刑。

1935年3月他的第一个妻子奥莉加·达维多夫娜被流放到塔什干。同时在3月份，他的长子亚历山大，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的毕业生也被捕并流放到阿拉木图。

他的第二个妻子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格列博娃和她与前夫所生的儿子伊戈尔，以及同加米涅夫所生的五岁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一起流放到中亚。她在阿尔巴特街卡尔马尼茨基巷有一套住房，1934年12月16日加米涅夫就是在那儿被捕的。

只剩下小儿子尤里和五岁的孙子维塔利还是自由的。

可现在已开始收拾尤里了，他还是个小孩子，少先队员，竟要把他当作恐怖分子来处决。那再过七年，等孙子维塔利满十二岁的时候又该着手整他了。不幸的孩子们哪。

加米涅夫把领扣解开了。他的囚室里从来没有阳光透进来，甚至在七月份都相当阴凉，但是今天，天气却显得很热。

加米涅夫清楚地知道：假如他不出庭，他将被枪决；即使出庭，也会被枪决。而且不论是在哪一种情况下，他在人民眼里都将作为一个恐怖分子、间谍和反革命分子而死去——他们会这样干的。但是如果他以假口供来证实那些假的指控，他们可能会饶恕他的孩子们。他有权这样作吗？什么东西更珍贵呢：他的荣誉还是这些无辜的孩子的生命？不过荣誉反正已经丧失了。在那些不断地悔过、承认错误、吹嘘斯大林的年代里荣誉已经丧尽了。在这份记录可耻行为的清单上再加上一个公开的假坦白又会怎么样呢？没什么了不起

的。反正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将作为叛徒、变节分子、奸细和反苏分子受到制裁的。可是终究，终究……

开始热得令人难以忍受了。这是怎么回事？他用手碰了一下暖气片，立刻把手缩回——烫痛了。坏蛋，恶棍！他们烧暖气了，这是故意的，故意把热气送到牢房里，用强烈的令人难忍的热气来折磨他，摧残他。

他敲了几下门。又敲了几下。小孔开了。

“要什么？”看守问道。

“为什么烧暖气？”

“这些事我们不知道。”

小孔砰地一声关上了。

抗议是毫无用处的。他越抗议，他们会把暖气烧得更热，会把更多的热气送到牢房里来。

不，他们摧毁不了他。他最后决不再让科巴舒坦。十年前，1927年，那时他不是对他科巴让步，他是对党让步，是向党屈服的。现在他，列宁的朋友和战友，列宁在世时的政治局常务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主席非得承认自己是间谍、恐怖分子、杀人凶手和反苏分子？——这样的让步党是不需要的，这样的牺牲党是不需要的，这样的供认对党不利，这样的供认对党只会有害，只有斯大林才需要这样的供认。这是为了诬蔑党，诬蔑列宁，诬蔑列宁周围的人，诬蔑列宁的近卫军。因此如果 he 想要死得象个共产党员，如果他哪怕是为了自己想要庄重地结束自己的一生，他就不应当出庭，不应当招认假口供。斯大林肯定会对他进行报复，他的孩子们也将死去——就让他们死吧，他将给党奉献这样的祭品。甚至，即使他承认了，即使他满足了斯大林的要求，

斯大林反正还会处死他，还会处死他的儿女和孙儿孙女们的，斯大林是在彻底清算，是在斩尽杀绝。

他脱下身上的衬衫和裤子，只穿了一件脏背心、一条短裤，短袜子也脱下了，他躺到水泥地上——这样还可以呼吸。

门上的小孔开了。

“犯人站起来！”

加米涅夫一动也不动。

小孔砰地一声关上了。

后来走廊里响起了靴子的脚步声，门打开了，三个粗壮的卫兵闯了进来，其中一人手里拿了一把椅子。

他们把加米涅夫架起来，让他坐在椅子上，用绳子将他捆在上面，腹部周围的绳子拉得很紧。

“坐着，坏蛋！”

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走进来，按了按他的脉搏，检查一下绳子捆得有多紧，将加米涅夫的眼皮提起来，打量了一下他的眼睛，从牢房里走出去了。

卫兵也跟在他后面走出去了。

列夫·波里索维奇已不能呼吸。椅子放在紧靠暖气片的地方，被捆紧了的手和脚都已麻木。头垂在胸前，但他神志还清楚，脑海中浮现出某些情景。渐渐地他已弄不清楚，记不住一分钟之前浮现出来的东西。朦胧中，只记住了一点，列宁称他是马儿。列宁生病的时候，人民委员会的会议是由他加米涅夫主持的。他宣布例会开始后说，他为与会者准备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在这以后列宁走进了大厅，抱住加米涅夫的肩膀，笑着说，嘿，怎么样，我给自己选了个代理人，选

对了，你们满意吗？我可早就知道，这匹马儿永远也不会让我上当的。于是大家都笑着向列宁鼓掌。

门重又打开了，医生在一个卫兵陪同下进来，重又摸摸加米涅夫的脉搏，检查一下双腿，稍稍扒开眼睛说：

“可以继续。”

28

半年过去了，阿尔特曼并没有来电话。

很清楚，是尤尔卡·沙罗克对他说了几句，于是阿尔特曼决定不再纠缠了。他们那里大概有一种同志式的团结精神：既然有同志请求，就应当尊重，必要时他对你的请求也会予以尊重的。好样的尤尔卡！

当然瓦季姆没给尤拉打过电话。这是极为微妙的事情。但有一次在阿尔巴特街上遇见了，便高兴地向他微笑，亲热地握握手，把他送到阿尔巴特广场并在告别时说：

“谢谢，尤拉！”

尤拉什么也没回答，微微一笑，就上了电车，挥挥手。呆子瓦季姆，素来是个糊涂蛋。难道真的指望尤拉会去为他奔走？难道他不明白，在这类事情上谁也不会去替别人说情的吗？这些知识分子真叫人好笑。阿尔特曼没找他是因为他被编入了一个侦讯小组，正在参加审判的准备工作。他顾不上瓦季姆。他沙罗克对瓦季姆的事甚至连想都不愿意去想，虽然大致上也猜得到：外事局感兴趣的是维卡的专案文件卷夹。

然而瓦季姆对此一无所知。沙罗克和蔼可亲的手势使他完全放心了。

现在他文章写得很多，演说更多，变得有名了。许多人都设法同他结交。

有一次，叶尔希洛夫的侄子从萨拉多夫来。象他叔叔一样，也是金鱼眼，尖鼻子，不过总是面带令人愉快的、腼腆的笑容。

叶尔希洛夫把他带到作家俱乐部，想让他看看莫斯科的名流。他们遇到了瓦季姆。

“他在铁路上工作，”叶尔希洛夫向瓦季姆介绍侄子时说，“然而是个戏迷。他读了您写的采访科宁的访问记，说是现在我哪儿都不想去了，不论是大剧院，还是梅耶霍德剧院，只想去莫斯科室内剧院。我说得对吗？”

青年人点点头，同意叔叔说的话。

“不成问题”，瓦季姆回答，“请您看一下剧目，挑选一个剧，给我来个电话。”

叶尔希洛夫这坏家伙当然是在奉承，可毕竟是令人愉快的，他的访问记在国内如此广为流传。瞧，在萨拉托夫也有人读过。要知道实质上这是他第一篇重要的文章，是一年半之前，1934年年底写的。

1934年底莫斯科室内剧院建院二十周年。但庆祝会从12月25日延至一月初。当时瓦季姆盘算过，最好也能在报上发表一篇这样详尽的访问记，例如，采访阿利萨·科宁，未来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人民演员。大家都知道，关于将这个称号授于泰罗夫^①和科宁^②的决定已经拟好，也许，都已签发

① 泰罗夫(1885—1950)——苏联导演，俄罗斯联邦人民艺术家，戏剧革新家之一，力求进行“综合戏剧”的实验，1919年创建了莫斯科室内剧院，导演过很多名剧。——译者

② 科宁(1889—1974)——苏联女演员，俄罗斯联邦人民艺术家。泰罗夫之妻。曾塑造一系列悲剧形象。——译者

了。最好在公布决定的前夕抛出这样的材料。

但是科宁一般不接受采访，而且没什么理由可到她跟前去看：在庆祝二十周年纪念的晚会上莫斯科室内剧院打算不仅上演《乐观的悲剧》和《若罗夫列-若罗夫利亚》的片断，而且还重新上演《莎乐美》——这部剧仿佛是十月革命后使剧院获得第二次生命的标志。

父亲帮了忙。

“阿利萨·格奥尔吉耶夫娜永远不会拒绝我的请求的。”

她确实没有拒绝，只是感到惊奇：“果真就那么急吗？”她请他在电话旁稍等一下，看了看日程表，约定12月26日四时一刻之前准时到她那儿，就在剧院大楼内的一套住房里，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记得的，让他给儿子讲清楚吧。

瓦季姆忙起来了，只剩下没几天了，而他想好好准备一下再上科宁那儿去。早晨他上文具用品商店去买了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又仔细研究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作了摘录。卢那察尔斯基虽然不承认泰罗夫的“新现实主义”，但对剧院仍给予帮助，认为《菲德拉》的演出取得了无可争议的成功，他将科宁比作伟大的拉舍尔^①，并称赞了《若罗夫列-若罗夫利亚》，更不用说《毛猿》了。

瓦季姆坐在图书馆里，翻阅书评，在书堆里寻找，找到了一本有趣的小册子，很新，还没人碰过，显然，任何人都还从未打开过这本书——书中有西方报刊对莫斯科室内剧院巡回演出的政治评论。

^① 拉舍尔(Rachel, 1821—1858)——原名艾丽莎·费莉克丝。法国女演员。——译者

1923年莫斯科室内剧院在巴黎、柏林及德国的其他大城市演出时，曾上演133个剧目。反响极其强烈，瓦季姆立即把它们抄到自己的本子上：

“俄国人成功了……”

“应当大声宣扬。莫斯科室内剧院是欧洲独一无二的剧院……”

“如果说莫斯科室内剧院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儿，那么，布尔什维克主义不仅不在毁灭，相反是在解放创造力。”

也看到了相反的反应。瓦季姆读了，冷笑了一下：“这些手法很粗鲁。粗鲁得使观众下决心把这些倒霉的笨蛋们都打发回他们的老家去了……”

总之，材料搜集到了。瓦季姆在家又翻了一下泰罗夫的《导演笔记》。某个时候他曾一口气把这部书读完，至今记忆犹新。父亲把这本有作者赠书题词的书一直放在自己的桌子后面。而且抽屉还用钥匙锁上。这倒不是因为对泰罗夫的亲笔题词如此珍惜，多半还是出于谨慎：这本书是由艺术家亚历山德拉·埃克斯特装帧的，她已出国去了。经常有些偶尔来的人在他们的家，完全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马拉谢维奇家保存着这样一些书籍。

瓦季姆决定用泰罗夫的几句话来作为访问记的卷首题词，这些话适用于纪念日：

“可是室内剧院终究还是出现了……它应当出现——在戏剧的命运·书中曾这样指出。”

这样，用这些话作为文章的开头，访问记就可以不用老一套的文章结构了：从首演起写到最后的演出高峰，恰恰相

反，仿佛可以从演出高峰时期，即从《乐观的悲剧》写起，一直追溯写到最初演出的剧目，写到《莎乐美》。

《乐观的悲剧》瓦季姆看过。是一部气势磅礴的戏剧，和梅耶霍德的《集团军司令员—2》大相庭径。据说，排练时，在泰罗夫那儿有一些海军军人在场观看，他们注意不让剧中出现违反常规的情况，演员们还向他们学习军人的步伐，仪表。据说，科宁在剧中扮演的女政委的皮夹克也是从水兵那儿找的，而且好象负责舞台美术的伦金也是第一次让剧院里的天空中飘浮着云彩。

再说，瓦季姆去看这个剧也是靠父亲帮助，当时以伏罗希洛夫为首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都去了，观众席上挤满了红军战士和红海军战士，在演出时他们鼓掌，高喊“乌拉”，当女政委被水兵们逐渐逼近到墙跟前时，她向一个从船舱中钻出来的可怕的半裸的司炉开了枪，很多坐在前面几排的观众竭力想扑过去帮助她。从一方面来说，当然是可笑的，但从另一方面看——却很感人……只是在最后一幕，当女政委临死前倒下时，手风琴在她尸体上空如歌似泣地呜咽，大厅内一片寂静，面在天幕上云彩就象真的一样轻轻地飘浮着。

在这次演出之后，剧院获准在海报上刊登：“献给红军和红海军。”

是的，他的决定是正确的：确实应当从《乐观的悲剧》开始写到《莎乐美》。这样一来，文章的主要思路就有了，现在需要细节，细节，用科宁的有血有肉的话——于是他瓦季姆就一定马到成功了。

26日，瓦季姆手中拿着玫瑰花，按指定时间准时接了一

下门铃。

开门的是科宁，她微微一笑。

“您就是那位性急的记者吧？”

“我真不好意思，”瓦季姆说了一句。

“别不好意思，我在工作中也是个性急的人。您叫瓦季姆？我没记错吧？”

瓦季姆脱大衣时，她暂时走开了一下——“我去把花交给姑娘，让她养在水里，”——她回来了，于是他们进了房间。那个“姑娘”立刻就出来了，把花瓶放在桌上。

瓦季姆纳闷了：“姑娘”的年龄大概已近三十岁。但是闪过了另一个念头：科宁用这个词含义极为准确——这表示了女主人对她的照顾、关心。是真正的贵族派头——不是象一般市民所说的保姆，也不是女仆，而是一个温存的词“姑娘”。

科宁就在这这时仔细地打量着他。

“您象叶夫根尼娅·费奥多罗夫娜，我很爱您的妈妈。”接着没有任何转弯抹角就直接说：“您知道，《乐观的悲剧》这个名字是我想出来的。有一天晚上，我顺便上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的办公室去，正遇上维什涅夫斯基也在那儿。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怎么都不同意把他的剧本看作是悲剧。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试图给他解释，他写的本来是个悲剧。

“就算是这样吧，”维什涅夫斯基说，“但我的剧本是乐观主义的呀！”

“那为什么不可以叫作《乐观的悲剧》呢？”我说。”

瓦季姆简要地作了记录，视线从笔记本上移向女主人，他还是有点胆怯。

“那么，还有什么要对您讲的呢？”

“当您担任新的角色或者想到剧作家的傲慢自负时，您仍感到轻松自如吗？”

她大笑起来了。

“这些我可从来没有想过。轻松自如是必须的。否则，象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所说的，戏剧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就将不复存在了，就将变成传达作者思想的唱片了。”

她含着微笑看了瓦季姆一眼。

“不知道您认为这个比喻怎么样？譬如说我吧，很喜欢这个比喻。您看过我们演的《黑人》吗？”

“当然。”

“那么我给您举个同奥尼尔有关的例子。顺便说说，斯特凡·茨韦格说过：‘为了看《黑人》，可以从维也纳步行到莫斯科。’她沉默了一下，不知是沉思起来了，还是让瓦季姆有时间来评价茨韦格的话。“《榆树下的欲望》看过吗？”

“看过，甚至看了两遍。”

科宁又默默地看着他。

他不完全理解她的目光。

“我很喜欢。”

“谢谢您。但我想告诉您，我演艾比这个角色时根本不是象当时美国对这角色那样来处理的。那里是由专门扮演反面女角的演员来担任艾比这个角色的。可我想要把这个形象提高到巨大的悲剧的高度。不应当指责艾比而要为她辩护，揭露导致她惨遭灾难的种种根源。她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而是一个具有可怕的悲剧性命运的人。”

她从圆手椅中站起来，走近墙壁，取下一幅放在镜框里

的照片，放在瓦季姆面前的桌子上。

“这是奥尼尔。”为了让瓦季姆看得清楚些，她点燃了大灯罩下的落地式红木烛台。

漂亮的脸庞，瓦季姆想，矜持、严厉，但与众不同。

“您看，这儿写的：‘送给为我将艾比和埃拉的形象演得栩栩如生的阿利萨·科宁女士。’嗯，下面是恭维话，没有必要读了。奥尼尔在巴黎看过我们演的戏。他住在巴黎近郊一座大庄园里，是专程来观看演出的。”

她将照片挂回原处，回到自己的圈椅上坐下，往后仰靠在椅背上。

“您知道，奥尼尔还说：具有创造性想象力的剧院素来是我的理想。莫斯科室内剧院实现了这一理想！”

这些话说得颇为得意。但是她的声音突然变了，低落下来，听得出含有同情的语气：

“瓦季姆，您有点使我不高兴。请放松，别那么拘束。我来说个小故事让您乐一下，可能，对您有用……请随便些……”

瓦季姆动了动肩膀。

“当我们在排练《菲德拉》的同时，我还忙于日常剧目的演出——几乎每天上演《阿德里延娜·列库夫列尔》。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有时指定演出后立即排练《菲德拉》。有一次尤任①上我们剧院来了，他得知指定我们排演四幕《菲德拉》，就和泰罗夫争吵起来了：‘亚历山大，您的过‘左’行为会毁了阿利萨·格奥尔吉耶夫娜的。叶尔莫洛娃和费多托娃演完一出重头戏之后，常常休息好几天，而您却不让阿德里延娜好好

① 尤任(1857—1927)——俄罗斯人民演员，剧作家，戏剧活动家。——译者

地卸装，就强迫她排练《菲德拉》，真是闻所未闻！这是不明智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大笑起来了。“您别为阿丽莎·格奥尔吉耶夫娜担心。她掌握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最天才的准则：表演时肌肉放松，不紧张，就不会疲劳。”确实，”她看了下瓦季姆，“没有什么比身体处于紧张状态更使演员感到疲劳的了。”

瓦季姆重又动了动肩膀，他终于不再激动不安，甚至微笑了一下。

“那么，也许，让我们谈谈《菲德拉》吧，好吗？科克托写过这样一句话：‘泰罗夫的《菲德拉》是部杰作。’”

“关于《菲德拉》已经谈得那么多，写得那么多了……最好我来给您讲一些别人不太了解的事。1923年我们带了《菲德拉》这出剧去巴黎。那是在巴黎的第一个晚上，大家情绪很高，我们周围是一些记者，谈话很有意思，可我突然感到我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了。我听说出于对伯恩哈特^①的崇敬已有多年没有任何一个法国女演员，也没有任何一个外地来巡回演出的女演员演过《菲德拉》了：直到她去世，这部悲剧一直由她主演。您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情吗？胆怯、害怕、恐惧。这时新闻界一位可爱的、上了年纪的先生把我带到一旁，请求准许他给我提个小小的、友好的建议。‘我觉得，’他说，‘您，一个年轻的俄国女演员，来巴黎演出《菲德拉》，很值得给我们这位伟大的法国女演员写几句话并请她为你祝福。’这是个非常好的建议。第二天早上我给伯恩哈特送去了一封表

^① 伯恩哈特(1844—1923)——法国女演员，1872—1880年在法兰西喜剧院演出，曾领导萨马·伯恩哈特剧院(巴黎)。——译者

示尊敬的短信并送去鲜花。但我想伯恩哈特没看到我的信，因为过了一天各报的头版都刊登了加上黑框的消息：‘我们伟大的伯恩哈特去世了。’”

他们又谈了谈在德国巡回演出的情况。

“但是在那儿，”科宁说，“我们已经不是‘默默无闻的布尔什维克’了。在巴黎获得成功的消息传到了那儿，因此人们等待莫斯科室内剧院的到来。德国戏剧界人士不单是对我们的戏表示赞赏，他们还认真地深入研究泰罗夫的导演艺术、演员的表演、舞台美术的原则以及灯光的使用。

泰罗夫特别推崇有综合表演才能的演员，他们能以同样水平表演各类戏剧，这特别使德国戏剧家中有头脑的人感到兴奋。何况泰罗夫的《导演笔记》一书的德文版恰好在此时间世。”

“我们家有这本书，上面还有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的赠书题词，”瓦季姆插话，“书是献给您的。”他感到自己完全轻松自如了，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莎乐美》的。

科宁沉思了。

“我跟您已谈了五十分钟了，我对时间的感觉绝对准确，请核对一下，我说得对吗？”

“是的，”瓦季姆看了下表说，“完全正确，现在是五点零五分。”

“我可以再给您几分钟时间。请别记录，请您听着。您记得王尔德写的这个剧吗？”

不用说，瓦季姆是记得的。这个剧本是根据圣经中关于希律王之妻的前夫之女莎乐美对施洗者约翰的悲剧性的爱情故事编写的。

“二月革命之前《莎乐美》为教会检查官所禁演。后来，当这一禁令取消之后，在莫斯科的小剧院以及我们这儿都上演过。泰罗夫被这个剧中的自发的反抗力量，强烈的、不可抑制的炽烈的欲望所吸引。当然，亚历山德拉·埃克斯特的舞台设计也很出色。这是埃克斯特在表现力、激情和形式感方面的最佳作品之一。”

“亚历山德拉·埃克斯特？”瓦季姆假装在便条本上记姓名，重问一遍。天哪，父亲由于她的名字把泰罗夫的书锁起来了，而科宁谈到她时却极为赞赏。

“剧中形象的最高潮，”科宁继续说，“被认为是七块盖布舞，莎乐美为此要求希律王把将她置之不顾的约翰的头颅奖赏给她。这个舞蹈通常由小型文艺节目的明星们表演，演成一种色情的、诱惑人的舞蹈。但在我们的剧中莎乐美在希律王面前跳舞不是为了诱惑他，而是只有一个疯狂的念头——希望希律王把施洗者约翰的头奖赏给她。”

科宁的肩膀仿佛由于寒冷哆嗦了一下，她笑起来了。

“我一回想起《莎乐美》的时候，就立刻觉得浑身发冷。当时我们怎么会没生病，没感冒的，真是不可思议！观众大厅里没有暖气，观众都穿了很厚的大衣坐在那儿，而我们，实际上，是半裸体地在演戏。不过这个戏给剧院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剧院的声誉在爱好戏剧的莫斯科人的心目中提高了，而且大家公认在这一比赛中我们战胜了小剧院。”

瓦季姆站在门口时问道：

“我写好访问记要不要给您过目？”

她微微一笑。

“不需要了，我信任您。”接着出人意料地问：“您喜欢坐第

五排吗？”

瓦季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这是最好的一排。我请他们为您保留第十七座。请来看我们演出吧。跟您交谈很有趣。”

瓦季姆回家时，顺着特韦尔林荫道走，他戴着自己那顶有长长的护耳的鹿皮帽，手上是一双费尼娅用农村里的粗毛线编结的厚手套，他甚至不是在走，而是幸福得忘乎所以地在飞奔，因为他明白手中掌握着一件宝物。

多么威严，多么坦诚，多么善于鼓励交谈者接近自己，丝毫不怀疑她的话可能会被人曲解。不过干吗呢？要知道她的光荣属于人民，属于国家。不妨仿效法国人那样欢呼：“我们伟大的阿利萨得到了最崇高的称号——共和国人民演员的称号！”

再说她讲故事多么出色啊！多么乐于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是天才人物的真正的豁达大度，访问记不如就叫作：《豁达大度的天才》，很不错，这个题目好。

关于最新的电气设备的细节多有价值啊？！他脑子里就这样形成了现成的句子：“在德国挣来的钱演员们用来买什么呢——你们怎么想的，尊敬的读者们？演员们用挣来的钱在德国为他们在莫斯科的剧院购买了最新的电气设备！”一个绝妙的细节——真正地、无私地为艺术献身的榜样。

而利特维诺夫在剧院巡回演出回来之后所说的话：“在那些把我们看作是野蛮人的国家里上演苏联戏剧，结果赢得了观众——这是个巨大的胜利……这很重要，苏联的剧团出国演出第一炮就打响了。”

这一政治主题必须在访问记中指出来。

瓦季姆一回到家，扔掉大衣，就走进自己的房间，敲打起打字机的字键。几小时之后，跑到厨房里费尼娅那儿。“赶快随便给我弄点东西吃吃，茶、夹心面包片什么的……”

维卡那时还住在莫斯科，她朝门里张望了一下，目不转睛地看着瓦季姆。

“她穿的什么衣服？”

“谁？”瓦季姆不明白。

“谁……当然是科宁。”

“她穿的什么衣服？”

瓦季姆沉思起来了。穿了件褐色的……也许，穿的是绿色的……或者穿的是蓝色的。他不记得了。只记得她开门时给他的第一个印象：美丽、苗条、几乎不施脂粉，稍稍抹了点口红。

“傻头傻脑的……”

她不耐烦起来。但是瓦季姆没有搭理她。重要的是别扰乱了自己快乐的心情，别因为这个傻女人而失去愉快的兴头。啃完了面包片，他又急忙坐到打字机那儿去了。

夜间他打上了最后一个句号，重读了一遍写好的东西，站起来，幸福地伸了个懒腰并看了看表。还可以！凌晨四点半；他可是坐得过久了。

访问记获得了极好的评价，人们都向瓦季姆祝贺，有人向他预约撰写莫斯科室内剧院的戏剧评论，请他给他们免费入场券。

而且至今人们还在向他请求……那个叶尔希洛夫和他的侄子也在向他请求。

叶尔希洛夫象炒爆豆似地说完了话，向他道谢。售票处

给留了票，他的侄子象“王子”似地被安排到第五排第十七座上。侄子很满意。请他转达向瓦季姆的敬意，他已经回萨拉托夫去了。

大约十天之后，他在某个会上遇到了叶尔希洛夫，会后顺便上作家俱乐部去喝杯白兰地，叶尔希洛夫又死乞白赖地向他央求起来：要给那个常为他妻子看病的妇科医生搞几张票。无论如何不能拒绝妇科医生，你自己明白……搞几张《埃及之夜》的票……

“你自己可也是个有名的人物，叶尔希洛夫，”瓦季姆说。“随便哪个剧院的票你自己也能弄到的。”

“莫斯科室内剧院里我没有熟人，没有，这才来求你的。”

后来有一次他又来过电话，请求为他的老同学弄票。那位老同学是希比内矿区的地质学家，他在那里寻找磷灰石，很久没有来莫斯科了，想去莫斯科室内剧院看戏，瓦季姆，帮帮忙吧。

瓦季姆拒绝了，但答应叶尔希洛夫，十月底带他一起去看滑稽歌剧《勇士们》的首场演出。

“这是什么剧，有趣吗？”

“你还问呢！……第一，找到了被遗忘的鲍罗廷^①的滑稽歌剧的总谱。已经轰动了！鲍罗廷写了这部歌剧之后，总共只在大剧院演出过一次。第二，莫斯科室内剧院已有五年没有上演音乐剧了，全莫斯科都在等着呢。第三，剧作者是杰

^① 鲍罗廷(1833—1887)——俄国作曲家，“强力集团”成员。著有闻名的俄罗斯古典交响乐《第二交响曲》〔《勇士》〕，是史诗交响乐的高峰。——译者

米扬·别德内，虽然照我看有点粗俗。还有第四，泰罗夫邀请巴热诺夫来担任这个剧的舞台设计，听说过这个人吗？”

“好吧，”叶尔希洛夫说，“我们去看《勇士们》吧。说定了。”

29

叶若夫在对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案情上的不顺手使亚戈达大为得意。对于斯大林来说，他亚戈达仍然是其政治阴谋的唯一执行者。趁叶若夫还在考虑自己的行动计划时，无论如何要抢在他的前面。亚戈达比叶若夫更有经验，因此，他感觉到，不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如何反抗，他们都已经精疲力竭，受尽折磨，戏快要收场了。

根据亚戈达的指示，给季诺维也夫的囚室里也开足了暖气，酷热难忍。季诺维也夫是个患有哮喘的人，痛苦极了，加之肝脏又绞痛起来，于是他就在地上打滚，要求派医生。医生开了药，服药之后，季诺维也夫的情况更糟。因为医生只接到一个命令，要他注意不能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死去，否则，审讯就会宣告破产。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情况，每小时都有人向亚戈达报告。亚戈达则寸步不离内务人民委员部，他就睡在办公室里。他明白，结局随时可能来到。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季诺维也夫要求莫尔恰诺夫立即接见他。

见到莫尔恰诺夫之后，季诺维也夫请求允许他同加米涅夫谈一次话。莫尔恰诺夫立即意识到，季诺维也夫打算投

降了。他给亚戈达打了电话，向他汇报了季诺维也夫的要求。亚戈达也理解了这一切，便立即下令将季诺维也夫带去见他。

亚戈达温和地接见了季诺维也夫，和善地说：

“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亲爱的，你就解放解放自己，让我们大家也从这个可怕的案件中摆脱出来吧！我答应你马上就同加米涅夫会面，你们可以单独在一起，想说多少就说多少。不过，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我请你放聪明些！”

后来，季诺维也夫被带到了—一个囚室，过了不多一会儿，加米涅夫也被带来了，让他俩留了下来。囚室里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并安放了传声器。这一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自然是不知道的。

“无路可走了，”季诺维也夫喘息着沉重地说道，“必须得出庭。我已经没有力气了。”

“我也没有力气了，”加米涅夫说，“但这迟早会了结的。必须忍耐。”

“如果我们出庭，就能保全我们家属的生命和其他受审人家属的生命。没有我和你出庭，他们无法组织审讯，所以首先是审讯需要我们。如果我们不出庭，科巴不仅会杀害我们，不仅会杀害我们的亲属，而且还会杀害所有其他的人，杀害他们的亲属。”

他喘过气来以后，重又说道：

“我们应该不仅考虑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属，我们一定要考虑到成千上万原来拥护我们的人和他们的家属，我们要对他们负责。因此，我建议提出这样的条件：斯大林应当保全我们及我们家属的生命，保全我们过去的支持者及他们家

属的生命。为什么要说保住我们的生命？因为如果他答应保全我们的生命，才能证实这个案件不是为了追究罪责。他知道得很清楚，罪行是没有的，只是一笔交易，以生命来换取指控托洛茨基的恐怖活动。”

“他什么都可以答应下来，但一切都将是欺骗。他是不可信的。”

“我们不是相信他，而是相信他正式向我们作出的保证。”

季诺维也夫已经被挫败了，这是很明显的。他将出庭，提供所需的证词，其中包括他们所需要的对他加米涅夫的证词。

当然，斯大林的许诺一段时间内是会照办的，能否长久，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暂时可以认为，会实现的，而且这只是对那些同意合作的人。而对那些拒绝合作的人，他会立即镇压，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包括他的小尤拉在内。

“若要我们答应去做这种卑鄙的事，”加米涅夫说，“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斯大林必须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向我们作出保证。我再强调一下：要政治局全体委员到场。那么，这就不是他个人作出的什么保证，而是政治局的保证了。只有在政治局作出新的决定时，才能推翻这个保证。”

“对，”季诺维也夫同意了。

加米涅夫在他和季诺维也夫一起被带去见亚戈达的时候，向亚戈达提出了这一条件。

亚戈达答应向斯大林报告。

其实，还在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被带去见他的途中，他已经汇报了。他通过传声器，一字不漏地倾听了他们的谈话，并急急忙忙地给斯大林打了电话，唯恐万一叶若夫米到这儿，

一听到加米涅夫的话会抢在他亚戈达的前头向斯大林报告。

亚戈达得意洋洋。战胜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桂冠已被他和他的机关夺得。斯大林也该会满意的。

但是，一切并不象亚戈达所预料的那样。斯大林吩咐亚戈达、莫尔恰诺夫、米罗诺夫立刻前去见他，汇报详细情况。

静静地听完报告之后，斯大林脸色阴沉，用严厉的眼光把他们几个扫视了一遍。

混蛋们一个个各就各位，坐了下来，自我陶醉着，他们洋洋得意、欢天喜地。为什么欢天喜地？是他们保证了审讯？那当然。他们完成了任务，想请功受赏哩！但真正的原因不在这里。他们高兴是因为他们拯救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搭救了斯米尔诺夫和姆拉奇科夫斯基，也救了象奥利别尔格那样一些混蛋，这才是他们兴高采烈的真正原因所在。被指控的那些人是用襟怀坦白的承认罪行来换取生命的啊！他们认为，是他们为这些人保住了性命。这样，他们的良心上就不会留下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的战友”的鲜血，他们也想做个清清白白的人。他斯大林会饶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他会对这种政治上错误的决定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的，而这些混蛋却在表现出欢天喜地、洋洋得意的样子，仿佛是他们保住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生命，他们是人道的、仁慈的，他们肃反工作人员的良心是清白的。他们没能挫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些二流子、腐化变质分子、寄生虫、胡说八道的人，连两个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早已崩溃了的人都

对付不了。现在他该替他们来做这件事吗？

斯大林站了起来，开始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

亚戈达、莫尔恰诺夫、米罗诺夫不声不响地靠墙坐着，胆战心惊地望着慢吞吞地、无声无息地在办公室里踱着方步的斯大林。

“初看起来，这是不坏的，”斯大林终于开口说话了，“不过那只是初看起来而已。他们想要保住性命吗？毫无疑问，是的。每个人都竭力想保住性命。生命对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不管是季诺维也夫，还是加米涅夫，也都想保住性命。当然，有一些是不怕死的，但那是些有理想的人，他们愿为理想而献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并没有这样的理想，他们早就失去理想了，因此他们不值得去为什么东西牺牲生命。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让人去为之牺牲的，那就是光荣感，共产党员的荣誉感，布尔什维克的荣誉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有这种荣誉感吗？毫无疑问，他们是没的。他们多年来一直在欺骗党，欺骗工人阶级，他们早就丧失了荣誉感和良心，从而，他们根本不值得去为什么东西送命。他们是想作为普通老百姓活下去吗？不，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普通老百姓。他们想保存自己的骨干。假如凭他们这种滔天大罪还要网开一面，那么，又怎么能向那些普通的追随者问罪呢？他们的阴谋就在于此。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骨干。这就是他们所要求的保证。试问，党为什么要向他们提供这样的保证呢？”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而是继续在房间里慢慢地、轻轻地走来走去。

亚戈达、米罗诺夫和莫尔恰诺夫默不作声，他们被事情突如其来的转折给镇住了；斯大林改变了初衷，不愿保证受

审者们的生命了。但是，审讯还将继续进行，他是无论如何也要进行审讯的，所以不得不采用其他手段以获取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证词了。

斯大林回到桌旁坐下。

“你们为什么不说话？”

但还是继续沉默。

斯大林冷笑了一下。

“你们向他们作出了什么保证？”

“斯大林同志，”亚戈达只得开口了，“我们没有向他们作出任何保证，我们也无权作什么保证。是他们要求保证，而且，他们不是要我们作出保证，他们是要求政治局保证。我们只是答应将他们的要求向政治局转达。”

“你们答应了，”斯大林重复了一遍，“你们答应他们同政治局作交易。政治局能作这种交易吗？你们想过没有？现在我算是明白了侦讯工作被引到了什么方向。”

他停了一下，然后说道：

“你们答应他们将要求转告斯大林同志，那斯大林同志应该怎么答复他们呢？说斯大林不同意接见他们，他们对此会怎么看呢？中央是多么不愿改变他们的命运啊！他们估计会为此判处死刑。那又要出庭干什么？要你们干什么？你们已经干了半年，毫无结果。你们答应他们将要求转达给政治局是犯了一个错误。你们只应当听他们讲，然后说，你们会讨论他们的要求，你们自己一定会讨论的。然后，你们来同我们商量，那我们就可以建议你们去对他们说，你们不能向中央转达这种要求，你们无权这样做。这样，就可以让他们自己去决定自己的命运。你们应该这么做，可是你们没有这样

做。”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道：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改正你们的错误。我看只有一个办法……”

他用那严厉的注视的目光又向大家扫视了一遍。

“要是我们拒不接受你们所转达的要求，那么，由于你们已经转达了这个要求，你们的声誉就将在机关全体人员面前受到影响，这是我们是不愿意的。我们不想让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领导的声誉受到影响。我们支持并高度评价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仅仅因为这一点，政治局才被迫接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要求。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今后，你们只能听取这一类要求，无权答应转达这类要求。请记住这点。”

莫尔恰诺夫和米罗诺夫用密封的小轿车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带进了克里姆林宫。

桌旁坐着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叶若夫。亚戈达靠墙坐着。

斯大林没有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打招呼，随便地用手指了一下墙旁边的椅子。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坐下了，旁边坐着米罗诺夫和莫尔恰诺夫。

斯大林默默地、冷冷地望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象看着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似的。过去的事消失了，过去的事不存在了。对他来说，这些人已经没什么可记忆的了。两张

憔悴之极、神色惊惶的脸孔，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居然想推翻他，推翻他！这些罪犯和混蛋！早就该消灭他们了！

“你们说吧！”斯大林阴沉地说道。

“他们答应我们说，政治局来听取我们的陈述，”加米涅夫说。

“你们指望政治局全体委员都会放下手头的工作，离开自己的城市和共和国，专程前来看你们一下，并听一下你们的陈述？老实说，他们看你们早已看够了，也听够了。”

加米涅夫向季诺维也夫看了一眼。

斯大林抓住了这一目光，并清楚地理解这个目光，他同加米涅夫相互之间是非常了解的。加米涅夫是在用这一目光暗示季诺维也夫坚持曾答应过他们的那个要求——应当是政治局全体成员来听他们申诉。加米涅夫一般总是跟在季诺维也夫后面的，但今天这两个人中，比较软弱、比较肯让步的是季诺维也夫。

“如果你觉得同政治局的一个委员会谈话不合适，”斯大林说道，“我们可以结束这次会见。”

斯大林的推测是对的。季诺维也夫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过去，季诺维也夫是个高嗓门儿，象是女声，甚至有点尖声刺耳。如今他说话声音很低，说得很慢，也很困难，象一个老太婆！从来就是个娘们儿，一副娘们儿的嘴脸，连庄重地去死都不会。可他过去竟会把人一批又一批地送去枪毙。他当时在彼得格勒杀死了多少人哪！他谁也没有可怜过，可现在他怜惜自己了。要是把他放在党内的上层领导机构里，他会把斯大林同志也枪毙掉，就连这样的谈判也不会进行的。难道说现在在这种处境下他还指望翻身？！

然而，季诺维也夫却艰难地呼吸着，低声地说道：

“无论是我，还是列夫·鲍里索维奇都与杀害基洛夫没有任何关系……这您知道得很清楚……”

他抬起头，正视了一眼斯大林。斯大林没有避开他的目光。

“但是……”

季诺维也夫低下了头……

“但是，当时要求我们接受……要我们对这个暗杀事件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他们向我们转告了你说的话……你说，党需要我们承认……”

季诺维也夫喘了一口气。

“为此，我们牺牲了自己的名誉这样做了……但是我们受骗了，把我们关进了监狱。”

他又喘了一口气。

“你们现在究竟想要什么？现在你们要我们再次出庭。而在法庭上，原先列宁在世时的政治局委员们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生前好友将被描绘成匪帮和杀人犯。这样做，不仅会使我们蒙受耻辱，而且会使党蒙受耻辱，这个党……是好，是坏，好歹我们也为她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他哭了起来。莫尔恰诺夫给他倒了水。斯大林对季诺维也夫的眼泪毫不在意，他说：

“中央曾不止一次地警告你们，你和加米涅夫的立场和做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果然如此……我们又对你们说，你们服从党吧，那样可以保住性命。你们愿意服从吗？又不愿意。怎么说呢？那就只好咎由自取了。”

“我们已经多次受骗了”，加米涅夫说，“又怎么能保证现

在不是在受骗呢？”

“你们要求保证？”斯大林假装吃惊地对伏罗希洛夫看了一眼，说道：“他们要求保证！政治局给他们的保证看来还不够！他们忘了，在我国没有更高的保证了！”斯大林又对伏罗希洛夫看了一眼，然后对叶若夫看了一眼。“同志们，你们意见如何？我觉得，这种谈话是白白浪费时间。”

叶若夫耸了耸肩膀，意思是说，一切都清楚了。

“他们忽然想迫使我们接受他们的条件，”伏罗希洛夫愤恨地说道，“他们是真的不明白，还是装作不明白：斯大林同志想要保住他们的性命。如果他不珍惜自己的性命，何必如此！见他妈的鬼去！”

沉默。大家都不说话。后来斯大林说了：

“很遗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总是用小市民的眼光来判断问题，非常遗憾。他们连为什么要组织审讯这一点都没有搞清楚。难道是为了要枪毙他们？这简直愚蠢极了！同志们，我们完全可以不经任何审判就把他们枪毙掉的。这该怎么做，季诺维也夫非常清楚。审讯的目标是指向托洛茨基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过去某个时候曾经知道，托洛茨基是党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但后来他们采取了向党进攻的态度，为托洛茨基恢复了名誉，出于派别的考虑，为他恢复了名誉。可托洛茨基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他仍然是党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这一点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假如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同托洛茨基一起反对党的时候我们尚且没有枪毙他们，那么，凭什么我们要在他们帮助中央反对托洛茨基之后枪毙他们呢？还有最后一点……”

斯大林在这儿停顿了一下，陷入了沉思。在他的眼里闪过了一丝丝富有人性的、可信任的目光，而他所说的一切又是那么突如其来的真诚，深情感人。

“我们并不希望让我们党内的老同志们流血，不管他们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季诺维也夫又一次哽咽起来，于是莫尔恰诺夫又一次站起来为他倒水。但是斯大林发现，莫尔恰诺夫的脸部表情已不是他跨进办公室那时的样子了。莫尔恰诺夫是幸福的，他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生命得救而感到由衷的高兴。米罗诺夫也感到高兴。这个米罗诺夫是他亲自提拔当亚戈达的副职的，这个仁慈的人感到特别满意。

那还用说，他们怎么不高兴呢？他们不必为“无辜者”之死而对历史负责了。

为什么说是“无辜”呢？因为根据他们的文件和法律条文有某些不符之处。可是，哪些文件，哪些法律条文可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呢？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来说，只有一条法律，那就是这个专政的利益。对于一个真正的肃反工作人员来说，不应有其他任何法律。如果有其他法律的话，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肃反工作者。

加米涅夫站了起来。

“斯大林同志，政治局委员同志们，我代表自己，并代表季诺维也夫同志声明，我们同意向我们提出的条件，并准备出庭受审。”不过，我们请求能答应我们，现在和将来都不枪毙任何一个过去曾有过派别活动的原反对派分子。”

斯大林仿佛是恢复了短暂的劳累，疲乏地说：

“这是理所当然的。”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从克里姆林宫被送回牢房时仍是乘坐的密封小轿车，但囚室换了；有了床，上面铺了干净的被褥，立即送他们去洗了淋浴，伙食也改善了。医生关照给季诺维也夫应有的病人饮食。在审讯前两周，同他接触的人举止都很得体，有分寸。

不过，1936年8月19日中午12时10分，他们被带到工会大厦十月大厅出庭受审时，季诺维也夫看上去气色仍然不好，一张灰土色的浮肿的脸，双眼下面是浮肿的眼泡。由于哮喘，他张着大口吞进空气，解开了领口并取下了衬衣的活领子，就这样一直坐着受审。

加米涅夫也是脸色发灰，眼眶发黑，但他看上去要比季诺维也夫精神些。他一直望着大厅里的人，希望能看到一些熟人。他多年任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莫斯科多少有点名望的党的活动家他都认识。可是，大厅里这样的人一个也没有，有的只是穿便衣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普通工作人员。

亚戈达和部里的其他领导人是坐在隔壁房间里听审讯的。

只有一个赖因霍尔德看上去很健康，仿佛他不是从监狱中来，而是从家里来的。他说得非常自信。每当维辛斯基说错了什么，他就要求发言，并巧妙地加以更正。

但是，赖因霍尔德的努力是多余的。全体被告都已记住了早先编好的台词，他们回答的问题都象检察长所要求的那样准确。更有甚者，在审理过程中他们还说出了一些阴谋的参与者：索科利尼利夫、斯米尔加、李可夫、布哈林、托姆

斯基、拉狄克、乌格拉诺夫、皮达科夫、谢列布里亚科夫、姆季瓦尼、奥库贾瓦、军长普特纳、军长普里马科夫、师长德米特里·施密特。每人在最后一句都是完全承认自己有罪，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恐怖分子、匪徒。

只有伊万·尼基季奇·斯米尔诺夫破坏了导演的意图。正如他已答应莫尔恰诺夫的那样，他承认于1932年接受了托洛茨基关于恐怖活动的指令，但自1933年1月1日被捕以后，一直在狱中，从而未从事任何恐怖活动。在审讯过程中，斯米尔诺夫否认存在什么“总部”，并驳斥了姆拉奇科夫斯基、季诺维也夫、叶夫多基莫夫、德赖采尔、捷尔·瓦加尼扬和加米涅夫的证词。

对有些问题斯米尔诺夫根本不予回答。

维辛斯基要求枪毙全体被告。

在8月24日的凌晨2点30分，法庭宣布判决：全体被告均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根据法律，犯人在72小时内可以请求赦免。

但24日早晨，全体犯人均被拖去枪决。

季诺维也夫失去了自制力，向着整个监狱歇斯底里地大喊斯大林的名字，恳求斯大林实现自己的诺言。为了制止这种喊叫，押解季诺维也夫的中尉把他赶进了一个空囚室，在那里用手枪打死了他。

加米涅夫则被惊呆了，一句话也说不出，默默地接受了死刑。

只有伊万·尼基季奇·斯米尔诺夫镇静自若，勇敢地走在监狱的走廊上。临刑前他说道：“由于我们在法庭上的不光彩行为，我们是罪有应得。”

斯米尔诺夫的女儿奥莉加和妻子萝扎随即被捕，并于1937年枪决。

就在那个1937年，季诺维也夫之子斯捷潘·拉多梅斯尔斯基，巴卡耶夫的妻子安娜·彼得罗夫娜·科斯基娜(1917年入党)、姆拉奇科夫斯基的兄弟和侄子、捷尔·尼加尼扬·恩德扎克的兄弟被枪决。捷尔·尼加尼扬的妻子克拉夫季娅·瓦西里耶夫娜·格涅拉洛娃于1936年被捕，在劳改营度过了十七年。

加米涅夫被处决后，他的第一个妻子和第二个妻子立即被处决。

1939年枪决了他的长子亚历山大。

加米涅夫的幼子尤里于1938年1月30日被处决，死时十七岁还差一个月。

加米涅夫的孙子维塔利到1951年才被捕，当时十九岁，被判处劳改25年，死于1966年。

斯大林同志就是这样履行自己的诺言的。

30

《勇士们》的首场演出没看成。瓦季姆患链球菌喉头炎，病得很厉害，体温将近39℃，用雷佛努耳含漱咽喉，毫无用处。费尼娅用白蘑菇干熬了汤，瓦季姆喝了一点清汤，才确实感到好了一点。农村里只有这种治法，哪怕喝一点清汤也好。瓦季姆请人把报纸带来，好多天没有看报了。利托夫斯基过去尽是说《勇士们》怎么怎么好，可突然在《苏联艺术》杂志上发表起评论来了，而扎戈尔斯基则在《莫斯科晚报》上发表评论。瓦季姆没有去看扎戈尔斯基的文章，把报纸扔到了地板上，反正来得及的，还来得及去看一场演出，不过，现在很想睡觉。

11月14日叶尔希洛夫来电话问：

“身体还没有恢复吗？……报纸还是可以看的吧？你看一下《真理报》，《真理报》。”

“上面有什么文章呀？”瓦季姆懒洋洋地问道。

“艺术委员会关于禁止《勇士们》上演的决定。”

“真的吗？！”

“你去看是不是真的……”

就在11月15日那天的《真理报》上发表了克尔任采夫的一

篇题为《伪造人民的过去的赝品》的文章，克尔任采夫彻底驳斥了杰米扬·别德内，他在文章结尾写道：

“杰·别德内在剧本的历史部分歪曲了历史，那不仅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而且简直是以轻率的态度对待历史的典型，是污辱人民的过去的典型……杰·别德内仅仅是根据‘勇士的鼾声’来写勇士的，他描绘的俄罗斯人民是‘在火炉上贪睡’的人民，这部剧本中反映出来的一些失常的表现，同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诗人都是格格不入的。”

现在，瓦季姆自己给叶尔希洛夫打电话了：

“有什么新闻吗？我躺着，什么事也不知道……”

“听说杰米扬·别德内给轰出了克里姆林宫的住宅，”叶尔希洛夫嘲笑道，“听说他现在只好在熟人那儿过夜了……你看吧，马上就要管到你们室内剧院了，你也要卷进去了。”

“这跟我什么相干？我有病，就连《勇士们》也没看过，这你是知道的……”

“不管你是看过还是没看过，反正你得包括进去了……”

叶尔希洛夫这个畜生看来是对的，也可能，他已经了解到什么了，只不过没有说出来。11月20日《真理报》上出现了一篇署名观众的文章《错误的路线》，对剧院批判得很厉害，可以说是一棍子打死，瓦季姆看啊，反复地看了几遍，把报纸拿在手里。

“为了使剧院摆脱形式主义美学‘遗产’的影响，为了使剧院显得生气勃勃、内容丰富，成为真正的苏维埃的剧院，一切努力都做过了，但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剧院的领导人没有接受政治教训……”

“莫斯科室内剧院从来都是谦逊不足，而恬不知耻的自我

吹嘘有余。

“莫斯科室内剧院不止一次地上演过有政治错误的剧本：

“1927年演出了米赫·列维多夫的《平等派的密谋》；

“1928年演出了米赫·布尔加科夫的《血红色的岛》；

“1929年演出了斯·谢苗诺夫的《娜塔莉娅·塔尔波娃》。

“整个舆论界，其中也包括其他一些剧院都严厉谴责了莫斯科室内剧院所演出的这些剧目，所以它们就被禁演了……

“莫斯科室内剧院的领导人亚·雅·泰罗夫顽固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1931年又演出了M·库利什的一出彻头彻尾沙文主义的戏《悲壮奏鸣曲》。

“接着又来了《勇士们》，这是杰·别德内的剧本，一出政治倾向性完全是虚伪的戏。

“莫斯科室内剧院同国内的政治生活和艺术生活联系很少。

“泰罗夫似乎在剧院里确立了‘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使集体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受到了压抑，无法表现，然而，谁也没有把剧院的专利权转让给泰罗夫。

“莫斯科室内剧院无法建立创造性的集体，因为他们不让出色的演员们有出头的机会。莫斯科室内剧院已落后于苏维埃艺术的总的成长形势，落在大家后面……”

就在同一天，瓦季姆常投稿的那家报社的责任编辑给他打来了电话：

“有个意见，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我们应该对发生在莫斯科室内剧院的事件有所反应，请您写一篇吧。”

“不过，您知道，”瓦季姆说：“我有病呢！我得了喉头炎之后又患了风湿病，指定了严格的静卧疗法。何况，正是由

于生病，所以我没有看过《勇士们》，另外被点了名的那些剧，不是没有看过，就是不记得了，因为那时我还小呢。”

“那我把这情况向编辑说一声吧，”书记不快地答道：“我没有料到您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会拒绝我们的要求。”

11月23日《真理报》第六版出现了一篇小短讯：《莫斯科室内剧院全体演职员的意见》，副标题是《亚·雅·泰罗夫在文过饰非》。

剧院工作人员的会议开了两天，几十个人发了言，其中包括剧院的名演员。

功勋艺术活动家Л·费宁说：“他们硬是只让演员们赞颂通得过的剧本，哪怕演员们认为这个剧是坏剧。”

但是采宁的话却使瓦季姆非常吃惊，他说：“泰罗夫不愿意同剧院工作人员讨论剧本。”

对于采宁，瓦季姆是记得很清楚的，他曾在《马希纳利》中饰丈夫，在《乐观的悲剧》中饰沃扎克，为此，科宁在那次采访时还表扬了他。去你的吧，采宁！

要知道，他瓦季姆一年半以前曾发表过一篇对科宁的访问记，当然，可以说是委托他去采访的，尽管报社大概还记得，这篇文章是他自己送去的，可是访问记的基本内容不是他的，而是科宁自己说的，不过，注脚都是他加的，问题也是他提的，他曾表达了赞扬剧院和科宁的意思，这点想必也会有人提醒他的，但许多人当时都羡慕他所取得的成就，可现在却倒打一耙了。

显然，他是不该拒绝写文章的，他怎么没有嗅出什么味儿来呢！难怪责任书记很不高兴地说什么“我去向编辑说一声吧。”而且还暗示说：“我没有料到您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

会拒绝我们。”

这儿还有叶尔希洛夫火上加油呢！他来讲了艺术委员会扩大会议的情况，他被邀请参加了这个会，还请了埃尔斯拜恩。

“要是你身体好的话，也会叫你参加的。会议的详细情况你自己可以看明天或后天的《苏联艺术报》，但有些事情你还是早些知道为妙：克尔任采夫指控泰罗夫‘政治’上有‘敌对行为’。”

“那《乐观的悲剧》怎么样呢？”瓦季姆问道，“这个剧总不应该忘记了吧？这儿可没有‘政治上的敌对行为’。”

“他们连一次也没有提到这个剧。克尔任采夫说：‘莫斯科室内剧院是个耻辱的词。’”

他被卷进这个事件中去了……笨蛋，你居然还拒绝写文章。怎么样？把这事告诉叶尔希洛夫吗？

“刚才报社还打电话给我要我写文章呢，可我说我在生病，不能写。”

“是杰洛夫吧……你给他打电话，就说你身体已经好了，现在就直接打吧，我稍等一下。”

瓦季姆打完了电话，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说，一切都说好了。

“你做得对，可不能翻车啊！”

瓦季姆喊费尼娅，叫她再拿一个枕头来，那样靠着写可以方便一些。他拿了一本书垫在纸的下面，不行，纸向下滑。他用眼睛在书桌上找，在书架上找，看到了一本搁在那儿不用的一本普通练习本，这可以用。他把本子一打开就看到

了一段记录，那是3月22日《芝加哥论坛报》中的一段。

“我们希望能再次看到他们，他们的离去使巴黎的舞台黯然失色，我们焦急地等待着这些天才演员的归来，并记住他们，以他们为榜样，我们的内心将常常向着俄国，因为，从现在起，我们知道了照射到欧洲舞台上的光明来自东方。”

这是从哪里来的？哦，想起来了，是《西方报刊对莫斯科国家室内剧院巡回演出的政治反响》小册子里的话！

“天才的演员们”！“照射到欧洲舞台上的光明来自东方”……资产阶级报刊如此吹捧他们决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艺术对资产阶级有用。

他毫无好感地想到了科宁。“姑娘……”，把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叫“姑娘”，算是找到了一位小姐，“姑娘”在侍候她。她待人朴实，能同人平等交谈，这并不是由于天才人物的豁达大度，而是由于冷漠。反正同谁说都一样，只要找到谈论自己和自己成就的机会。斯特凡·茨威格、奥尼尔、让·科克托……

署名观众的文章说得对：室内剧院不够谦虚。确实如此，一味地恬不知耻地自我吹嘘！“在竞赛中他们战胜了小剧院”，小剧院如今巍然屹立，并将继续巍然独存，可是你是不是站稳了脚跟，还很难说……人民需要小剧院，国家需要小剧院，亲爱的科宁太太，国家是否需要您，还不清楚。西方需要您，是对的，西方在向您鼓掌……但是您可别强求我们苏联观众为您鼓掌。

医院里有人把瓦季姆写的文章拿给安德烈·安德烈耶维

奇看，不知是夸奖，还是嘲笑：“您的儿子写得挺来劲。”

晚上，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和平时一样去看瓦季姆，把椅子挪到他的床边。

“我看完了你的文章，不知道你怎么看，这家人以后不会再接待我们了，而且，我担心，还不仅是这一家。”

他默默地坐了一会儿，望着地板，就站起来了。

“你量过体温了吗？”

“体温正常，”瓦季姆嘟哝了一句，“要是这一家不接待，就去找别的更好些的人家。”

他睡得很熟，很沉，因为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可是，到了早晨，又象上一次一样，电话铃响了，睡得朦朦胧胧的瓦季姆拿起了话筒，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官腔十足、蛮横无礼的声音：

“是马拉谢维奇公民吗？你今天十二点钟以前到苏联内务部来一趟，找阿尔特曼同志，通行证可到通行证发放处去取，地址是：库兹涅茨基桥24号。”

还是那个办公室，窗户是用栅栏钉起来的；还是那个穿军装的阿尔特曼，军装过大，象是挂在衣架上似的；还是那副凹陷的双颊，那双阴沉的眼睛。

他在桌子抽屉里翻找了一番，拿出了一个卷宗，把它打开，抽出了上次审问时的一份记录，重新看了一遍。

瓦季姆不安地注视着他的动作，肉体上的恐惧重又控制

了他，他不知道阿尔特曼这次又会对他怎样。

看完了最后一页，阿尔特曼连看也不看瓦季姆，就低声地、没精打采地问道：

“您不推翻您的供词吧？”

“当然不会，我还签了字的呢。”

“还想补充什么吗？”

又给了一次机会，他应当好好地利用这次机会。

“您瞧，”瓦季姆开始说道，“上次您问起反苏内容的谈话的问题，我今天还要重申：我没有也不可能与任何人进行过任何反革命的、反苏维埃的谈话。不过，当然，您的提问迫使我进一步地进行了考虑，我明白，这样的问题您不会无缘无故地提出来的，您提这样的问题总会有某种根据。所以我想，我给我的一个熟人讲过的一个笑话有可能成为这种根据。这个笑话是偶然讲起来的，不过，我确实讲了。”

“是个什么笑话？”阿尔特曼身子向后一仰，准备听下去，这才第一次正式向瓦季姆看了一眼。

瓦季姆把这个笑话讲了一遍，说了他是从哪儿听来的，给什么人讲过。他还补充说，他过去对这个笑话没有在意，讲的时候党委会委员在场，他对这个笑话也没有什么反应，甚至还笑了一阵。而他瓦季姆又把这个笑话讲给自己的一个名叫谢尔盖·阿历克谢耶维奇的理发师听了。往理发椅上一坐，就扯开了，何况从小就认识这位理发师，那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人，他对政治的态度只需一句话就包括了：“少了列夫·达维多维奇是不成的。”

在这个地方，在办公室里，瓦季姆就选择了这个说法，他觉得这个说法心平气和，内容丰富，有说服力。

阿尔特曼沉默了一段时间，现在他这种沉默是凶多吉少的表示，他这样做使瓦季姆感觉到了对他的不信任和不满意，阿尔特曼给人的印象是，他是个脑筋迟钝的人。

后来，阿尔特曼拿了一张纸，说道：

“请再说一遍，这个笑话您是听谁讲的？”

瓦季姆重复了一遍。

“这是在什么时候？”

瓦季姆说了在哪个月，但记不清是哪一天了。

“您讲给谁听了？”

这下明白了：原来瓦季姆并不知道谢尔盖·阿历克谢耶维奇姓什么。阿尔特曼在纸上记下了名字和父称，还有理发馆的地址。

“您还讲过一些什么笑话？讲给谁听的？”

瓦季姆耸了耸肩膀说：

“我？笑话？我没对什么人讲过。”

“您想让我相信您在自己的一生中除了这则笑话之外别的一个也不知道了？您想让我相信这一点吗？”

“不，我这一生中当然听过各种笑话，但是我没有讲给别人听过。”

“您究竟听过些什么笑话呢？”

“记不清了，无论如何不是什么政治性的。”

“那是什么性质的呢？”

“就是一般日常生活的……”

“马拉谢维奇！您想向我证明我是一个傻瓜？我并不是傻瓜，您也别以为我是傻瓜……”

他又凶残地眯起了眼睛，恶狠狠地说，不，那不是再说，

而是发狠地指责说：

“一般说来这儿没有傻瓜。”

瓦季姆突然感到阿尔特曼是失态了，于是他更加害怕了，因为疯子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不过我真的想不起来了，”瓦季姆嘟哝说。

“您想不起来了，”阿尔特曼一面满怀仇恨地注视着瓦季姆，一面说，“那谁能替您想呢？我？那好，请坐，请坐到我的位子上来，我坐到您的位子上去，”他站了起来，“来呀，请坐，请坐，”他向旁边跨了一步，用手指了指，“请这边坐！”

瓦季姆被吓得面无人色，这个疯子眼看就会打死他的，他会用佩在皮带上的手枪把他打死的。

阿尔特曼出乎意外地坐了下去，就象刚才站起来时一样突然。又沉默了一会儿，沉思着，发愁地看着屋角，后来突然问道：

“作家协会里人们常讲笑话吗？”

“大概是讲的。”

“请准确地回答：讲还是不讲？不要说‘大概’，而要准确。”

“作家协会会有好几百号人呢！”

“我不是问作家协会会有多少人，我是问，他们讲不讲笑话？”

“有人无疑是讲的。”

“这‘有人’是指谁？”

“我说不出具体人来……”

“‘说不出’？”阿尔特曼奸笑得嘴都歪了，“您还是说‘我不想说’吧……一个笑话被逮住了，您就记住了一个，再逮住了

别的，您就会想起别的了，不过，那就晚了。好吧！您认识潘克拉托夫·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吧？”

“潘克拉托夫？啊，是的，萨沙·潘克拉托夫，当然认识，我们过去曾在一个学校上学。”

“您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他被逮捕了，流放了，好象是西伯利亚。”

“您是从谁那儿知道的？”

“是这样的，”瓦季姆慌了神，“我和他住在同一条街上，在同一个学校上学，大家都知道这情况。”

“不，您真的把我当傻瓜了，”阿尔特曼说道，“您是想让我相信，这条街上所有的人都光在谈论潘克拉托夫·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被捕的事了？您是想让我相信，您还和从前一样在上学，在那里也是只谈潘克拉托夫被捕的事？……是这样吗？”

“我常在阿尔巴特街上和同班同学见面，是他们告诉我萨沙·潘克拉托夫被捕的事的。”

“就这些？”

“您是指？……”

“什么‘您是指’‘我是指’的，”阿尔特曼又大发雷霆了，“我是在用俄语问您！我问您，关于潘克拉托夫案件您知道些什么？”

“关于他的案件一般说来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被捕了，至于为什么被捕，我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您只知道一个笑话，一辈子只听人讲过一个笑话！”

阿尔特曼沉默了，停了好久，又突然问道：

“你们写过为潘克拉托夫辩护的信吗？”

“信，”瓦季姆又发慌了，“信……”

“对，‘信’、‘信’，”阿尔特曼又轻蔑地撇了撇嘴。“为潘克拉托夫辩护的信你们写了没有？”

瓦季姆记起了列娜·布佳金娜家的吃饭间，当尼娜建议写一封为萨沙辩护的信的时候，他们是坐在吃饭间里。他想起了列娜、尼娜、马克西姆……萨沙是在两年前被捕的，瓦季姆已经把他忘了。

“是这样的，”他迟疑地开始说了，“萨沙被捕的时候，我正好在我的同班同学列娜·布佳金娜家里作客，当时还有别的同班同学也在她家里。”

“谁？”阿尔特曼打断了他的话，“说具体的，谁？马拉谢维奇，说具体些，别支支吾吾，不要让我诱供。您差不多想了一年才想起了您的理发师，您还想继续这么干？不，我们不会让您一年想一个姓的！我们会有办法让您快点儿回忆起来的，我们有这种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把您留在这儿，您在这样的房间里会想得快一些的。”

瓦季姆喘了口气，他的两只手在发抖，脑袋象是被紧紧地箍住了。

“怎么样？”阿尔特曼突然轻声地、温和地说，“您说吗？”

“在列娜家的有我、尼娜·伊万诺娃和马克西姆·科斯基，我们都是同班同学……”

阿尔特曼把这些姓记在纸上。

“我们谈了萨沙·潘克拉托夫的事。尼娜·伊万诺娃提议给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写个报告，说明我们了解萨沙·潘克拉托夫，他是一个诚实的共青团员。我反对，我说，我们只知

道萨沙·潘克拉托夫在中学里的时候是个好共青团员，可从那以后已经过了六年，他可能变了。列娜·布佳金娜……”

“好了，好了，”阿尔特曼不耐烦地打断了他，“够了！总的来说，你们讨论了如何为已定罪的反革命分子翻案的问题，是这样吧？您说，假如潘克拉托夫按第五十八条定了罪，他是不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呢？”

瓦季姆本来完全可以说，萨沙当时还没有判罪，只是逮捕而已，所以他们也无从知道，会向他提出哪个条款，而且他瓦季姆确实是反对过尼娜的建议的，但是他害怕与阿尔特曼发生矛盾，害怕阿尔特曼又勃然大怒，也就顺从地同意了。

“是，当然，如果把潘克拉托夫定为反革命分子，那就是说，这是无疑的。”

“可你们想为反革命分子翻案。”

“不过我个人……”

“什么‘我个人’‘你个人’的……你们每个人各自说了些什么，我不感兴趣。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事实：你们四个人，也就是一个小组聚在一起，讨论了如何帮助已经被捕的反革命分子的问题，准备发信为他翻案。信发了吗？”

瓦季姆本来可以说，信是没有发，那正是因为他瓦季姆反对。但他怕说谎，害怕阿尔特曼会揭穿他的谎言，那将会更糟糕，会糟糕得多，所以他说：

“我个人反对发信，于是我们便向尼娜的父亲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布佳金请教，您知道，他是奥尔忠尼启则的副手。他说不应当发这样的信。”

“是这样，”阿尔特曼满意地说了一句，“现在总算多多少少弄清楚点儿了，当然，不是全部，但总算弄清了一点儿。”

他把一页审问记录放在自己面前，拿起笔开始写记录。

瓦季姆坐在他对面，不敢动弹。

阿尔特曼写了好久，先是仔细地看了记有埃尔斯拜恩、叶尔希洛夫、谢尔盖·阿历克谢耶维奇等姓名的那张记录，然后对写有列娜、尼娜、马克西姆名字的记录仔细地看了几遍。

瓦季姆知道，被他说出来的这些同学以及别人这下也都要被叫到这里来了。那又怎么样？他并没有感到应受良心的谴责。既然人家可以把他叫来进行审问，为什么就不能把那些人叫来审问呢？他一句假话也没有说，他又没有诬陷哪一个，没出卖哪一个，他说的都是事实。所以，假如把那些人叫来，让他们也照实说好了。为什么他应该作出自我牺牲呢？为了什么？又为了谁？不，他不作自我牺牲。他们也可以不作自我牺牲。他们说了实话就没事儿了。

阿尔特曼终于写完了，他把纸递给瓦季姆。

“请看一下我写得对不对？”

瓦季姆开始看了。全都是写得对的，但联系起来这幅情景是很可怕的：埃尔斯拜恩当着叶尔希洛夫的面讲了一个笑话，他瓦季姆把这个笑话讲给自己的理发师谢尔盖·阿历克谢耶维奇听了。谢尔盖·阿历克谢耶维奇在每一次谈话时都要提到托洛茨基，并表现出明显的好感。他在言词之间表露出对托洛茨基的一切指控都是没有依据的。为反革命罪犯潘克拉托夫翻案的报告是尼娜·伊万诺娃建议写的，这个问题是在副人民委员伊·格·布佳金的住处讨论的，参加讨论的人有：瓦季姆、尼娜·伊万诺娃、布佳金娜·叶列娜、科斯京·马克西姆。根据副人民委员布佳金·伊·格的指示报告没有发出。

瓦季姆愈往下看，愈胆战心惊。“谢尔盖·阿历克谢耶维奇常常提到托洛茨基，并怀有明显的同情。”谢尔盖·阿历克谢耶维奇多半是个告密者（用不着可怜他），不过，瓦季姆总不能肯定他经常“同情”地提到托洛茨基吧，更何况还是嘲笑的口吻。接着是讨论了“报告”……“根据布佳金的指示”，这样说倒很象是一个组织了。

“怎么样？”瓦季姆听到阿尔特曼慢吞吞地低声说。“您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奉劝您不要去咬文嚼字，这些都不是本质。重要的是事情的实质。”

瓦季姆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这些话竟会出自阿尔特曼之口，他认定阿尔特曼是说不出这样的话的，可是，看来，阿尔特曼什么都知道。他怎么竟没看透阿尔特曼是个知识分子呢？

然而阿尔特曼继续说道：

“您想救什么人？用不着！每个人都会自己设法解救自己的，我劝您相信这点。至于您，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够解救您自己：在记录稿上签字。为什么？因为记录稿是正确的。”

本来是应该表示反对的，但是反对没有好处。如果他表示反对，只能惹怒阿尔特曼，也许，可能争取到个别词的改动，那又有什么用？最主要的是离开这里。

瓦季姆在审讯记录稿上签了字，这时，他感觉到阿尔特曼在注视着他手的动作。

阿尔特曼把记录收了起来，归到上次签过字的记录稿一起，把卷宗合上，放进了抽屉，身子向后一仰，靠到了椅背上，向瓦季姆看了一眼，完全是另一种目光，一种友善的目光。

“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您明白您刚才签字的是什么东西

西吗？”

“我是诚心诚意签的字。”

“对，是诚心诚意的，我很器重这点。”

他那刽子手的眯缝眼光突然没有了，也不歇斯底里大发作了，这时同瓦季姆谈话的是一个态度和蔼、心地善良的知识分子。

“我再说一遍，我很器重这点，就象我高度评价您的文学作品一样。我对您评论莫斯科室内剧院的近作评价颇高，我甚至非常惊讶，在心情不佳的情况下，您怎么写得出来的。在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后，心情当然是好不了的。不知为什么总有人认为跟我们打交道是危险的，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认识我们是有好处的。是这样，文章是篇好文章，虽然对个别地方并不是没有异议。怎么对您说呢？……一些小意见，甚至不是什么实质性意见，只是形式上的，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另外一点：要是我处在您的位置上，我就否认曾采访过科宁了。”

说完，他看了看瓦季姆。

瓦季姆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阿尔特曼对他的情况是如此熟悉。

阿尔特曼对他的印象十分满意，他继续说道：

“我为什么这样想呢？我们还有许多败类，还有许多怀嫉妒心的人，他们会吹毛求疵的，比如，说什么马拉谢维奇同志今天写的是一个说法，可一年半以前写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应该预先估计到可能出现这种攻击。您自己应当回想一下那次采访，并出来表示，剧院的问题早在一年半以前就存在了，只不过是现在才揭露出来而已。但是您没有这样做。”

他又看了一眼瓦季姆，不过这一次的目光似乎有点神秘莫测。

“要是这样做了就好了。要知道，您大肆赞扬这个剧院的时候，剧院的经理是他妈的奸细和托洛茨基分子皮克尔。你常看报，您知道皮克尔是为什么枪毙的吗？”

“可是我连认也不认识他呀，”瓦季姆低声含糊不清地说。

“这还有待证实，瓦季姆·马拉谢维奇，而这又很难证实。您是莫斯科室内剧院的常客，可以说是它的编内评论员，还专为您在第五排留下了包座，您会不认识剧院经理？”

“可我真的……”

“算了，”阿尔特曼打断了他的话，“皮克尔啦、剧院啦、还有艺术啦，我们都别谈了，要不然，”他笑了起来，甚至笑得很讨人喜欢，“这种争论会让我们离题万里的。我希望您能坚定地向自己解释清楚：您承认了一些什么。第一，有人当您的面讲过一个反苏的笑话，您对此是如何反应的？您有没有到我们这儿，至少，有没有到党委会去报告所发生的情况，揭露反苏维埃的人呢？没有。相反，您自己也讲起这个笑话来了，对谁讲呢？对自己的理发师。是不是只对他一个人讲了？您肯定说只对他一个人讲过。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您。假如您对一个人讲了，那就还会对另一个什么人讲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您是听过这个笑话的，而且我们也知道，您是从谁那儿听来的，讲给谁听过了，我们也知道。这是偶然的吗？常常有偶然发生的事，会偶然听到些什么，会偶然向什么人讲些什么，这是常有的事，虽然我们对此也不会原谅，因为，一个人总该明白他在讲些什么。但是，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

您这不是偶然的，远不是偶然的。”

阿尔特曼又微微地皱起了眉头，注视着瓦季姆，于是瓦季姆又害怕得揪心了。后来，阿尔特曼的目光又变得正常了，他继续说道：

“为什么不是偶然的呢？因为，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您是一个隐蔽的托洛茨基分子。”

为了制止瓦季姆表示愤怒的举动，他把手举了起来。

“镇静，镇静！你们一个小组聚集在一起，讨论了为被捕的反革命分子翻案的信，您肯定地说您是反对写信的，我们姑且相信您是反对了。但是您为什么反对呢？是因为不能为反革命分子辩护吗？不是，你瞧，是因为中学毕业已经很长时间了。难道这是苏维埃人的态度？不，苏维埃人的态度会采取另外一种立场：我不愿意，也不去为被捕的反革命分子翻案，甚至连讨论也不愿意，这才是苏维埃人的态度。您没有表现出这种态度。相反，您参加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而且，您大概也会在这封信上签名的，但是，布佳金制止了，他为什么制止呢？您又知道了。您遵循的不是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良心，而是某个人的命令。您的这种立场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它是建立在您成长起来的环境的根基之上的，您是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长大的，在那里，外国人是自己人。卡梅尔教授，罗索尔尼，”他的声音中充满了厌恶之意，“啊！啊！……您还相信这些外国人在我们这儿是奉公守法的，您能不能担保，他们到我们这儿来是单纯出于科学的目的？您能担保吗？”

瓦季姆被压抑得一声不吭。

“您不能，”阿尔特曼代他回答道，“可您和他们同坐一桌，

在一起吃了，一起喝了，听了他们的谈话，一次也没有到我们这儿来，也没有说，外国人在我们家谈了不该谈的话。还有您的妹妹，嫁给了其中一个彻头彻尾的反苏维埃分子。她的丈夫不仅是一个反苏分子，而且是一个间谍，他到时候跑了，偷偷溜了，逃避了公正的裁判。他还不是一个人走的，还把您的妹妹带走了，这样做，大概也不是偶然的。难道在巴黎漂亮姑娘还少吗？够多的。顺便说说，他的未婚妻出身巨富，可他却为了您的妹妹而丢了她。我要告诉您这是为什么，为了要把您的妹妹从这里带走。对，是这样。正如常言所说的，她也有不可告人的事，他的上级给他下达了指示，要把她带出去，救她出去，于是他便把她带出国，救了出去。”

他沉默了一会儿，坐着，双手交叉放在干瘦的肚子上，阴沉地望着瓦季姆。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俱乐部啊，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一个很糟糕的小俱乐部，那个小小俱乐部对您非常非常不利。光只一个议论斯大林同志的笑话早就应该把您关进牢房了……何况除了这个笑话以外还有外国人的问题，还有为被捕的反革命分子翻案的问题。可是我们并没有把您关起来，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我们饶恕了您……为什么呢？我直说吧：我们很器重您。您作为一个批评家，我们器重您，”他冷笑道，“您，当然，不是别林斯基，也不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但您在写文章的时候立场是正确的。问题是，您是真诚的呢，还是伪装的？就这个案件看，”他点头示意向抽屉看了一眼，抽屉里藏着审问记录稿的卷宗，“我们可以对您的诚意表示怀疑，怀疑的依据是很充分的。所以，”他意味深长地、久久地注视着瓦季姆，“您还应当证明您的诚意。情况就是如此，瓦季姆·

安德烈耶维奇，您有什么想法？”

瓦季姆耸了耸肩膀。

“我不知道……什么都搞得这么糟糕……”

“您应当认真仔细地考虑考虑自己的行为，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

“那当然，那当然，”瓦季姆嘟哝地说，“今后我要更加谨慎才是。”

“怎么说呢？小心谨慎是件好事，”阿尔特曼表示赞同。“可是这件事怎么办？”他又点头向抽屉看了一眼，“我怎么向领导汇报？领导只要一看完这个案卷就会问我：‘这个马拉谢维奇现在在哪间牢房里待着呀？’我怎么回答他呢？‘他答应今后谨慎一些。’我就这样回答他吗？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把我关进本应关您的牢房里去的。可是，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我可不愿意去蹲监狱，不，我不愿意。”

他又沉默了。

瓦季姆一动也不敢动。胃部烧得使他感到很痛苦，要喝点苏打水才好，他身上带有苏打，他平时总是随身带着苏打的，但他不敢要水。

“总之，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阿尔特曼突然快活地说，“应当让案子圆满了结。我再重复一下：您应当证明您的诚意，而且，如果您证明了自己的诚意，那么，这一切，”他敲了一下抽屉，“就真的被看作是荒唐的、偶然发生的事件了。您明白我说的话吗？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

“是的，是的，当然明白。”

他明白，很明白他们要他做什么。他而且明白，他会同意他们的要求的。但是他害怕亲口说出这些话来。

“什么‘是’呀‘是’的，”阿尔特曼皱起了眉头，“您明白什么了？”

“我明白，我应当证明自己的诚意。”

“那怎么证明呢？”

“不知道……我愿意，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

“那好吧，我来给您提示一下吧，”阿尔特曼果断地说，“您应该帮助我们同党和国家的敌人作斗争。”

“但是，我的文章，我的发言……”

“您的文章和发言我们都知道，这我已经对您说过了，但那是关于文学和艺术方面的。我们希望了解人的情况，那些从事文艺工作的人的情况，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实际上在想些什么，他们的真实思想是什么，而不是指他们在会上说了些什么，我们想了解的是他们不是在讲台上说的话。我们需要一个介绍这方面情况的人。”

“那……”

阿尔特曼从桌子里拿出了一张纸，给瓦季姆递上了一支笔。

“您写吧！”

“写什么？”

“您准备怎么帮助我们。”

“我是准备帮助你们，不过干吗要写？”

“那我怎么向那儿报告呢？”阿尔特曼把一个手指举向天花板。“就说您口头上答应帮助我们？”

他打开了抽屉，拿出了放有审问记录稿的卷宗，气忿地把它往桌上一扔。

“这就是您的一些案卷，讨厌的案卷，白纸黑字都记下来

了。可是，好的案卷您反倒不想要了。您瞧，您只是口头上答应帮助我们，”他看了看手表，“就这样吧，您自己决定，谁也不来强迫您做什么。我跟您已经胡扯了两个小时，您知道吗？我还有别的事要办呢！”

他向后一仰，眯起了眼睛，嘴边露出了表示厌恶的狞笑。

“快决定吧，快决定吧！”

瓦季姆把钢笔在墨水中蘸了一下。

“我该写些什么呢？”

他问的时候非常镇定，甚至还带点自尊心。他知道，现在是他们与他利害相关了。

阿尔特曼慢慢吞吞地，还不时地停顿一下，不急不慢地，但斩钉截铁、说一不二地逐句口授起来：

“‘我，一个在下面要签名的公民马拉谢维奇·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保证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报告一切损害苏维埃政权的行动和谈话内容，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并且保证一定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示，向他们介绍文艺作品的内容。’写好了吗？就是这些。我们不要求您写这些报告时签上自己的名字。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比如，您把它丢失在哪儿了，忘在什么地方了，被人捡走了，我们不想给您的生活条件添什么麻烦。所以，在这些报告上签名时最好用假名，可以用男人的名字，也可以用女人的名字。用女人的名字您不会觉得受委屈吧？”

多么阴沉的幽默啊，见鬼，还嘲笑人呢！

“最好还是用男人的名字吧，”瓦季姆答道。

“好……您叫瓦季姆……要是您愿意的话，就叫瓦茨拉夫

好吗？合适不合适？”

“行。”

“您把它写完：‘情况报告我用如下签名：瓦茨拉夫。’写完了吗？现在请您签名……就这样，还请注上日期，今天是几号？”

31

用早餐之前斯大林来到小花园沿小道散散步。

虞美人花开了，草坪上的紫罗兰看上去也很美：白的、蓝的、深紫色的，但稍远一点的地方有一些不知名的花，杆子长长的，从凉台上就看得见，花蕾用黑纸象绷带似地一个个地裹起来。为什么花上要用黑纸？看起来很不舒服。女服务员瓦利娅送早餐来了。

他用手指向她招招，把她叫到凉台上，指了指花。

“这是什么花？”

瓦利娅大笑起来。

“这是唐昌蒲，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它们下面的小花蕾比上面的开放得要早一些。要是它们同时开花，那是很美丽的。这下面的小花蕾用黑纸包起来是为了在上面的花还没有开的时候不让它们开放。我们在祖巴洛沃也是这么办的……”

当她一想起弗拉西克不准她提起祖巴洛沃时，她怕得不敢再说话了。

斯大林什么话也没有说，生气地看了看瓦利娅，回到房间里去了，早餐他碰也没碰，披上了军大衣就到篱笆小门那

儿去了。

瓦利娅不知所措地注视着他的身影，她的眼里流出了泪水，她很舍不得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她让他受委屈了，她是无意的，但让他受了委屈，真是罪过呀！早饭也不吃就走了，这事办得多不顺畅呀……鬼使神差似地让她说起了祖巴洛沃……

小汽车行驶在通向莫扎伊斯科耶公路的狭窄小道上，斯大林没有注意坐在司机旁边的上校，没有在意行驶在小车前后的警卫汽车，他不时地看着右边的云杉树，左边的桦树和白杨树，整个树林都经过了仔细巡察、仔细检查，它受到无形的保卫，但正因为如此，他的后脑勺或者前额很可能挨警卫人员的子弹。保克尔担保说，每个警卫人员不仅监视道路，而且监视自己身旁的警卫人员，这样，就可以排除任何的“偶然性”了。这个滑头保克尔就是这么说的。不论怎么说，这些阴沉郁闷的云杉，这些秋天就落叶的白桦和白杨紧紧地围住了道路，实在令人不快，使人产生一种不安的心情。

当车子驶上了莫扎伊斯科耶公路，在公路上疾驰，后来又在多罗戈米洛夫斯基街上奔驰的时候，斯大林觉得自己镇静了一些，因为这里已经没有云杉、白桦和白杨树了，而在这每棵树的后面仿佛都藏着一支看不见的利箭，它将射向何人，不知道。这儿是街道，警卫调整好了，交通受到阻拦，在这儿，恐怖是起作用的……

古时候，每当帝王坐的车驶过街道的时候，他的臣民都得叩拜并趴下，不得抬头，表现出仿佛自己是奴隶般地恭顺。

不，这样做不是为了这一点，人们应该趴下，不准抬头是为了排除任何谋害的可能性，头一抬，立即就会被警卫的马刀砍掉。这样的秩序真不坏。古人就已经知道如何保卫自己，在人多的情况下如何防卫。但是，如何保卫自己以防宫廷政变，并不是每人都懂得的……

他没有恪守诺言，没有饶过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生命，这样做对吗？

做得对。

为什么做得对呢？

因为审判符合党和国家的利益，被告的供认符合党和国家的利益。

对被告仁慈，对他们自己承认的那些罪行手软，就意味着怀疑他们口供是否可靠，怀疑他们的滔天罪行是否可靠。

对他们心慈手软就意味着宣布的这些滔天罪行是可以宽恕的。

对他们心慈手软就意味着鼓励别人去犯类似的罪行。

对他们心慈手软就意味着给党和国家带来无法挽回的危害。

维克多·雨果说过：一个罪犯，无论他是穿上了劳役犯的囚服还是戴上了帝王的王冠，他依然是罪犯。说得很漂亮，但纯粹是一句法国式的空话。罪犯有他个人的动机，统治者是为了国家利益，所以他不可能成为罪犯，因为只有统治者才能决定，什么符合国家利益，什么不符合国家利益。

关于真理，列宁说得很多，他一直在寻求真理。当然，列宁是个伟大的革命家，但是，很遗憾，他是一个用西方的伦理道德概念培养出来的革命家，所以难免有某种资产阶级

的偏见。

“良心”，这是一个抽象的、空洞的概念。良心是掩盖异端思想的一种说法：“我不是政治家，我没有政治观点，我只有良心。”这是一种狡猾而又巧妙的说法。

有所谓良心的人是很危险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决定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并且把这种权利扩大到所有的范畴，其中包括政治范畴。所谓的良心允许他们评论党和国家的政策措施，也就是允许评论他的行为。所谓的良心允许他们有与他不同的信念，这必须永远彻底制止。

马克思有一次曾经说过：谁也不能因为他的政治信念和宗教信仰而被监禁入狱。马克思是随便这么说的，因为他当时不掌握国家政权，所以，马克思也不无资产阶级成见，要是他掌握了国家政权，他就会明白，政治观点很快便会变成政治行动，有异端思想的人会变成潜在的敌人的。

列宁创建了一个能够夺取政权并掌握政权的党，但是，这样的党在世界人民的历史上已经有过了，有些国家的人民不止一次地夺取政权，但执政时间都不长。

他创建了一个将永远执政的党。

他创建了一个完全新型的政党，一个与各个时代不同的政党，她不仅是国家的象征，而且是国内唯一的社会力量；这个党，不仅其党员的主要荣誉属于党，而且，党员的生命的内容和意义都属于党。他创建了这种绝对的、能代替一切的党的思想，这个思想能代替神、道德、王朝、家庭、伦理、社会发展规律。

这样的党在人类历史上还未曾有过的，这样的党是国家的，他的国家的、不可摧毁的保证。

既然党是绝对的“神”，那么党的领袖也是绝对的“神”。
党的领袖是党的伦理道德的最高体现。

因此，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符合道德规范的，别的道德准则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而道德规范应该为国家服务，应该符合国家的利益，符合他提出的任务。

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干部队伍的革命。为了消灭当前的和未来的敌人，首先必须消灭过去的敌人。

车子驶上了波罗季诺大桥。斯大林很喜欢这座桥，喜欢这些坚实的石桥墩，桥是建筑在这些石桥墩的基础上的；他喜欢为纪念波罗季诺交战而建立的有金属纪念牌的方尖碑，喜欢那些半圆形的、有军事标志的柱廊，这是一件坚强有力、基础坚实、外形美观的建筑物。就是应该这样地建设，而不应当象如今的形式主义建筑师们所建设的那种笨拙的、毫无特色的、火柴盒那样的建筑物。

他们驶向斯摩棱斯克广场，来到了阿尔巴特街。

斯大林又陷入了沉思。

第一阶段已经过去了，第一次审判结束了，被告已全部枪决。

这次审判的教训如何？毫无疑问，审判是正确的，季诺维也夫和加来涅夫是永远被消灭了，从肉体上和政治上都永远被消灭了，这是一。

第二，在审讯过程中，点了皮达科夫、拉狄克、索科利尼科夫、谢列布里亚科夫及其他托洛茨基分子的名，他们已经被捕了，正在侦讯“平行总部”一案，此案与他们有关，但指控犯有恐怖活动，似嫌不足。说到底，恐怖活动是斗争形式之一，马克思主义者正式声明不主张进行恐怖活动，但

并不是因为恐怖活动不道德，而是因为它不起什么作用。可是，社会革命党人则认为它是有效的，所以他们采取恐怖活动方式。民意党人也进行过恐怖活动。个人恐怖活动在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影响根深蒂固，如果大肆宣扬这个问题，它会在青年人中深入人心的，会出现仿效者的，所以万万不能允许这样做。因此对“平行总部”的成员提出的公诉应该是相当严重的指控。

第三，已经点了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及其他右翼分子的名，那就是说，已经为对他们开庭审判打下了基础。

由于在法庭上点了托姆斯基的名，8月22日他已在博尔舍沃自己的别墅里开枪自杀。中央委员会审议了这一事实，但托姆斯基这一行为只能肯定对他的这些指控的严重性，也是反对所有布哈林分子的。

第四，一些军人被点了名，而且已经被捕了，他们是军长普特纳和普里马科夫，师长施密特，这就为消灭以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军队中的阴谋家打下了基础。

这些都是审讯过程中应当肯定的正面经验，当然也有一些反面的教训。主要应该否定的是：准备工作很差，对一些细节考虑欠周密，欠准确，这就向托洛茨基这个无赖提供了在资产阶级报刊上掀起一个辟谣运动的可乘之机。

当然，他掀起这个运动是意料中的事，但是戈尔茨曼的失误是很可恨的。在枪决全体被告整整一个星期之后，丹麦政府的官方机关报《社会民主报》发表了一条消息：布里斯托尔旅馆，即戈尔茨曼提到他同谢多夫接头的地点并由此出发去见托洛茨基的这家旅馆早在1917年就拆掉了，而在哥本哈根没

有第二家布里斯托尔旅馆。

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这是亚戈达搞的名堂，致使审判名誉扫地。

是的，这是他向他们暗示的一个想法：安排戈尔茨曼同托洛茨基碰头。但是为什么偏要找一家现实并不存在的旅馆呢？为什么非要想出在一家旅馆里接头呢？戈尔茨曼可以说他们是在火车站碰头的。戈尔茨曼供认，他是专程从柏林去哥本哈根同托洛茨基见面的。那就可以说谢多夫是在火车站见到他并把他带去见老爷子的。

本来是这么明白，这么简单的事，可是不，偏偏要想出一家旅馆来，而且还是一家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的旅馆。这一类失误不应该再发生了，但亚戈达也将不复存在了。

亚戈达坐在斯大林的面前，在为布里斯托尔旅馆这一失误开脱罪责。工作人员当中有人把在奥斯陆的旅馆名字同哥本哈根的搞混了，在奥斯陆有一家布里斯托尔旅馆。这个工作人员已受到严厉的惩处。

“怎么惩罚的？”斯大林问道。

“降级处理并调到劳改营管理局去工作。”

斯大林厉色地向他看了一眼。

“这是一次破坏活动，是一次精心策划、蓄谋已久、有意损害审判工作的破坏活动，直接肇事者应交军事法庭审判。促成此行为者也应交军事法庭审判。”

“是，”亚戈达答道，“但这位工作人员他姓季亚科夫……”

“破坏党的任务的破坏分子姓什么，我不感兴趣，”斯大林

打断他的话说。

“是，”亚戈达的双唇神经质地不时地痉挛，“这个工作人员，是他自己犯的错误，把在哥本哈根和奥斯陆的旅馆名字搞错了。”

“自己……”斯大林注视着亚戈达，他在为自己人开脱，使自己人免遭打击……“那好吧，就让他一个人为大家承担责任吧。”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道：

“那些没有招供的托洛茨基分子现在关在哪里？”

“暂时还在莫斯科。”

“重新审讯一下所有的人，那些再次拒绝招供的人，作为恐怖分子交军事法庭审判。法庭的判决不公布。至于那些一次都没有投降过的托洛茨基的积极追随者，也用不着让他们在劳改营里再占地盘了。无论是劳改营，还是监狱，还是流放，苏维埃的大地上没有他们的位置，让苏联人民摆脱他们吧！”

“是，”亚戈达的双唇依然在颤抖。

“这些人永远是党的敌人，苏维埃国家的敌人。斯米尔诺夫在法庭上的举动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他出庭是为了败坏法庭的名誉，让他们的追随者来为此承担责任吧。够了，我们已经为他们忙了十年，我们国家比这种养活苏维埃政权不共戴天的仇敌要重大得多的事有的是！”

“是。”

斯大林冷笑了一下：他害怕自己承担责任，害怕做没有证件、没有笔录、没有供词、没有习惯的形式上的程序的事。

“派人到各劳改营去执行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特别会议

全权代表的名义作出的判决。”

斯大林又严厉地对亚戈达盯了一眼。亚戈达还在指望他们在那里也能参照原则性的法律条文相应地处理各个具体案件，又会去准备证明文件以便将来能证明自己无罪。

“不用进行任何调查，不用提出任何指控，”斯大林总结道，“让各劳改营主任开列一个名单，把那些在监禁地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的托洛茨基骨干分子，把那些继续进行托洛茨基反革命谈话的、发表反苏言论的托洛茨基骨干分子的名字写上去，根据这些名单作出判决，立即执行。”

“是，”亚戈达顺从地重复一遍。

“还有，最后一点，”斯大林仍然象刚才那样，严厉的目光一直没有从亚戈达的脸上移开。“‘平行总部’的参加者应当不仅承认他们参与了旨在夺取政权的恐怖活动，而且还要承认他们企图在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帮助下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当然，要投靠这些国家就得割让领土：将乌克兰割让给德国，将远东割让给日本……”

他停顿了一下，问道：

“您的任务明白了吗？”

“明白了。”亚戈达赶紧回答。

“但愿您能愉快地胜任？”

“没有问题。”亚戈达突然以坚定的语气回答说，他的双唇不再颤抖了，只要斯大林察觉出对方表现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就不再会信任他了。

亚戈达一走出去，斯大林就吩咐保克尔和弗拉西克到办公室来，他们早就在客厅里等着了。斯大林告诉他们，过两个小时，他要从库尔斯克车站出发到索契去。无论是谁，无

论是保克尔，还是弗拉西克，从来都不知道斯大林打算什么时候，从哪个车站出发离开莫斯科，他总要等到临行前的最后时刻才通知，这已成了惯例。早在两星期前他在莫斯科的火车和在高尔基城的轮船就已准备好了。

这次没要求坐轮船。斯大林说，莫斯科直达索契，不经过高尔基城和斯大林格勒，过去有时候他是这样走的。

政治局委员大部分都在休假，但叶若夫留在莫斯科领导对“平行总部”审判的准备工作，公开并粗暴地干预亚戈达的活动。

很清楚，叶若夫干预亚戈达的工作不只是作为分管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中央书记，而且是特奉斯大林的指示。亚戈达已经失去了斯大林对他的信任，叶若夫的粗暴、傲慢和厚颜无耻说明了这一点。

亚戈达明白，一般说来，失去斯大林的信任意味着什么，而对他亚戈达，尤其特殊，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了。人们是不会让他们所不信任的见证人活下去的。

情况确实如此，但是相比之下，亨里希·亚戈达也是久经考验的老手，他现在有自己的有利条件，他知道政治局力量的对比。

将近8月底，政治局委员们度完假开始返回，除了斯大林、日丹诺夫和米高扬之外，全都回来了。这时，亚戈达随即将对布哈林、李可夫进行审讯的问题提交政治局审查，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亚戈达的估计是正确的。表决时，赞成将李可夫和布哈

林提交法庭审判的只有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

9月10日《真理报》报道了一则消息：对于指控李可夫和布哈林的侦讯工作由于其犯罪活动缺乏证据而中止了。

但是这一着棋没能挽救亚戈达，相反，反而加速了他的垮台。

1936年9月25日一封由斯大林和日丹诺夫签署的给政治局的电报从索契发至莫斯科：

“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担任内务人民委员职务是绝对必须的，是当务之急。亚戈达在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这一案件中明显地表现出他的无能。在这一案件的审理中政治保安总局落后了四年，这已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全体党员干部和大多数代表所察觉。”

电文的最后三句话意味着除亚戈达之外内务人民委员部其余领导人都应该留在自己的岗位上。

几天之后，叶若夫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任交通人民委员，原任此职的李可夫被免职，但无新的任命。

除了亚戈达的副职普罗科菲耶夫调至水上交通人民委员部，原劳改营管理总局局长马特维·贝尔曼和原边防部队司令员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被补充任命为叶若夫的副职以外，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再没有任何变动，其余全体干部均留任原职，甚至亚戈达的私人秘书布拉诺夫也如此。是的，叶若夫从中央机关带来了几个人，但他们都被任命当各局原局长即莫尔恰诺夫、米罗诺夫、斯卢茨基、保克尔等人的助理了。

不但如此，斯大林还向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原领导人表达了自己的信任，——在12月20日庆祝全俄肃反委员会一国家

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成立周年纪念的时候，邀请他们去参加了一个不大的宴会。

宴会是在亲密、友好、信任的气氛中进行的，斯大林禁止谈论“平行总部”审判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

“尽情地玩儿吧，朋友们！”斯大林说。

朋友们真的尽情地玩了，喝了伏特加酒，吃了按德国方法腌制的鲱鱼，那是不知疲倦的行动局局长、斯大林的贴身警卫队长保克尔弄来的，他一脸受宠若惊的表情，他还是斯大林的私人理发师：能把自己的咽喉放在别人的刮脸刀下，还能有什么比这更高的信任！

战前，保克尔是布达佩斯轻歌剧院的一名理发师。他自我吹嘘说，布达佩斯最有名的轻歌剧演员都发现他身上具有当一个演员的才华，建议他登台演出。

他确实是一个第一流的喜剧演员，随便模仿什么人都行，讲的笑话很精彩，尤其是讲犹太人的笑话和淫秽的笑话。他是一名天生的丑角，就连郁郁寡欢的斯大林也能被他逗得大笑。

这一次保克尔表演了季诺维也夫被押去枪决的情景。

保克尔由扮演押送人员的弗里诺夫斯基和贝尔曼两人的手架着，绝望地挂在他们的肩膀上，哀怨地哭叫着，惊恐万状的眼睛滴溜溜地转着，走到屋子中央后，保克尔双膝跪下，抱住了弗里诺夫斯基的皮靴，贴到自己身上，号叫起来：“同志……看在上帝的份上……同志……给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打个电话吧……同志……”

大家都笑了。

斯大林也得意地冷笑了。

保克尔又重演了一场，但这次演的已不是季诺维也夫，而是加米涅夫了。这次他没有下跪，而是相反，挺起了肚子，将双手举向天花板，然后，模仿加米涅夫的知识分子腔调，悲戚地喊道：“啊，上帝啊！你听我说呀！”

大家又笑了起来，但是，斯大林觉察到，米罗诺夫和莫尔恰诺夫没有笑。他们不高兴，也无法掩饰这种心情，正如那次在他的办公室里听到斯大林保证不枪毙被告时无法掩饰当时的喜悦心情一样。他们为被告惋惜。啊，这种天真的俄罗斯式的恻隐之心啊！假如你把最高权力交给俄罗斯人的话，他会出于怜悯随即就把政权丧失掉的。

但是，保克尔这个可恶的小丑太过分了。政治，这不是什么滑稽戏，悲剧是不应该变成闹剧的。奴才应当知道自己的地位，这个畜生的真正位置是在绞刑架上。万一有什么意外，他也会扮演他这个角色的，出卖灵魂的家伙！

斯大林举起高脚酒杯，向米罗诺夫和莫尔恰诺夫说：

“为您的健康，米罗诺夫同志；为您的健康，莫尔恰诺夫同志；让我们为莫尔恰诺夫同志和米罗诺夫同志的健康，为他们所代表的真正的肃反工作者，为那些认真理解和认真执行他们所面临任务的肃反工作者们干杯！”

他一直没有放下酒杯，用目光扫视了坐在桌旁的全体人员，但对仍然站在房间中央的保克尔、贝尔曼和弗里诺夫斯基却没有回头看一眼。

凡是准备这一次审判的工作人员，以及准备以后几次审判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几乎全部工作人员

都被消灭了。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被处决于1938年3月。

第一副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处决于1937年。

副人民委员普罗科菲耶夫处决于1937年，贝尔曼和弗里诺夫斯基处决于1939年。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各局局长莫尔恰诺夫、米罗诺夫、保克尔、沙宁、加伊处决于1937年。斯卢茨基于1938年自杀。切尔托克则在人们来逮捕他时从自己办公室的窗口跳了下去。

许多其他侦讯人员均和他们的局长们一起同时被消灭。

1937—1939年间被枪决或被判处长期劳役的肃反工作人员总计约为两万名左右。

32

萨沙急切地等待着冬季的邮班，就象他两年多以前在这儿等待第一趟邮班时的心情一样。

萨沙看到的最后一张报纸是刊登关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案件的起诉书的《真理报》。当时他简直震惊极了，怎么也无法相信这些可怕的指控。

现在萨沙收到的是8月20日以后的、9月份和10月份的报纸，上面刊登了审判的全部材料和记录。

被告们都承认是他们杀害了基洛夫，也准备同样地杀害斯大林及其他党和国家的最有名望的领导人，招认他们都是按托洛茨基的直接指示行动的。审讯是公开的，但审讯的时间很短，总共只有几天工夫，没有辩护人。被告们都十分乐意而且流利地叙说自己那些可怕的暴行，他们的供词彼此相似，简直是一模一样。虽然他们都悔悟了，但还是全都被枪决了。被告们供认，不仅原托洛茨基分子拉狄克、皮达科夫、索科利尼科夫、谢列布里亚科夫是他们的同谋，而且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也是他们的同谋。于是维辛斯基当时就下令开始侦讯这些人的案件，而且宣布了劳动人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种种要求。

这一切萨沙无论如何也没法接受。老共产党员、布尔什维克近卫军、列宁的战友、十月革命的英雄、国内战争时期各集团军传奇式的司令员们，这些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党的人都成了杀人凶手、反革命破坏分子和间谍。列宁在世时的政治局的委员们，为十月革命作好了一切准备并进行了这场革命的人们，会向工人的食品中投放玻璃碎片，会去破坏机器，会是外国侦察机关的雇佣人员。假如把这种臆造当作事实，那么，不应该再相信这个党了；假如这个党几十年来是由这些刑事犯罪分子所领导的，那么这个党还值个什么？

是他们自己承认一切的吗？萨沙不相信这一点。千篇一律的，犹如根据别人写好的稿子背出来的供词不可能是真的。这不是他们承认的，这是有人代他们做的，有人扮演了他们这些人的角色。搜罗了一些演员，让他们扮成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扮成斯米尔诺夫和姆拉奇科夫斯基，强迫他们上台表演。姆拉奇科夫斯基出生于沙皇的苦役监狱，他是国内战争的英雄。他会是日本间谍、德国间谍、杀人凶手和派遣者？而且他自己还津津乐道地诉说这一切？不，对不起，萨沙不相信这个。是些演员！要么是施了催眠术！服用了某种特效药！也可能对他们进行了严刑拷打？不，任你采用何种酷刑也无法使这些人承认自己是间谍和杀人犯的。或者是演员，或者是催眠术，或者是某种特效药。是演戏，这是兹维亚古罗说过的。

但是，斯大林不可能不知道这是演戏。没有斯大林的同意，他们是谁也不敢演这种戏的。利季娅·格里戈里耶夫娜·兹维亚古罗是对的，他在毁灭党，从道德上和肉体上毁灭党。这个破坏性的审讯，这个违法的法庭，把萨沙的怀疑彻

底打消了。

斯大林说的是一套，做的完全是另一套。他口头上是为人民，而行动上却恐吓人民。恐吓与暴力是他执政的唯一工具。如果说你萨沙不能阻止暴力，那么，不向恐惧屈服是能做到的。只有这样，仍能算是个人。

但是，显然并不是所有的手段都起作用的，催眠术也不是对所有的人都起作用的。伊万·尼基季奇·斯米尔诺夫在法庭上的行为就证明了这一点。

就在审讯的第一天，8月19日，伊万·尼基季奇断然否认姆拉奇科夫斯基所招供的内容。姆拉奇科夫斯基供认说，是他斯米尔诺夫将托洛茨基关于恐怖行动的指令转达给莫斯科总部的。

审讯第二天，8月20日，正如报上所载：“在将近三个小时的审问过程中，斯米尔诺夫千方百计地竭力回避苏联检察长维辛斯基同志直接提出的问题，妄图缩小自己的作用，否认自己所从事的反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恐怖活动。”

过了一天，8月22日，报纸报道说，斯米尔诺夫“又妄图为自己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总部的活动开脱罪责。

“维辛斯基：你是什么时候脱离总部的？”

斯米尔诺夫：我并没有打算脱离，没有什么可脱离的。

维辛斯基：有这个总部吗？

斯米尔诺夫：哪有什么总部……

维辛斯基：姆拉奇科夫斯基，有这个总部吗？

姆拉奇科夫斯基：有。

维辛斯基：季诺维也夫，有这个总部吗？

季诺维也夫：有。

维辛斯基：叶夫多基莫夫，有这个总部吗？

叶夫多基莫夫：有。

维辛斯基：巴卡耶夫，有这个总部吗？

巴卡耶夫：有。

维辛斯基：那你，斯米尔诺夫，怎么能让自己肯定没有什么总部呢？”

“斯米尔诺夫妄图重新支支吾吾地推脱，说他没有参加总部的会议，但季诺维也夫、捷尔·瓦加尼扬和姆拉奇科夫斯基的供词又一次揭露他说的是假话。”

斯米尔诺夫是唯一在法庭上勇敢地坚持到底的人。8月23日的报纸在结束语中报道说：“斯米尔诺夫无论是在预审中，还是在审讯会上一直否认自己的罪责，否认自己在被捕以后继续从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总部的活动。”

这意味着，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摧垮了，这也意味着那不是演戏。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们究竟是用什么办法把其他人搞垮的呢？

但是，最使萨沙吃惊的是那些反应。各工厂、学校和人民委员部是集体反应，这是习惯如此。在人群中举举手也就罢了。早在8月16日，即审判前三天，报上就登满了工人们召开的各种会议，作出的决议简直让人看花了眼。

“决不饶恕人民的敌人！”

“消灭败类！”

“消灭不共戴天的仇敌！”以及类似的要求。

但现在是一名作家、名演员、名学者的反应！这确实确实是可怕的。

早在8月15日，即审讯前四天，在苏联检察院发布揭开阴谋的消息的那一天，名作家斯塔夫斯基写道：“恶棍和暴徒们，你们的名字将永远被诅咒，永远被鄙视！”

8月20日，苏联作家们宣布：

安娜·卡拉瓦耶娃说：“……由于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恶棍们的无比憎恨，千百万人的心在突突地跳，他们的拳头握紧了！”

伊万·卡塔耶夫说：“让人民的愤怒去捣毁杀人凶手和挑衅者们的老巢吧！”

弗拉基米尔·巴赫梅季耶夫说：“人们将世代永远愤怒和鄙视地记起那些在无关紧要的地方奄奄一息的帝国主义小爬虫！”

阿尔乔姆·韦肖雷说：“用布尔什维克的警惕的目光来观察，就是在我们作家的党组织里，也远不是那么太平无事的。”

尼古拉·奥格涅夫说：“最高法院的判决就是全苏联人民的判决，这个判决将是严厉的，公正的。”

亚历山大·斯维尔斯基说：“多么无耻！这些坏蛋的血管里流的是多么黑的血啊！愤怒和激动使我无法写作。我只能高呼：世界不需要叛徒！”

8月21日——

阿历克谢·托尔斯泰说：“现在不只是苏维埃的法院，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都在声讨的叛变行为是人类历史上为人所知的一切叛变行为中最最卑鄙、最最可恶的行为。”

8月25日——

“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热烈欢迎无产阶级法庭决定枪决法西斯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破坏分子……”

“这些事件……提出了一个审查苏联作家协会成员的问题。要了解你在跟谁打交道……要了解我们作家协会三千名会员的一切情况。必须仔细审查我们协会和它的机构的各个环节。

弗谢·维什涅夫斯基”

“这些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分子，他们是什么人？

这些不是人！

这些只是人样的狗！

A·吉达什”

“我们每个人都感到无比轻松，因为他们都已被枪毙了，世界上再也没有他们了……

他们不会再污染我们美好国家的空气了！

A·巴尔托”

萨沙越往下读这些要求，越感到不知所措。这些作家们哪！作家！人民的良心！在俄罗斯，作家从来都被看作为人民的良心：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

就是说，作家们是相信的！就是说，他们知道这是真情；他们知道这些被告确实是杀人犯和间谍……

也许，事实确实如此？要知道甚至还有他们过去反对派中志同道合的人，就连那些人也在报上痛斥他们哪！

X·拉科夫斯基说：“对那些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

子，杀害基洛夫同志的凶手，对那些妄图暗杀我们敬爱的领袖斯大林同志和其他党和政府领导人的组织者，对那些托洛茨基分子、德国盖世太保的间谍，不应有任何宽容，应当把他们枪毙。”

Г·皮达科夫说：“我们美好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但突然从这具政治僵尸身上冒出一股有害的恶臭气味。那些早就成为政治死尸的人正在腐朽，快要烂完了，污染着周围的空气。但正是在腐烂的最后阶段，他们不仅是很可恶的，而且对社会也是很危险的。”

“什么词汇都难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愤恨与厌恶。他们是些失去了人的面貌的最后特征的人，应当把他们消灭，就象消灭污染苏维埃国家清新的、沁人心肺的空气中的尸体那样，就象消灭要把我们的领袖置于危险的死地的尸体那样，他们已经把我国一位卓越的人，一位杰出的同志和领导人谢·米·基洛夫同志害死了。”

卡尔·拉狄克说：“从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审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姆拉奇科夫斯基、斯米尔诺夫案件、缺席审判托洛茨基案件的审判大厅里向全世界散发出一股死尸的腐臭味。”

“拿起武器杀害无产阶级敬爱的领袖们的生命的人必须为自己的滔天罪行付出自己的脑袋。”

要知道，皮达科夫、拉科夫斯基、拉狄克不久前还是托洛茨基骨干分子，是托洛茨基的主要助手，是他的忠实朋友和追随者。要知道，他们是明白的，假如今天审讯无罪的人，而且仅仅是因为他们过去某个时候曾当过反对派，那么到了明天，也就可能会审讯他们这些人自己，因为他们自己

也曾参加过反对派。假如他们证实莫须有的罪名，那么到明天，同样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也会落到他们头上并反对他们的。不！他们不可能证实不真实的事的……那就是说，这一切都是真的？那就是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和姆拉奇科夫斯基都是杀人凶手和间谍！？

要知道 就连十月革命的英雄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原来也是托洛茨基分子，8月24日，他在《消息报》上写文章说：“这不仅是些两面派人物，胆小的叛徒和恶棍，这还是些法西斯主义的破坏活动的别动队。”

那么，科学家呢？

“毫不留情地消灭苏维埃国家最凶恶的敌人！”这是科学院院士巴赫和凯勒尔的要求。

“我们无限热爱党，热爱斯大林，”卢里亚、维什涅夫斯基、舍列舍夫斯基、戈特利布、马尔古利斯、戈里涅夫斯卡娅、沃夫西等教授这样写道，“我们组成一道活的人墙团团围住我们的伟大领袖，把他作为人类最美好的凤凰的化身，保卫他，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对已经彻底失败的政治匪徒们不应有任何宽容。”

那么，文化活动家呢？

导演普图什科说：“我们应当提高布尔什维克的警惕性，更机警地保卫革命的成果，使它们免受祖国的叛徒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的侵害。”

共和国人民演员阿克·瓦萨泽说：“我要求枪毙法西斯匪帮。对我们伟大祖国的敌人和叛徒毫不宽容。”

共和国人民演员米·克利莫夫说：“三天前，《消息报》上发表了卡季耶夫卡第一中学十年级女生叶娃·涅鲁比娜写的

诗。在该诗的叠句中，针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的话是：‘对你们的判决只有一个，象狗一样地枪毙！’

“我是一个老人，共和国的人民演员，完全同意这位少女说的话。”

下面就是叶娃·涅鲁比娜写的诗，此诗各报都转载了：

你们这些恶棍太卑鄙，
竟敢用死威胁人，
不！你们永远也等不到宽容，
对你们的判决只有一个
把你们象狗一样
枪毙！

这首儿童诗使萨沙害怕极了：一个孩子竟会要求象对付狗一样地枪毙人。可是，为什么狗就应该枪毙呢？要知道，孩子们是非常喜爱动物的呀！也许，现在已经不喜爱了？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出了什么事呢？事实到底怎样呢？

以往，萨沙总是很快地把全部邮件浏览一遍，把全部的报纸浏览一遍，然后再仔细阅读每张报纸。

这一次，他久久地无法放下八月份的报纸了，他无数次地斟酌着一字一句、反复阅读审讯的总结报告以及对它的反响。他懂得，他的命运也和这联在一起。现在，他对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和利季娅·格里戈里耶夫娜所说的话也理解了；黑暗的时代已经来临，闹剧刚刚开场。

一直到第二天，他才开始翻阅其他报纸。

6月佛朗哥将军发动的叛乱开始了西班牙内战。摩洛哥、德国、意大利的正规部队参加了这场反对共和国的战争。报纸上出现了一些西班牙城市和省份的名字：马德里、巴塞罗那、巴伦西亚、巴斯科尼亚、阿斯图里亚斯、安达卢西亚、埃斯特雷马杜拉、卡斯季里亚、伊隆；出现了一些新的人名：阿萨尼亚^①、希拉尔^②、拉尔戈·卡瓦列罗^③、何塞·迪亚斯、多洛雷斯·伊巴露丽^④（浑名西潘莲），也就是热情之花……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枪决以后，报上的歇斯底里立刻停止了。9月10日发布苏联检察院的一条消息“对尼·伊·布哈林和A·H·李可夫起诉的法律材料侦讯机关未能查明，因此，此案停止审理。”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被撤职，由某个叫叶若夫的接替工作。亚戈达的撤职证明了他非法镇压、无根据地指控布哈林和李可夫事件中有错误。当然，没有斯大林的指示，亚戈达是什么也不会做的。他不过是替罪羊。但斯大林不得不退缩了，党显然比斯大林强大。党的干部显然不是利季娅·格里戈里耶夫娜·兹维亚古罗所想象的听人任

① 阿萨尼亚(1880——1940)——1936至1939年任西班牙共和国总统，人民阵线右翼领导人之一。1931—1933年，1936年2—5月任政府首脑。——译者

② 希拉尔(1879——1962)——曾任西班牙共和政府总理，外交部长。1945—1947年1月任流亡的共和政府总理。——译者。

③ 拉尔戈·卡瓦列罗(1869——1946)——曾任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的总理、陆军部长。1894年起加入西班牙工人社会党，1918—1937年任工人总联合会总书记，1932—1937年任工人社会党主席。后渐渐转向反共立场，被开除出政府，并撤消其党内职务。——译者

④ 伊巴露丽——西班牙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译者

意摆布的小卒子，他们显然是能够与斯大林相抗衡的。他们能够限制他，干预他的恐怖政策。可能斯大林在耍什么手段，那就是说，他已不能那样为所欲为，而党的警惕性是很高的。

但是，最使萨沙吃惊的是新宪法草案，甚至令人难以置信。规定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实行普遍平等的直接选举，对苏联公民保证彻底的民主和自由的权利，不以性别、民族、财产状况为转移的平等权利。保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集会自由、示威游行和结社的自由。

这一切都意味着转向自由、民主和法制。当然，把新宪法称为《斯大林宪法》是不大合适的，但问题不在于怎么叫法。今后大家都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甚至可以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组织游行了。象8月份进行的那种审判已经永远也不会再重现了。无法无天的现象该结束了。就连斯大林也说：“我们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法律的稳定性……”

是啊！如果苏联能够通过这样的宪法，她就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了！苏联政府宣布，她认为自己与不干涉西班牙内部事务的协定无关，这就意味着，我们将援助共和的西班牙，承担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给法西斯主义以打击。出现了一条消息：有志愿兵去西班牙保卫共和国。假如萨沙能获释——现在不可能不释放他的——他就立即报名去当志愿兵。让他们把他派到西班牙去吧！那儿共产党人正在同法西斯分子战斗，那儿共产主义的第五团捍卫了马德里。

重新出现了自由的一线希望，现在萨沙有法律保护了。宪法，新的革命高潮，谁也不敢再给他加刑了，一定会释放他的。1月19日他要到阿尔费罗夫那儿去要求释放，哪怕耽误

一天工夫也是对法律的粗暴违反。否则，他就给加里宁发电报，肇事者将受到惩处。法律就是法律，法律是人人都要遵守的。谁也无权让人滞留在流放地，哪怕多呆一天。

就为了预感到的这一天，萨沙担心起来，甚至开始忙碌起来了。如果放他——不可能不放他的——那他的钱够不够路费呀？到泰舍特会发差旅费的，可以后呢？到莫斯科一张票要50卢布呢。不会少于50卢布的，何况路上还得吃东西呢！应该够的。虽然他不让，但妈妈每个月仍然给他寄20卢布。而他在房东那儿过日子，吃饭靠的是自己的劳动日收入。他也常去钓鱼，也割过草，钱只花在烟草和煤油上。现在要节省些了。

他和以往一样地写了很多，又写了四个故事。和上次一样，把故事重抄了一份寄给了妈妈。一切都得让妈妈保存好，以防万一。

1937年1月19日终于到来了。

在这前夕，萨沙就把东西整理好了。什么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可能会立即逮捕，可能会命令他立即出发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宪法归宪法，法律归法律。内务人民委员部还有自己的法律。

这一夜萨沙久久无法入睡，考虑同阿尔费罗夫怎么谈话。虽然谈话内容是很清楚的，萨沙还是想了又想，想象着一切可能产生的麻烦事情，预感到会发生一些意外的事情。

三年了，他一直在等待自己获释的那个时刻，他会得到自由吗？要是突然阿尔费罗夫不在克日马，也到那个克拉斯

诺亚尔斯克去了，而且一去要好几个星期，在这区里走走也要一个月左右呢！区很大，而交通工具则冬天是带后座的大雪橇，夏天是船。假如阿尔费罗夫不在，没有人可谈话，就得等他回来。又要受罪了，一想到这些就令人不快。

早晨七点天刚发亮，萨沙离家出发了。

十二公里路程，步行三个小时，十点他就该到阿尔费罗夫那儿了。

好几天没有下雪，雪橇的路相当坚硬，压得很结实。只有纵树树梢上的雪挂着，一些象是松软的枕头。好象连空气也冻住了，但是山雀却在树林之间飞来飞去。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象是在很远的地方有啄木鸟在啄树干。红腹灰雀在树梢上炫耀着自己的美丽，以松子为食的长嘴鸟在树枝间忙碌着。树林中这种难得有的声音反而使它显得更加寂静。

偶尔从左边稀疏的树林中可以看到安加拉河白色的平静的河面，后来又看不见了。零下三十度的严寒，萨沙身穿暖和的内衣、高领毛线衣、毡靴、大衣，戴着帽子，帽子的护耳放了下来。帽子后面还缝了一块布，这样雪就钻不到领子里去了，萨沙没有围巾帽。他手里拿着一根粗粗的棍子，带棍子走路可以快活些，而且也可能用得着的——用来赶走狼么。

正如萨沙所料，十点整他走到了克日马，向阿尔费罗夫家走去。他家厨房蒙上霜的窗户里闪烁着亮光，不知是灯光还是炉火。门廊旁边还留有脚印，看得出昨天有人来过。家里有人。萨沙敲了敲小门上的金属环，没有回音，连狗也没叫。阿尔费罗夫大概还在睡觉。可是不能等呀，寒气直往大衣里钻哪；毡靴里脚趾头都冻木了。要是在这儿站下去，全身都会

冻僵的。萨沙敲敲闪着火光的窗户，又敲了一下。他觉得有一个人影在厨房里走动，在窗口停住了，显然是想仔细看看是谁在敲门。影子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女主人大概是去穿件暖和的衣服。门廊那儿的门吱嘎响了一声，听到了踩在雪地上的脚步声。门响了，小门打开了。在萨沙面前站着的是女主人，她穿着毡靴，皮袄，扎着头巾。

“您找谁？”

“阿尔费罗夫同志。”

“您来得早了点，他们还睡着呢。”

“我是从莫兹戈瓦来的。”

“那就进来等一等吧。”

萨沙跟在女主人后面来到过道屋，象她那样脱了毡靴，只穿袜子。女主人向他指了指屋角里的暖鞋，他穿上了，来到厨房。

“请把衣服脱了吧，请坐，这儿暖和，”女主人说。

萨沙脱了大衣，把它挂到衣架上，打量着四周。

他在自己的女房东那儿早晨也喜欢坐在厨房里。那时隔夜的炉子还没有冷却，但炉口前的小平台上室内的小火炉却已经生火了，在那儿热早饭。放着一捆刚从棚子里拿来的木柴。木柴散发出冷气和桦树皮的气味，使人感到非常舒畅。

女主人把渍酱果、鱼馅饼放在桌上，往杯子里倒了茶。

“吃一点，喝点茶，暖暖身子吧！”

“谢谢。”

萨沙双手捧起杯子，暖一暖冻住了的手指。

“大老远来的，道路没给暴风雪盖住吗？”

“路很好走。”

萨沙喝了一口茶。

屋子里门砰地响了一声，听见了一个男人吸烟的咳嗽声。

“维克多·格拉西莫维奇他们起来了，他们有自己的洗脸盆，可以在那儿洗脸、刮脸，”女主人说着，仿佛在安慰萨沙，为什么阿尔费罗夫不到厨房里来，“他们那儿也有自己的门可以进出。”

门又砰地响了一下，阿尔费罗夫从院子里回来了。跺着毡靴，抖掉靴子上的雪。接着，洗脸盆里的杆子啪地响了一下，听到了水流进盆里哗哗的响声。

对女主人来说，这是一个信号。她就把茶炊、放酱果、馅饼的盘子拿到吃饭间里，那都是招待萨沙的；然后又回来，把煎锅放到小炉子上，打了鸡蛋煎着。

听得见阿尔费罗夫进了里屋，移动了一下椅子，看来是坐下了，在倒茶。女主人从炉口的平台上拿下了煎鸡蛋的煎锅，拿到里屋去。

“早上好，维克多·格拉西莫维奇，睡得怎么样？没有打扰您吧？”

“谢谢，睡得很好，”阿尔费罗夫答道。

“那儿有人在等您，维克多·格拉西莫维奇。”

“谁在等？”

“一个男人，维克多·格拉西莫维奇。”

“他在哪儿？”

“在厨房里坐着呢。外面冷得够呛，我让他在那儿暖和暖和。他是从莫兹戈瓦来的。”

椅子移动了。阿尔费罗夫出现在门口，他对萨沙看了一眼。

“是您？来干什么？”

萨沙站了起来。

“昨天我的刑期满了……”

“噢，是这样，”阿尔费罗夫没有让他说完：“请到我这儿来吧。”

萨沙尾随阿尔费罗夫进了里屋，在桌旁指定的位子上坐下，坐在阿尔费罗夫对面。

“您喝茶吗？”阿尔费罗夫问道。

不知是由于刚刚睡醒，还是隔夜多喝了几杯，他的脸略微有点浮肿。从萨沙上一次看到他以来，他显得老些了，也变得忧郁了。他穿的是长裤，裤管塞在毡靴里，衬衫外面套了一件羊毛坎肩。

“谢谢，您的女主人已经让我吃饱喝足了。”

“她是一个很好客的人，人家来找我的麻烦，可她总是先让他们吃饱喝足。‘她把孤儿收留了，喂饱了他，使他的身子暖和过来，’您记得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童话故事吗？”

“记得。”

“好。故事里是怎么说的？‘黄昏时分，满天星斗，天寒地冻，街上蹒跚着一个小孩。他脸色发青，冻得全身发抖。小孩说，天哪，我累了，想吃呀。可在这个世界上，谁可怜孤儿啊？’幸亏这位好心肠的老太婆可怜您，让您的身子暖和过来了。不然的话，您会冻死在街上的。您是走来的吗？”

“走来的。”

“哦，”阿尔费罗夫边吃煎鸡蛋边说道，“把孤儿喂饱了，

喝足了，让他们身子暖和过来了。’我记得小时候保姆给我读过，当时我为可怜这个孤儿还哭过的呢。可后来我忘了。从那时候起再也没有想起过。现在才回忆起来。”

“是看到我这副样子才想起的吧？”

“可能。”

“那就是说，您发慈悲了，”萨沙苦笑道。

“也许是，对不起。我刚才出去解手，屁股差点没有冻坏，虽然我们棚子里的厕所挺好，风吹不到。您还赶了十二公里路呢！所以我用诗歌的形式对您表示了同情。您好象对文学并不陌生吧？”

“对，我喜欢看文学书。当然，那得有书看。”

“这儿搞书有点困难，”阿尔费罗夫表示同意：“过去有位女教师供您看书，可现在她不在这儿了。您为什么不去同新来的女教师认识一下呢？那也是年轻的、挺有意思的老师。”

萨沙皱着眉头，以沉默表示回客，因为问题提得很尴尬。

“这说明您不喜欢，”阿尔费罗夫笑了起来，“瞧，您过得挺逍遥自在的呀，潘克拉托夫，对一个坐牢的人来说，对成千上万坐牢的人来说，对几十万囚犯来说，”这时，他意味深长地看了萨沙一眼，以便给他时间估算一下这个庞大的数字。“对囚犯来说，接近妇女一般是不可能的，要是谁能有这种幸运的话，那他就什么都不管了。只要是个女人就行。可您还挑剔，您不但要有点文化程度的，而且还要求从一切方面来说都是高水平的。所以，您的日子过得可够逍遥自在的。”

阿尔费罗夫的闲扯使萨沙感到有点紧张了：找了这么个

喝足了，让他们身子暖和过来了。’我记得小时候保姆给我读过，当时我为可怜这个孤儿还哭过的呢。可后来我忘了。从那时候起再也没有想起过。现在才回忆起来。”

“是看到我这副样子才想起的吧？”

“可能。”

“那就是说，您发慈悲了，”萨沙苦笑道。

“也许是，对不起。我刚才出去解手，屁股差点没有冻坏，虽然我们棚子里的厕所挺好，风吹不到。您还赶了十二公里路呢！所以我用诗歌的形式对您表示了同情。您好象对文学并不陌生吧？”

“对，我喜欢看文学书。当然，那得有书看。”

“这儿搞书有点困难，”阿尔费罗夫表示同意：“过去有位女教师供您看书，可现在她不在这儿了。您为什么不去同新来的女教师认识一下呢？那也是年轻的、挺有意思的老师。”

萨沙皱着眉头，以沉默表示回客，因为问题提得很尴尬。

“这说明您不喜欢，”阿尔费罗夫笑了起来，“瞧，您过得挺逍遥自在的呀，潘克拉托夫，对一个坐牢的人来说，对成千上万坐牢的人来说，对几十万囚犯来说，”这时，他意味深长地看了萨沙一眼，以便给他时间估算一下这个庞大的数字。“对囚犯来说，接近妇女一般是不可能的，要是谁能有这种幸运的话，那他就什么都不管了。只要是个女人就行。可您还挑剔，您不但要有点文化程度的，而且还要求从一切方面来说都是高水平的。所以，您的日子过得可够逍遥自在的。”

阿尔费罗夫的闲扯使萨沙感到有点紧张了：找了这么个

他停顿了一下，想了一下，无可奈何地笑了：

“我猜得到您的想法：阿尔费罗夫这个狗崽子，读了我的文章了。他那见不得人的爪子竟然伸到我的创作的灵魂深处来了。我承认：是的，我看了；是的，我伸了进去。我的职业就是这样的嘛。不过，请放心，您的创作都已寄到您想寄的地方去了。不过，我是您的第一个读者和第一个评论员。想知道我的意思吗？”

这是在拷问！想以此来代替宣布他的命运。但应当掌握住自己！他还该为自己争斗一番！假如他现在动起肝火来，那就等于让阿尔费罗夫知道自己对获释信心不足，而他是不应当这样表现的。因为从今天起，他自由了，就是这样。一切都滚他妈的蛋！

他不甚乐意地答腔说：

“有意思。”

“从形式上看，您的作品是平庸的，幼稚的，甚至是很粗糙的，只是一些词藻华丽的句子，大量的修饰语，表面漂亮。”

阿尔费罗夫给自己倒了点茶，问萨沙要不要，萨沙不要。

“这样吧，我说下去。法国大革命，这是一次最富有戏剧性、最富有教育意义的革命。我要强调人类历史上有教育意义的事件这种说法。可您只写了部分人物、部分情节。是为谁写的呢？为儿童、少年，还是成年读者？不清楚。他们读完这些读物之后应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还有，”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萨沙，“您不怕编辑会进行对比？”

“什么对比？”萨沙不明白。

“哦，什么对比？他们有一场革命，我们也有一场革命。他们的革命是怎么结束的？是以热月政变，以拿破仑的唯一政权，以帝国而告终的……”

“不过，对不起，那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

“对，对，当然，”阿尔费罗夫打断了谈话，“行，那又怎么样？也许还可能会发表的，那当然得要您本人一切都正常之后。您知道，我们这儿是不发表囚犯的作品。因此，我祝您成功，虽然我很怀疑。”

他沉默了，用毛巾擦了擦嘴，抽起烟来。他把烟盒递给萨沙。

“我习惯抽自己的。”

“那就抽您自己的吧。我们这儿有人也抽自己种的烟叶。”

阿尔费罗夫眯缝起眼睛看着萨沙掏出烟卷，燃着火柴，点着了烟，火柴在烟灰缸里熄灭了。那是阿尔费罗夫把它推到萨沙跟前的。怎么，他怕萨沙会把火柴头扔到地板上？

“阿尔费罗夫同志，”萨沙说道，“我的流放期昨天到期了。”

“是吗？”阿尔费罗夫装出一脸惊讶的神色，重新问了一遍。“难道是真的？”

“是的，”萨沙重复了一遍：“这个情况我已经告诉过您了，加上判决前的羁押，我被判刑三年。我是在1934年1月19日被捕的，今天是1937年1月19日，因此，从今天起我自由了。请发给我证件。”

“您是指什么证件？”

“我是指类似情况下应该发的证件。您想必是知道的。”

“行，我发给您。您要了证件干什么用呢？”

“离开这里。”

“去哪儿？”

“回家。”

“去莫斯科吗？”

“去莫斯科。”

“按规定您不能去莫斯科。”

“为什么？”

“您的情况正好符合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身份证条例的规定。有些城市您无权去居住，莫斯科也属于这类城市。”

“但这个决定是在新宪法之前作出的呀！”

“新宪法，”阿尔费罗夫反驳说，“并没有撤消苏维埃政权以前发布的法律和命令。有些法律，更确切地说，有些条例规定是会修改的，会重新审议的，比方说，选举法等等。但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将继续生效。您看过斯大林同志的宪法报告了吗？”

“看过了。”

“斯大林同志直率地说了：‘新宪法草案确实能使工人阶级专政的制度继续有效。’您还想要什么呢？另外，顺便说一下，宪法中没有关于迁徙自由的条款。这种条款一般只在资产阶级宪法中形式上存在。‘迁徙自由’是指可以自由地选择居住地，想在哪儿住，就自由地住在哪里。我们不允许到处漂游。身份证制度中的这种限制暂时没有撤消，也未必就会撤消。”

他把目光从萨沙身上移开，注视着窗外，又意味深长地

补充道：

“相反，我认为还要加强呢！”

“您怎么说就让您说吧，”萨沙说，“但是有一条法律是这样的：不得将一个已服满刑期的人关押哪怕一天。这条法律谁也没有撤销。”

“您是在哪儿看到这条法律的？”

“我看过的，”萨沙撒谎说。

“不对，您是看不到这种法律的，没有这种法律。逻辑是这样的：假如一个囚犯刑期已满，但没有释放他，就是说，没有任何别的理由却继续囚禁他，也就是说，这是违法囚禁。”

“既然如此，那您就放了我吧。”

“我又没有再监禁您。”

“但是我没有证件是无法离开的呀！”

“您的证件在人民内务委员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管理局。这一段路程有一千公里，在这个范围里，流放犯够多的，他们没有来得及准时在1月19日以前把您的证件寄来，会及时送来的，等着吧。要是您不想等，那就请便，我可以给您开一张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路条，到那儿您自己去找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边疆区管理局，去要自己的证件。至于那儿会给您一张什么样的证件，我就不得而知了。”

最后几句话，听得出含有某种威胁的口气：可能给的是服刑期满的证件，也可能给的是增加新刑期的证件。

萨沙没有作声。

“那您自己决定吧，”阿尔费罗夫以结束的口气说道，“是在这儿等证件，还是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去取。”

萨沙仍未吭声，他在考虑。接着，他说：

“我应当今天就获得自由。假如今天得不到自由，我就给加里宁同志发电报。”

阿尔费罗夫笑起来了。

“电报会马上就放到加里宁的办公桌上吗？”

“我不知道，但总会有人对电报作出答复的。”

阿尔费罗夫又眯起了眼睛。

“您给斯大林同志的信收到回信没有呀？”

原来如此。给斯大林的信想必就在他抽屉里，所以他才笑呢！

“您给斯大林同志发信，做得对吗？”

“难道我没有权利给他写信？”

“您当然有权这样做。大家都在给斯大林同志写信，您常看报，您知道。有的是向他报告成就，有的是感谢他在工作中给予的帮助，也有的是感谢他的英明领导。毋庸置疑，也有一些被判罪的人向他求助，正如您所知道的，这样的人还不少呢！您也写信求助了，您服刑服了一半期限，没有抱怨，没有觉得委屈，可是突然，叭的一声，说，我不该坐牢，坐错了，你们快放我！难道是您的案情中出现了新的情况？不，没有出现新的情况呀，所以，您瞧，连信都不给您回！假如要回信，就得有根据，要重新审查案情，可是，没有根据呀！”

“没有，就是说，没有，”萨沙说，“不过一个人总有权利抱有希望吧？总不该剥夺他这个权利呀！”

阿尔费罗夫把茶杯移开了，把肘放到了桌上，严肃地看着萨沙。

“您是对的，一个人有权利抱有希望。但是每个人都应当

周密考虑自己的行为，这是他的义务。您认真地估计过没有，您的信到得了斯大林那儿吗？人家为什么要复查您的案件？就因为您给斯大林同志写了信？不，您没有这样估计，也没有抱这种希望，对这个问题，您是过于聪明了些，这是一个考虑欠周的举动。您给斯大林同志写信，您就使人想起了您，想起了您的存在，让收到您的信的那些机关想起您来，而且，您还控告这些机关不公正地审判了您。您干吗这样做？”

萨沙不作声。他面前的这个人是个什么人？朋友吗？敌人？他直率地说：不应当写信给斯大林，不应当去得罪这些机关的，不应当去让他们注意到自己的。这一切，萨沙一直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但他还是写了信。

“可能是不应该写信的，”萨沙说，“但是我还是写了，早就写了，现在说起来已经没有意思了。但是，从今天起再让我在这儿流放是非法的。对此，我大概是有权控告的。我不知道我的证件什么时候才能到您的手，也可能到不了呢！”

“自由了，您的处境就一定会好些？”

“自由总比坐牢好。”

“您是对的：自由总比坐牢好。”

阿尔费罗夫站了起来，在屋里走动走动。和上次一样，他走近五斗柜，抓住一个果子露酒瓶的长颈，但象上次一样，没有给自己倒，而是拿了两只高脚玻璃杯，放在桌上。

“怎么样，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上次您不愿意和我一起喝一杯，我希望，现在您不会拒绝我；那时您是行政流放犯，我是您的宪兵，而现在，正如您所断定的那样，您是一个自由人，就是说，您可以喝了，而且，您一定要记住今天这个日子。”

他倒了两杯，举起了自己的那一杯，向萨沙点头示意，一饮而尽。

萨沙把自己那杯喝完了。果子露酒有点苦涩，但味道好极了。

“看来，”萨沙说，“我没处可走了。在这儿等证件一点意思也没有，我不能也不想这么做。请您给我开一张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路条吧，我到那儿去寻找法制与真理吧！”

“在我这儿您没有找到，您要到那儿去找，”阿尔费罗夫冷笑了一下，又向果子露酒瓶点了一下头。“喜欢吗？”

“味道很好。”

“我们每人再来一杯怎么样？”

“可以再来一杯。”

阿尔费罗夫又一饮而尽，擦了擦嘴唇，等着萨沙把它喝完。

“您不怕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吗？您动身沿冬季走的道路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用于这种旅行的旅差费我是没有的，到那儿，您得自己付款，比较贵。我们假定您到了那儿，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边疆区管理局，可那儿对您说：您来这儿干什么？您的证件已经发到克日马去了，您回去，去向阿尔费罗夫同志要吧。啊？您喜欢这样来回跑吗？”

萨沙把酒杯移开了，愤怒地向阿尔费罗夫看了一眼。够了！吃了饭没事干的家伙，给自己找到了早晨逗乐的事儿。

“阿尔费罗夫同志！”

但那个人打断了他：

“干吗这么正经呢？我还跟您干杯了的呢！请叫我维克多·格拉西莫维奇。”

但萨沙突然无法自持了，他重又叫了一声：

“阿尔费罗夫同志！对不起，阿尔费罗夫公民！这是一次无聊而又有损我的尊严的谈话，我正式请求您发给我结束流放期的证明信，或者给我一份说明为什么不发证明信的原因的书面材料。”

“好吧，”阿尔费罗夫一面沉思一面说道，“您没有听懂我的意思。遗憾……但是，以后您会明白的。”

他走到隔壁的房间里——那是他的办公室，在桌旁坐下来，写了好久，不住地翻看某一本卷宗，看后又写。后来，将所写的东西用吸墨器吸干了，站起来，回到里屋。

“这样吧，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他故意用讥讽的语气着重强调了萨沙的名字和父称，“这是您刑期已满的证明信，这儿有一栏，您看，”他指了指说，“‘去向’，我给您写的是克日马，这就是说，您直接从我这儿去民警局，那儿会开给您一张身份证，临时身份证，以代替这张证明信，三个月的或六个月的临时身份证，给您什么样的，您就拿什么样的，不要去提什么问题。您一拿到身份证，今天，至迟不超过明天，马上就走。明天恰好有一个邮班到泰舍特去，您尽量搭上它，占到一个位置，我没法发给您差旅费，因为我给您写的证明是到克日马的。无论如何您得设法对付过去，邮递员不会多要您的钱的，把您的箱子塞到雪橇上去，自己步行去。您不要去莫斯科，可以随便去哪一个没有特别制度的城市，把临时身份证换成永久身份证，然后重新再到离莫斯科稍远一点的地方去。大家都希望待在一百零一公里处^①，我劝您别这样，那

^① 当时规定某些政治犯释放后只能在离莫斯科一百公里以外的地方定居。——译者

些地方象您这样的人太多了，你们是不该成堆地聚到一处的，你们应当分散开住，你们也不要来往太密切，一般说来你们不该有任何联系。您年轻，健康，漂亮，您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三年，现在您走吧，到俄罗斯母亲的怀抱里去邈邈吧。去看一看世界。总的说来，这一下您应该明白我说的是怎么了，我的忠告对您应该是有益的。我没有骗过您，您的证件真的没有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送到这儿，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才放您走的。”

停顿一下之后，他意味深长地补充说道：

“正因为如此，我才催您走的。祝您一路顺风！”

他伸出了手，把萨沙的手握在其中。

“把我说的一切都记住吧……但是，我们只是谈了您的历史著作，是这样吗？”

“是的，”萨沙坚定地回答，“就只谈了这些。”

萨沙不知道对皮达科夫、拉狄克、索科利尼科夫、穆拉洛夫等布尔什维克党的重要领导人的新的、规模巨大的审讯已在莫斯科进行两天了。

可阿尔费罗夫已知道了。

1937年是以这一审讯开始的。